

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文库

# Research Libra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al Cul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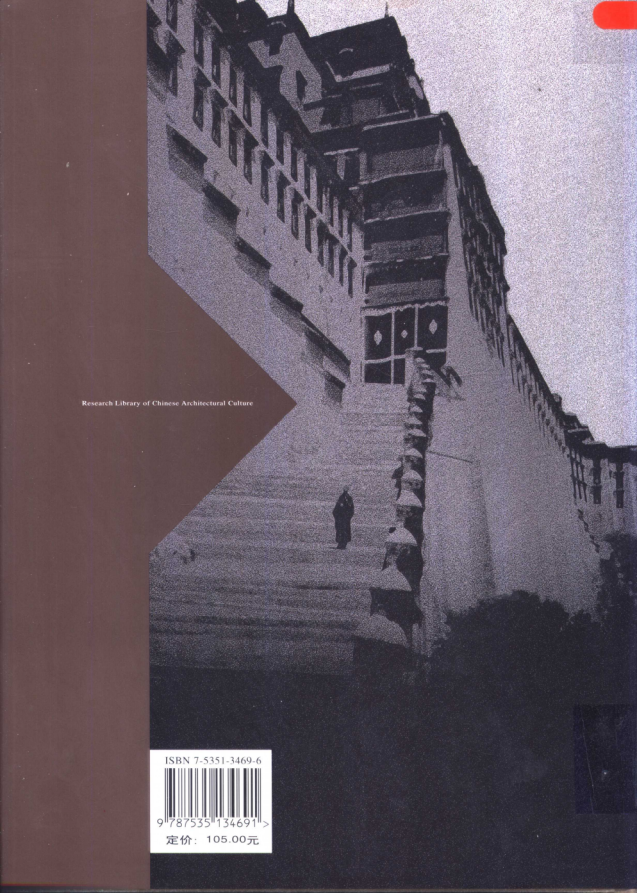
主编/高介华

## 中国西南地域建筑文化

Regional Architectural Culture of Southwest China

戴志中 杨宇振/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Research Libra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al Culture

ISBN 7-5351-3469-6



9 787535 134691 >

定价: 105.00元



主 编/高介华

Research  
Libra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al  
Culture

中国西南地域建筑文化

Regional Architectural Culture of Southwest China

戴志中 杨宇振/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02号

**图书在版编目(CTP)数据**

中国西南地区建筑文化/戴志中、杨宇振著.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文库/高介华主编)

ISBN 7-5351-3469-6

I.中... II.①戴...②杨... III.建筑-文化-研究-西南地区

IV.TU-8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43177号

**责任编辑**

杨唐轩

**整体设计**

夏金中

**责任印制**

张遇春

**出版**

湖北教育出版社

**发行**

地址 武汉市青年路277号

电话 027-83619605

邮编 430015

网址 <http://www.hbedup.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精一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太白路3013号

开本: 889mm × 1230mm 1/16

字数: 278千字

印张: 12.5印张 6插图

版次: 2003年3月第1版 200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书号: ISBN 7-5351-3469-6/T.10

定价: 105.00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 承印) 为你调换)

## 《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文库》编纂委员会

顾问： 吴良镛 齐 康

名誉主任委员： 杨鸿勋

主任委员： 刘先觉 郭湖生 姜齐贵

副主任委员： 吴庆洲 巫纪光 李先述 袁定坤

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志武 王 铎 王 冬 王鲁民 刘先觉

刘 坤 吴庆洲 巫纪光 余卓群 李先述

张十庆 张先进 张万立 张敬龙 杨唐轩

杨秉德 杨慎初 沈福煦 郑振铎 姜传宗

柳 肃 姜齐贵 施维琳 袁定坤 郭湖生

顾孟潮 常 青 喻学才 戴志中 戴 俭

主编：高介华

最后要补充说明的是,文化的内容非常广泛,这里所说的文化主要是指科学技术与人文两方面的结合;写这篇文章时面对很多现实的问题,需要从多方面进行思考,文化方面的探讨只是尝试之一,思考还远不成熟,但结稿时间在即,匆匆提出,希望能引起大家的讨论和研究。

2002年8月25日

[1] 赖纳·特劳拉夫,全球化——第三世界——前景忧虑与赶超希望之间的文化

[2]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3] 据美国百人会在1995年做过的一次调查,“美国人在不少方面对中国持有否定态度,但美国人对中国的文化却有强烈的肯定和崇敬的态度与浓厚的兴趣。”见:Shirley Young, *Cultural as an engine for Shanghai's development* (杨雪兰,文化是上海发展的原动力,中华学人与二十一世纪上海发展国际研讨会),中国上海,2002年7月25日

[4] Mumford, L. *The Culture of Citi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38

[5] 芒福德,城市发展史(倪文彦 宋峻岭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

[6] Hall, P. *Cities of Tomorrow*.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88

[7] Hall, P. *Cities in Civilization*. New York: Fromm International, 2001

[8] 周向群主编,吴文化与现代化论坛:苏州现代化进程中的吴文化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9] 杨雪兰,文化是上海发展的原动力,中华学人与二十一世纪上海发展国际研讨会,中国上海,2002年7月25日

[10] 吴良镛,基本理念·地域文化·时代模式——对中国建筑发展道路的探索,建筑学报,2002(2);吴良镛,广义建筑学·文化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

[11] 刘秀峰同志,共和国第一任建设部长,可以被看作建筑行业行政官员学习专业的代表,对建筑学专业他有两件值得纪念的事,一是在1950年代批判所谓“复古主义”后的1958年,他在上海组织了建筑理论虚谈,探索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筑新风格;二是在1960年代后期,他组织了古建筑研究老中青的代表人物参加,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他也亲自筹划、组织并负责编写,终能在文革前夕得以完成,实功不可没。

[12] 1985年在城市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论城市文化”,中国重庆;文章修改稿见:吴良镛,迎接新世纪的来临——吴良镛城市研究论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



[13] 吴良镛,地方文化与全球文明:面向新的中国地区建筑学,1997年9月现代乡土建筑国际会议大会主旨报告人之一,中国北京

[14] 吴良镛,面向新的中国地区建筑学,华中建筑,1998(3);吴良镛,江南建筑文化与地区建筑学,1995—1996,见:吴良镛,迎接新世纪的来临——吴良镛城市研究论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吴良镛,建筑文化与地区建筑学,华中建筑,1997(1)

[15] 皮特斯,作为杂合的全球化,见:梁展编选,全球化话语,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16] 吴良镛,关于古建筑理论研究,建筑学报,1999(4)

[17] 王国维,观堂别集,国学丛刊·序。

[18] 吴良镛,曲阜孔子研究院设计的学术报告——在曲阜孔子研究院设计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建筑学报,2000(7)

# 原书缺页

原始人群聚集生活开始后,尝试用树枝、泥土、石头等原始材料来构筑生存空间,建筑活动开始了。在进一步的演化发展中产生了城市,城市是人类高效的聚集形态。中国城市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独特的形制,作为社会体制的空间体现,具有显明的东方特征,是世界城市史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城市是农业社会的城市,是具有防御功能的城市。中国古代建筑受宗教、礼仪的影响,受儒家思想的制约,有严格的等级性。王城之内,宫城居中,前朝后市,早在周代,已有都城“营国制度”。中央政权统治和管辖着地方行政,控制着地区经济的发展,在黄河、长江流域逐渐形成了以行政体系为主的城镇体系。在汉民族文化的强大影响下,少数民族城镇仍然保持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必然依托区域政治、经济特点和文化特点,且受到民俗文化的影响。丰富的城市形态遍布于全中国,并不断地延续其生命力。虽然它们有的被战争破坏,被自然灾害所湮灭,但对于它们的发掘和研究仍然是现代城市发展的基础,是中华民族建筑文化生命力延续的象征。中国的城市选址注重依托水系,水系依托大江大湖,江湖依托自然生灵,自然生灵的生存离不开古代的自然生态。虽然经过了几次大的人口迁移和社会变迁,但中国城市始终存在一种相对固定的模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城市历史形态和形象特点,始终得以保持,那些壮丽的城墙、城门、城楼、护城河等构成了城市的坚不可摧的军事防御性建筑形象。

山地的城市与建筑,为适应自然地貌的特性,沿着蜿蜒的山麓,利用易于建筑的地段,与山形和自然环境浑然一体。都城的选址,意在“象天法地”。北京城选址在华北平原,历经千年修葺,特别是明代的大规模建设,使之成为世界城市的瑰宝,保留了最为完整的城垣。西安也是历史文化名城,历经朝代的更替,依然保留了城墙和城市结构的特点。南京是一座宏伟的城市,明代建设的城墙,宽达9m,高13m左右,至今没有哪个城市能比过它的。它顺应自然形态,蜿蜒于钟山之下,北起长江,南至秦淮河,城中有山,山中有水,是适应自然与军事防御相结合的城池典范。东海之滨,历史上有许多海防城市,如惠安崇武古城至今保存完好,在抗击外敌入侵中起过很大作用。中国最宏伟的城墙是长城,从战国时始筑,至明清一直修筑不止,成为人造卫星上可见的中华长龙。

由于中国幅员广大,从风光绮丽的北国到绿林茂盛的南疆,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隔绝,影响了各地区人民的交往,但另一方面,却使各地区的城镇和建筑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文化的交流、民族的融合,不断地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这些都是中国城市 and 建筑发展历史的丰富资源和历史见证,更是新时代技术、文明和文化发展的不竭动力。

我们难以想象如果没有布达拉宫,没有长城,没有故宫、天坛,没有承德避暑山庄,没有各地民居和少数民族的建筑等等,又怎么能够让人们完整地理解中国丰富的古代文化。中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以它们为载体的。文化是人的文化,生

活的文化。文明是文化的凝结。中国各地的民居绚丽多彩,由于各地的气候、地理、人文、生活习俗之不同而呈现出千姿百态,并仍统一在相对固定的院落模式中。从冰封千里的东北看厚大石墙的四合院,从云、贵、黔山地看山寨的吊脚楼,从闽江、珠江流域看飘逸通透的围粤民宅,真是缤纷多彩。又如皖南民居依山面水,一簇簇、一群群,展现着独特的地域文化风情。除黄河、长江外,我国还有许多重要的河流,孕育、产生了不同的地域建筑文化。在大西北的黄土高原,人们利用黄土夯筑墙垣、城墙,城楼建筑十分壮丽。窑洞民居,浑然天成,形成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

中国的山林一般都与人文文化相融合,如泰山、华山、衡山、峨眉山、武当山、武夷山、雁荡山等等,几乎所有的名山大川,都深含文化根基。中国的山水是文化的山水,是与人民息息相关,有血有肉的山水。

中国古代建筑的技术和艺术水平,曾经达到了世界建筑文化的顶峰。建筑以“间”为单元,形成以木构架为主的结构体系,并以砖、石、土材相配合,形成一种特有的组合体,它们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中国古代城市营造中的朴素自然观,曾创造了宜人的人居环境,城市、建筑、园林是一个有机整体。城市的选址依托大自然,城市周围或有绿色的山林,或有优美的水面;城市中的水网系统充分利用自然水系,沿主要水系形成绿色地带。都城中心按方位的不同建有皇家坛、庙,皆有大片绿地林木环抱。城中官衙、民居的合院以至私家园林也均有绿化,更不用说皇家园林了。中国古代的城市、建筑、园林一体化,组成了适合人们游憩栖居的良好人居环境。

中国古代建筑虽以“间”为单位组成四合院,但相互组织的单位是“群”,“群”是中国建筑的基础。“间”和“群”是体现和谐之美的所在。这些“间”、“群”又与自然山形、水面结合,丰富了山水城市的内涵。在城市中,“间”和“群”又形成分层次的街巷空间结构,城市群落有机的组织是中国城市美的主要特点。这些山水城市注重宅第的选址、排水,及有利于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街坊、里弄成为组织、管理生活的基本要素。以“间”为基本单位,形成单体,再由单体围合组织成建筑群体。群体的组织,反映了社会层次的高低,也反映出贫富的等级性。故此,我们便能看到故宫壮丽、天坛均衡、孔庙庄严、民居活泼的各类建筑群体。木构架的使用和形制的完善,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另一重要特点。举架、开间作为形制的基本标准,既可适应社会组织结构中不同等级层次的要求,也能适应不同建筑功能的需要。四合院空间的穿插组织,不论是连续的建筑群,还是独立的一户印民居合院组合,都具有内向封闭的空间特点。由于防御和气候的需要,也多采用内向的院落式布局,强调围合。院落式的围合布局形成了建筑和宅居的群体。由于南北气候的不同,乡村和城



市对地形环境适应的不同,贫富差别反映在群体规模上的不同,防御性强弱的不同等因素,会影响到群体组合形态的特征。

重人伦,强调空间秩序。中国古代传统建筑的群体往往以轴线的方式组织空间,空间结构往往与社会中的等级结构相对应,分别轻、重、主、次,使空间组织秩序井然。中国古代社会是以血缘为组带的组织结构,在建筑、聚落和城市中有空间表现,大量的坛庙、祠堂、厅堂,是祖先祭祀的空间体现。

中国古代建筑以木结构为主体,进入封建社会中期后,木结构建筑,特别是官式大木结构,具有大体一致的形制和模式。这一木结构体系具有广泛的适应性,综合解决了不同使用功能要求和艺术要求的各种建筑需要,充分体现出它的“通用”特征。而民间匠人和建筑的使用者,有些为文人墨客,参与了建筑的设计与营造,他们充分利用木材的特性,配合砖石,有的地方用夯土墙围护木结构,就地取材,丰富了建筑的空间和形式表现力。中国建筑以自己独特的优美线形成为世界建筑史中独树一帜的美丽建筑形体,那飘浮流畅的屋顶,黄色、绿色、蓝色的琉璃,出挑深远的檐口,层层叠叠的斗拱,都显示出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对木构技术的充分理解。中国古代建筑的结构形式也是多样的,虽然木构建筑是一条发展的主线,有完善的形制,但用于墓葬、军事防御、天象观测及桥梁等用途的建筑,却以砖石为基本材料,砖、石拱结构技术达到了较高水平。各种类型的塔,在高层结构技术上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木构建筑的坡屋顶,在形式上很有表现力。木构架有一定的可变性、弹性,对抗震有好处。然而,中国古代传统建筑发展过程中的某些方面也有不足之处:1.从总体上来看,结构上无重大的、跃进式的突破。2.木构建筑围护体系的保温、隔热、防视线干扰的物理性能较差。3.垂直交通系统不够发达,建筑多为单层,超过二层的建筑比较少,且多为塔、阁等特殊类型的建筑。所以,中国古代建筑及其群体大都朝水平的横向发展。

中国古代传统建筑地区差异较大。中国古代建筑的地方性特征明显。地方的风土民俗、建筑材料、装饰细部等等,反映在建筑上,形成了浓郁的地方建筑风格。建材的地方化,木材、砖石、竹子、陶瓷、琉璃制品,即使是同一种材料,如土坯墙,各地的具体做法亦有所不同,形式上亦各有特色。不同的地方材料也丰富了建筑的外观造型。各地区都有结合自然环境的建筑群体,结合地形,利用山水,适应地方气候和地理环境,使群体形态多种多样,丰富多彩。虽然中国古代建筑地区性特征明显,但是地区与地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从来没有停止过建筑文化的交流。中国古代建筑文化曾广泛影响过周边国家和地区,同时,在某些方面也受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产生过合璧的新的建筑类型、新的建筑空间和形式。

使用功能要求、建筑材料、构造、结构,结合度较高。在构造上结合并发挥木材的特性,创造了斗拱这一空间结构,寓美观于其中,材料和形式美达到高度统一。在木材的连接,木材与其他辅材的连接上,构造的功能作用与形式美也是统一的,是建筑材料和构造的真实反映和美的组织。为保护梁柱,雕梁画栋,装饰、材料与功能结合一体。构架组合一般都分为三段:屋顶、墙身、基座,在整体上产生一种和谐的美感。

中国古代建筑集中了多种装饰手法及艺术表现方式,主要有圆雕、浮雕、砖雕、彩画、壁画、编织物、书画、金属饰件等等。装饰纹样的题材多样,深入到生活的各个层面,内容丰富。装饰的部位有梁柱、屋脊、马头山墙、檐口等等。建筑的用色大胆、丰富、醒目,强调与环境的配合协调。中国的东南部建筑有多种色彩的配合,适应山清水秀的环境。寺庙建筑多用黄色墙体,掩映在绿水青山中,体现出浓郁的宗教气氛。青藏高原的寺庙、宫殿建筑色彩尤为鲜艳明亮,在茫茫荒漠的景色中,突出了建筑对环境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中国古代建筑的营造过程中技术分工明确,高等级建筑的营造,分大木作、小木作、瓦作、砖作、石作、彩画作等等。后期,发展到30多个匠作种类,形成了繁复的内、外檐装修体系。建筑施工工序计划极为周密。

中国古代建筑的营造,在组织机构上有完善的工官制度,国家设立了专司管营造的将作监(将作少府或工部)。在建筑设计上,很早就采用了模型审定的方式。为了准确地估算工程量、征集材料与加强施工管理的需要,制订了各种法式或作法则例,最著名的是宋代李诫的《营造法式》和清代《工部工程做法》。在施工中则运用了图纸放样的方法。严密的施工组织管理制度加上以木构件的标准断面为设计模数的方法,简化并系统化了材料的加工程序,便大大地提高了设计、施工效率,加快了营建速度,大量的民间匠人是建筑设计、营造的主力军。

充分利用大自然的赐予。在建筑中充分利用自然通风、采光。在黄土高原,窑洞建筑有良好的保温、隔热、防风效果;在气候恶劣的青藏高原,不仅运用开窗大小和布幔来控制通风采光,而且采用芦苇做外墙,以提高墙体的保温性能;运用对景、借景的园林手法,将大自然的美与建筑中人的审美结合起来。聚落和城市的选址具有防灾观,溯水筑城,城内的水系有利于防火。防火山墙及建筑群内的水井、水池等也有利于防火,但建筑的用材及建筑密集程度往往又构成了防火的不利条件。

中国具有5000多年深厚的建筑文化传统,中国古代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近百年来,封建思想意识的落后面,工业化的滞后加上外敌入侵和军阀割据混战,使国力衰弱。在外来文化面前,古老的中华传统建筑文化,在整体上变成了弱势文化。在社会的激烈变迁中,中国建筑缺乏功能的提升,技术的飞跃和空

间形象的大突破。即便如此,中国近代也出现了一批有作为的真正意义上的建筑师,他们吸取国外的经验,奠定了开业建筑师制度和中国建筑学教育的基础,探索了一条吸收、传承和转换的建筑创作和建筑教育的道路。所以,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很自然的形成了近代五种建筑形态的特征:

1. 帝国主义列强带来的早期现代建筑和殖民样式建筑。
2. 出自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尊重和崇敬,外国建筑师探索、设计的中式建筑,以及大量的中国建筑师对传统建筑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之作。
3. 学成归来和本土的中国建筑师,运用所学而创作的早期现代建筑。
4. 由于文化的交融,为适合业主的兴趣与当地建筑杂交所产生的一批地方的加洋式的或中国古代传统样式加洋式的,变异多态的民国建筑。
5. 由于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和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的稳定性、封闭性,一方面保存了大量传统的乡土建筑;另一方面,民间的乡土建筑不断更新,清末、民初的地方乡土建筑没有停止过发展。

尽管如此,我们应当清楚的认识,上述五种子建筑文化的类型的混杂所体现出的传统建筑文化的整体性弱势,在中国不太可能在传统的地区建筑文化中产生新的地域主义。所以,从近代开始,在对外开埠的城市,在传统建筑文化整体弱势的形势下,具有了与西方交流的特征。这个分化分离的过程,强势外来建筑文化必然对这些地区和城市的传统建筑文化产生冲击和破坏,从而使它们失去了原有的魅力,发生了一次无序的新陈代谢过程。从近代的民国时期一直到今天,中国传统的建筑文化没有很好地完成“传承—转换—创新”的过程,没能在整体上将传统的建筑文化转化推进成强势建筑文化。同时也缺少对建筑历史的深层次的思考。所以,在建筑学上难以形成完善的体系,只能从国外生硬的搬来,消化、转化、进化得不够。

近50年来,中国的各项事业都有了极大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加快了中国建筑业的现代化进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更需要树立国人的建筑意识,有必要向社会普及建筑文化知识。应当看到,中国现代建筑的发展道路上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创造性的解决,这些问题包括:

1. 行政权力过多的干预,有时阻碍了建筑师聪明才智的发挥。
2. 城市和建筑的设计与建造过程中,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还要进一步加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要落到实处。
3. 人们还没有从大量的建设中,理解城市和建筑的本体。
4. 缺乏对城市和建筑的整体研究。

5. 缺乏对地域主义的理解和研究, 缺乏对传统和地域建筑文化的现代表现及其他与地区现代建筑设计和建造体系结合的整体研究。

6. 对建造过程与地区建筑文化传统的研究还有待加强; 对地区建筑的材料、构造、结构的关系的研究还有待系统地深入。在此基础上, 建构新的有传统和地区精神的现代建筑设计和建筑教育体系的工作需要大力推进。

7. 建筑师缺乏独立自主意识, 在外来强势建筑文化的冲击下, 缺少自己的主张和创新意识, 因此要加快建立自我的建筑文化价值体系。在建筑的创作过程中, 离不开合作、协作, 因此要强调团队精神。

8. 对现代建筑技术缺乏整体、深入的研究, 在传统和地区建筑文化背景下, 转化运用现代建筑技术的途径和方法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9. 现代建筑技术与艺术的结合方式和途径在探索之中, 适应时代发展和国情的完善和建筑教育体系, 还在改进和建立完善之中。

10. 对城市 and 建筑中人的行为、活动、交往缺乏整体、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 在人和社会的需要与建筑功能的转化之间也缺少系统的研究。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文库》的编纂出版实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为了开创中国建筑文化的新时代, 我们要研究如何吸收外来建筑文化的精髓, 同时要克服、摒弃人们的屈从思想。要有更新、创造的主体意识, 探索出一条中国自身的建筑文化发展道路。文库的出版本身就是一种振兴传统建筑文化之举, 会极大地提高人们的民族自豪感, 激发民族的振兴和创新意识。

我们还应发挥建筑评论和建筑批评的作用, 这些作用体现在以下方面: ①促使中国整体建筑设计水平和建筑建造质量的提高; ②统一和提高建筑设计者、使用者和管理者的认识, 知道什么是好的城市环境, 什么是好的建筑; ③促进建筑艺术和建筑技术水平的提高; ④促进建筑设计手法的丰富和建筑空间构成艺术的提高; ⑤让社会更关注城市的环境和建筑, 促进全社会建筑意识的提高, 培养大众的建筑鉴赏兴趣, 提高大众的建筑素养, 以便他们在参与设计中, 更好的发挥作用。对于古代建筑历史和传统建筑文化的整体研究, 无疑是建筑评论和建筑批评的基础之一。《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文库》的出版在这方面会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希望中国的建筑文化, 像一条巨龙, 又腾飞起来, 建立新的价值观。继承吸取祖先创造的建筑文化的精粹, 积累发展的力量, 创造发展的条件, 奠定发展的基础。从这层意义上讲,《文库》的出版增强了人们的自信, 振奋了人们的精神。寻求地区自身的优秀建筑文化的发展, 在对传统文化深入地剖析和深层次的思考的同时, 还要看到世界现代建筑的



发展,在兼容并蓄的同时也在追求地区文化的保护、再生和创造。实际上,保护建筑文化的多样性,就像保护生物种类的多样性一样,是人类自身发展的需要。所以,我们不能固步自封,要创造合理的机制,寻求完善的体制,更要培养大量优秀的规划师、建筑师、建筑教育家以及城市和管理者。

学传统、研究传统不是违反,也不是自大狂妄。完善的建筑意识观的形成,不可能完全脱离民族和地区的传统,不要把传统当成前进的负担,要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胸怀和气概。

《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文库》的选题所涉范围是比较全面的,从中国古建筑思想、理论、建筑制度、建筑文化观、建筑艺术、建筑形制、中西建筑文化交融等各个层面来阐释中国建筑文化的特征,是一套全面研究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大型学术丛书。这在国内还属首次,必将促进我国建筑研究学术水平的提高,并对完善全社会的建筑意识产生积极作用,发挥广泛深远的社会效益。在对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研究中,还要进一步重视对传统建筑技术和建造过程的整体研究,鼓励用新的方法,新的观点来重新诠释古代传统建筑文化,所以文库要不断地充实。中国建筑需要建构适应时代新发展的“传承—转换—创新”机制。建筑是大地的印记,优秀的建筑师的创作一定有广阔的天地。《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文库》的出版,就像茫茫大海与天相接处出现的一片建筑文化的船帆,正向我们驶来,愈来愈近,愈来愈清晰。

2001年11月于南京

## 总序(一)

# 论中国建筑文化的研究与创造

吴良镛

### 1 新时期的建筑文化危机

#### 1.1 欣欣向荣的建筑市场中地域文化的失落

当前,中国经济快速稳步发展,建筑设计、城市设计的“市场”欣欣向荣,非常热闹。大小竞赛不断,并且似乎非国际招标不足以显示其“规格”。影响所及,国际上一些建筑事务所纷纷来中国的主要城市“抢滩”,进行一场“混战”(说它是混战,因为出题往往未经过深入的可行性研究,发标、评委组织匆匆忙忙)。由于目前中国建筑师新生力量在茁长,设计机构在重组,经不住大型竞赛的诱惑,因此只能被动地参战。这不觉令人联想到1920—1930年代中国建筑事务所在上海等地的租界争一席之地的情況。尽管经过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大发展,过去与今天已不能相提并论,但目前中国建筑师正面临新一轮的力量不平衡甚至不公平的竞争则是无疑的。

繁荣的建筑市场中的设计竞赛,广义地看,是科学技术与经济实力的竞争,也是地域文化的竞争。一般说来,科学技术与经济竞争的目标和要求较为明显,“指标”具体,而建筑文化的竞争、设计艺术匠心的酝酿则较难捉摸,但非常重要。目前,一般商品市场的竞争战略观念已经从产品竞争转变到核心竞争力,要求掌握“核心专长”,即要拥有别人所没有的优势资源。有人说21世纪竞争将取决于“文化力”的较量,对建筑来说,颇为确切。中国建筑师理应熟悉本土文化,才能够赢得这方面的竞争,但事实上未必如此。兹举首都博物馆的例子说明:应该说首都博物馆设计不是一般的建筑设计,它本身是文化建筑,又建在中国文化中心、首位历史文化名城中的主要大街上,建筑构思理应追求更多一些文化内涵和地方文化特色,事实却很令人失望。从参赛的一些方案包括中标的方案中,我们并不能得到这种印象。这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在国家大剧院设计竞赛中,由于操办者的偏颇以及中国某些同行们的哄抬,那位建筑师搞言“对待传统的最好办法

## 编纂“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文库”的缘起

高介华

如果说在英国的建筑史学家弗列治次所编绘的“建筑之树”这棵大树上，“中国及日本的建筑”还能凑合成一小小的枝丫得到存在，那么英国建筑师法古孙(James Fergusson)就干脆把中国的文化也一股脑儿压入了地下。因为“中国无哲学、无文学、无艺术，建筑中无艺术价值，只可视为一种工业。此种工业极低级而不合理，类似儿戏。”这使我们联想到中国的某些老奶奶在跟自己的小孙子“儿戏”时会开开玩笑说：“你是从你妈的腋窝里生出来的”一样地有意思，因为小孙子毕竟对自己的怎样出世还茫然无知。

新浪建筑人有一句口头语：建筑是要用心去“读”的。看来是有点道理。

西方人多热爱“茶花女”，却少有知道《桃花扇》和李香君的；不少中国人也爱奥赛罗和朱丽叶，却少有知道窦娥和杜丽娘的，大概也就是少“读”的缘故吧！

名著《红楼梦》用上的汉字可能不足四千个，一般读者大体上不会将字读白。如果读了半天，还只知道贾宝玉爱林妹妹，焦大却不喜欢，恐怕会使地下的曹雪芹感到悲哀。所以有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红学家在不停地精读。

对于法古孙和弗列治次的断语，好在有他们的老乡李约瑟博士在生前作了回答，原因是博士用了60多年的时间来攻“读”中国文化。

用心读中国建筑的西方人并非没有。曾任第一任罗马教廷驻华使节的刚恒毅枢机主教就是一例。他确立的北京辅仁大学校舍的建设方针是：“整个建筑采用中国古典艺术式，象征着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和信仰。我们很悲痛地看到中国举世无双的古老艺术倒塌、拆毁或弃而不修。我们要在新文化运动中保留着中国古老的文化艺术，但此建筑的形式不是一座无生气的复制品，而是象征着中国文化复兴与时代之需要。”<sup>①</sup>辅仁大学的总建筑师、比利时艺术家格里森(Dom Adelbert Gresnigt O.S.B)在他的

*Chinese Architecture* 著述中饱蘸浓墨,激动地写道:“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中国建筑是中国人思想感情的具体表现方式,寄托了他们的愿望,包含着他们民族的历史和传统。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一样,中国人也在他们的艺术中表现出本民族的特征和理想。中国建筑在反映中国民族精神的特征和创造方面并不亚于他们的文学成就,这是显示中国民族精神的一种无声语言。”“在华教会采用糅合中国建筑形式的最终目的,是想以这种与众不同的建筑形态来反映真正的中国精神,充分表现出中国建筑美学观念,为创造性地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更广阔的前景。”<sup>[2]</sup>

我们知道,早在中国的春秋时代,孔子就对楚文化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所谓的“南方之强也”就是指的楚国,他怀着恐惧而又欣慰的心情感叹:“微管仲,吾将披发左衽矣!”还认为南方文化比周文化更文雅,更有文采。可是,仅仅在半个世纪以前,有多少人谈论过楚文化呢?由于新中国考古事业的飞速发展,以及哲学、文学、历史地理学、文学艺术以至于城市、建筑等多学科领域的研究,楚文化的奇谲瑰丽才展现于世界。如今,楚文化已被公认为“光彩神州,丰润中华”,“宛如太极之两仪”“与西方希腊文化交辉齐光”的灿烂文化,不就是能让世人瞩目多“读”的缘故吗?“楚学文库”面世后,中外学术界更惊奇地发现,原来楚学是一片值得研究的学术沃土。

自1989年始,中国建筑学术界配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的“世界文化发展十年”(“VNESCO World Decade On Cultural development 1988-1997”)紧扣国际建筑师协会提出的“建筑与文化”这一研究主题,开展了全国性的“建筑与文化”研究学术活动。与此同时,自然要广涉中国文化与建筑的再发掘和研究。在“建筑与文化1996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提出的一系列专题研究中,不少是属于中国建筑文化的范畴。又经过一年来的努力,而有编篡“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文库”之举。

中国建筑文化是各民族长期共同熔铸的亦属于多元一体的文化结晶,无论是文献、实物,皆有深厚的底蕴。近现代的老一辈建筑学者对于中国传统建筑特别是形制方面已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从文化高度切入的多层面的全方位的研究尚在开创阶段。

就本“文库”的系列而言,从建筑文化学到建筑思想的渊源、流变,从建筑的词源到典章制度的考索,从墓葬建筑到园林,从史前的聚落形态到历代城市的演变,从创作理论到形制的源流,从装饰艺术到小品的文化观,从建筑的外部空间构成到环境生态观,从历代名作、名匠到军事、桥梁建筑艺术莫不包罗并列、几乎各专著本身即具有创新性。

诚然,我们的心情也像20世纪初侨居中国的刚恒毅主教一样,“很悲痛地看到中国举世无双的古老艺术(中的某些绝世珍品)倒塌”了。毕竟,刚恒毅惋惜的只是某些建筑实体的毁弃,而中国建筑所铸成的历史文化丰碑是不会倒塌的。“文库”的奉献就在于提供



一些“读”本。

中国建筑文化源远流长,且形成了多个亚文化圈内的特色。至于是否博大精深,还是让读者自己去精心品味,作出客观的评判吧!须得申明的是,“文库”的主旨重在推动中国新建筑文化的开拓与发展。就研究中国建筑文化而言,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向前迈出了大大的一步,放眼观之,则此路方长,绝非终结。

1997年5月31日于武昌

---

[1][2] 参见董黎. 中西建筑文化的交汇与建筑形态的构成——中国教会大学建筑研究. 南京: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1995.3。

就是把它逼到危险的境地”，今天试看到处“欧陆风”建筑的兴起，到处不顾条件地争请“洋”建筑师来本地创名牌，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种种现象都反映了我们对中国建筑文化缺乏应有的自信。

### 1.2 城市“大建设”高潮中对传统文化的“大破坏”

浙江绍兴原是一个规模并不大、河网纵横、保存得也相当完整的历史文化名城。它与苏州分庭抗礼，分别是越文化与吴文化的代表，对绍兴不难进行整体保护，甚至有条件申请人类文化遗产，可决策者却偏偏按捺不住“寂寞”去赶时髦，中心开花，大桥大改，建大高楼、大广场、大草地，并安放两组不伦不类的庞大的近代建筑。不久前我旧地重游，黯然神伤。这种遭遇何止一地？在“三面荷花一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济南大明湖，现在因为湖边高楼四起，在湖中只能看到残山剩水，已失去昔日烟波浩渺的诗情画意。目前，中国城市化已经进入加速阶段，在大建设的高潮中这类“建设性破坏”已经有发生，北京从1980年代后期兴起的危房改造，确实改造了一些危旧房，但拆个不停，现已从旧城边缘拆到历史保护地段的城市中心精华地区，眼看雕梁画栋、绿阴满院的住宅，一夜之间夷为平地，不禁为之黯然神伤。

上述两点危机绝非孤立现象，尽管情况错综复杂，其共同点则可以归结为对传统建筑文化价值的近乎无知与糟蹋，以及对西方建筑文化的盲目崇拜，而实质上是全球化与地域文化激烈碰撞的反映。

### 1.3 全球化对地域文化的撞击

全球化是一个尚在争议的课题。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交通传媒的进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从积极的意义来说，其经济方面可以促进文化交流，给地域文化发展以新的内容、新的启示、新的机遇；地域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沟通，也可以对世界文化发展有所贡献<sup>[1]</sup>。连美国塞缪尔·亨廷顿也说：“在未来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sup>[2]</sup>。但是，事实上，全球化的发展与所在地的文化和经济日益脱节，面临席卷而来的“强势”文化，处于“弱势”的地域文化如果缺乏内在的活力，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和自强意识，不自觉地保护与发展，就会显得被动，有可能丧失自我的创造力与竞争力，淹没在世界“文化趋同”的大潮中。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当然不能算是弱势文化<sup>[3]</sup>，但是由于近百年来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缓慢，科学技术落后，建筑科学发展长期停滞不前。虽然在1920—30年代涌现出近代建筑的前驱者，努力不懈地介绍西方建筑，整理中国遗产，创建名作，功不可没，但1950年代后，由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影响，对世界建筑思想的发展缺乏全面的了解，甚至仍在为过时的学术思想等所支配。如对国际式建筑、现代建

筑拳拳服膺。现代形形色色的流派劈天盖地而来,建筑市场上光怪陆离,使得一些并不成熟的中国建筑师难免眼花缭乱;与此同时,由于对自己本土文化又往往缺乏深厚的功力,甚至存在不正确的偏见,因此尽管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面对全球强势文化,我们一时仍然显得“头重脚轻”,无所适从。

失去建筑的一些基本准则,漠视中国文化,无视历史文脉的继承和发展,放弃对中国历史文化内涵的探索,显然是一种误解与迷茫。成功的建筑师从来就不是拘泥于国际式的现代建筑的樊笼,美国建筑师事务所设计的上海金茂大厦就是一个证明。可惜我们自己的建筑师队伍对中国文化认识还不够,钻研不深。

## 2 “城市黄金时代”与城市振兴的机遇

### 2.1 一本书的启示

城市文明与文化一直为学者们所倡导。在1940年代,美国评论家、在历史人文社会诸多领域著作等身的学者芒福德(L.Mumford)鉴于资本主义社会城市的兴起与当时的社会现象,曾撰写了《城市文化》(*The Culture of Cities*)<sup>[4]</sup>一书,后意犹未尽,又进一步发展为《历史中的城市》(*Cities in History*)<sup>[5]</sup>,受到国际、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在上个世纪末,英国城市学家霍尔(P.Hall)在写了《明日之城市》(*Cities of Tomorrow*)<sup>[6]</sup>之后,又撰写《城市文明》(*Cities in Civilization*)<sup>[7]</sup>一书,进一步选择西方2500年文明史中的21个城市,细评其发展源流、文化与城市建设特点,指出城市在市政创新中具有四个方面的独特表现:①城市发展与文化艺术的创造,②技术的进步,③文化与技术的结合,④针对现实存在的问题寻找答案。他指出,在城市发展史中有十分难得的“城市黄金时代”现象。这特别的窗口同时照亮了世界内外,如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14世纪的佛罗伦萨,16世纪的伦敦,18—19世纪的维也纳,以及19世纪末的巴黎等等,清晰可见。为什么它形成在特定的城市,并在特定的时期内,突然地显现其创造力?为什么这种精神之花在历史的长河中短暂即逝,一般在十几年、二十年左右,就像它匆匆而来一样又悄然逝去?为什么少数城市能有不止一个黄金时代?为什么又难以捕捉并创造这智慧的火花?在此我们无法对这本巨著所涉及的城市作摘要叙述,对书中的观点也未必全然同意,且作者声明,这本书并不试图说明一切。该书对5000年的中华文化等尚未涉及,这就从另一角度促使我们思考自己的文化史、城市史。中国黄金的城市时代是什么?对唐长安、洛阳、北宋汴梁、南宋杭州、元大都以至明清北京等一般的情况,学者们大体有所了解,我们可以从中再发现什么?(说到这里,我很懊悔自己当年在林徽因先生在病榻上与我聊汴梁的时候,我未能一一记录下来。)我们不一定像霍尔那样得出同样的结论,但是这些城市确有极盛一时的辉煌,它的发展规律等待我们去发掘和阐明。

## 2.2 中国的城市黄金时代已经到来

事实上,今天的中国城市无论沿海还是内地都处在大规模的建设高潮之中,可以说已经进入城市的黄金时代;并且,依笔者所见,与西方可能有所不同的是,中国可以有若干城市同时塑造它们的黄金时代。在此情形下,关键就看我们如何在国家或主管部门总的建设纲领的指导下,审时度势,及时地根据当地条件,针对自己的特有问題,利用技术进步,创造性地加以解决。每个城市如果真正地深入研究自己的历史文化,总结其历史经验,捕捉当前发展的有利条件,创造性地制定发展战略,不失时机地调动多方面的条件包括文化优势,等等,城市发展必将大有可为。最近苏州召开“吴文化与现代化论坛”,研讨会就颇有创意,首次公开向社会公开招标,征集研究课题,把研讨会当作过程来办,促成了营造社会氛围和抓好研究成果的互动;我大致浏览该论坛的文集<sup>[9]</sup>,觉得它给我们的启发还不仅在对吴文化本身的历史发展(从吴越文化到六朝及以后的江南文化等),还在于通过对吴文化价值的新认识,将吴文化研究的主题从历史推向了现代。鸦片战争后,上海开辟租界,“海派文化”的兴起,至少使我国江南文化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反过来又影响江南文化的发展,至今上海及长江三角洲的发展仍然具有巨大的活力。不久前,上海召开“中华学人与二十一世纪上海发展国际研讨会”,美国百人会常务理事、百人会文化协会主席杨雪兰女士指出:“文化是上海发展的原动力”,“上海具有丰富和多彩的文化历史,并且已经开辟了特定的文化基础的通道,上海目前需要的是一个全面的、战略性的计划去推动和促进其充满活力和独创的文化,从而来显示上海在中国和世界的独特位置。”<sup>[9]</sup>

在《城市文明》一书中,霍尔批判了斯宾格勒(Spengler)所说的“西方文化的衰落”(也包括对芒福德批判)。在斯宾格勒预言的80年后,芒福德预言的60年后,霍尔以本人的著述为证持有异议。在世界大城市中都一直保持着持续的创造力与持续的再创造,而整个过程似无尽头,无论西方文化或西方城市都无衰微的迹象。中心的问题是,为什么城市生命能自我更新,更确切地问,点燃城市之火的创造的火花本质是什么?我们可以思考霍尔所提的问题,但更要反躬自问,难道中国建筑文化传统真的成为“弱势文化”?处在“危险的边缘”?在燎原的全球文化下,就如此一蹶不振?面对中国如此蓬勃的建设形势,除了吸取西方所长外,就如此碌碌无所作为?我们不能不反求诸己。

在此,我想再次重申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在全球化进程中,学习吸取先进的科学技术,创造全球优秀文化的同时,对本土文化更要有一种文化自觉的意识,文化自尊的态度,文化自强的精神。”<sup>[10]</sup>

## 3 开拓性地、创造性地研究中国建筑文化遗产

综上所述,我们迫切需要加强对中国建筑文化遗产的研究并向全国学人及全社会广为介绍,这是时代的任务。中国史家对建筑文化的研究不遗余力。1940年代,梁思成先生首著《中国建筑史》;1960年代,经刘敦桢、梁思成、刘秀峰<sup>11</sup>等人的倡导,曾组织当时全国的建筑研究力量,编纂《中国建筑史》,八易其稿;1980年代,十年动乱刚结束即着手编纂《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华夏意匠》也问世;嗣后,《中国大百科全书》之“建筑·园林·城市规划”分卷中,中国建筑部分以其严谨的内容,光彩照人;近年来,一系列大型中国建筑图书编辑出版,亦为盛事。如果说1960年代《中国建筑史》的编纂是第一代、第二代建筑史家结合的盛举,文革后的《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是第二代的成果,那么近几年来除了第二代的建筑史家力作相继问世外,一系列中国建筑新图书的出版,如《中国民族建筑》、《中国建筑艺术史》,以及《古建园林技术》杂志等,青年史家脱颖而出。应该说中国古建筑研究经过三代之努力已经蔚为大观,功绩卓著,形势喜人。

但是,从现实要求看,已有的工作还远不能适应时代需要。一般讨论建筑文化,每每就建筑论建筑,从形式、技法等论建筑,或仅整理、记录历史,应该说这方面的努力有成功、成熟与开拓之作,这是一个方面。今天,建筑与城市面临新的发展形势,我们宜予以更为宽阔的视野,看待建筑与城市文化问题。过去,我不断浅陋,对建筑与城市文化方面曾作了一些评论,如对城市文化<sup>12</sup>、地域文化<sup>13</sup>、地区建筑学<sup>14</sup>的提倡,在建筑创作中提高文化内涵等理论的阐述,此处不再重复了。现针对经济与城市化大发展,以及欣欣向荣的建筑市场,对建筑与城市文化发展作一些新的探索。

#### (1) 着眼于地域文化,深化对中国建筑与城市文化的研究。

文化是有地域性的,中国城市生长于特定的地域中,或者说处于不同的地域文化的哺育之中。愈来愈多的考古发掘成果证明,历史久远的中华文化实际上是多种聚落的镶嵌。如就全中华而言,亦可称亚文化的镶嵌(mosaic of subculture),如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三星堆文化、巴蜀文化等,地域文化发源连绵不断。地域文化是人们生活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下,世代耕耘经营、创造、演变的的结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哺育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共同组合出色彩斑斓的中国文化空间的万花筒式图景。

如果说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在通史、断代史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开创性的工作,相应地,在地域文化研究方面则相对不足,甚至有缺憾(地域文化不是没有人做,但分散而不平衡)。多年来,本人提倡地区建筑学,其理论与实践不能没有地域文化研究的根基,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次去西藏就深感对地域文化的再发现,很惭愧年近八旬初窥宝库,相见恨晚。西藏幅员之广阔,文化之深厚,民族之纯朴,实给我以极大的教育,

亦坚定我对地域文化研究之责任与信心。

前人云“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地域文化有待我们发掘、学习、光大。当然这里指的地域建筑文化内涵较为广泛，从建筑到城市，从人工建筑文化到山水文化，从文态到生态的综合内容。例如，中国的山水文化有了了不起的蕴藏。中国的名山文化基于不同哲理的审美精神，并与传统的诗画中的意境美相结合，别有天地。在我们对西方园林、地景领域中有所浏览之后，再把中国园林山水下一番功夫，当更能领略天地之大美。

另外必须说明的是，地域文化本身是一潭活水，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有学者谓全球文化为“杂合”文化(Hybridization)<sup>[15]</sup>。地域文化本身也具有“杂合”性质，不能简单理解为纯之又纯，随着时代的发展，地域文化也要发展变化；另一方面，随着本土文化的积淀，它又在新形式的创造与构成中发挥一定的影响。这些都属于较为专门的问题，此处不多中述。

## (2) 从史实研究上升到理论研究

中国建筑文化研究向来重史实，这是前贤留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传统，但理论建树必须要跟上来。<sup>[16]</sup>对建筑文化遗产研究要发掘其“义理”，即对今天仍然不失光彩的一些基本原则，如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环境伦理思想，“惜物”等有益的节约资源的观念。从经典建筑群中，我们可以总结建筑规划苗头的艺术规律，例如举世闻名的布达拉宫中，顺治初年的三座殿堂，后来又经过不同时代断断续续的添建，从中可以领悟建筑群递增的规律(growth development)与自组织现象。

在理论研究中，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是对中国近代建筑文化的研究。中国近代本身就是中 with 西、新 with 旧、成功 with 失败、革新 with 保守交融的时期，从历史经典的作品，建筑师本人的身上，也可以找出时代发展的轨迹。以前文已述及的“海派文化”为例(建筑部分)，这里充满传统与革新、碰撞与融合、理论的困惑与矛盾，又有中而合璧的“石库门”建筑的实践，其探索对今天仍不无启发。因此，可以说抛却近代历史，理论研究也就不完整。

就理论研究来说，我们有必要加强“西学”与“中学”根基。我已多次介绍过王国维先生的名言：“中西之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讲究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sup>[17]</sup>当前中国建筑师在国际竞赛中处于弱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西学”与“中学”根基都不够宽厚。相比之下，“中学”的根基尤为薄弱。就素质来讲，我们的学生是非常优秀的，我倒不愁他们对当前国际建筑成就吸收的能力。当然需要正确的观点和方向，辨别精华糟粕，但同时更希望善为引导他们在“中学”上要打好基础，在科学上要有整体性理解，在艺术修养上要达到高境界，在思想感情上要对吾土吾民有发自内心的挚爱。最近我成行西藏，动力就来自对祖国“宝藏”补课的愿望，它激发我对祖国文化宝藏进一步学习和发掘的信心，

因此我也联想到中国建筑文化的“文艺复兴”。我无意低估西方建筑师在中国的可能贡献(例如在近代上海就曾经出现过“万国博览会”),但中流砥柱,有理由更寄期望于我们的学人,打好根基才能与时并进。当然,加强“西学”与“中学”根基,并不是要求每个人都能像梁思成先生、童寯先生那样融会贯通。但我们在治学的态度和方法论上,也应该向这个方向努力,把历史和现实中纷繁的、似乎“孤立”的现象连缀为线索,渐成系统,并作东西比较研究,这是提高文化修养,激发对新事物的敏感,促进创作意匠的关键之点。

### (3) 追溯原型,探讨范式。

为了较为自觉地把研究推向更高的境界,要注意追溯原型,探讨范式。建筑历史文化研究一般常总结过去,找出原型(prototype),并理出发展源流,例如中国各地民居的基本类型、中国各种类型建筑的发展源流、聚居形式的发展以及城市演变,等等。找出原型及发展变化就易于理出其发展规律。但作为建筑与规划研究不仅要追溯过去,还要面向未来,特别要从纷繁的当代社会现象中尝试予以理论诠释,并预测未来。因为我们研究世界的目的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对建筑文化探讨的基本任务亦在于此。历史和现实留存了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如当前全球文化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并未弄清楚,作为研究工作者,总要有一种看法与见解。当然随着形势的发展可以不断修正、充实、完善,也有可能否定。如果继续深入研究,就不仅是一种看法,甚至可以提高到对某种范式(paradigm)的建构,可以促使我们较为自觉地把理论与实践推向更高的境界。这是我们观察事物的着眼点、立足点,这样可以促使我们开阔视野,激发思考,我们的历史研究就必然逐渐从专史到史论,从单纯的历史、文化研究到关注现实,关注未来,并以多学科的视野寻找焦点、生长点,探索“可能的未来”。其实,有创见、有贡献的中西方学者多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现实也要求、迫使我们非如此不可,时代在前进,我们要随时改进我们的学习。

### (4) 以审美意识来发掘遗产,总结美的规律,运用于实践。

科学和艺术在建筑上应是统一的,21世纪建筑需要科学的拓展,也需要寄托于艺术的创造。艺术的追求是无止境的,高低之分、文野之分、功力之深浅等一经比较就立即显现。如果我们在研究中能结合建筑与城市设计创作实践,以审美的意识来发掘其有用的题材,借题发挥,当能另辟蹊径,用以丰富其文化内涵。

例如,我们在山东曲阜孔子研究院的设计创作中,对这样建立在特殊地点(孔子家乡)的特殊功能的建筑物(以研究和发挥儒学文化为内容)的建筑,它必须是一座现代建筑屹立在这文化之乡,同时自当具备特有的文化内涵。果然在对孔子同时代——战国时代的建筑文化,及对中国书院建筑的发展沿革、形制,进行一番探讨之后,从建筑构图、总体布

局、室内外造型上,包括装饰纹样等都作了一定的探索。既选择其内在的“含义”(meaning),又予以现代形象表达,创造一种“欢乐的圣地感”(sacred space)。因此整个设计能独树一帜,被誉为该市的现代标志性建筑。<sup>[18]</sup>

像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除列入保护名册的历史名城与历史地段外,可以借题发挥大做文章的城市、地段真几乎所在皆是,就看你如何去因借创造。有了丰富的历史、地理、文化知识,就好像顿生慧眼,山还是那个山,水还是那个水,但有了李、杜题韵,东坡记游,立即光彩照人。“落花流水皆文章”,涌出了无穷的想象力,促使建筑师、规划师以生花之笔勾画出情理兼融的大块文章。

#### (5) 推进并开拓文物保护工作

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如梁思成等在从事历史研究的同时,即重视文物保护工作(修缮、复原设计以至历史名城保护,抢救因城市发展行将被拆除的文物等),据理力争,做了大量工作,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思想理论体系。改革开放以后,文保工作的情况发生很大变化,建设规模变大,内容变多,时间紧急,保护规划工作一般跟不上,并且由于投资者各种方式幕前幕后的介入,法制的不断完善,这项工作的复杂性与日俱增,破坏文物的行为此起彼伏,几乎日有所闻,文物保护工作异常艰苦,收效不一。当前的客观情况要求必须积极推进并开拓文物保护工作,包括扩大保护工作的内容(从古建筑园林到城市,从人工建筑到自然景观),研究符合实际的可供操作的保护措施(例如适当地再利用等);争取更多的专业工作者合作;吸收社会各阶层热心人士参与,唤起全社会的认识与关注,乃至争取决策者的秉公支持,力挽当前混乱局面。在所有这些工作中,出于专业职责和对历史与后人负责的考虑,文物学术界有识之士在发掘史实,参考国际成功经验与理论,密切与规划工作者结合,投身实际,提出切实措施等方面,更是当仁不让,义不容辞。

#### 4 喜赞“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文库”的编纂与发行

从文化角度研究建筑,或从建筑论文化问题,应视为近十年来中国建筑研究工作的重大进展,其中有两件事值得提出(也是我亲身经历的):一是自1989年在湖南大学“千年学府”的岳麓书院召开的“建筑与文化”学术讨论会,前后开了6次会议,从不同侧面推动了研究的进展;二是1996年建筑与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后,在高介华先生的努力下,组织“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文库”的编纂,计划出书30余种,蔚成系列,短短几年,已见成果,将在今年10月庐山召开的会议上先推出第一辑。我尚未读过书稿,但“文库”总目所列,正是涉及中国建筑文化方方面面的重大问题,是值得加以研读的,也正是我个人渴望猎取的知识。它的出版必将对中国建筑研究以大的推动,欣喜之余,聊书感怀,权代总序。





<b>第一章 绪论</b>	<b>1</b>
第一节 “西南”的概念与范围	2
第二节 西南地域建筑文化研究的意义	3
第三节 研究现状	5
一、相关学科的研究概述	5
二、建筑学领域内的研究	6
<b>第二章 西南地域文化背景</b>	<b>9</b>
第一节 中国三大文化区与西南地域文化	10
一、文化多源说	10
二、北方游牧文化区	11
三、黄河流域旱地农业文化区	12
四、水田稻作农业文化区	12
五、西南是中国三大文化板块延伸、接触、碰撞、交融的地区	12
第二节 文化圈与文化生态系统	13
一、“文化圈”与“地域文化”	13
二、“文化生态学”与西南地域建筑文化	17
第三节 地理空间与地域文化	18
一、巴蜀地区(农耕文化区)	20
二、川西滇西北地区(农耕—游牧文化区)	26
三、滇黔地区(农耕—渔猎文化区)	29
四、四川地域文化的亚层次划区及其建筑文化特征	31
第四节 民族学背景	33
一、氐羌族系	35
二、百越族系	35

	三、苗族族系	36
	四、百濮族系	36
	五、地理空间·民族分布·建筑类型	36
第五节	西南诸信仰	37
	一、文化接触与西南宗教格局	37
	二、宗教影响与建筑承传	38
第六节	廊道	38
	一、自然廊道	39
	二、人文廊道	39
第七节	小结	42
第三章	西南地域建筑谱系与特征	45
第一节	邛笮	47
	一、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	48
	二、藏、羌、彝族关系简考	49
	三、邛笮的分布与分类	50
	四、邛笮民居的基本特征	51
	五、文化差异与建筑特征差别	54
	六、传播与变异:喜马拉雅山麓、甘肃、青海等地的“邛笮”建筑	58
第二节	干栏	59
	一、东亚、东南亚、中国南方地区“干栏”	60
	二、水田稻作与干栏	61
	三、分类与分布	63
	四、基本模式与特征	64
	五、黔东南、桂北苗侗干栏聚居区	65
	六、文化生态·物质民俗·干栏	71
第三节	合院	72
	一、农耕文化与合院建筑	74
	二、分布与分类	74
	三、基本特征:“通用设计”与“外部空间设计”	76
	四、合院与山地	77
第四节	关于井干	78
	一、“井干式”结构	78
	二、井干房的分类与分布	78
	三、井干房的结构形式与建筑类型	79
	四、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井干”板屋	79

第四章	西南地域建筑类型与现象	85
第一节	地理空间与聚落模式	87
	一、属性构成	89
	二、形态构成	91
	三、形态特征	93
第二节	移民与会馆建筑	94
	一、会馆产生的社会背景	94
	二、会馆职能	95
	三、会馆特征	98
	四、会馆建筑退出历史舞台及其社会意义	99
第三节	摩崖石窟与摩崖寺庙	102
	一、从石窟到寺庙的空间形制演变	102
	二、摩崖石窟与摩崖寺庙的分布路线	104
	三、摩崖石窟与摩崖寺庙的特点	105
第四节	山地交通与码头文化	107
	一、从“水驿”到“码头”	108
	二、“码头”的败落与更新	111
	三、案例简析	111
第五节	小结	115
第五章	地域技术与西南地域建筑文化	117
第一节	地域主义批判	118
	一、地域主义在中国	118
	二、技术：双刃剑	119
	三、“文化观念”与“技术模式”	120
第二节	回归的路程——生态关怀的“文化观念”	120
	一、学者与论著	121
	二、报告与会议	123
第三节	绿色通道：生态观念影响下的技术模式	123
	一、增长极限论与建筑技术模式的选择	123
	二、技术的追问：建筑设计技术诸模式	124
	三、广义的建筑生态技术	125
	四、针对建筑设计本身的生态技术	125
	五、气候的启示：三种不同地域气候特征下的探讨	129
第四节	形式的背后：西南传统地域建造技术初探	135
	一、厚重环笔	135

二、轻盈栏杆	141
三、文化合院	146
第五节 过去到现在:西南地域技术现代化思考	149
一、微观层面:传统技术的评估和认识	149
二、中观层面:场所研究与建筑设计	151
三、宏观层面:生态技术与“开发生态学”	154
四、关于能源:太阳能、风能利用与地区建筑的发展	156
第六节 小结	159
结 语	162
附录:合院建筑外部空间设计初探	163
主要参考文献	170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第一章

绪 论

“它(现代科学技术)不仅破坏了传统的文化,这一点倒不是无可挽回的错误;而且破坏了我暂且称之为伟大文化的‘创造核心’,这个核心构成了我们阐释生命的基础……一方面,它(传统文化)必须扎根在自己历史的土壤中,熔炼一种民族的精神,并且在殖民者的个性面前显示出这种精神和文明的再生。但是,为了参加现代文明,它又必须参与到科学、技术和政治的理性行列中来,而这种理性又往往要求把自己全部的文化传统都纯粹地、简单地予以抛弃。事实是:每个文化都无能承受及吸收来自现代文明的冲击。这就是我们的谜:如何又成为现代的而又回到自己的源泉;如何又恢复一个古老的、沉睡的文化,而又参与到全球文明中去。”

保罗·利库尔《历史与真理》

## 第一节 “西南”的概念与范围

首先就是对“西南”在空间上和文化上的理解和界定。比较而论,迄今为止的各种论述中,可将其划分为“狭义”西南观与“广义”西南观两种。狭义的界定沿袭了自《史记》《汉书》《后汉书》中《西南夷列传》的概念,将“西南”界定在“巴蜀西南徼外”的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区;广义的“西南观”则突破了行政区限制,结合历史人文与自然地理的共性与差异性,划出一个包含川、藏、滇、黔为主的空间领域。刘敦桢先生在1940年受事中央博物院与中国营造学社对西南诸省古建筑进行调查时,对于西南有一大略定义,“窃以为西南诸省之涵义,在地理上,系指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广西五省而言,即东经 $93^{\circ}\sim 113^{\circ}$ ,北纬 $21^{\circ}\sim 34^{\circ}$ 之间”<sup>[1]</sup>。任何一种自然空间的划分事实上都是一种人文现象的划分,应该兼顾人的活动与自然地理的共性。——对于“西南”的界定应该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出发,综合自然地理因素又兼具历史的特点,形成一个视野宽阔的“西南”概念。童恩正先生在其《中国西南民族考古论文集》中对于“西南”有一较全面的描述:

“中国的西南地区,位于亚洲大陆的南部,包括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和西藏自治区。其西部为青藏高原,南部为云贵高原,北部为四川盆地。全境海拔高度相差悬殊,动植物的垂直分布差异很大,故而品种繁多,物产丰饶,十分适宜原始人类的繁衍生息。从地理位置上看,本地区北接黄河流域,南与印度、不丹、缅甸、老挝、越南等国为邻,是连接亚洲大陆腹地与印巴次大陆及中南半岛的枢纽。”<sup>[2]</sup>

这段描述从更宽广的范围明确地表达了“西南”的空间领域与地理生态环境特点,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指出了西南地域与周边的邻接关系,尤其是突破了行政区划的界定,注意到“西南”是“连接亚洲大陆腹地与印巴次大陆及中南半岛的枢纽”,从而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西南”概念——本书“西南”界定范围大致与之相当,然而具体的边界并不十分明确。因为这些边界往往处于不同文化特质的边缘,具有文化的过渡性和渐变性的,所以无法如划分行政区那样将其分隔开来。比如在黔、湘、桂三省交界处的侗、壮、瑶等少数民族,多民族杂居在一起,有着类似的历史演化背景,其间区别很难截然分开。因而可以说本书研究的“西南”是一个明确又模糊的区域概念,明确是有相对清晰的空间领域,模糊则是其边缘的渐变性。

## 第二节 西南地域建筑文化研究的意义

“中国西南确是研究中国民族学、民族史的宝库。……因此,西南的民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中国古代的多样性的民族情况,西南民族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中国民族史,同时西南民族文化的细节也常反映着中国古代文化的细节。”<sup>[3]</sup>——张光直的这段论述足以说明西南地区研究的重要性及其意义。就建筑文化研究而言,也可以说,“西南地区的建筑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中国古代多样性的建筑情况,西南的建筑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中国的建筑史”。

无论从自然生态角度还是人文生态角度而言,“西南山地”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从自然生态角度看,由于整个西南山地生态图中的海拔落差大,山地分布众多复杂,导致其“环境基因”的多样性:多地形、多气候、多河流、多物产。地形上,从海拔 5000 多米的青藏高原到逶迤延伸的云贵高原,其间山谷林立、盆地众多、落差巨大。大小山脉分布其间,纵横交织、错综复杂,形成区域性的垂直立体地形。(图 1-2-1-2)从雪域高地、高原湖泊到一马平川、河谷、丘陵、高坡、坝子、石林等,呈现出多种多样的自然地理特征。同时,地形的变化多样导致气候的垂直差异十分明显,具有寒、温、热带等不同气候类型,是典型的“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立体气候。独特的地理条件与多样的立体气候,使西南山地地区动植物资源极为丰富,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之称。再者,这一生态圈中布满了众多河流与高原湖泊。以云南为例,“云南有六大江河水系的 600 多条河流。是金沙江(长江上游)、南盘江(珠江上游)两大国内江河的上游;元河(红河上游)、澜沧江(湄公河上游)、怒江(萨而温河上游)及瑞丽江、龙江(伊洛瓦底江上游)四大国际河流的上游……还有湖面大于 1 平方千米的 37 个高原湖泊和众多的高山冰泽湖”<sup>[4]</sup>。

丰富的水资源、富饶的动植物物种、山地多样的地形特征、立体的气候条件是“西南山地”自然生态的表现。这种多元的自然地理基质客观上为人类聚居创造了多样的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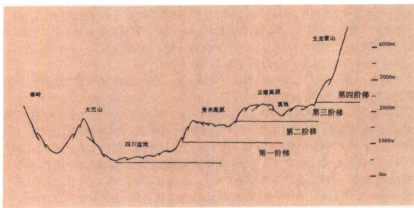


图 1-2-1 西南山地空间剖面概貌 (采自《秦汉时代的中国西南》2000 年,2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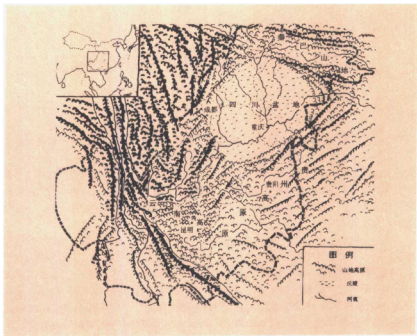


图 1-2-2 西南地域  
空间概貌 (来自  
《秦汉时代的中国西  
南》2000 年, 4 页)

是“西南山地”出现多元文化类型的生态前提。——而这也是研究西南地域建筑文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人文背景上,西南山地文化具有“多民族、多宗教、多分布、多边缘”的特点。由于西南地貌的立体多样,在空间上很难像中原文化形成高度统一的文化类型,客观上为此地区居住的人类划定了若干彼此隔离的、相对稳定的生长点。各生长点在若干相似或各异的自然空间中演化发展,为不同样式的文化提供土壤,最终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化丛群(Culture Complex),同时也形成西南山地文化“大分散,小聚集”的整体多元格局。

客观的地理生态环境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建筑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西南地域建筑文化中有着多支不同背景的亚文化分支。刘致平早年调研四川传统住宅,就总结道:“自古以来四川即有很多的各种少数民族居住滋长,后来汉人移入渐多,同化日甚,清初各地移民入川,又增加了文化的复杂性;于是四川住宅形制是非常丰富了,不过概括说来四川古代宅制大约不外乎三种:(1)普通官室式,(2)碉房,(3)干栏”<sup>[5]</sup>。综观整个中华建筑文化圈,有这三种鲜明特色的建筑形态共存的,尚存的区域也就仅有西南地区。——仅仅从这一点上来看,西南山地建筑文化就有着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

再者,如果从更广的范围来审视中华建筑文化乃至东亚地区的建筑文化发展,则西南地域建筑文化更显现出重要之意义。西南地域处在几大文化板块的交界处,历史上长期以来是各方移民流离迁徙之境,成为各种文化交会的地方,这一过程深刻地烙在了西南建筑的方方面面。郭湖生在《我们为什么研究东方建筑》一文中写道:“越出国界、区界作宏观大系统的考察,例如近年来日本学者提出的‘照叶林文化’包含东南亚、中国南部以迄日本本土及冲绳这一广大弧形地带。其共同特征是气候与自然植被的相似,水稻栽植、牛耕、竹器与竹编工艺等。中国古代的滇文化、闽越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等也属于这一大系统。宏观地研究这一系统的萌生、发展、在中国境内的存在与变化,其文化形态、



信仰崇拜、聚居形态、建筑艺术等问题,必然要和统一系统的其他支系比较而后,才能更深刻准确地认识其位置、阶段和特殊性质。”<sup>6</sup>这一段论述深刻地指出了建筑文化联系性研究的重要性,这里面理应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地域文化的本体研究,二是地域文化间的联系与影响。由于西南地区特殊的地理区位使得西南山地建筑文化的研究在中华整体建筑和文化圈中更显示出重要意义。“如果能进一步弄清不同地区建筑文化的渊源,和各地建筑文化发展的内在的,而非臆造的规律,比较它们相互之间的差异,研究其空间格局,这将不仅大大深化我们对中国建筑发展的整体认识,并进一步阐明其个性所在,加深对整体个性的理解,且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建筑的区域特色”<sup>7</sup>。

### 第三节 研究现状

早在1942年,经过艰辛的调查之后,刘敦桢先生在四川南部宜宾的李庄写下了《西南古建筑调查概况》一文,其中有“故吾人欲于短期内完成(西南诸省)详尽而系统之调查,殆为事实所难许可”<sup>8</sup>之慨,又从其调查日记中可以感受到当时之困难。刘敦桢先生一行实为我们的榜样。无论从那一方面来看,作为人类最早的发源地之一,西南的方方面面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然而无论从那一个时期来看,西南都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长期以来,西南仅是“一点四方”结构之中的“蛮夷”之地——加之其山峻水险,民族零落分布,客观上导致了西南文化研究,尤其是西南地域建筑文化研究的相对薄弱。

#### 一、相关学科的研究概述

首先是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学科意识到了西南的价值,在这里找到了他们丰富的研究资源。——第一批成果很可能是在民国时期。“西南联大”迁移云南,带来的大批知识精英开始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西南,艰辛的田野调查与亲身体会使“西南”在他们的笔中渐露端倪。刘敦桢先生的《西南古建筑调查概况》、刘致平先生的《中国居住建筑简史》中的四川居住建筑部分大致也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解放后,包括四川大学、云南大学等在内的高等学府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出了相当的成果,也产生了一批包括万国瑜、汪宁生、童恩正等在内的颇有成果的学者。其中,童恩正通过考古资料与自然环境特征、历史文化渊源等方面的整合分析,提出在我国东北至西南存在着一一条半月形的文化传播带,是较有价值的一个学术观点<sup>9</sup>。另外又有费孝通、宋蜀华等民族研究工作者也将目光投向了西南这块神秘的熟土。费孝通从“多元一体”的整体角度来对待中华民族的起源、发展,有助于用联系的观点审视西南民族主体的变迁<sup>10</sup>;宋蜀华则提出“云贵高原是中国三大文化板块延伸、碰撞和交融的地区”的观点,从而为西南文化的多样性来源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论证<sup>11</sup>。近年来,又有学者蓝勇发表了80万字的《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结合“古文爬梳”与“田野调查”,从诸多方面论述西南历史时期文化的特征、演化,在学术界引起相当的关注<sup>12</sup>。从国外的研究来看,一些学者从广域的视野来研究亚洲文化的起源、发生、发展,研究亚洲文化内部各亚文化圈之间的联系时,也发现了西南地域的重要性,比如美国

哈佛学者张光直,日本学者佐佐木高明,前苏联学者伊茨等。再有,由于“干栏”是一种多要素组成的文化复合体,其分布面广,影响深远,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民族学和建筑界研究的重点课题<sup>[3]</sup>。而西南地区是干栏建筑最为集中的一个区域,我国学者戴裔煊、安志敏、谭继和等就曾经利用民族学、考古学以及相关的文献资料进行过一定的研究。众多的研究发现,中国的西南地区很有可能是人类起源的摇篮,早期西南多样的自然生态最适合人类的繁衍生息。

另外,由于西南具有独特的地理空间特性,西南的文化具有相对的一致性,有不少学者提出了建立“西南学”——一门地域文化学,将“西南”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研究西南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从人类学、文化学、生态学、考古学、地理学、宗教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角度审视西南的历史、现状与发展,从学术的角度出发将观察的视角从“中国的西南”转换为“西南的西南”而至“世界的西南”。<sup>[4]</sup>在笔者看来,这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只有更深入地挖掘地区文化的特色,才有可能丰富中华整体文化的内容;只有发挥各个地区的文化特色,这才有中华整体文化的特色。笼统的“特色”,大一统的“特色”事实上就是抹杀了真正的“特色”。建筑是多因素综合的结果,需要从众多层面来剥茧抽丝。而其他学科取得的成果则为西南地域建筑文化的研究提供良好的学术研究背景。

## 二、建筑学领域内的研究

对西南文化研究的薄弱相对造成西南建筑文化这一领域研究的薄弱。建筑文化的研究与地域生态紧密相关,脱离地域的自然与人文生态空谈建筑文化则是“刻舟求剑”,是没有根基的空泛研究。在笔者看来,近现代中国建筑文化务实的、较有影响的研究,早期着重对古建筑的调研与资料收集整理(如营造学社的工作);20世纪80年代期间有一批民居的实态收录(如《桂北民居》、《福建民居》、《新疆民居》等);近期则有从多角度结合其他门类学科对建筑文化进行剖析的趋势,如从风水与建筑关系的角度、从社会学、类型学、民俗学角度等。这一过程是符合事物发展程序的;从资料掌握到技术层面研究再到价值观等与建筑的深层次关系探讨。更进一步的发展,笔者认为则在于对地域自然生态、人文生态的充分认知与建筑本体及其营建技术的研究之中。换一个角度说,一方面需要更新知识结构,从整体观角度来了解、洞悉事物的发展动态;另一方面需要以更务实的精神深入到建筑本体之中,剖析地域生态(自然与人文生态)与建筑发展间的复杂关系。

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对于西南山地建筑的研究,早期着重于对西南重点建筑及民居实态的测绘、收录,如《布达拉宫》、《西藏民居》、《云南民居》、《四川民居》、《丽江民居》等。这些基础资料详尽丰富,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基石。其中尤其以叶启荣之《四川藏族住宅》、刘敦桢之《西南古建筑调查概况》及其相关资料、刘致平之《中国居住建筑简史——附四川住宅建筑》,云南省设计院编著之《云南民居》及其续篇最为详尽和深入;近期则有多向发展趋势;如有西南民族建筑之继续收集整理,注意到西南地区建筑的多种类型,其中以季富政著之《中国无族建筑》、《巴蜀城镇与民居》等为典型;又有开始注意到西南地域中不同的气候特征带来的建筑类型差异,从住屋的差异研究地区的建筑文化,其中以蒋高宸之《云南民族住屋文化》、《建水古城的历史记忆》为代表;又有从技术层面研究山地建筑营建之模式,如唐璞之《山地住宅建筑》以及重庆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诸多硕士论文;再有从地区间文化的联系角度研究东南亚地区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建筑文化之间的关联,如杨昌鸣之《东南亚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建筑文化探析》;再有从城市规划角度出发,建立“山地城市学”,结合工程学、生态学、城市美学等对西南山地城市进行

研究等,如黄光宇倡导之“山地学”等。

上述的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但是由于缺少交叉学科支持以及西南地区纷繁复杂的地理地貌、人群种类、多变的历史演化等客观原因,大部分成果更多在于资料收集与工程技术上,在于对现有事物的描述上,或者在于实际应用的方法研究,而对于现象背后深刻而丰富的历史人文背景的探讨略显不足,也就是说,更多是在“有什么”的层面上。这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研究面貌是有颇多相近之处。“对中国建筑的研究总体而言虽粗具规模,但浅尝辄止,不求甚解,乃至以讹传讹的情况尚多。许多问题至今若明若暗,似是而非。除了继续深入之外,另辟蹊径也是必要的。”<sup>[15]</sup>

总体而言,在建筑学领域中对于西南地区的研究,尤其是将其作为一个“具有相对完整的文化特征的区域”来研究的学术成果寥若晨星;从文化学角度,从文化的演变、发展来研究建筑的发生发展则更显不足。在这种背景下,以“山地”为主要特征的“西南地域建筑文化”研究显得尤其重要和迫切。

---

[1] 刘敦桢:《西南古建筑调查概况》,《刘敦桢文集》三,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7年版,第320页。

[2] 童恩正:《南方文明》,重庆出版社。

[3] 张光直:《中国西南民族考古论文集》序言。

[4] 葛国金、张家植:《西部生态》,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247-249页。

[5] 刘致平著,王其明增补:《中国居住建筑简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0年版,第125页。

[6] 郭湖生:《我们为什么研究东方建筑》,载于杨昌鸣著《东南亚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建筑文化探析》,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7] 吴良镛:《江南建筑文化与地区建筑学》,《吴良镛城市研究论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年。

[8] 刘敦桢:《西南古建筑调查概况》,《刘敦桢文集》三,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7年版,第321页。

[9] 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南方文明》,重庆出版社。

[10]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11] 宋蜀华:《中国民族学理论探索与实践》,中央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

[12] 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3] 参见黄才贵:《亚太干栏文化比较研究》,《建筑与文化论集》第4卷,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14] 《西南研究书系》编委会:《西南研究论》(总序),载杨庭硕、罗隆康:《西南与中原》,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15] 郭湖生:《东方建筑研究》下册(序),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中国西南地域文化背景

第二章

西南地域文化背景

西南地域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之所以将西南地域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有诸多方面的理由和原因,在《绪论》中已有阐述。但是西南地域文化圈之中,又有多支各具特色的亚文化,如人们常说的“巴蜀文化”、“滇文化”、“黔贵文化”等等,分别对应于今天的四川与重庆、云南、贵州等。这种行政区与文化类型一一对应的划分方式有一定的合理性,最为清晰明了,也最为普通百姓理解,但是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它更强调亚文化各自的独立性,而淡视了其间的关联。尤其今日各行政区在“西部大开发”中为推动旅游产业而着力宣传各自的文化特色,往往自我大力鼓吹而少及其他——客观造成了对西南地域文化难以有一个整体性的认识。

更进一步说,以行政区命名文化类型存在一方面该文化类型难以完全概括其自然地理空间中存在的文化种类,另一方面则存在着割裂了文化整体性的可能。第一种可能,以“巴蜀文化”为例。目前看来,“巴蜀文化”试图代表的是四川与重庆行政区覆盖的自然地理空间中的文化类型。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在四川的西部高原地区,存在着一支与“巴蜀文化”有相当差异的文化类型。这支文化北抵甘青,南至云南的哀牢山一带,西与藏文化交融,有着自己典型的文化特征<sup>[1]</sup>,这里且称之为“川西滇西北”高原文化。但是当我们在表述四川地区的文化之时,往往忽视了这支历史悠久的文化类型而仅简单以“巴蜀文化”蔽之。第二种可能,以“滇文化”为例。云南的自然地理空间可以明显地分为两大板块:以哀牢山为界的滇东地区和滇西地区。滇东地区受中原文化与荆楚文化影响为深;而滇西地区则因少数民族分布众多而显出文化多元并存的特征,但是总体来看有着与“川西滇西北”高原文化很深的渊源关系。从文化的特征上看,滇西地区诸多文化因子与“川西滇西北”高原地区似乎更为接近,更宜纳入同一文化类型的范畴。但是长期以来由于行政的条块分割,强调各自的独立发展,客观上造成了对某一种跨地区文化的研究缺乏整体性和延续性。事实上,目前有不少学者已经把他们的研究重点投在纵跨川西与滇西北的横断山脉群,研究这一条自古而今的民族迁徙大走廊对于地域文化演变发展的重要作用。

研究西南建筑文化需要以其地域文化为背景,方能了解其发生、发展之根源。而研究西南地域文化时,一方面要参考人们所熟悉的按地区划分的方式,另一方面还需要从学术的角度深层次审视该地区的文化种类。

## 第一节 中国三大文化区与西南地域文化

研究地域文化,必须了解其外围的文化环境,才有可能找到地域文化格局形成的基本原因。因此研究西南地域文化,就有必要审视中国这个大的文化背景。这其中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华早期文化的多元区域发展;二是中国版图内文化区的构成。

### 一、文化多源说

中华早期文化多元区域发展指的是“文化的多源说”。多源说乃相对于“单源说”而

来,所谓“单源说”指的是关于中华民族与文化是起源于黄河中下游然后向四周扩散的理论。这种学说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而且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观念,从而导致了“习惯于把汉族史看成是正史,其他的就列于正史之外。于是,本来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如夏、商、周、秦、汉便被串在一起,像串葫芦糖一样,一根棍串下来,成为一脉相承的改朝换代,少数民族与境外接壤的周边地区的历史被几笔带过。”<sup>[2]</sup>这种单中心起源的正统史观,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才受到质疑。包括梁启超、顾颉刚、蒙文通、林惠祥、吕思勉、夏鼐、苏秉琦、费孝通、林耀华等在内的学者通过对民族渊源、史料考辨、考古发现等方面的研究,多向论证了中华民族与文明的多元起源学说。费孝通先生指出:“它的主流是由于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合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去你来,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有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sup>[3]</sup>

既然中华文化是“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其中就存在一个考证中华文化版图上的各个文化区域分布的问题。目前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存在着较多的争论,有诸多的划分方式,并无完全定论。随着考古学、人类学等研究的深入,原始资料的不断丰富,有可能对目前的划分方式进行调整。但是对于文化发源的自然地理空间及其对应的文化类型划分,学术界则颇多认同中华文化是由三大主要的文化区构成。这就是秦长城以北及西北草原游牧文化区,秦岭—淮河以北秦长城以南的粟为代表的旱地农业以及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的水田稻作农业文化区。(图2-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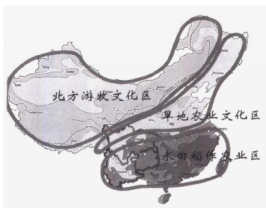


图2-1-1 中国三大文化区与西南地域文化

## 二、北方游牧文化区

北方和西北草原游牧文化区生活着匈奴、鲜卑、乌孙、月氏、羌等族,分布在从内蒙古至新疆的广大草原以及青海、河湟等地。由于生态环境的特点,这些民族形成了居住毡幕,逐水草而居,随畜迁徙的游牧生活模式。大约在西汉时期,匈奴统一了北方游牧地区。这个时期的中国大地上,形成了两个统一的国家,一个是长城以外匈奴单于建立的以游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奴隶制国家,一个是长城以内的汉朝建立的以农耕为主的封建制国家。费孝通先生曾经批判了中国古代史长期以来只承认秦统一长城内农业区的进步意义,而将匈奴诬蔑为中国历史发展的消极因素的偏见,并充分肯定了匈奴统一北方游牧区的积极历史意义<sup>[4]</sup>,这客观上形成了中华文化的早期格局:以长城为界的游牧与农耕两个文化区。居住形态上,北方游牧民族以毡幕为主要的住屋形态,但也有城郭存在,然而因历史久远和政权的衰弱已不可考。惟一还留有文化信息的是南下的羌人在西南横断山脉地区留下的邛笮建筑,它和历史上的“西蕃”(今藏人前身)的住屋形态极为相近,都是生产方式从游牧向兼农耕方式转变过程的产物。

### 三、黄河流域旱地农业文化区

秦岭—淮河以北秦长城以南的黄河流域旱地农业文化区,中游以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为代表,后来发展成为夏文化;下游以青莲岗文化、大汶口文化以及山东龙山文化等为代表,后来发展成为商文化。周兴于夏之西的河曲渭水流域。夏、商、周三代文化是相对独立又有一定继承关系的文化<sup>[9]</sup>,是形成华夏文明的三个主要来源,共同创造了中原地区的“礼乐文化”。从居住的主体来看,夏尚难定论,商有说是游牧起家的东夷之人,周则是西戎的一部分羌人,传说其始祖是姜嫄。也就是说,黄河流域旱地农业文化区的居住主体华夏族事实上是由多民族流动、融合、混血而最终形成的。居住形态上,华夏族由早期的穴居发展成为后来的地面建筑,最终演化为影响大部分地区的汉族合院式官室建筑。

### 四、水田稻作农业文化区

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的长江流域水田稻作农业文化区以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以及良渚文化为代表,发展成为百越文化。百越民族支系繁多,但由于南方地区的生态环境特点,客观上促成了百越民族相近的生活形态,如以渔猎为生、善种水稻、淡水而居、文身断发、龙蛇崇拜等。美国民族学家克姜伯曾把整个东南亚的古文化特质归纳为“刀耕火种、梯田、祭献用牲畜、嚼槟榔、高顶草屋、巢居、树皮衣、种棉、织彩线布、无边帽、戴梳、凿齿、文身、火绳、取火管、独柄风箱、贵重铜锣、竹弓、吹箭、少女房、重祭祀、猎头、人祭、竹祭坛、祖先崇拜、多灵魂”。1954年,台湾学者凌纯声又在此26种特质之外,加上“铜鼓、龙船、弩箭、毒矢、梭标、长盾、涅齿、穿耳、穿鼻、鼻饮、口菜、鼻笛、猎头衣、衣著尾、坐月、父子连名、犬图腾、蛇图腾、长杵、楼居、点蜡印花布、岩葬、罐葬、石板葬”等24种文化特质。

其中,干栏建筑是他们典型的住屋形态,在稻作农业文化区分布极广,而且影响到东南亚和日本等周边地区。因此又有人提出“亚太干栏文化圈”之说。“‘亚太干栏文化圈’是指亚洲太平洋地区,在这一空间概念中,以干栏民居建筑为中心所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空间分布范围。这个文化圈是由于干栏民居及其伴生的稻作、纺织、语言、宗教等一定数量的文化因子所标定,随着人口的流动逐渐向四周传播,形成该文化因子的分布区。”<sup>[6]</sup>

### 五、西南是中国三大文化板块延伸、接触、碰撞、交融的地区

三大文化板块的发展分别是与其自然地理空间紧密相关的,从北到南干燥、湿润、多雨的气候形态是促成游牧、旱地农业和水田稻作的生产方式的最根本原因。这三大文化板块虽互有影响,尤其是中原地区积极吸收了周边文化的影响,发展成为三者之间较为发达的文化区域,然而稻作与游牧南北两支文化却很少在彼此的区域中发现对方的文化影响,游牧区找不到稻作农业,百越文化区也无游牧文化的特征。这是生态环境的较大差异使然。

西南是中国三大文化板块延伸、接触、碰撞、交融的地区,<sup>[7]</sup>这客观上导致了西南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复杂性。也就是说,西南兼有三大文化板块的文化特征,这在中国各个文



化区中是绝无仅有的。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宋蜀华先生提出了两个理由：第一，云贵高原独特的地形和地势使之呈现不同的地理生态环境，具有热、温、寒三带的气候特点，适合于多种生产方式的并存共生；第二，横断山脉区众多贯穿南北的河流是历史上天然的民族流动走廊。<sup>[8]</sup>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应该是童恩正先生提出的“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sup>[9]</sup>(图 2-1-2) 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西端紧接横断山脉的北段，这使得北方游牧民族有相近的生态环境和地理通道与西南接触，从而绕过了中原的强大威胁，形成顺畅的民族迁徙通道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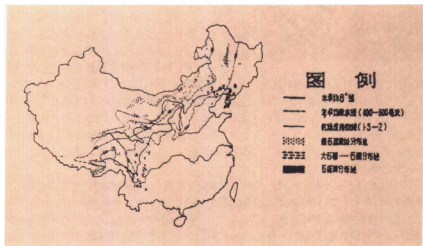


图 2-1-2 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 (采自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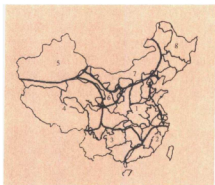
因此西南地域建筑文化也就深具三大文化板块的影响。这包括了以氏羌族系为主的北方游牧民族的居住样式及其演化样式、百越族系为主的干栏建筑样式以及汉民族为主的合院建筑样式等。这同样在其他地域也是绝无仅有的。而对于这三种住屋形态在西南地域的分布，则有待于对西南自然地理空间及其文化发展的进一步审视。

## 第二节 文化圈与文化生态系统

### 一、“文化圈”与“地域文化”

在此为了更好地了解西南山地建筑文化与周边文化的相互影响，文中借用“文化圈”的概念。文化圈的概念首先由德国民族学家 R. F. 格雷布纳提出，是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描述文化分布的方式之一。格雷布纳认为文化圈是一个空间范围，在这个空间内分布着一些文化特质相似或基本相同的文化丛群，强调地理空间上的意义，注重物质文化的作用。后来奥地利的施米特扩展了这个概念，他在原有的地理空间上推出文化的时间性，在原有的物质文化上强调社会风俗、伦理道德以及宗教等方面的精神文化，同时他更加强文化圈内各文化丛的相互关联以及如何构成具有共同文化特质的文化有机体。“文化

图 2-2-1 8 个传统民居的人文背景划分



圈”的理论后来逐步被文化人类学家所接受,对于研究民族学和文化传播都很有价值。

国内目前有不少学者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对整体文化进行分地域的研究,在强调“多元一体”的同时更加突出各地域文化差异性,归纳出多种特质各异的文化区域。比如东南大学的王文娟、陈焯先生在其《中国传统民居构筑形态的自然区划》与《中国传统民居的人文背景区划探讨》两文中,通过对文化的广义分析以及区划原则的拟定,在对物质文

化、制度文化、心理文化等单项区划的基础上推导出 8 个传统民居的人文背景<sup>[10]</sup>(图 2-2-1)。又如《中国民俗地理》一书中,通过对地理环境、气候等因素的分析,根据几条主要的分界线(大兴安岭—长城—青藏高原东缘,秦岭—淮河,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将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中、华南、西南、西北以及青藏等 7 个民俗地理区。<sup>[11]</sup>再如《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对于民族的划区,则有东北、内蒙古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以及中南西南地区等等划分。

文化圈的划定可大可小,是一个具有层次属性的概念。大到民族群、国家、东西半球,小到村落、单个民族以及各类风景区等。圈划的范围越大,文化的差异性就越大,反之各文化从的特性就更加明显突出。同时,由于各文化从的形成、发展、演化以及地理分布复杂,不仅受到自然地理因素、社会经济条件影响,同时还要考虑到时间的层积以及各文化从间的相互渗透,尤其是一些文化从间还具有较大的渐变性,因而要十分明确地划分文化圈是复杂、困难与难有普遍认同之定论的。本书不准备对全国范围进行文化圈的界定,而且那也非本书研究的目的,在此仅阐述“西南地域文化圈”的特点及其多边文化类型之相互影响。

在笔者看来,划分文化圈至少应包括以下两个原则:

1. 地质基质环境的相对一致性;
2. 圈内文化独特性及其他文化圈层的差异性。

从自然地貌上看,“西南”空间领域涵盖的重庆、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和西藏自治区,从统计数字上看,这几个省份的山地面积均在 7 成以上,而平坝面积不到一成(见下表),其间大小山脉错综复杂,空间高度变化剧烈,属于典型山地地貌。独特的地形地貌在将其周围的西北、中原、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跨越国界的印巴次大陆和东南亚半岛区分开来,如果依照传统的文化三层提法,即文化包含物质、制度与精神三个方面,那么可以说西南文化物质性层面的最大特点就是其山地性。(图 2-2-2)

省份	高原及中低山地	丘陵	平坝或平原
重庆	75.8%	18.2%	6%
四川	81.8%	12.9%	5.3%
云南	84%	10%	6%
贵州	75.11%	23.6%	1.29%
西藏	平均海拔 4000 米以上的高原山地		

资料统计自:西部生态: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图 2-2-2 “山地”是西南地区最普遍的景象

从民族分布上看，西南地区生活着全国一半以上的少数民族——以云南省为例，就有 25 个民族散居其中。由于西南复杂的自然山地地貌，客观上造成了生活空间扩展可能性减小以及各民族交往上的隔绝，最终形成了文化整体结构的“大分散，小聚集”。（图 2-2-3）而“所谓大分散，是指由于西南地貌的立体多样性，西南地区很难形成空间上高度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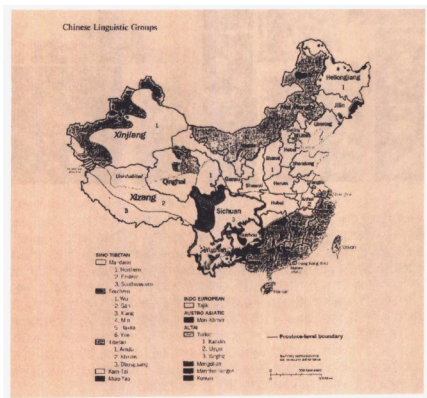


图 2-2-3 从语言分布看民族分布的“大分散，小聚集”

一的族类,每一族类不是被严重分割的自然界限隔成若干子群,就是索性在彼此长期分离的过程中,演化为语言和习俗等互不相通的新类型。所谓小聚集是指这些被自然分割为若干空间单位的族类各自固守在适应其生存繁衍的文化生长点内,从而形成无数相对独立的自我中心。每一个中心都具有自我循环、自我演化的能力,从而保证了每一个文化生长点的相对稳定。这就为西南文化在整体上的多元格局打下了基础。”<sup>[12]</sup>

宗教类型上看,包括云、贵、川、藏、渝在内的西南地区有着极其丰富的宗教信仰。大分散的多民族不仅有着各自多样的原始巫教,而且有着越过了喜马拉雅山的印度佛教,有着演化了的汉地佛教与藏传佛教,有着小乘佛教与西南道教,还有着中原地区传来的儒教以及传教士们带来的基督教等等。宗教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与文化现象,包含了人类社会得以维系的众多因素,涉及到社会结构、价值观、制度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同时它也是文化最深层次的、最核心的内容。

在相对限定的空间范围内有着不同生活习性、不同族类的人,有着多样丰富的宗教类型,这又是西南地域文化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点之一。综上所述,即山地地貌+多族类的人群+多元宗教信仰共同构成西南地域文化圈的独特性。(图2-2-4)

图2-2-4 西南地区多族类的人群与多元宗教信仰



作为文化浅层次的、显性的物质文化,西南地域建筑文化的核心内容显然与其地域文化的特性息息相关。西南地域文化圈的诸多特点也应是其建筑特点的文化之源。山地地貌——建筑的自然山地性;多民族分布——建筑的多元形态;多宗教信仰——建筑的多元价值观等几组关系体现了整体文化圈与其亚文化——建筑文化之间的关系。因此对于建筑文化的研究,“一方面需把建筑置于人类宏大的文化背景和综合关系网络之中予以考察,即所谓研究作为文化现象的建筑,或者说是建筑与其外部因素相互关系的‘外部研究’;另一方面,建筑作为一种文化意义的载体,也要重视建筑本身规律的‘内部研究’,即所谓研究作为建筑现象的文化。外部研究中涉及建筑与许多自然因素、人文因素的关系,这种研究拓宽了建筑文化研究的广度;内部研究则研究建筑的表面形态与其深层结构的关系,涉及对建筑语言及其含义的研究,这种研究促进了建筑文化研究的深度。外部因素研究有助于使我们更深刻理解建筑的本质;明确建筑文化在整个大文化系统中的位置;而内部因素研究则直接有助于我们的建筑设计和建筑创作。”<sup>[13]</sup>

因而应该从更宽的视野和更细微的角度来研究西南地域建筑文化,用望远镜和显微镜来观察建筑现象。“文化圈”的划定,提供了相对完整的文化背景,有利于研究建筑文化在传播过程中的演化 and 相互影响。比如“西南地域文化圈”中,各文化区因不同的边缘不同类型的文化接触而有着不同的文化表现:

“川”紧挨着长江中下游地区,长期与中原交往,故具有了更多的中原文化特征;“黔”位于与东楚、南粤(越)即长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相关联的位置,故一方面成为荆楚文化进入西南的信道,另一方面又与南粤文化保持着难以割断的联系;“滇”的西南部是与其山水相连的东南亚地区,彼此关系密切,从而也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现象;“藏”区地域广大,一面与位于西北地区的“西戎”多有交往(这导致藏文化保持着与“西戎”颇为相似的诸多特征),另一方面则连通着另一古老文明轴心印度,从而成为佛教东传的重要信道并成为佛教“中国化”的一支重要代表(藏传佛教)。<sup>[4]</sup>

另外对于西南地域建筑文化的本体属性,则有必要借用“文化生态学”的观点审视建筑文化内部各要素间的互动关系,将其作为“文化生态系统”来研究。

## 二、“文化生态学”与西南地域建筑文化

简单的表述,把文化学的研究与生态学研究结合在一起,从整体观角度研究人类生命网中各种因素间的作用关联、发生发展,即所谓文化生态学(Culture Ecology)。其最早的概念是由美国文化人类学家 J.H. 斯图尔德提出,用以探究具有地域性差异的文化特征及文化模式。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文化生态学》中其有如下解释:

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和概念主要是用来解释文化适应环境的过程。……文化生态学认为,文化不是经济活动的直接产物,它们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复杂的变量。山脉、河流、海洋等自然条件的影响,不同民族的居住地、环境、先前的社会观念、现实生活中流行的新观念、以及社会、社区的特殊发展趋势,等等,都给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特殊的、独一无二的场合和情境。文化生态学主张从人、自然、社会、文化的各种变量的交互作用中研究文化产生、发展的规律,用以寻求不同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殊形貌和模式。斯图尔德把文化生态学的研究方法看做是真正整合的方法,认为如果孤立地考虑人口、居住模式、亲属关系结构、土地占有形式及使用制度、技术等文化因素,就不能掌握它们之间的关系及与环境的联系;只有把各种复杂因素联系在一起,进行整合研究,才能弄清楚环境诸因素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才能说明文化类型和文化模式怎样受制于环境。

也就是说,文化生态学是以一种动态的观点来认识、解释各种自然与人文的环境变量,把某一种文化现象置于整体的文化背景中。

将西南地域建筑文化作为一个生态系统来研究,就要了解该生态系统的运行机制,了解该系统的输入(外部因素)、输出(本体特征)及反馈机制。而其中更涉及到一个时间层面。

通常说来,可以将西南文化划分为几个阶段。最明显划分点则在 20 世纪 50 年代。50 年代之前,整个西南文化的生态系统基本构架稳定,输入与输出保持相对平衡。同时就建筑文化而言,作为一种显性输出,保持着相当长时间的延续性。从村镇布局、建筑形态、空间组成、建筑细部以及营建技术等都延续着传统的模式。50 年代后,由于传统的社会组织方式、社会结构、生活生产方式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变动,因而对于“输出”就有相当大的影响——客观上导致了建筑文化一定程度上的变化。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以及将整个封闭系统调整为开放系统——经济模式的转变,西方文化模式的渗透等强有力的

输入因素,在各种文化冲突中又将产生某种新的文化趋向。

### 第三节 地理空间与地域文化

“助长民族精神产生的那种自然联系,就是地理的基础。我们要把那些特殊地区间的地理差别,看作是思想本质的差别,而与各种偶然性的差别截然分开。”——黑格尔

地理环境是文化创造的自然基础。通过物质生产及其技术系统等中介,地理环境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地理位置(经度、纬度)、地形、气候、土壤、水文、动植物、矿藏等因素,对于人类的物质生产方式,尤其是对于早期人类的聚居、农村与城市的形成以及由此而推进文字的发明和应用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进而作用于各类群体的性情、心理和气质等。

早在战国的《礼记》中就有一段地理环境与人关系的深刻论述: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然而对于地理环境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向来有不同的观点。其中以“智力决定论”和“地理唯物论”中的“环境决定论”为两个极端的代表。“智力决定论”将文化单纯归结为人类智力或精神的产物;而“地理唯物论”则认为地理条件规定着民族性与社会制度,制约着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方向。其极端的形态就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赋予“地理唯物论”完整理论形态的是德国地理学家拉策尔(1844-1904)。他将地理环境对人类的影响归结为四个方面:1.直接生理影响;2.心理影响;3.对社会组织和经济发达程度的影响;4.支配人类迁徙及其最后分布。古代中国也有类似“地理唯物论”的观点。《管子·水地篇》载: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故水一,则人心正;水清,则民心易。

作为与建筑文化最紧密相关的因素,各自然地理要素始终是制约人类聚居、营建、建筑空间、材料选择等最重要的因素,从而左右着建筑文化的发展。然而这一论断并不排斥人的不同需求(包括文化上的追求)对于建筑文化的影响。可以说,自然的人化就是文化。人的价值观、环境观以及宗教信仰等的形成同样与自然的地理环境息息相关。因而了解地域建筑文化的地理背景,了解地域亚文化间的地理空间差异,是了解地域建筑文化发生、发展以及差异性形成的最重要内容。

“中国的西南地区,位于亚洲大陆的南部,包括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和西藏自治区。北接黄河中上游的青海、甘肃、陕西诸省,东与湖北、湖南、广西相连,南与印度、不丹、缅甸、老挝、越南等国为邻。是连接亚洲大陆腹地与印巴次大陆及中南半岛的枢纽。

全境地形复杂,变化多端。气候的地区差异很大,从干燥的高寒气候直至潮湿的热带气候俱备。土壤的垂直分布亦不相同,具有从高原的风化黄土到丘陵的红壤以及盆地肥沃的沉积土等各种类型。复杂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其丰富的物产。动植物种类繁多,几乎包括了从寒带到热带的多类品种。在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即狩猎和采集经济时期,对自然的依赖性很强。这种多变的生态环境和复杂的动植物群正好满足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

不同经济类型的原始社会居民的需要。”<sup>[18]</sup>

童恩正对于西南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的这段概要描述清晰地表达了几个概念：一、周边环境上西南地区具有地理的多边缘性，是“连接亚洲大陆腹地与印巴次大陆及中南半岛的枢纽”。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客观上为多种文化的交流、融合提供了条件；二、西南地区立体的自然空间、多变的生态环境为产生多样的文化生长点提供了可能；三、西南地区内众多南北走向的河流成为古代文化、尤其是亚洲大陆与南亚、东南亚文化传播、交流的重要通道；四、发源于西南的长江最终呈东西走向流入东海，使东西方向不同的文化交流成为可能。西南的地理空间位置决定了它文化上的多元特征：西北方向接黄河上游游牧文化地区，东北则与黄河中下游的农耕文化接壤，东部深受长江中下游的荆楚文化影响，东南与珠江流域南粤农耕渔猎文化交接，南部与北部分别与东南亚和印度毗邻。（图 2-3-1）

如前所述，因为不同的周边文化接触，西南有着多元格局的文化分布。这种文化分布格局大致与今天的行政区划相当。“四川”处于西南北部，北接中原，西与藏区交界，一方面最早与中原交往，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广袤的成都平原提供了中原文化在巴蜀的拓展空间；与藏区交融的川西地区原设“西康”省，无论是民族构成或文化面貌都与藏文化有许多共通之处。“黔”位于长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的相关联位置，一方面是荆楚文化进入西南的通道，另一方面又与南粤的农耕渔猎文化有密切关联。“滇”在西南南方，毗邻东南亚，在文化上可以说与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现象，特别是滇南盛行南传上部座佛教的地区，更是难以和东南亚地区截然分开。“藏”地域广阔，北接“西戎”西通印度，文化形态上带有西戎的诸多特征，而藏地佛教很大一部分则直接来源于印度佛教。

在《中国文化通志》的《景观志》中，吴必虎将中国文化景观区划分为东南部农业文化大区与西北部牧业文化大区，然后又将西南文化区划在东南部农业文化大区之下，由巴蜀文化区和云贵高原文化区两部分组成。这与历史上诸多文献的划分方式相同。然而文化的类型与该地域的自然空间与生产方式紧密相关，西南处于农耕与游牧两种生产方式的交接带，简单将其分为巴蜀与云贵两部分，未能涵盖西南文化的全部。在“中国三大文化板块与西南地域文化”一节中已经明确指出西南地域文化是游牧、旱地农业以及水田稻作三种不同的文化接触、碰撞的结果。众多的研究表明，西南文化中的巴蜀文化是以“平原”为发展空间，以“农耕”为主要的生产方式，秦统一巴蜀后，巴蜀文化深受中原一带文化的影响，并攀西南的龙头，影响到西南其他各个平坝河谷地区；滇黔文化是以“山地”为发展基质，以百越、苗瑶等众多南方民族为主体，带有浓烈渔耕文化的色彩；而川西滇西北地区存在着一种半耕半牧的游耕文化，其地貌特征是典型的“高原山地”，而且这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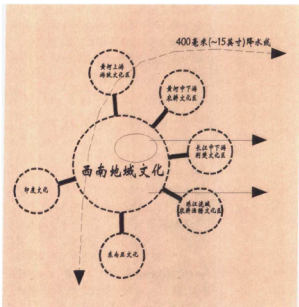


图 2-3-1 西南地域文化多元特征的外部影响

类型的文化影响面极为广泛,其分布以岷江为界,覆盖了岷江以西至与西藏交接的大部分地带。无论是生产方式、民族构成,还是文化传统以及自然空间形态都与巴蜀或是云贵有很大的差异,从而导致了建筑类型与形态上的差异。这是为什么在以下的论述中不因循行政区划分文化类型的常规做法,而将西南文化分为三大板块来进行的基本理由。

## 一、巴蜀地区(农耕文化区)

巴蜀是西南地区文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西汉时期,人们通常将西南地区分为两大部分,其一是以四川盆地为主的巴蜀地区;其二以居住在贵州、云南、川西等地区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并称之为“西南夷地区”。《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载:“西南夷,君长以十数……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此乃对巴蜀地区文化的认同使然。自秦灭巴蜀,巴蜀地区始与中原有密切交往。地理位置重要性与文化上的交融使巴蜀文化成为南方古文明的中心之一。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时首都长安户数有 80800,蜀郡成都市户数也达 76256,仅次于长安。而公元前 316 年秦灭巴蜀,蜀守张若在此“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布张列肆,与咸阳同制”<sup>[6]</sup>,足见蜀郡之繁荣。

“巴蜀”是一个有多重含义的词。其一,它是族名,它是居住在一定空间区域的巴族人与蜀族人的通称;其二,它是一种空间领域概念,它表明巴族人与蜀族人占领的空间范围;其三,它又是一个文化概念。然而无论是居住的主体,文化的生存空间还是文化本身的内涵,历史时期的“巴蜀文化”经过了多次的巨大变化;而且对于不同的研究者,又有着不同时期的所指。比如许多考古学研究仅将“巴蜀文化”定义在秦灭巴蜀前的古巴蜀文化。因此应该以一种动态的眼光来审视“巴蜀文化”的发展与变化。

### 地域空间

历史时期巴蜀文化的自然地理空间大致覆盖了今日以四川盆地为主的区域以及与重庆直辖市。它的地理范围在《华阳国志》有详细的记载,巴地的疆域为“其地东至鱼复,西至犍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据刘琳先生考证,古代巴国大抵西包嘉陵江、涪江之间以至泸州一带,东至奉节,北抵米仓山、大巴山南坡,南及贵州思南一带;蜀为“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嵋。地称天府,原曰华阳。”其中,“峨”指峨眉山,“嵋”指位于甘肃省境内的岷冢山,岷冢在蜀地东北,蜀国统治区域似曾达到今云南、贵州一带,由此可看出蜀人所在的主要地域为四川盆地。从整个中华版图上看,它处于我国两大古文明区域——黄河与长江流域文明的西侧。北接米仓山、大巴山,属秦巴山地的南翼,是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主要分界线,同时也是南北方的重要分界线。西有青藏高原与横断山脉,南临云贵高原,东则有巫山等。天然的阻隔与地势平坦、面积辽阔的盆地共同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有利于早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段渝先生指出:“正是这种地理上的向心结构,加上盆地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得盆地容易吸引周围边缘山地经营高地农业的群体向低地发展定居,吸引各种古文化沿着下趋的河谷和山间谷地所形成的向心状地理结构走向盆地底部平原,从而为古文化的交流融合提供自然基础。”<sup>[7]</sup>

### 地貌特征

巴蜀境内的四川盆地大部分地区海拔在 1000 米以下,地貌以丘陵和低山为主,并有一定面积的平原;水系结构多为树枝状,由盆地边缘山地辐射盆地底部,最后汇入长江,河流有灌溉、航运之利;地带性的植被为湿性亚热带常绿阔叶林;自然土壤多紫色土和黄壤,为四川省最大的水稻土分布区。人口以汉族为主体,密度大,耕地集中。<sup>[8]</sup>

巴蜀的地理空间沿着西东方向递降,海拔高度上属于第二级阶梯,分别分布着川西高



原、盆西平原、盆中丘陵以及盆东峡谷。”长江从四川东部经过三峡,连接了江汉平原;而发源于贵州东部的濛江,则经过湘西沟通了肥沃的洞庭湖平原。这就使石器时代西部高原的畜牧或半农半牧的民族与平原的农耕民族联系起来。这两种不同传统的文化的汇合,就更加丰富了本地区史前文化的内容。”<sup>19</sup>长江北岸的主要河流至西而东有岷江、沱江、嘉陵江及其支流涪江、渠江、大宁河等;南岸则有长宁河、永宁河、赤水河以及乌江等。——东西走向的河流加强了巴蜀文化、夜郎文化与楚文化的共融,使得巴蜀文化具有强烈的楚文化的特征。“就文化类型而言,巴蜀与楚成为一个系统,而自有特征。”<sup>20</sup>

#### 气候特征

东部盆地因四周环山,冬季寒潮不易入侵,夏季焚风显著,与同纬度长江中下游相比,热量较高,因而冬暖夏热春早无霜期长,雨量丰沛,但地区分布、季节分配不均;风小,湿度大,云雾多,日照少,冬季多绵雨。

气温:四川盆地地区处亚热带,年平均气温 16—18℃,以长江流域河谷一带最高,达 18℃以上,最低气温少见 0℃以下,最热月(七、八月)平均气温 25—29℃,极端最高气温大部地区在 38—40℃之间,长江河谷区高达 40℃以上,重庆曾达 44℃,盆地热量资源十分丰富,气候温和,四季宜耕。

降雨量:盆地内降雨量丰富,一般在 900—1200 毫米之间,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相当。总的来看,盆地边缘的降雨量多于盆地中心。盆地内全年降水日由南向北减少,南部 150—175 天,北部 125—150 天,雅安多达 200 天以上。

日照:盆地内的日照是全国最少的地区之一。大部分地区全年的日照只有 1100—1500 小时,占可照时数 30%左右。盆地的西部和西南边沿仅 800—1100 小时,为可照射时数的 20%左右。

湿度:由于降雨量大,日照时间短,加之平原河谷地带,客观上导致了巴蜀地区的湿度远大于同纬度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年平均相对湿度达 70%—85%。湿度大是造成该地区云雾多的主要原因。重庆、成都、遂宁等地以及开闢河谷地带,全年雾日可达 50 天以上。(近年来,随城市气温的提高,雾日已经大为减少)。重庆被称为“雾都”,是也。

风向与风速:盆地内全年盛行北风或东北风,少数地区盛行南风。因为受到四周高山的影响,除边沿少数山区风速较大外,盆地内各月风速均在 2 米/秒以下。<sup>21</sup>

唐代岑参《招北客》对于巴蜀地区的气候有一描写:“二江双注,群山回蔽,其地卑湿,其风性逸,蜃蛤杂处,溟漠为邻。地偏西而两仪不正,寒薄而四季不均,花叶重荣,秋冬如春,暮夜多雨,朝且为云,阳景罕开,阴气恒昏;以暑以湿,为霾为雨,气沮热以中人,吾知重腿之病号,将掣尔身”,大致不差也。

#### 早期的文化发展

关于文明的生产有若干个标志:生产力的发展导致手工业的分离、商品的出现,最终导致阶级与国家的产生等等。体现在物质形态上就是城市的出现、礼仪建筑以及礼器、青铜器以及文字。根据考古学资料,古蜀文化显然具备进入文明的主要要素:

·城址:广汉三星堆遗址发现了夯土城墙,现存的有东、南、西三面城墙,墙体为人工夯筑而成,东面城墙的顶部使用了土坯。北面尚未发现城墙遗存,可能是鸭子河代替城墙的功能。“城内面积 2.6 平方公里”,“在城区内外分布着密集的居民区,已发现房址、玉石器作坊、制陶窑址、墓葬及埋葬大批青铜器、玉礼器的祭祀坑。”<sup>22</sup>

·大型的宫室建筑:成都十二桥遗址发现时代稍晚于广汉三星堆城址的大型木构建筑遗址,一般认为这座大型木构建筑属于宫殿建筑遗存,发现的有地梁,另有小型建筑的桩基,可能属于附属性建筑物。(图 2-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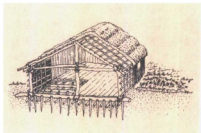


图 2-3-2 成都十二桥干栏遗址

·礼仪建筑：这类建筑的遗存已发现并公布材料的有广汉三星堆的两座祭祀坑、成都羊子山的土台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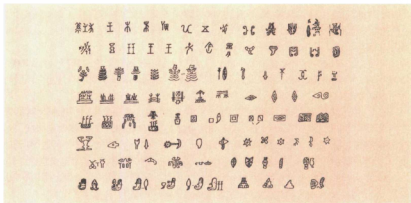
·青铜冶铸手工业和玉器制造手工业。

·礼器的使用：礼器的使用。早期蜀文化发现的礼器有青铜器如尊、量、人像、面具、神树等，金器有面罩、杖等，玉石器有璋、援、琰、戈、斧、钺、璜等。这些礼器大约都是代表当时统治阶层的地位，用于祭祀、

盟会等礼仪活动。<sup>[25]</sup>

另外，关于文字考古学界似乎还无定论。一些晚期蜀文化的遗物上有一些符号，被称为“巴蜀图语”或“巴蜀徽识”（图 2-3-3），但是否是文字考古学界尚众说纷纭。文字固然是文明出现的标志之一，但并非必要条件。中国历史上的羌、匈奴等族已经进入文明尚无文字。所以综合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古代蜀国已经进入文明社会。

图 2-3-3 巴蜀徽识



就秦灭巴蜀前的建筑类型来看，巴蜀地区已经发展有较为成熟的“干栏式”建筑。成都十二桥建筑遗址以及从作为陪葬品的大量陶制房屋“明器”上看，都属于典型的干栏建筑。

秦灭巴蜀后，巴蜀文化能够迅速被秦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融合，其主要原因之一除了巴蜀地区有着类似的文化发展空间，秦王朝在此设郡守，其管理模式“与咸阳同制”外，其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然外力的作用。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充分肯定了文明早期发源中自然外力的作用。他曾经对东西半球五个最早的文明区（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中国、秘鲁和墨西哥）进行比较，认为灌溉和治理洪水等治水技术与深耕细作的农业制度对于早期文明的崛起，都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并由此发展了相应的社会、军事和宗教。另外，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也曾经对土壤、季候风以及泛滥成灾的黄河对于形成中央集权官僚体系的影响做过分析。他指出，“环境上产生极大的压力，务使中枢权力再度出现。所以中国的团结出于自然力量的驱使。”<sup>[26]</sup>以此观点来审视巴蜀的自然地理条件与历史发展的关系，同样可以找到巴蜀文化早期发展的一些端倪。

“层峦叠嶂，环以四围，沃野千里，蹲其中服。岷江为经，众水纬之，咸从三峡一线而出，亦自然一省会也。”<sup>[27]</sup>——蜀地处于岷江中下游，岷江常年水患是蜀地最大的环境压

力。岷江为从北至南贯穿蜀地。每至夏秋上游涨水,下游洪水必将泛滥成灾。治水工程的需要直接促进了平原地区人们之间的协作。客观上的需求导致产生有力的统治阶层领导协调抗洪灾,疏通河道的工作。由此而加速了平原地区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可以说,无论是在古蜀时期或是秦统一巴蜀之后,蜀地治水的历史始终是巴蜀历史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先古大禹治水到秦时蜀郡守李冰治都江堰,文化的发展在资源的调动中,在人群的组织协调中逐渐成熟。应劭《风俗通》云:秦昭王使李冰为蜀守……冰乃变壅江作棚,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颇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又溉灌三郡(蜀郡、广汉、犍为),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谨,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sup>[27]</sup>

综观西南地区,从地理条件看,惟巴蜀地区有“沃野千里”,河流纵横,成为孕育文化发展的良好基质;而影响到大部分地区的洪灾客观上却又促成了内部的团结,加之与几大文化的多边缘接触与交流,这可说是促成巴蜀文化在西南地区较为成熟的内在成因。

众多的考古学资料表明,巴蜀地区的建筑类型至迟到汉已经由原有穿斗结构的干栏建筑转至抬梁式的宫室建筑。(图2-3-4)这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当然是地域文化的极大变动:巴蜀古文化已经融入中原文化的主流之中。既然主体文化的性质与形态已经转变,那么文化的调控机制也将随之变化,这势必影响到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社会组织方式以及人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等等。而这些组成文化的深层因子的变化将最终在其物质层面上表现出来。至此,巴蜀地区已在中原统治者视野之中。“巴蜀的巴蜀”已经成为“秦汉的巴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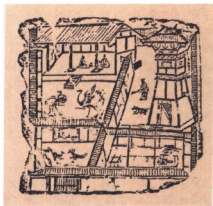


图2-3-4 汉代画像砖中的抬梁式宫室建筑

### 文化演变

历史断面看,巴蜀地区几千年的发展历经多次的文化冲击。其中尤其是以大量的移民入川对巴蜀文化的演变有重要影响。在传播媒介尚不发达的传统社会,人是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秦灭巴蜀后,秦国“移秦民万家以实之”(《华阳国志·蜀志》),“秦之迁民皆居蜀”(《史记·项羽本纪》);楚民也沿江而上,大量入川,“江州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华阳国志·巴志》)。两汉时期,关中大饥。汉高祖令民“就食蜀汉”。西北略阳、天水等10万以上的流民入蜀,以后更有大规模的南方僚人人蜀,就连川南一带的僰人因“汉民多,渐斥徙之”。元时战乱,四川人口剧减(元十九年,四川册载户口只有12万户,约60万人左右)。在低人口的背景下,元末明初时期形成第一次“湖广填四川”的高潮,所谓“自元季大乱,湖湘之人往往相携入蜀”。然而明末清初巴蜀地区经历了长达80年的战乱<sup>[28]</sup>和天灾,使人口急剧下降。“至顺治七年时,蜀人大体已尽”<sup>[29]</sup>,“作为历次战火中心的成都平原情况尤为恶劣,原来繁华城市竟有虎豹栖息”。<sup>[30]</sup>为了恢复巴蜀地区的经济生产,清初开始了大规模长时间的移民入川,形成了第二次“湖广填四川”的高潮。清代中后期整个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较为稳定,巴蜀文化进入了平稳的恢复期。而抗日战争爆发后,巴蜀地区再次成为数以百万计的各省人士避难所,对于地区文化的发展又有着极大的影响。

因此从民族主体的流变的这一层关系看,巴蜀文化的主流是移民文化。而自秦统一

巴蜀后大量移民,尤其两次的“湖广填四川”,原有的居民消失殆尽,文化在频繁战争及其的主要载体——人的剧烈更换中突变。从人群的空间分布上看,以汉族为主的外来移民占领了河谷平坝地区,其他民族则被迫迁移山地高原等条件较为恶劣的生存环境。因而可以说,巴蜀文化是由处于主导地位的移民文化(强势文化、突变的文化)与处于边缘的其他民族文化(弱势文化、相对稳定的文化)组成。而这种构成也影响到了巴蜀地区的建筑文化区划。

再者,移民文化带来了其独特的建筑类型,各地的移民会馆。大量的会馆建筑散落在巴蜀各地,其分布之广泛、建造之规模、构筑之精致、富含信息之多样文化片段决定了它是近代巴蜀建筑类型重要的组成。我将在后文单独成文讨论。

#### 文化特征差异与建筑类型比较

自然地理空间与人文历史的层积等因素造成了巴蜀(四川与重庆)地区内部文化的差异。人们自古将这个区域称为“巴与蜀”,说明了人们早已意识到它们之间既有一定的联系又存在差别。目前已经有不少学者指出:“实际上,盆地东部和西部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在较早时期并不具备作为一个文化整体的性质。尽管人们通常从地理角度把战国秦汉之际的巴蜀文化视为一个地方或区域文化类型,然而二者在事实上却存在着显著差异。”<sup>[31]</sup>又有从“文化传统”“渊源”“文化面貌”等方面阐述二者之不同等等。<sup>[32]</sup>

这是在比较文化共性与差异性时,视域范围不同所导致的。巴蜀文化相对于中原秦汉文化有其自身的文化色彩,尤其是其山地特征和多雨多雾的气候带来的一种文化氛围。这可以从古时众多诗人的语句中得到领悟。(如李白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商隐的“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刘禹锡的竹枝词“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等等。)另一方面,从区域文化的内部来看,巴文化与蜀文化的确又存在相当差异。

地理空间差异:巴蜀虽同在盆地内,但巴与蜀的地理空间有着加大的差别。巴地处于盆地东侧,三十多条北东走向的山脉平行地与河流相间分布,将巴地切割成无数的山地丘陵和面积不大的小坝子。客观上造成了地理空间的多元分割。蜀地则不同,“沃野千里”。成都平原是上游河流冲积而成的约达 9500 平方公里的扇形平原。自然地理空间的差异对于文明产生模式、发展的样式等等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文化发展的早期阶段,在人们尚未能卓有成效地改造自然环境的条件下,生存空间中获得资源的难易程度左右着文化的发展。从地理空间上看,蜀地的生存条件明显比巴地来得优越。这是促成成都平原文明起源较早,进入全盛期与文明持续发展的时间都比巴地久远的基本原因。

生产方式差异:地理空间的差异导致生产方式的差异。蜀地的“沃野千里”,土壤紫赤,土层深厚,溪流纵横,是农耕生产的有利场所。因此向来谓之“天府”也。历史上周边地区发生了多次“饥荒”,当权政府均命之“就食蜀汉”,可见蜀地之殷实。巴地虽有丘陵平坝,但耕作条件明显不若蜀地,加之山高谷深,因此早期巴文化以渔猎、射猎为主。

文化发展差异:文化的发展通常是基于经济基础之上的,而经济的发展又与生产方式较为相关。蜀地的文化发展之所以较早且成熟,几个方面的原因都与地理空间紧密相关。一是上文提到的盆地平原“向心性”结构,提供了早期文化交融的基础;二是“治水”的需求客观上促进了统一政权的产生;三是“沃野千里”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四同样是“沃野千里”,几乎没有天然的屏障阻碍政权的扩张。与此相对,巴地的地理空间切割客观上造成了各族之间缺乏往来和联系,形成了封闭落后的“小国寡民”生活状态,从而难以形成统一的政权。“没有以劳动协作为动力形成一个稳定的政治共同体并服从一个政治中心的经济基础,因此不存在造成统一政治组织的地理条件。”<sup>[33]</sup>巴地惟一进入文明社会

的姬姓巴国,苦于与西边的蜀国及东边的楚国征战,史载巴国在川东五易其都。在这种自身动荡的情况下,很难称得上“扮演执行统一政府各种职能的历史性角色”,也更谈不上文化的建设。

关于两地的建筑类型差异:无论是地理空间差异、生产方式差异还是文化发展差异,诸多的差异都在物质文化上烙下深深的印迹。因此“巴”“蜀”两地的建筑类型有相当大的差异。蜀地在并入秦的统属之后,文化迅速融合,如前文所述,主流建筑类型至迟到汉代已经从原来的干栏建筑转变为从中原传入的抬梁式宫室合院建筑。由于文化的势差以及所处区位的关系,中原的建筑文化影响了巴蜀的建筑文化且以蜀地为西南的龙头,通过经济贸易活动,文化交流或是战争等方式传播、辐射到西南的各个平坝河谷地区。这种影响只要略为考察就可发现。产生这种广泛的影响至少需要以下几个方面的条件:

- 一是存在较大的文化势能差;
- 二是流通廊道的畅通;
- 三是文化自然生存空间的类似性。

这几方面中无论缺了其中那一项,都无法形成文化上有效而深入的影响。没有文化的势差,文化之间的交流就难以建立(而文化的势差通常是建立在经济基础的势差上)。没有流通廊道,当然不存在交流:如同中华古文明与西方文明在18世纪前的状态,当海上通道打开时,这种文化上的流通便势不可挡。而自然地理空间的相似性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文化传播过程中文化物种的相似性。<sup>[36]</sup>

巴地明显不具备有上述中的二、三两个条件。地理空间的多元切割阻碍了中原文化在巴地的传播。而作为巴地境内主要的天然廊道长江,发源于南北走向的金沙江,绕过蜀地后(长江穿过蜀地主要的城市是其南部的宜宾),穿越巴渝、穿透荆楚、穿过吴越,一泻千里地向东奔去。可以说,在长江中上游地区,它沟通的更多的是巴地与荆楚之间的联系。这通过民族渊源、神话信仰以及建筑类型等诸多方面的文化因子可以得到印证。

自然地理空间的多元分割是抬梁式宫室合院建筑难以在巴地广泛存在的根本原因。尽管中原文化最后还是通过战争、大量的移民等等方式有力地渗透进来,抬梁式宫室合院建筑还是没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另一方面如上文所说“自然地理空间的相似性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文化传播过程中文化物种的相似性”,抬梁式宫室合院建筑传播至巴地,在巴地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为适应巴地的山地地貌,抬梁式宫室合院建筑在结构构建方式、空间组合方式等都已有了相当的调整,反而受到干栏建筑的影响。

干栏建筑作为南方地区普遍的居住建筑形态有其自身浅显而深刻的道理。它似乎天生与山地地貌合拍。其鲜明特点“架空”的方式使建筑可以在任何复杂的山地地形上扎根落脚。(图2-3-5)这是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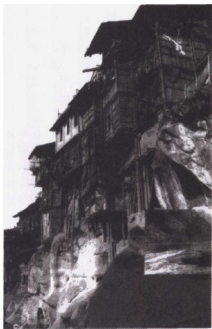


图2-3-5 干栏建筑天生适于山地地貌

栏建筑之所以能够在巴地广泛存在,持续时间长的一个基本原因。当然从更广的范围来看,这与民族的渊源、生产生活方式、所受的荆楚文化的影响等等密不可分。我们再从更深层面的地域文化的亚层次文化划区来看巴地与荆楚的关系。

## 二、川西滇西北地区(农耕—游牧文化区)

川西滇西北地区无论是经济的发展还是文化发展相对西南其他地区都较为落后,尤其与蜀地相较差距就更大了。虽然二者在文化的早期有一定的关联。有研究表明早期蜀地的民族构成族类众多,其中很主要的一支就是岷江上游下来的氐羌一族。有说蜀地部落之首“蚕丛”系始居岷山石室之中。但是两者在文化特征上有很大的区别,川西滇西北地区与巴蜀地区应该分属于不同的文化区域。所谓“文化区域是指一种文化模式所占有的更大的区域。北美文化人类学家在研究北美洲部落文化时,根据几百个部落文化和居住地域的不同,把美国和加拿大划分为9个文化区域:平原区、高原区、加利福尼亚区、北太平洋海岸区、爱斯基摩区、麦肯齐区、东部森林区、东南区和西南区。这9个区的居民来源及形成发展的历史背景不同,各有自己特殊的文化。这些文化区域是综合了影响文化的地理环境、生物环境和历史背景3个要素而划分的。一个文化区域有自己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特殊素质的人口和特殊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因此形成地域性的特殊文化。”<sup>[35]</sup>

按照“文化区域”的定义,地域性的特殊文化的形成与文化的地理环境、生物环境和历史背景3个要素紧密关联。以此来比较巴蜀地域文化、川西滇西北地域文化以及云贵文化,可以明显发现它们之间显著的区别。

### 地域空间

川西滇西北地区与巴蜀地区的分界线基本上是以地质构造的变化为界线的。就四川省境内看,以广元、都江堰、雅安、康定、冕宁和木里一线为界,其西部分为地槽区,是川西滇西北地区的地域空间,在中国地形三级阶梯分布上属于一级阶梯;其东部分为台地区,是巴蜀地区的地域空间,属于第二级阶梯。因此从地质的构造变化就可以清楚分辨二者在自然地理空间上的差异。云南省境内看,基本上以哀牢山为界,包括了其西部的横断山脉三江并流纵谷区上游地区。横断山脉纵谷区,由高黎贡山、怒山、云岭三大山脉和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纵向相间排列,是世界著名的三江并流纵谷区。该区山高谷深,系云南境内海拔最高的区域,也是西南生存条件最为恶劣的一个地区。如德钦、中甸一带,海拔多在3000—4000米。这些高海拔地区一方面可耕地少,气候寒冷,生活条件恶劣;另一方面,交通极其不便,人们活动范围小,社会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客观上造成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凝固化的倾向,对于生活于其间的人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都有很大影响。这也是这个地区的建筑形态长时间稳定而缺少变化的原因之一。另外,横断山脉区是民族迁徙的必经之路,众多的山川河流由北至南逶迤蜿蜒进入云南境内而至东南亚诸国——小范围看它们将滇西北与巴蜀南部紧密联系在一起;更广的范围则是中国西南与东南亚诸国的文化交流走廊。族属关系上,氐羌系的藏缅语族群占有较大比例。因而建筑形态的“基因”类型更多属于游牧或游牧—农耕民族的住屋遗传。

川西滇西北的自然地理走向呈西高东低,北高南低。北南方向上,“从西藏高原的东端直至四川盆地,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等河流均自北向南流,如同在崇山峻岭之中开辟了若干条南北交通的走廊,自古以来就是不同民族集团往来迁徙的通道。在亚洲大陆的南端,南亚和东南亚的许多大河,都发源于本区,如雅鲁藏布江流入印度(布拉马普特拉河),龙川江流入缅甸(瑞丽江),怒江流入缅甸(萨尔温江),澜沧江流入

老挝和泰国(湄公河),元江流入越南(红河)。在石器时代,文化的传播多半通过自然的河谷通道进行。<sup>[10]</sup>——这是该文化走廊民族构成复杂,古语族存留众多的原因之一,也是造成西南地区建筑形态纷繁复杂的主要原因。文后将重点论述自然地理廊道与文化交流间的关系,这种文化的流动在川西、滇西北地区显得尤为突出。

该地域空间的居民主体是羌族系的藏、羌、彝等民族,包括一部分向南延伸的纳西族、哈尼族等等。川西的藏羌民族主要分布在甘孜州、阿坝州境内。因为历史的原因,藏民族主要分布在海拔较高的西部及北部高原。而羌民族则集中于东南缘海拔相对较低,围绕着成都平原的高山峡谷区,其中以岷江上游的汶川、茂县、理县等为主。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在四川盆地西北边缘,位于东经 $101^{\circ}$ — $104.50^{\circ}$ ,北纬 $31^{\circ}$ — $34^{\circ}$ 之间,面积共83200余平方公里。历史上被称为嘉绒藏区,全州共辖13个县(马尔康、壤塘、若尔盖、阿坝、红原、黑水、金川、小金、茂县、汉川、理县、松潘、南坪等),总人口73万人。藏族人口约占40%左右,聚居在鹤鸣山以北各县,少数杂居于金川、小金等杂居区。羌族约占9%左右,聚居于茂理汶三县和黑水、松潘南部地区。甘孜藏族自治州位于四川盆地西部,面积约1205570余平方公里。全州辖康定、巴塘、泸定、九龙、雅江、道孚等县。总人口约76万,以藏族为主,是典型的半农半牧地区。

#### 地貌特征

川西滇西北大部分地区海拔在1000米—3000米以上,多高原和山地;以高寒的山岳气候为主,干湿季分明,干燥度在1.0—1.5以上;水系结构多羽毛状,大部分河流由北而南注入金沙江,富水能资源;自然土壤以山地棕壤和草甸土为主,并有沼泽土分布;地带性植被南部为干性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北部为阴暗针叶林及草甸。生产方式包括了游牧、游牧—农耕以及农耕等多种方式。地广人稀,部分原始生态环境保存尚好。<sup>[11]</sup>地势北高而南低,岷山山脉、邛崃山脉、雪山山脉、阿鲁里山脉,都是自北而南。四大山脉夹着岷江、大渡河、雅鲁江、金沙江及其支流也自北而南,急流而下。阿坝州北部及甘孜州东北隅地势较高,海拔都在4000米左右,是一片草原牧区。南部基本上是横断山脉与河谷。河谷之中构成一些不大而湿润肥沃的土地,宜于耕种的河谷平原,是农牧业区。

#### 气候特征

气温:西部高原因地形复杂,海拔悬殊,等温线分布和地形等高线走向基本一致。一般海拔凡升高1000米气温下降 $6^{\circ}\text{C}$ 左右,有“一山四季”和山顶寒冷,山腰温和和山谷干热的特点。由于该地区为山地地区,海拔高度的剧烈变化造成了局部的气温相差巨大。例如泸定河面海拔约1100米,它左右两岸的山坡,有的高达5000米以上,故当夏与春之交,河面气温已达 $30^{\circ}\text{C}$ ,两岸山腰才 $15^{\circ}\text{C}$ — $16^{\circ}\text{C}$ ,最高处气温还在零下。又如金沙江岸,从宁静山顶下到金沙江岸,恰如自冬起春而到仲夏。河谷气候又因南北向的河谷如雅鲁江较温暖,东西向的河谷如康定多寒冷。东西向的山脉,则山南面比山北面暖和得多。<sup>[12]</sup>

降水量:由于季风环流的影响,该地区有干湿季之分。雨季时间短,约在5月—9月的夏季之间,降雨量也不大(约500—800毫米);干季时间长,约从10月至次年的5月。干季日照多,湿度小,日温差大;雨季日照少,湿度大,日温差小。雨季多冰雹雷雹。干季多大风霜雪,因此干季有风季之称。

日照:全年日照率为50%,比盆地内的日照率大一倍,而且冬季日照时数又恰与盆地内各季日照时数相反,即冬春两季较夏秋(雨季)两季为多(12月至3月最多),故从藏族住它的布局、造型可以看出他们在冬季利用太阳能的处理方式与经验。

风向与风速:在冬春雨季最多,风向大约以北纬 $30^{\circ}$ 为界,南部地区多偏南风,北部地区多西风或北风,而且多大风,如康定、甘孜等地,每年八级以上的大风有四五天,六级以

上的大风有四五十天,五级风有十几天以上,五级以下的就更多了。全年大风日数在二十天以上,多者可达五十天以上,瞬时风速很大,甘孜曾达 41 米/秒,西昌曾达 31.6 米/秒,因风大高原多沙暴;高原北部全年沙暴日数可达十天以上。

在这些地区由于西、北风多,对于建筑的选址、朝向和开窗等,都有很大的关系。

#### 民族演化与早期文化发展

作为一个有民族特色的族群,羌人一直是甘、青、陕一带的强大集团。其中的党项羌曾经在 1038—1227 年间建立西夏国,后被蒙古人击溃。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羌人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的作用似乎和汉人刚好相反,汉族是以接纳为主而日益壮大,羌族却以供应为主,壮大了其他民族”。<sup>[39]</sup>羌人南下后,分别与当地的土著融合成藏、彝等族,这从语言的亲近关系上可以得到验证。胡庆均教授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彝族条目中是这样描述彝族的发展的:“彝族是古羌人南下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与西南土著部落不断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古羌人亦称氐羌或西羌,分布在陕、甘、青一带。约在 4~5 千年以前,羌人早期南下支系与当地土著部落融合为氐(濮)。氐系‘羌之别种’,因其所居平坝地区自然条件之优越,早已发展了农耕。……公元前 4 世纪初,羌人无弋爰剑之后自甘、宁、青一带河湟地区南下,到岷山以东至金沙江畔,发展为武都、广汉、越嶲诸羌,……是羌人南下的较晚支系。”

《史记》对于西南夷的记载中分别有西夷和南夷的描述。其中西夷就是对于该地区民族的一个简要的概括:梳发辫、没有村邑、没有君长、过着随畜迁徙的游牧生活。因此保留的文化特征很少。就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主要有以石棺葬文化为主的存留。

石棺葬文化主要分布在洱海以西以北的滇西北地区以及包括雅安、凉山州、阿坝州在内的川西地区。其基本特点是以石板或石块砌筑棺槨,盛行山字格青铜剑和黑桃双耳罐等,表现为强烈的游牧文化特点(图 2-3-6)。“这种考古文化虽因地区不同而存在较大的差异,但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呈现出一种与中国西北地区文化相似的特征”<sup>[40]</sup>,而且体现出一种文化的强度分布与地理空间的南延成反比的趋势。关于石棺葬文化的民族主体多有争论,但非羌人所有可以定论。羌人实行“火葬”,古史有载羌人被俘虏后,经常担心死后无法火葬。有说是早先进入该地区的氐人的墓葬方式。<sup>[41]</sup>羌人进入这个地区后,还是保留了自己的墓葬方式,但是却沿用了氐人的住屋形态——邛笮建筑。(图 2-3-7)

图 2-3-6 川西地区的石棺葬文化 (采自罗二虎《秦汉时期的中国西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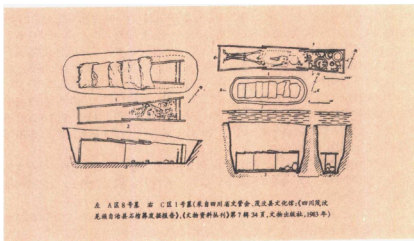






图 2-3-7 川西滇西北地区的侏笠建筑

羌人南下后赶走原住民戈基人,这在古史《羌戈大战》中可以获得验证。羌人原系游牧部落,以毡幕为住屋,进入该地区后发展成为半牧半农的生产方式,住屋也就由原来的毡幕发展成为毡幕(游牧)与邛笼(农事)并存的模式。

邛笼建筑在川西滇西北地区广泛存在,它的形态充分体现了该地区的“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记录了该地区“特殊素质的人口和特殊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是区域文化特征的明显体现,也许用邛笼建筑文化来代表川西滇西北地区的文化特征更为恰当。

### 三、滇黔地区(农耕—渔猎文化区)

滇黔地区同巴蜀地区一样,经历了从本土原始文化繁荣到被中原文化同化过程。然而由于其空间分布、自然山地地理以及族群等诸多差异使得滇黔的发展与巴蜀、川西滇西北地区相距较远。巴蜀近中原、川西滇西北近北方游牧文化,而云贵地区在长江中下游的西南方,与稻作为主的百越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巴蜀地区一是由于长期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往,二则因元明清时期的大量移民,其民族主体基本上以汉族为主,主流文化已由巴蜀的本土文化转为融合了中原文化的巴蜀文化,因此文化概貌清晰。川西滇西北地区因为生活环境恶劣、生产力落后等原因导致文化发展的缓慢甚至趋于停滞,历史时期的民族主体虽有迁徙,但近几百年来民族的居住空间相对稳定而且以藏、羌、彝等族为主,因此文化特征虽不明显,却也有脉络可寻。相比而言,云贵地区由于复杂的民族构成和地理生存空间导致了其文化发展脉络的复杂多样。尤其是黔贵地区,“唯黔、桂二省,遗迹较少,且因地理关系,或受四川之影响,或濡染湘、粤二省之成法,致其现行式样,殊乏显著之特征可言。”<sup>[4]</sup>

#### 地域空间·地貌与气候特征

滇黔地区的地域空间大致上遵循行政区的划分界定,只是在云南的西北部沿攀枝花、大理至腾冲一线以西应纳入川西滇西北的游牧—农耕文化区,该线以东则为农耕—渔猎文化区。

在云南境内,又有以哀牢山为界的空间划分,东西相差甚大。哀牢山以东,高原面保

持比较完整,称为滇中高原,大部分的平坝河谷分布在此区,诸如滇池坝子、昭通坝子、曲靖坝子等。平坝为山地地区的族群聚居,经济文化发展提供了扩展的空间。所以从自然地理条件上看,滇中、滇东比滇西获得了较为优越的生存空间,也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历史断面显示以滇池地区为中心的文化无论是青铜时期还是进入儒学兴盛的元明清时期,在滇文化中都具有重要位置。同时该地区也是云南境内受汉文化影响最深的一个区域。

哀牢山的西南面海拔相对较低,属于低山丘陵盆地类型,是目前我国境内气候最炎热、民族分布最为复杂的地区。由于所处地理位置远离中原而近东南亚诸国,又是国境内南北民族迁徙通道的末端等原因,该地区是西南族群关系最为复杂的一个区域。该地区年降水量在 1500 毫升以上,跨境河流众多,因而建筑形态与其他地区迥异。

滇黔境内自然地理空间延续着巴蜀地区的走向,西高东低,北高南低,由西北向东南呈阶梯状递减(但空间梯度变化比巴蜀境内更为剧烈)。滇西北梅里雪山海拔高达 6740 米,为全省最高点;滇东南河口县境内的元江与南溪河交汇处海拔仅 76.4 米;贵州省境内西部最高的韭菜坪海拔 2900 米,而东部黎平水口河出省处的海拔为 137 米,是全省最低点——形成了高纬度高海拔、低纬度低海拔的特点。

云贵两省都是典型的山地城市。贵州省“全省中山(海拔 900—2900 米)占全省面积的 60.87%,低山(海拔 900 米)占全省面积的 14.24%,丘陵占全省面积的 23.6%,盆地(包括河谷平原)仅占全省面积的 1.21%,而台地占全省面积的 0.073%。”<sup>[4]</sup>按照地形特点,贵州省大约可以分成 3 个梯级,即黔西北高原中山区,黔中丘陵、山原、山地区以及黔东低山丘陵区。云南省同样山地高达 84%,而山间平坝仅占 6%,而且多数分布在哀牢山以东的滇中高原地区。

滇黔境内地貌类型复杂,分布纵横交织,形成了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差异性。

### 早期的文化发展

《史记》中载西南夷中的西夷是以氐羌族系为主的川西滇西北地区,而南夷则是以百越族系为主的云贵地区。从早期的青铜器文化看,这个地区有着以滇池为中心的滇文化以及滇文化的另一类型——以洱海为中心的洱海文化,还有以夜郎为首分布于贵州高原上的民族集团文化。器物文化上的诸多特征表明它们属于《史记》中的靡莫之属民族集团农耕定居的文化:椎结,耕田,有邑聚。

汉代在滇池坝子设立了益州郡,在夜郎设立了牂牁郡,这实际上是对滇池文化和夜郎文化的一种认定,同时也是中原文化向西南更深入地渗透的表现。历史时期的滇黔地区各又分置或若干郡、或设立行省、或监察道等等,事实上是进一步加强管理,将其纳入中原的行政网络中。尽管如此,由于滇黔地区复杂的地理空间、特殊多样的民族构成,其行政管理还是与其他地区略有不同,如设立羁縻州、土司制等。即使有了后来的“改土归流”的运动,在云贵地区的边远山区,依然还是有不少处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给自足状态的村邑,绝少与外界环境交往,至今依然。

的确,由于滇黔地区的自然地理空间被切割成大大小小的若干小区域,从而形成了许多各自为中心的小集团,少有大的政权产生。除了在河谷坝子以及交通要塞等位置被以汉族为主的民族占据,其他的山脚、二半山地区、山顶地区混居着包括百越、百濮、苗瑶以及一部分南下的氐羌等民族,形成了多民族杂居,多元民族文化并存的状况。因此要从民族主体的角度描述云贵地区的文化特征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

但是比起其他地区,云贵地区有着丰富的降雨量和相近的生产方式。作为稻作文化

的起源地，<sup>[44]</sup>云贵地区中的诸族有着许多共同的生活文化特点，如上文提到的百越文化为代表的“渔猎为生、善种水稻、滨水而居、居住干栏、文身断发、龙蛇崇拜等”。而其中的干栏建筑延续了几千年，至今依然有不少边远山区的少数民族居住在干栏建筑中。

该地区最早的干栏建筑遗址始见于云南新石器时代的剑川海门口。而晋宁石寨山的考古发现中青铜筑成的房屋模型，铸工精细，保存完整，是典型的长脊短檐干栏式建筑。（图2-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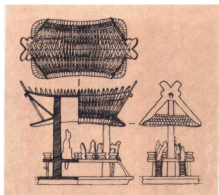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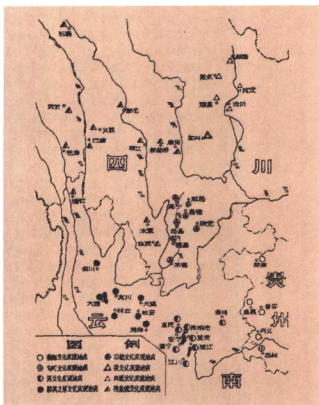


图 2-3-8 晋宁石寨山出土的干栏式建筑模型

#### 四、四川地域文化的亚层次划区及其建筑文化特征

通过考古学的资料分析，有人将四川地区的古文化大致分为4种类型，即川东丘陵地带的巴文化、成都平原的蜀文化、川西高原的笮文化以及川西南的邛都文化。<sup>[45]</sup>（图2-3-9）这种划分经过历史时期而体现了相当的稳定性。又有学者蓝勇通过政区、移民、方言、民俗、居民的个性特征与文化区域的关系分析，对西南文化进行划区。对于四川地区，他将其分为川东北、川西、川南文化区以及川西羌藏文化区。<sup>[46]</sup>（图2-3-10）这种划分基本与童恩正先生对四川古文化的划分相当，体现了文化发展的地域稳定性，但提法略为不当。其划分中的“川西”地区事实上是“成都平原的蜀文化”分布区。从地理位置上看，成都平原的位置在四川省的中部甚至还有偏东的位置，因此将“蜀文化”的生存空间称之为“川西文化区”的提法不恰当，虽然这似乎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提法。因此在下面的论述中我们还是将其称为“成都平原蜀文化区”。

图 2-3-9 四川地区古文化划区



川东地区（巴文化所在区）与荆楚关系密切。史载“江州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时期该地区是战争的主战场，战争的频繁使原有土著所剩无几。又因紧临湖北湖南，所以湖广籍移民最多，所受湖广文化的影响也最深远<sup>[47]</sup>。成都平原的蜀文



图 2-3-10 四川地区的文化划区 (来自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

化区是移民繁杂的商业文化区,是四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秦汉与中原中央政府有密切联系,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受中原影响最为深远,在西南地区的文化发展中处于较为成熟的地位,因此而辐射到其他地区。处于岷江中下游的川南文化区是四川的西南腹地,远离秦陇和荆楚,地理区位上的关系受外来的文化影响相对较小,经济开发也较为迟缓。另外元明清的战争对于该地区破坏相对较弱,保存的古文化特征也较其他地区为多。但由于经济落后,地形相对其他地区复杂等原因,该地区的文化主体特征不明显,带有多元并存的特点。该地区南北走向河流密集,将川西北、川西南与滇西北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三者文化上也有诸多类似之处。川西南的大小凉山是中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川西羌藏文化区处于众多河流的上游,处于农耕与游牧两种不同经济方式的交界带上,其文化特征则与巴蜀区内的其他文化有较大的差异,具有强烈的地区色彩。岷江上游的山地是中国惟一的羌族分布区;甘孜和阿坝也是中国重要的藏族集中区。这些都是我们为什么单独将其作为一个文化亚区提出来的理由。

借助其他门类学科的方法和成果,对于地域文化的亚层次文化划区为建筑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自然、人文背景。从四川的文化分区上可以看出,川东(巴文化区)的文化特征受荆楚文化影响为深,建筑形态上以干栏建筑为主,平面组合自由灵活,与多变复杂的地形结合较为紧密;“成都平原的蜀文化区”的建筑特征早期受中原建筑文化的强烈辐射,略有中原建筑文化的印迹,后期由于多向移民,形成以“抬梁式官室合院建筑”为主的建筑文化多元共融、相互影响的状态。由于地形相对平整,文化的整体水平较高,平面组合上合院布局形式较多,建筑装饰也较其他地区为精致。川东南地区地理特征复杂、交通落后、经济不发达,除受中原文化影响外,该地区最为明显的存留是闽粤移民的客家碉式建筑。平面组合上也多以合院为主,然外墙厚实,洞口小而高,带有突出的防御功能。墙体材料上以上为主。川西南有着中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同时与滇东北界临,因而建筑文化特征上除有古风外呈现出以彝族建筑文化为主的多元并存状态。该地区向来是民族迁徙的南北通道,加之生产力水平发展不一,生产方式农、牧、耕多种并存,所以建筑形态从发展较成熟的合院到土掌房、木楞房(井干房)以及较为原始的棚居等在该地区都可发现。川西北羌藏文化区的建筑文化则具有鲜明民族特征,一方面由于其民族主体是从游牧转向游牧与农耕并举的藏、羌人,二则由于其所处的高地气候特征,使得这个区域的建筑特征与西南其他地区存在较大差异。从建筑的“遗传基因”上看,该地区

的建筑形态已非中原建筑的“基因”。无论是平面组合,建筑用材,视觉形态等都与中原的合院建筑相去甚远。

进行文化的“区划”本身就是一种危险的工作,因为它不免挂一漏万。而且由于民族的迁徙移动在该文化区的某些位置很可能带有彼文化区域的特征,这是普遍的现象,因而也存在更进一步的亚层分区的可能。然而通过地域文化的“区划”有助于在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中爬梳出一定的条理,有助于通过现象认识事物的发生、发展的成因,有助于认识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和各地区之间的文化联系。这个工作对于认识西南文化的整体面貌尤其重要。西南建筑形态复杂,建筑类型多样,要有一个清晰条理的认识离不开对地域文化的研究,以地域文化为背景,通过相关学科对地域文化的归纳总结,才能理清一定的脉络。

当然,建筑文化的区划与地域文化的区划可能并不完全吻合,二者之间存在这一定的差异。比如关于巴蜀文化。巴文化与蜀文化自春秋时期起二者因为文化融合始有较相近的文化特征,故后期人们通常将其视为同一地域文化。但是二者事实上还存在诸多文化上的差异,特别是地理空间上的差异以及建筑文化上的不相统属,上文已有所阐述。巴地的建筑类型以干栏式建筑为主,这与荆楚地区的建筑更有渊源关系,与云贵地区的建筑更为相近。

## 第四节 民族学背景

确切的说,研究建筑就是研究自然的状态与人的需求。西南建筑类型繁多错综,基本原因在于地理环境的复杂和其“民”种类之多,也在于“民”的演化、迁移,为适应新环境而产生出更多的居住类型。因而要研究西南建筑,对之进行形态特征归纳,就有必要研究其“民”的组成。

公元前1世纪初成书的《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了当时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情况: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徼榆,名为焉、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焉以东,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自笮以东,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

在这里,司马迁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依次叙述了其周边南部、西南部和西部的少数民族,包括现在的贵州、云南滇池区域、澜沧江中游区域、洱海区域、滇西北区域、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雅安地区、阿坝藏族自治州和甘孜藏族自治州,其间涉及农耕的夜郎、滇与邛都以及游牧的昆明、焉或农或耕的徙、笮、冉駹诸族。可见早在公元前1世纪,西南地区的民族分布就十分错综复杂。

又有吕思勉先生在《中国民族史》中将中国民族划分为11个族类。北方5族,汉居其中,南方5族。其言“西南诸族,最为错综,而名称亦猥多。我国古代,通称为蛮,……近今之言种族者,亦多通称高地族而已……今就数籍可稽者,略加爬梳,析为五族:曰苗,曰粤(越),曰濮,曰羌,曰藏。”吕思勉先生在这里是将羌与藏分而叙之,事实上藏羌民族有着

再有费孝通先生将西南云贵地区的民族构成分为六类：一是以傣族为主的居住在南部及西南边境上的壮侗语系民族；二是北方迁徙来的彝语民族；三是该地区的土著民族，如仡佬族；四是中原移民，最早如楚国的庄乔人滇；五是各民族的混血，可能如白族；六是南亚语系的民族，如佤族等。<sup>〔4〕</sup>

另外,通过人类的体质特征和语言族属研究民族源流的分化组合是当前理论界普遍认同的方法。作为人类学和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历史上西南民族可分为五支语族: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汉藏语系壮侗语族、汉藏语系苗瑶语族、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汉藏语系汉语族等。属藏缅语族的西南各族,其主要部分源于氏羌;属壮侗(壮傣)语族的西南各族,其主要部分源于百越;属孟高棉语族的西南各族,其主要部分则源于百濮,而苗瑶语族的部分则从三苗九黎为主构成的民族;属汉藏语系汉语族系中原齐民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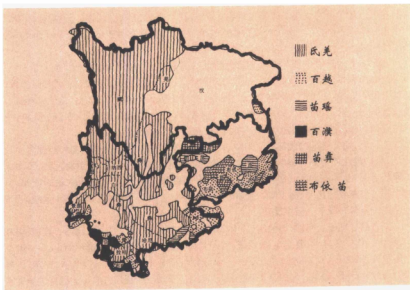


图 2-4-2 西南民族分布示意图 (采自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

西南地区古代民族源流、人种及语言族属表<sup>[49]</sup>

现代语言语族	现代民族与人种亚种	古代民族系统
汉藏语系藏缅语族	彝语支——彝族(西北亚与南亚过渡型)、哈尼族(南亚型)、纳西族(东亚型)、傈僳族(东亚型)、拉祜族、基诺族(南亚型)、碧江怒族 白语支——白族(东亚型) 景颇语支——景颇族(东亚与南亚过渡型)、独龙族、贡山怒族 藏语支——藏族(西北亚与南亚过渡型)、普米族 缅语支——阿昌族(东亚型)	氏羌系统民族
汉藏语系壮侗语族 (侗傣语族)	傣语支——傣族(南亚型) 壮语支——壮族(南亚型)、布依族(南亚型) 水语支——水族(南亚型)	百越系统民族
汉藏语系苗瑶语族	苗语支——苗族(南亚型) 瑶语支——瑶族(南亚型)	三苗九黎系统
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	佤德语支——佤族、布朗族(南亚型)、德昂族、崩龙族	百濮系统民族
汉藏语系汉语族	中国以长江为界分成北方汉人和南方汉人。西南三省汉人多为东亚型。但川黔两省汉人聚类更近,与南方汉人更近;云南汉人也属南方汉人,但聚类更近北方汉人。	中原齐民

## 一、氏羌族系

氏羌族系最初起源于甘肃、青海一带,处于农耕与游牧两大地区的中间,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广泛的影响。《后汉书》载“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很可能是三苗西迁与当地土著民族融合而成羌族。氏羌族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向四周迁徙,向东的部分与华夏族发生密切的联系,并最终大部分融入华夏—汉族之中;向南、向西的部分广泛分布于西南地区,成为今天的藏缅语族诸族。西南地区的氏羌系藏缅语族以青藏高原及云贵高原的西部和北部为主要活动区,喜居在海拔 2000 米以上的高原和山区,其分布乔木少而草原辽阔,以畜牧和狩猎经济为主,辅之以刀耕火种的高原种植业。从居住类型看,该族系因长期居住在高原寒冷地区,或干热(冷)地区,为获得良好的居住小气候,建筑形态体现出强烈的内缩性及与环境的隔离性,如羌族的邛笼、藏式住宅以及彝族的土掌房等。在这里我们统称之为邛笼建筑体系。尽管氏羌民族后来有诸多衍化并继续向气候炎热的南方迁徙,并进一步与其他民族融合,产生如纳西族的井干房、合院房等,但邛笼体系至今依然是该族系物质文化最鲜明的特征之一。该体系系北方游牧民族南迁中与当地土著的文化融合过程中产生的居住样式(如岷江上游的邛笼,或有说羌人学习于当地纵目叉基人的筑房技术),长期以来并未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然而因其所处地区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等因素,至今该体系历经千百年而无多大变更,而且留有相当数量,可以说研究该区域建筑文化的活化石。

## 二、百越族系

百越族系之称为“百”,乃其族类之多而杂也。其广泛分布于长江中下游以南至岭南,贵州的乌江以南和黔西北以及云南省的东部、南部等广大地区。该族系有着鲜明的居住

特点,即喜居于平原低地或靠近江河湖海水道纵横的地区。因而在文化生境上,百越族系体现出与“水”更多的密切联系,也与其他几个族系有明显的区别。如水耕稻作、习水用舟、干栏建筑以及龙蛇崇拜等均离不开“水”的生境,上文已多有阐述。西南地区的百越系壮侗语各族主要在红河、南北盘江、怒江、澜沧江中下游河谷地带,系亚热带季风湿润区,海拔高度在1500米以下,他们以水田稻作农耕为主,辅之以捕鱼业和家庭养殖业。

### 三、苗瑶族系

苗瑶族系是我国历史最悠久,迁徙最频繁,迁徙跨度最大的族系之一。关于其族源,学术界有诸多说法,或说是远古时“三苗”后裔,或说是源于西周时的“鬻人”,或有夜郎说、盘瓠蛮说、武陵蛮说等等。但是各家对于秦汉时期的“武陵五溪蛮”有苗族先民在内均无异议。由于苗瑶民族的居无定所,关于该族系的考古资料相对分散,墓葬方式也多种多样(如树葬、崖葬、悬棺葬、土葬等),所以“苗瑶文化”似乎缺乏明显的特色。西南地区苗族主要分布在云贵高原的东部和东南部的边缘地带,海拔高度约在500—2000米之间,瑶族则在200—1500米之间。他们以旱地农耕为主,辅之以少量的山地饲养业。

### 四、百濮族系

百濮族系很可能是西南诸省的土著民族。如费孝通先生所言,“按考古学上的遗留来看,这是一块人类的发源地,不能想象没有遗留人种。但是现有的知识,还是不能明确他们和现代民族有什么关系。”<sup>[90]</sup>又有凌纯声先生认为,古代亚洲太平洋区域南岛语族或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系统之民族,“古代居于中国长江流域,尤其在中游,左洞庭而右彭泽为中心区域,最早见于中国古史者名九黎,其后在西南曰百濮,在东南曰百越。”<sup>[91]</sup>

## 五、地理空间·民族分布·建筑类型

“西南各族人文分布的总特征是大杂居,小聚居。这种状态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自然生态的垂直分布和各族从先民那里传承的向自然索取生存资料的经济方式各异,显然是两个最基本的因素。其次,西南域内的‘民族迁徙走廊’、‘丝绸之路’,以及中原王朝的征讨,南亚宗教的传入等因素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有的西南少数民族人口众多,分布又广,历史上动荡迁徙较频繁,因而,同一民族的不同部分往往又既有居住在高原山顶的部分,也有居住在二半山和河川平地的部分,处在自然经济的生产力水平,他们也只能变革传统,适地求生,宜牧则牧,宜农则农。”<sup>[92]</sup>——客观上的诸多原因造成了多民族的混居,相同的民族也有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相异的居住地域,因而也造成了一个民族有多种居住形态。比如彝族,由于其分支繁多,分布宽广,既有土掌房,一颗印又有木楞房等,因而如果仅从单个民族的角度出发,就无从下手,很难把握西南建筑文化的特征。然而研究建筑文化离开了对具体的人的研究,尤其是人的生活方式研究,无异于空中楼阁。所以在我看来,结合民族的谱系与民族的活动区域分布,比较、总结、归纳西南建筑体系,是一种可取的方法。

百越、苗瑶、百濮等族系都是生活在长江以南的区域,是我国的南方民族。这几个族系的民族多生活在低山丘陵或滨水地带,气候炎热,虫蛇众多,因而创造出干栏建筑体系,如同族建筑、土家族吊脚楼等。干栏建筑起源并广泛分布与我国的南方地区,且影响



到东南亚的众多国家,有树上居、楼居、棚居、寨居等诸多方式。然而现在也仅在西南地区有较多存留。

如果依然将我国地理单元分成寒带、温带以及热带三大块,比对这一分法研究建筑在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不同形态,那么寒带地区有穹窿建筑体系,热带地区有干栏建筑体系,而温带地区则有华夏—汉族创造的合院建筑体系。由于文化上的成熟和强大,合院建筑体系比之穹窿与干栏体系,发展得最为成熟和完善。加之历史的原因,西南的汉族大部分居住在生存条件较为宽松的平原坝子地区,以集贸、农耕等为主要生产方式。文化上的强势及地理空间的优势使得合院建筑体系对于周边地区有较大影响。

## 第五节 西南诸信仰

它(西南原生宗教)都能通过自身对本地文化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使之介入世俗的生活,制造出一种适宜于其传播的具有强烈感染力和权威性的神秘的文化氛围,并通过这种氛围一代又一代地传续下去。它与民族文化融为一体,渗透进每个民族成员的心灵,支配他们的判断与行为。它将世代先辈积累起来的经验、教训与知识,披上神话传说的外衣,衍生为维系生产活动与社会生活所必须遵循的诸如节令、习惯和禁忌之中,从而保证本民族文化在既有的条件下不断地延续。它把自己的价值观、宇宙观、社会观、人生观用强烈的宗教感情加以艺术化,使之物化在服饰、建筑、工具及一切器物之中,形成一个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生活习俗与器物特征。<sup>[31]</sup>

——史波:《神鬼之祭—西南少数民族传统宗教文化研究》

### 一、文化接触与西南宗教格局

宗教是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西南地区民族多达 37 种,宗教信仰也是错综复杂。然而如果仔细研究各种宗教的地理分布,可以发现它与族群分布有类似之处。发展成熟完善的宗教,如汉地佛教、南传上部座佛教、藏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大部分分布在平坝河谷地区,或是居于重要的交通干道、民族走廊上。又如西南道教在成都平原上产生、弘扬,并与汉地佛教相互渗透发展;藏传佛教处于著名的“北丝绸之路”的南线,南传上部座佛教处于“西南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地理空间的优势有利于宗教文化的传播发展;而伊斯兰教基本上就是由于民族战争和贸易而传入西南地区。

如前文所言,不同的文化接触造成了西南今日的文化格局。对于西南宗教大的分布格局,同样也可从周边的影响看出一些端倪。(图 2-5-1)西面而来的印度佛教在西南的西部、南部衍化成大小乘佛教;东边荆楚崇尚鬼神的巫风至今在黔贵地区有浓厚的存留;中原的汉地佛教首先在四川落脚并向其他西南诸省扩张。而道教则是源于西南本土最完善成熟的宗教,最终成为我国三大宗教之一。而这些宗教中尤以佛教的格局分布最有代表性特征,体现出西南地区的多边文化影响:

“唐代以来,西南地区佛教已经分成三大系统,一是中原的大乘系统,以密宗、禅宗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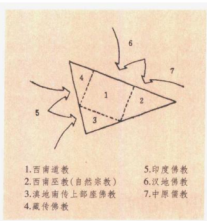


图 2-5-1 西南宗教格局与周边影响  
(采自徐新建《西南研究论》)

主；一是南方的小乘佛教系统；一是西藏藏密的喇嘛教系统，在地域上分布各异。中原佛教大乘系统传入西南最早，是西南地区最主要的佛教信仰，在四川、云南中部、北部和贵州地区最为流行。一般认为，南方的小乘佛教系统从缅甸传入我国的时间是在隋唐时期，其主要影响的地区在滇南西双版纳和德宏州、临沧和思茅州等地区。西藏是藏传佛教的发源地。实际上，藏传佛教也是佛教的密宗，只是由于传到西藏后，受当地民间信仰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具有强烈民族和地方色彩的佛教，其主要分布在西藏、西康和滇西北藏区。”<sup>[54]</sup>

## 二、宗教影响与建筑承传

在这里，应该着重指出宗教在西南地区的作用，尤其是对于西南建筑文化的重要作用。文化的影响必须经过“习得”才能作用于其成员。“习得”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正规教育，二是非正规教育。在现代社会中，正规教育日益显示出其重要性。而在西南地区，尤其是在非坝子地区，非正规教育依然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西南各族的传统文化依然是通过言传身教、耳闻目睹的方式传承。“宗教经典、神话传说和史诗、宗教祭师与巫师，年老的部族成员和半专业化的工匠是他们民族文化的积累者和传播人。在器物形态中蕴藏的民族文化信息也要靠他们去揭示、阐发和弘扬。”

任何器物都有两种的功能，一是“实用”功能，一是“审美”的功能。建筑也不例外。而建筑中“形而上”的美，很大程度需要依靠宗教信仰来承传。宗教信仰通过对人思想的影响，如教义、传说等从而体现在建筑的实体形态上。由于西南地区宗教的复杂多样，加之宗教的影响在民间还起着很大的作用，从寺庙到普通的民居，都可以看到非实用性功能的装饰，如羌族建筑中的白石崇拜、羊崇拜等。当宗教稳定成文化上的一种定势，它将恒久体现在生活生产中的方方面面，并深烙于器物之上，经久不变。这种影响在川西滇西北地区尤为恒久不变。

## 第六节 廊 道

把西南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西南的建筑文化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除了外部的地理空间格局、文化界临等外部因素的压力整合作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西南地域内部的文化交流。这种交流需要一定的历史契机，这包括民族迁徙、经济流通、使节往来、宗教传播以及社会变革、爆发战争等等，而这其中就不得不提到文化交流

的廊道。西南复杂的山地地貌客观上造成了各个文化生长点的分散和其交通联系的不便,导致不同文化间缺乏交流。这也是为什么至今在西南地区还有多元并存的各类民族文化的根本原因之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从多元并存转为多元共融,文化交流的廊道就显出特别的重要性。总结起来,这种廊道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的廊道,一类是人为开拓的廊道。当然,二者可能存在叠合的现象。

## 一、自然廊道

所谓的自然廊道即指西南地区内天然形成的四通八达的江河水系。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尤其是西南复杂的地貌限制,人们的交流基本上是沿着江河河谷地带这种自然的廊道进行。即便在今天,西南地区大部分的公路交通,也是沿着河流走向行进。这其中该着重着墨的是贯穿南北的横断山脉地区的众多河流以及横穿东西的滚滚长江。

### (1) 贯穿南北的横断山脉及其间的众多河流

横断山脉及其间的河流贯穿了我国三大气候带,北接寒冷的北方游牧区,南可穿过滇南而达东南亚热带地区。由于其地理空间位置远离强大的中原文化,并处于我国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西端且呈南北走向,横断山脉区往往成为南北民族迁徙的走廊。由于近代该通道主要连接藏、彝两大民族地区,费孝通先生曾称其为“藏彝走廊”。

该廊道主要由三条并列的走廊组成:1.西部的金沙江与雅砻江走廊,2.中部的大渡河走廊,3.东部的岷江上游走廊。前两通道北接甘青,南抵云南,沟通了藏彝地区,可以说是严格意义上的“藏彝走廊”。第三通道虽北接甘青,但南抵成都平原,自汉唐来多有藏、羌民族在该地区活动,却少有彝族在此出入。这也是为什么在岷江上游至今存留有我国唯一的羌族聚居区的原因之一。

### (2) 横穿东西的滚滚长江

南北奔腾千里的金沙江与岷江在四川宜宾汇合,然后转道东边,在重庆与嘉陵江汇合,之后穿过荆楚吴越,流向滔滔东海。如果说横断山脉沟通了西南地区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交往,那么长江则是巴蜀文化与荆楚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同时也是百越民族西迁的主要通道之一。古代社会中信息的传播媒介不发达,不若今日一瞬千里,有如电视、电话、报纸等大众信息传播媒介。可以说,古时的人就是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人的流动就是文化的流动,不同族群的迁徙、接触就是不同文化的移动、接触。

## 二、人文廊道

除了自然形成的廊道,因为战争、贸易等的需求,人们也会主动开辟出一些道路。这其中就有沟通西南与中原的诸多官道以及民间贸易形成的西南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

### (1) 官道

西南与中原的官道开通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秦代开通了巴蜀地区与北方之间以及巴蜀地区内部的联系干道;汉代则主要开通了巴蜀地区通向西南夷地区、西南夷地区内部以及西南夷地区通向其他地区的交通道路。这种官道的开通扩展的过程事实上体现了中原文化在西南地区的渗透、扩张,同时也体现了为什么在西南地区诸文化中巴蜀文化受中原文化影响最深。中原文化必须将巴蜀作为一个据点,经巴蜀而辐射到西南诸地区。

根据罗二虎著《秦汉时代的中国西南》<sup>①</sup>载,秦时开通的官道主要有:

· 褒斜道与石牛道:这是一条巴蜀地区通向北方关中地区的道路,也是自古以来蜀连

接周与秦的交通干线。北段称褒斜道或称斜谷道、褒余道,在今陕西的关中地区至汉中地区,途中要翻越秦岭。其南段称金牛道或金牛道,是从汉中地区经四川广元至成都。

·阴平道:这是一条从甘肃南部的天水经武都,四川的青川进入四川盆地而至成都。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昭王二十七年“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灭楚黔中,拔之”,秦国的军队即是通过阴平道而至蜀地。

·江水道:该道沿着岷江顺流而下而至犍道(宜宾),再沿江而下。该道沟通了巴蜀地区内部以及巴蜀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联系。《史记·张仪列传》载张仪劝楚王时称“大船积粟起于汶山,浮江而下,至楚三千余里。……一日行三百里,不至十日而距关”。事实上,司马错就是占据蜀地后顺江而下伐楚的。

·五尺道:这条道路的路线为从犍道(今四川宜宾)向南进入夜郎地区的北部(今贵州省西北部一带)。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在秦代,政府“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秦的5尺约合今1米左右。言“五尺道”主要是形容此道的狭窄,仅能过人、畜而不能通车。西汉武帝进兵西南夷地区时,又重修扩建此路,并成为汉代的官道——南夷道的一部分。

汉代开通的官道主要有南夷道和西夷道,统称西南夷道。

·南夷道:南夷道的路线北边一段与秦五尺道重合,南边一段继续向南延伸,并与西夷道会合。西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汉在夜郎等南夷地区设置郡县的同时,将道路从犍为郡的犍道(今四川宜宾)修到了夜郎国所在的牂牁江一带(今贵州西部珠江上游的北盘江)。可能在元封二年(前109),汉武帝第二次进兵西南夷并置益州郡前后,又将此道延伸到滇池一带并最终再向西延伸与西夷道会合。

·西夷道:西夷道又可分为两段,即灵关道和博南道。前者大致从成都经青衣江至邛都(今四川西昌),后者又从邛都延伸至不韦(今云南保山)。当建元六年(前135)汉在夜郎国等南夷地区设置郡县后,又派司马相如为汉使,以巴蜀地区的财物贿赂西夷。于是,“司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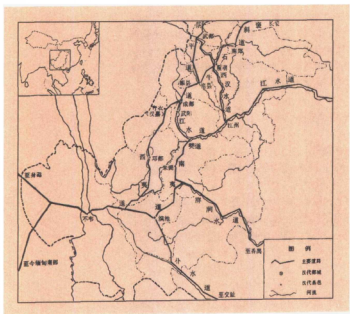
长卿(相如)便略定西夷……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今大渡河)、若水(今青衣江),南至牂牁为犍,通零(灵)关道、桥孙水(今安宁河)以通邛都。”大约在元封二年(前109),汉武帝第二次进兵西南夷前后,开通博南道。

汉帝国的势力到达西南夷地区之前,已存在着一条从成都经西夷地区通向身毒(今印度)的民间商道。汉代以后,这条道路也一直在利用,除了到达身毒之外,还可以向南沿今伊洛瓦底江到达今缅甸南部。东汉时,今缅甸南部的一些小国和部族即经此道向汉帝国朝贡。此外,根据汉晋时期的文献记载,汉代时从益州郡和永昌郡还可沿仆水(今元江)到达交趾郡(今越南北部)。(图2-6-1)

## (2)西南丝绸之路

《史记·大宛列传》载,公元前122

图2-6-1 秦汉时期西南主要的官道(采自罗二虎《秦汉时代的中国西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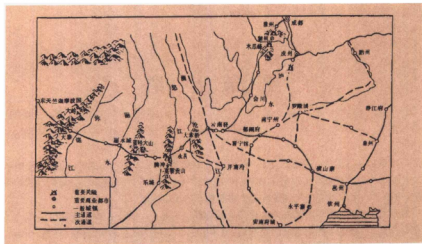


年,大探险家张骞出使西域归来,见汉武帝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这证明了西汉时期,巴蜀已经和印度等地区有了民间的商业来往。为了解该通道,汉武帝“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陇,出冉,出徙,出邛,焚,各行一二千里。其北闭氐、笮,南方闭僇、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能通。”

汉武帝四道并出还是被西南诸多的少数民族所阻,终于还是没能找到通往印度的道路。其实这条路线早在公元前4世纪就已存在,直到两个世纪后才引起官方注意。根据《史记》的记录,说明至迟到公元前2世纪,中国西南地区已经和西域诸国有了贸易往来。从四川经云南到缅甸、印度、阿富汗等国,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

这条道路据考由灵关道、五尺道和永昌道三部分组成。灵关道由蜀(成都)经临邛(邛崃)、灵关(芦山)、笮都(汉源)、邛都(西昌)、青蛉(大姚)、至大勃弄(祥云)、叶榆(大理);五尺道则由蜀南下,经焚道(宜宾)、朱提(昭通)、夜郎西北(威宁一带)、味县(曲靖),至滇池(昆明),然后往西经楚雄、云南(今祥云县云南驿)而至叶榆,与灵关道会合。永昌道则由叶榆向西,经博南(永平)、越唐(保山),然后由滇越(腾冲)出缅甸到印度。(图2-6-2)

图 2-6-2 西南丝绸之路路线



两千多年来,西南丝绸之路通过各国商人、僧僧、使节的往来沟通了沿线各国、地区以及西南各民族间的交流,无论是在器物上还是文化的影响上均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西南丝绸之路,不仅如《史记》所说蜀布、邛竹杖传到了身毒乃至大夏;也不仅仅是印度琉璃珠在战国时即已传入长沙,更重要的是技术、文化、艺术的交流。

另外,这条通道尤其是佛教从印度传往西南地区的主要渠道,对于今天的藏传佛教与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形成留有深远影响。史料研究表明,除了印度僧人传播佛法于中土之外,我国僧人也有通过西南丝绸之路前往印度求法。唐僧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八十一就提到曾有二十余僧“从蜀川南出群洞,往天竺得法”。

### (3) 茶马古道

这是一条西南高原上由马帮踏出来的联系滇、川、藏的国际大通道。这条通道事实上把西南丝绸之路与唐蕃古道联系起来,成为了沟通西南文化、雪域文化与印度文化的纽带。茶马古道的路线有两条,一条从云南普洱等地开始,经大理、丽江、中甸、察隅、波密、

拉萨、日喀则、江孜、亚东、柏林山口而出缅甸、尼泊尔、印度等国；一条从四川的雅安出发，经康定、理塘、巴塘、芒康、左贡、邦达、昌都、加玉、阿兰多、墨竹工卡、拉萨到尼泊尔、印度等国。

茶马古道以丽江马及普洱茶为主要的流通商品，兼及山货、皮毛等。丽江马因其“质小而蹄健，上高山，履危径，虽数十里不知喘汗”，或用作坐骑，或用以运物（包括马帮），或被贩运于内地。至于滇茶，其栽培功亦早。《普洱府志》谓汉代已有。滇茶由马帮运入四川再向西传入藏区。这就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而且具有政治意义了。滇茶再由西藏传入锡金、印度等地；而由普洱南下则通老挝、越南等地。因而，茶马古道上，一是“茶文化”外传的同时，印度文化传入了；二是汉、藏文化交流了；古道沿途各民族之文化因子相互传递、扩散乃至交融了。商品流通，商贩往来对文化交流所起之作用不可低估。

以上所述仅仅是古代西南地区一些主要的交通干道，同时也是文化流通、交融的廊道。这些通道将西南与北方游牧区、西南与中原、西南与荆楚、西南与西域、西南与东南亚以及西南内部等不同方位的地理、文化区域联系起来，促成了西南今天文化的多元并存现象。研究西南山地建筑文化，就不能忽视对文化交流廊道的研究，否则就很难理解会在遥远的山区产生诸如丽江、建水这类比较发达的城镇，同时也很难理解为什么在中心坝子周围不远的区域，建筑的形式会有相当大的差距。

## 第七节 小 结

本章择选了几个主要的文化因子，通过对它们的研究、比较、归纳，勾勒出西南地域文化的一个基本轮廓。借助史学、地理学、民族学等学科对于西南这个错综复杂地域的研究，描绘了西南地域文化及其建筑文化的概貌。这其中包括了：

- 西南地域文化与中国三大文化区关系浅释。这是一个关于西南山地建筑文化的外部环境研究，指出了西南地域的特殊性，是中国三大文化“板块”延伸、接触、碰撞、交融的结果。这为阐述西南地域文化的主体特征奠定一个大的文化背景。同时为西南山地建筑文化的类型构成做了有力的论证。

- 西南地域文化及其自然地理空间的主要类型与特征。这是一个关于西南地域文化本体的研究，其中将西南地域文化分为以农耕为主的巴蜀文化、以游牧兼农耕的川西滇西北高原文化以及以渔猎兼稻作农业为主的云贵文化等三类。这三类文化类型反证了西南山地文化与中国三大文化板块间的关系。同时阐述了西南地域建筑文化系由农耕为主的巴蜀文化为代表的“合院建筑体系”、游牧兼农耕的川西滇西北高原文化为代表的“邛笼建筑体系”以及渔猎兼稻作农业的云贵文化为代表的“干栏建筑体系”构成的。

- 西南地域的人。这是关于西南地域民族主体构成的研究，结合相关资料指出了西南地域系由氏羌、苗瑶、百濮、百越以及中原汉民等组成。其中，氏羌族系是川西滇西北高原地区的活动主体，是邛笼建筑的居住主体；苗瑶、百濮、百越是云贵地区的活动主体，是干栏建筑的居住主体；而中原汉民以及被汉化的相关民族是以巴蜀地区为代表的农耕文化的主体，是合院建筑的居住主体。——当然，这是一种主流的划分，人具有能动性，民族

的迁徙十分复杂,不可能完全绝对。

·西南地域中人的信仰。这是关于西南地域价值信仰格局以及对于物质文化影响的一个论说,分析了以藏传佛教、南传上部座佛教、汉地佛教、道教以及巫教为主的宗教信仰的空间分布及其与周边环境的关系。其中,藏传佛教大多为羌族系宗教信仰;巫教与南传上部座佛教大多为苗瑶、百濮、百越等族系的宗教信仰;而汉地佛教、道教等则为汉民的信仰。

·西南地域文化交流的廊道。这是关于形成西南文化格局的另一个方面因素的阐述。其中简论了早期主要贯穿西南地域东西、南北走向的自然廊道、后来形成的官道以及贸易需求开辟的廊道等。

从相关学科的视野,从多学科的观点,有助于从更宽广的层面来理解西南山地建筑文化的发生、发展、变化。建筑的演化始终离不开修建、使用建筑的人,离不开人周围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了解这些左右着建筑的“无形的手”就等于摸到了发现建筑“之所以然”的钥匙。

通过以上的研究归纳,我们发现西南地域文化的三大板块(巴蜀为主的农耕文化、滇黔为主的农耕—渔猎文化以及川西滇西北地区为主的农耕—游牧文化)有着各自鲜明的文化特征,这种文化特征的产生有着其深刻的自然与历史文化背景,同时该文化的特征又是由若干鲜明的文化因子组成。而“建筑”就是其中典型的文化因子之一。下文我们将更深入地探讨各文化类型相对应的建筑体系及其典型特征。

[1] 大致为原有西康省覆盖的地理空间,原设立西康省,说明人们也早已经意识到该地理空间在文化特征上的差异。

[2]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

[3]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第4页。

[4]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第257页。

[5]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第12页。

[6] 黄才胜:《亚太干栏文化比较研究》,《建筑与文化论集》第4卷,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第157页。

[7] 该概念借用了宋蜀华先生对于“云贵高原是中国三大文化板块延伸、碰撞和交融的地区”的提法。用于西南地区,可以从更广的地域范围,从文化演变等来审视西南地域文化与三大文化板块之间的关系。

[8] 宋蜀华:《中国民族学理论探索与实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9] 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南方文明》,重庆出版社,第558页。

[10] 王文卿、陈雄:《中国传统民居建筑形态的自然区划》,《建筑学报》1994年第7期,第47页。

[11] 高曾伟:《中国民俗地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86页。

[12] 徐新建:《西南研究论》,云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13] 高亦兰:《建筑形态与文化研究》,《建筑师》第56期,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第2页。

[14] 徐新建:《西南研究论》,云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15] 童恩正:《南方文明》,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

[16] 《华阳国志·蜀志》。

[17] 段渝:《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18] 吴国金 张家楨主编:《西部生态》,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22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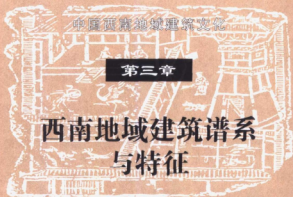
- [19] 童恩正:《南方文明》,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
- [20] 童恩正:《古代的巴蜀》,试谈古代四川与东南亚文明的关系,重庆出版社,第306页。
- [21] 以上统计资料摘自邓少琴《巴蜀史稿》。
- [22] 宋治民:《蜀文化与巴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
- [23] 参见宋治民:《蜀文化与巴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第142页。
- [24] 戴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出版社,第23页。
- [25] 王士性《五岳游草》。
- [26] 古史或说禹在石纽,或说禹在汶川,均指今岷江上游一带。
- [27] 转引自邓少琴《巴蜀史稿》,第102页。
- [28] 如“张献忠屠蜀”、吴三桂军队与清军在四川大战等。
- [29] 任乃强《张献忠屠蜀论》。
- [30] 袁庭栋:《巴蜀文化志》,中华文化通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 [31] 段渝:《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 [32] 参见宋治民:《蜀文化与巴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第213页。
- [33] 段渝:《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 [34] 关于“自然地理空间的相似性”这点似乎还应存疑。西南传统建筑文化演变过程似乎是如此的,然而以之来验证中国当前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又不尽然。大江南北的建筑模样并无多大的差别,这是“人定胜天”的结果呢还是文化的滞后使然?
- [35] 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文化区域”条。
- [36] 童恩正:《南方文明》,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
- [37] 参见奚国金、张家桢主编:《西部生态》,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221页。
- [38] 以上气候资料主要来自:叶启荣:《四川藏族住宅》,第6页。
- [39]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
- [40] 罗二虎:《秦汉时期的中国西南》,天地出版社,2000年版,第26页。
- [41] 也有称之为“纵目的戈基人”。有考证戈基人系氏人一支。
- [42] 刘敦桢:《刘敦桢文集》三,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7年版,第320-321页。
- [43] 奚国金、张家桢主编:《西部生态》,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277页。
- [44] 日本学者佐佐木高明曾经论证了存在着一个东亚半月弧,其中心是以西部的阿萨姆、中部的云南和东部的贵州组成,系稻作农业的发源地,其影响深远,波及日本及东南亚地区。参见佐佐木高明:《照叶树林文化之路》,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 [45] 童恩正:《南方文明》,“近年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战国秦汉时代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第420页。
- [46] 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 [47] 参见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中对于明清时期各省移民比例的统计。
- [48]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 [49] 转引自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
- [50]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 [51] 凌纯声:《中国与东南亚之崖葬》,《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3本,下册,1952年版。
- [52] 史波:《神鬼之祭——西南少数民族传统宗教文化研究》,云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 [53] 史波:《神鬼之祭——西南少数民族传统宗教文化研究》,云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 [54] 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1页。
- [55] 罗二虎:《秦汉时期的中国西南》,天地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页。



中国民居建筑类型学

第三章

西南地域建筑谱系  
与特征



“一个自然体系,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的价值体系,一个被居住于此,拥有这一自然体系的人们所认知的社会价值体系……这种认知与自然资源将导致一个特殊的生产方式,而它有时又会受制于自然体系。继而这个生产方式将造就一个有个性的聚落形态,这些具有特殊生产方式及特殊聚落形态的人们将有一特定的价值观,并影响认对环境的认知。”

——麦克·哈格《设计结合自然》

对于建筑的研究方法向来有不同之理解,有价值的成果可能更多在于产生形态背后的自然、人文背景以及形态本身的营造与设计上的研究。其中,民居文化研究是整体建筑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民居形态的分类则是研究的重要基础,也就是说,从哪一方面入手来研究民居形态。从目前的资料上看,大致有如下几类分法:“平面分类法”(刘敦桢《中国住宅概说》、杨昌鸣《东南亚与中国西南少数住宅平面布局研究》)、“结构分类法”(刘敦桢《中国居住建筑简史》)、“外形分类法”(龙炳颐《中国传统民居》)、“气候、地理分类法”(汪之力《中国传统民居》)、“人文、语言、自然条件分类法”(陆元鼎《中国传统民居的类型与特征》)、“文化、地理分类法”(蒋寅宸《匹大谱系说》)等。

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以上的分类方式主要是两种倾向:一类是输入信号的分类(人文、自然等);另一类则是输出信号的分类(建筑形态的平面、结构、外形、装饰等)。两种分法是研究事物的两个方面,并无优劣之分。在我看来则更倾向于前一类的划分方式。对“有什么”、“是什么”的划分固然也是认知事物的一种方式,然而很有可能陷入将“器物”研究与其环境割裂开来的危险;而对于形成事物的背后缘由探讨,对于“为什么”的划分,则能够更好理顺事物发展的脉络、了解事物的发生机制和本质特征。然而具体的研究还是必须落实于具体的实态,结合建筑的形制,从平面模式、空间构成以及建筑装饰等方面进行分析,尤其是通过建筑类型学的类型归纳比较,反证于气候、历史等地理人文因素对建筑文化的影响。

另一方面,对于输入信号,则又有哪方面是主导因素的研究。其中涉及到自然的地理环境、气候、资源以及社会形态、生产方式、婚姻形态、宗教信仰等等。从现有资料上看,更多的是较笼统的提法,缺乏深入具体的研究。

如果将民居还原到最开始的状态,只留下两个问题:即“修建”以及“建什么”的问题。其中,“修建”更多涉及技术、材料,涉及到与自然环境、气候等协调的问题;而“建什么”则涉及更多的“人谋”,更多的与生活生产方式、婚姻形态、宗教信仰等相关,与人的需求相关。——实体的围筑是获取空间,而空间的形态与人的需求紧密相关。所以在我看来,对于传统民居外形态(围筑)的主导影响因素是地理、地貌、气候等自然因子,其形态是人们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情况下长期与自然的磨合、调适的结果。生产力越低下,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制约能力就越大,在建筑文化中的烙印就越明显。而对于聚落的布局、房屋的安排、细部的装饰等其主导因素则应当是人的需求,从基本的生理需求到审美的需求而至文化的追求。

因此,有必要更加深入地审视西南地区的自然地理划区,尤其是影响到建筑形态的几个重要元素在量上的变化,如太阳辐射、气温、降水以及地形坡度等,对照于各种建筑形态在不同地域自然条件下的分布,从中寻找规律。也就是说,研究的重点不仅仅在于建筑的形态上,更在于探索这些建筑形式的空间差异与时间变化之间的关系,探索造成这种差别变化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成因。

关于西南地区的五花八门建筑的分类,早在20世纪40年代刘敦桢等对西南诸省的

建筑进行调查时就有所提及“窃以为西南诸省……依其结构式样,大体可以分别为汉式与藏式二类。其分布状况,则藏式建筑,随藏族之繁衍与喇嘛教之传播,约占西康省之大部,与四川、云南省之西北部。除此以外,凡川、康、滇、黔、贵五省所辖范围,俱隶属于汉式建筑系统之内。”<sup>[1]</sup>在前一章中,我们根据多方面资料将西南文化进行划区,因为不同的气候特征、生产生活方式、文化上的发展等将其分为以巴蜀地区为主的农耕文化、以滇黔地区为主的农耕—渔猎文化和以川西滇西北高原为主的农耕—游牧文化。这种划分固然十分粗放,然而对于在纷繁复杂的关系中把握住西南文化的概貌,还是颇有帮助。建筑文化亦然:在这里,针对不同的文化主流,我们将巴蜀文化——合院建筑体系;滇黔文化——干栏建筑体系;川西滇西北高原文化——邛笮建筑文化体系——相对应,研究具有独特特点并相对独立的地理文化单元下的建筑文化特征。其中,相对其他地区而言,邛笮与干栏建筑是西南地区发展脉络较为完整的建筑类型,至今还有相当的留存。“一是源远流长,绵延长达数千年之久。二是发展序列清晰,既有干栏—楼居系统,又有邛笮—石碉系统。这两个系统都有各自从低级到高级形式发展的序列,发轫齐全,脉络清晰,这是巴蜀巢居文化优于前述其他地区的独有的特色。三是地域广大。它以古‘江源’流域为中心,从西蜀扩及三巴,进而影响于滇黔,传播于越南、缅甸和东南亚。”<sup>[2]</sup>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这种对应关系并非绝然,它只是体现一种主流的对应。在该文化的地理空间中可能有彼文化对应的建筑类型,尤其是汉文化影响下的合院建筑,这并不奇怪。只要有通道的存在,势能高的文化总会向势能低的文化流动,造成相应的影响。在第二章中论及的诸多文化交流廊道沿线的坝子地区,也往往是受中原文化影响为深,因而其建筑形态也多以合院建筑为主。另一方面,三大文化板块的交接地带往往融有多种文化因素,很难截然划分。

## 第一节 邛 笮

川西滇西北高原间的三条民族迁徙走廊分布着氏羌族系的诸多民族,其中以藏、彝、羌三个民族为主,并且他们还保留着强烈的民族建筑特色。由于这几个民族的源流、生活的空间区域、生活生产的方式有着很大程度的相近之处,所以他们的居住样式也多有相同。作为西南建筑文化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称之为邛笮体系。

所谓“邛笮”,《后汉书·西南夷传》云:“众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数十丈,为邛笮”。关于这种奇特的建筑形式,史料多有记载。早在唐时,李贤注:“邛笮,案今彼土夷人呼为雕也”。《旧唐书·西戎传》:“氏人皆依山居,上垒石为屋,高十余丈,谓之邛笮”。又有清人陆次云《峒溪纤志》载:“松潘,古再戕地,积雪凝寒,盛夏不解。人居累石为室,高者十余丈,名曰雕房”。《章古屯志略》云:“石碉,形制有二:或如方几,或似菱花,下宽上锐,自五六丈至数十丈不等,悉以乱石砌成,碉底六七丈,中棹以木,下卧畜牲,中置锅桩,上数层贮粮糗什物,远望耸如束笋,高出云霄”,“峰峦之上,高碉凌云,寨落可畦,不啻身游图中”等等。(图3-1-1)

事实上以上的文献记载大多为岷江上游氏羌民族的居住式样。岷江上游走廊以松潘



图 3-1-1 高坪碉堡

县与南坪县交界的弓杠岭岷江发源地为起点,贯穿松潘、茂县、汶川三县,长约 340 公里。自战国以来,该走廊大抵为南下的羌人占据。由于该地区比较集中分布了羌族的碉房建筑,尤其是坐落山顶达十余丈的高碉,所以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然而仔细考察横断山脉区其他两条通道,即西部的金沙江与雅砻江走廊和中部的嘉陵江走廊,就会发现“凡川西诸土司直至西藏,人民所居皆同此制”。<sup>[3]</sup>同时有学者认为“庄房与碉房形式相似,康藏青海金川等地,大致相同”。<sup>[4]</sup>——因而有必要对该地区的民族源流作一考证。

## 一、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

最重要的一个论据就是童恩正先生提出的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sup>[5]</sup>理论。这一文化传播带大致东起大兴安岭南段,北以长城为界,西抵河湟地区再折向南方,沿青藏高原东部直达云南西北部,东西方向由青藏高原东北、青海的祁连山脉、宁夏的贺兰山脉、内蒙的阴山山脉以及辽宁、吉林境内的大兴安岭组成,南北方向则由青藏高原西南部以及由四川西部通往滇西北的横断山脉组成(图 2-1-2)。该文化传播带处于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边缘地带,有着类似的生态环境:

- 主要地貌为山地或高原,平均海拔在 1000—3500 米。从东北到西南,半月形地带的高度呈阶梯状递增,呈现纬度高地形低,地形高纬度低的互为补偿的自然条件。
  - 该文化带位于 140 千卡/厘米<sup>2</sup> 等值线以西,太阳辐射年总量相当。
  - 该文化带走向与年平均气温 8 度的等值线走向大致吻合,说明该地带年平均温度相当。
  - 该文化带农作物及大多数木本植物的生长期约在 200 天左右。
  - 该文化带的年降水量约在 400—600 毫米之间。
  - 太阳辐射总量与降水量相近决定了该地区的干燥度指数约在 1.5—2.0 之间,属于半干旱气候类型。
  - 该文化带处于森林地区与荒漠地区之间,属于草原和高山灌木丛、草甸地区。
- 童恩正先生通过大量的考古资料,包括细石器、石棺葬、大石墓—石棚、石头建筑以及考古挖掘出来的其他器物,兼以历史、人文的诸多因素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这一从东北

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存在。其中提及的区别于南方民族干栏房屋的“石头建筑”即包括邛笼在内。

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论证证明了文明的发展与地理空间、人文历史的紧密关系,处于该文化带的许多器物有着相类似的形态,实在很难完全用“偶合”来解释。

邛笼建筑广泛分布于横断山脉地区,处于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西段。它的形成更多地与周边的自然生态环境相关。一个民族可以有众多的居住建筑形态,一种建筑样式可以多个民族共同拥有。然而为什么川西滇西北大部分的藏、彝、羌民族有着以邛笼为主的居住样式呢?他们之间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呢?

## 二、藏、羌、彝民族关系简考

语言学的研究表明藏、彝、羌民族上具有的同属关系,都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然而不是不同的语支:“依谱系法分出的最大的语言系属由具有共同来源的语言组成,在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的形式上有多规律的语言对立。”<sup>[8]</sup>相同的语系说明它们具有同源关系。可属一个语族,又说明了他们之间有很近的关系。而不同的语支证明了他们是不可同的民族。

民族学上研究同样表明藏、彝、羌民族具有同源关系,系由原来居住在甘青河湟地区的古羌人向西南迁徙,在不同的地区与当地的土著融合成不同的民族。任乃强先生在其著作《羌族源流探索》中指出,一部康青藏高原的历史,在7世纪以前是羌族的历史,在8世纪以后是喇嘛教的历史;喇嘛教传入以前的民族叫羌族,喇嘛教传入以后的民族则变成藏族了。同样可见二者的渊源。

川西及川西南地区分布着牦牛羌、白马羌、嘉良夷等古羌人。<sup>[9]</sup>《后汉书·西羌传》载:“自爱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谓首,灭狄源戎。忍季父兜梁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嶲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据考证,牦牛羌在后来的发展中一部分融合于彝族,一部分融合于汉族,一部分则发展为川西南的藏族,而分散在滇西北的部分演化为普米族。白马羌分布在四川甘肃交界的地方,是与氏人杂居的一支羌人,后演化为今四川平武县的白马藏人。嘉良夷主要分布于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及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一部分地域,是今嘉戎藏族的先民。

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上看,藏、彝、羌民族也有着很大的共性。他们处于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西段,横断山脉地区。相近的外部生态环境使他们都处于半牧半农的生产方式。“这些民族的农田一般不如典型的农耕民族那么稳定,农田耕作后的秆蒿往往留在耕地上,以备畜生越冬的饲料,农田又是畜生之御寒所,其放牧特征又与干旱草原的游牧民族迥别,不是按南北向的季节游动放牧,而是垂直上下游动放牧,冬季进入耕地越冬,夏季农田耕种,则放牧上山”。<sup>[10]</sup>这种生产方式对于建筑的形态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藏族的民居。我们在后面还会看到建筑的平面形态是如何适应于生产方式的变化。

可以说,藏、彝、羌民族都可称之为高原民族,但是他们在分布上还是略有差别。水平分布上,横断山脉的三条走廊中东部的岷江上游走廊以藏、羌民族为主;西部的金沙江与雅鲁江走廊和中部的渡河走廊以藏、彝为主。藏族大部分分布在河流的上游,彝族则多在下游。从民族分布的海拔高度上看,藏民族生活在海拔最高,气候最寒冷干燥、冬天多雪的地区,羌族居中,彝族较低。相较之下,由于彝族生活在海拔和纬度都较低的区域,降水量、太阳辐射量等也就有较大的不同,因而该民族虽然以土掌房为主要的居

住类型,然而还有其他类型如合院、干栏等存在,不如藏、羌民族纯粹。这是居住的自然环境变化使然。

### 三、邛笮的分布与分类

#### 1. 分布

邛笮建筑因系氏羌族系中藏、羌、彝等民族主要的住屋形式,所以其中除了前文提到的部分彝族向南迁移,因地域气候变化和与其他民族的交往而居住形态有更多的变化外,基本上可以说只要有藏、羌、彝等氏羌族系民族活动的地区就有邛笮建筑的分布。总的来看,邛笮主要分布于川西高原以及滇西北地区。包括了南至甘青、北达腾冲、大理、楚雄一带,东西包括了岷江上游的汶川、理县、茂县、松潘等地区连线以西的大部分地区。史料《皇清职贡图》就曾经记载了川西大部分地区的邛笮分布(见下表),从中可以看出邛笮理应是当时非常普遍的一种居住形态。

《皇清职贡图》记载川西碉式建筑分布表<sup>9</sup>

地 域	具体描述	资料出处
松潘镇中营	其居碉房	《皇清职贡图》
松潘镇龙安营	其地皆高山,积雪不消,垒石为重屋,覆以柴薪,上居人而下饲畜	《皇清职贡图》
松潘漳腊营	垒石为碉房	《皇清职贡图》
黎雅营木坪番(董卜韩胡)	居处多垒石为碉房	《皇清职贡图》
阜和营明正番(打箭炉)	居碉房	《皇清职贡图》
阜和营霍耳章谷(甘孜、炉霍)	多居山级碉房	《皇清职贡图》
里塘营(里塘)	居多碉房	《皇清职贡图》
阜和营革什咱番(丹巴西北)	依山建碉以居	《皇清职贡图》
阜和营绰斯甲布(金川)	居碉房	《皇清职贡图》
阜和营纳浪番(新龙县)	居碉房	《皇清职贡图》
阜和营上下瞻对番(新龙县)	居碉房	《皇清职贡图》

#### 2. 分类

不同的分类方式有不同的研究侧重点。邛笮的分类方式有多种:一种可以按照居住的主体——不同的民族划分,即藏族民居、羌族碉房以及彝族的土掌房,从而考察它们之间的异同处,了解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同一种居住类型的不同演化。一种可以按照邛笮的砌建材料分类,即片石材、鹅卵石材、版筑土材、板筑木材等,了解修建过程中人们对于材料的利用。还有则按建筑的等级来分类,一种为普通的平民居住生产用房,一种为土司、奴隶主使用的官寨,可以了解、比较普通和特殊之间的关系。另一种就是按照建筑的具体形态进行区分。这种分法最为简单明了,所以也最早为人们所认识。顾炎武说:“威、茂、古冉驻地,累石为巢以居,如浮图数重,门内以楹木上下,货藏以上,人居其中,畜圈于下,高二三丈者为鸡笮,十余丈者谓之碉”。也就是说,分为高低两部分,高者作为防卫、储藏用;低者则作为日常生活之用。(图 3-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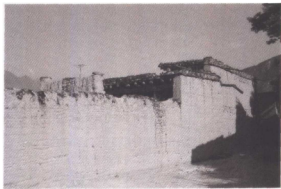


图 3-1-2 鸡笼与高棚

#### 四、邛笮民居的基本特征

##### 地质条件与建筑材料

邛笮的分布地带多处于亚欧板块、印度板块、太平洋板块之间,受到这些板块不同时期不同程度的挤压,形成了地质结构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地质构造复杂,地震频繁。特殊的地质条件形成了丰富的天然材料。以岷江上游为例,向北沿江而上,一过都江堰,就可以发现遍地的鹅卵石和片状的云母石。另外又如理塘、新龙、甘孜、道孚、巴塘等地,有深厚的有机质泥炭土和黄土,土质粘结坚硬,当地的人们用它来夯筑墙身,铺筑屋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图 3-1-3)

“平顶无肋密梁式建筑在西南地区分布与地理环境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其一,川西地区一般来说牧区多土室,而农区多石碉,这本身是与这种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所依赖的地理环境相联系的。其二,岷江上游、黑水河、杂谷脑河、大渡河以及上游的马尔康河、大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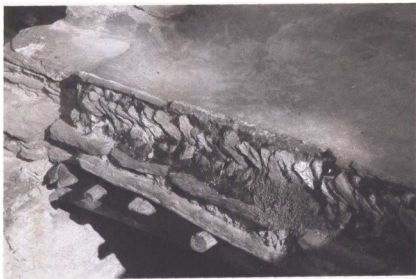


图 3-1-3 邛笮屋面

川、雅砻江上游的石梁河、希渠、金沙江上游地区本身岩石众多,故房多用石砌,形成石碉。而草原和冲积平原多的地区,如阿坝、甘孜、炉霍、道孚、乾宁、新龙、理塘等地则多用黄土作墙。其三,阿坝州的平顶无肋密梁式建筑不论是土室或碉房都多用墙本身作承重体,而甘孜州则主要是用梁柱作为主要承重体,这种差别可能是由甘孜州森林资料更丰富而湿度相对更大所致。其四,平顶无肋密梁式建筑从川西北一直延伸到滇南地区,由于滇南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特别是相对湿润的气候条件,使这类建筑在形制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如元江、墨江、红河、普洱等地哈尼族的土掌房,有的改作了坡顶,有的则用石料、卵石先砌墙脚,有的则在四周专门开排水沟。”<sup>[10]</sup>

总而言之,邛笼的分布地带带有多钟天然的建筑材料。自然的材料是最好的筑屋材料,人们用它们来筑屋,体现了“就地取材”的经济性原则,同时也使同一种建筑样式表现出在不同材料下的美。另外从北至南,邛笼建筑在材料的使用上也体现出了地域气候微变的影响。在北方寒冷地区,墙身多是石材砌筑和黄土版筑。越往南走,就渐有板砌木材出现在墙体上,以至于占了主导因素。

#### 气候与防卫的因素

一部分是气候的因素,一部分是防卫的因素使邛笼建筑的形态显得紧凑、厚实,内缩性强。邛笼的分布地带多处于高寒或干热地区,天气寒冷多变且风力大,绝对温差大。要在一个严峻的环境中营造出适宜人居的微气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将其与外部寒冷或干热的气候隔绝开来。在建筑上就体现为紧凑的体量,厚实的外墙,少量必须的窗洞。这种形态也适合于频繁的战事需求。横断山脉地区是民族迁徙的必经之路,为争夺生存空间,常爆发各种战争;同时它又处于农耕与游牧的交接处,历史上自唐以来有过多次的“唐蕃战争”。而从本地区看,复杂的山地空间地貌很难形式统一有力的政权,必将导致大大小小的部落、族系间的纷争。这种现实的客观存在体现于建筑上除了上述几点外,还有三个明显的例证。一是邛笼寨落的分布,一是高碉的出现,一是官寨的耸立形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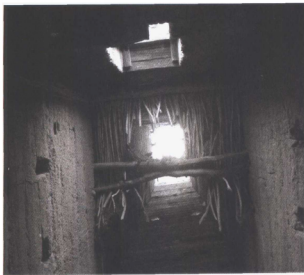
邛笼寨落在河谷、二半山以及山顶均有分布,但规模相对较大的寨子则多坐落于高且险,不易到达的山巅之处;或是易守难攻的三面环山位置。而高达十余丈的碉房形态则

完全是为了战争的需要。今天在汶川、茂县、理县一带,尚有相当多人居住在“鸡笼”之中,高碉基本废弃不用,面临着坍塌的危险。(图3-1-4)官寨由于争夺政权的要求、居住人口的扩大、居住要求的提高等因素而显厚重、庞大。

#### 居住的模式

研究平面功能的布局是研究居住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面包含两个主要内容:一是楼层功能的使用状况,一是主要生活层面的具体分布。邛笼民居的主人——藏、羌、彝民族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和严寒的气候客观上决定了它的楼层功能布局。一般说来,邛笼民居由三个不同标高的层面组成:地面层为过冬的牲畜提供御寒场所同时也是杂物堆放间;中间层面为人的主要活动场所,主室所在(也有喇嘛的经堂设

图3-1-4 破败的高碉内部





在该层);最上一层通常半为半开敞房屋(又叫罩楼),半为晒坝,间或经堂。(图3-1-5)

由于气候的原因,邛笼建筑一般平面结构紧凑,为方形或长方形;空间高度低,多在2.3~2.6米之间。中间层面是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活动场所,一般由主室、储藏室、卧室及楼梯间组成,“基本上各有定型”。早期的房屋较为简单,多无卧室,家人的活动均在主室中,共睡一屋,如夏日游牧之帐篷。(另外有在基本模式上衍化出带有夏日卧房的建筑平面布局以及底层无圈养牲畜而直接住人的模式,这可能是生产方式更加趋近于农耕使然。)顶层的罩房和平台事实上是室内空间的延续,在日常生活中的有着重要的作用。这十几个平方米的台面在不平的山地中创造了平整的空间,是农事的延续的场地,是活动的场所,是私家的领域,同时也是祭祀、敬神的地方。

#### 建造

对于邛笼建筑的建造,李心衡《金川琐记》卷二中就有记载:

窑俗造屋尽用土,盖先砌石作墙,架巨木为梁,以杂木横搭之,盖土于其上,筑之令极坚,虽倾盆大雨不能漏,唯淫雨数日,须加土再筑。其碉楼及一切垣墙俱乱石,远望作小裂纹,顿齐如刀削,虽汉人登之不能动寸步。

羌族人为了充分利用山坡上有限的平坦地面积,在设计时能密切结合山坡地形,分台筑室,以便节省土石方量。一般是平行于等高线自由布局,等高线走向平直时,则房屋顺坡配置,形成长条形列式;等高线走向弯曲多变时,房屋配置则随之而变,出现更多不规则形状。

事实上在修房之前,首先要考虑的是房屋的向阳背风。如羌族,“为了保暖防风,住房多采取向阳、背风、封闭及层高较低等方法。住屋的方向、门窗的开口,大都避开常年主导风向,向南方或朝东南,楼层的北面,东面和西面墙身及底层各墙都不开窗。由于住屋层数多而层高较低,墙壁较厚,窗洞矮小,以致下面各层室内采光、日照、通风均感不足。因此,他们便利用梯井、天井、天窗等方式以弥补侧窗之不足。”<sup>[11]</sup>

施工时,先在地面掘成略成正方形,深三四尺的沟;在沟内用石片砌成户基,宽约2尺,再用拌和好的黄泥浆,以手涂于石片上,层层堆砌,使泥石相胶合。石墙自下而上逐渐减薄,墙的内侧与地面垂直,外侧则稍向内倾斜。修建时不吊线,不绘图,亦不用柱架支撑,全凭目测和经验,信手砌成。砌墙每达丈余时,便架直径约十五厘米的木横梁,上铺以木板,层层如此。修至最上层时,所架木板支出墙外,构成房檐,一方面可以保护下面的墙壁,另一方面可以加宽顶层平台的面积。楼顶平台,在铺以木板和石板后,再铺以密结的树丫或竹枝,然后渗入细黄土,再铺以含有石灰质的鸡粪土,以锤打紧,厚约尺余。平台面部,两侧微向中部倾斜,以小槽(俗称洞槽)引水于外。这样的建筑住房 and 碉楼其平顶不仅不漏雨雪,墙壁光滑平整,不留裂缝,而且冬暖夏凉,坚固耐久,可经历数十年以至数百年甚至轻微地震,亦不致倾塌。<sup>[1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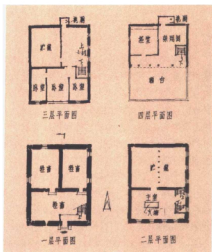


图 3-1-5 邛笼居住模式 (采自叶启梁《四川藏族住宅》)

## 五、文化差异与建筑特征差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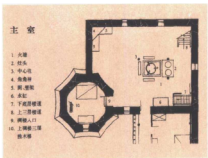
建筑的用色事实上与其主体民族的生存环境、文化发展有密切的关联。文化较为成熟的民族,往往会创造出的一套完整的用于表达尊卑、贵贱的礼仪方式,建筑即其中一种,如形制、等级的变化。色彩也是其中的一种。反之,文化不甚发达的民族,缺乏强有力的统治阶层,缺乏文化的凝聚力,也就难于形成相应的表达方式。这一现象可以在比较藏、羌、彝建筑中得到揭示。藏、羌、彝诸族虽为同一族系,但因不同的历史发展轨迹,略有差异的当地地理环境、各有侧重的生产生活方式等等差异,形成了今天各自的民族。他们的住屋虽同为邛笼建筑,但存在着各族自己的特色,只要稍加识辨,就可发现其间的差别。

比较而言,藏、彝两族的文化的发展相对要比羌族成熟得多。历史上的羌人始终处于“奔波流离”的状态,除了党项羌曾经建立西夏国外,羌人一直不停地被较之强大的民族向西北、向西南赶。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言,羌人是一支不断给别的民族输血的民族,不断地融入其他的民族,自身却渐渐衰弱。最后的羌人留在了岷江的上游地区。羌民族的文化之所以不能得到较大的发展,关键的一点与该民族选择的地理空间位置有关。

羌民族一直活动在游牧与农耕的交界地带。该地带长期以来是两种不同生产方式政权争夺的空间,如历史上汉朝与匈奴之战、唐蕃之战等。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很难想象羌人会有喘息的机会来发展文化,这种状态客观上导致了羌文化同时具有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特点,却难有自己突出的特色。这种特点也就体现在了羌族的住屋中:

一是居住邛笼。邛笼建筑是生产方式从游牧向游牧兼农耕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一种住屋形态:夏居帐篷,冬居邛笼。这种建筑形态在藏区有着相当广泛的分布。当然,随着农耕占主导方式,也有以邛笼为主要的住屋,分设有夏室和冬室,但依然以冬室为主。邛笼建筑中保留有游牧文化特点的“中柱”、“火塘”等,尤其是主室的空间布局和使用方式是典型游牧文化特征的存留。(图3-1-6)

图 3-1-6 主室与中柱  
(采自季富政《中国羌族建筑》)



一是邛笼上的装饰。羌族邛笼的装饰带有明显的农耕文化的影响。以大门为例:1.贴对联。在岷江上游汶川、茂县等地区的羌族碉楼,基本上家家户户要贴对联,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祝四季吉祥如意,贺百年荣华富贵”,横批“吉星高照”等)。这种形式甚至在牌楼上都体现出来了。汶川郭竹村的一个牌楼上有着“赤化全四川、活捉蒋介石”,横批“工农专政”的一副对联。将“对联”的形式应用到阶级斗争上来,可见该种形式在这个地区的广泛和流行;2.贴门神。与对联一样,门神也是必不可少的装饰之一。门神多为秦叔宝与尉迟恭二将。传说当年唐玄宗李世民常有梦魇,秦叔宝与尉迟恭两位武将主动请缨,为其把门,之后唐玄宗便得入眠。所以民间便将秦与尉迟二位绘成彩画,贴于门上辟邪;3.门的左边立泰山石敢当。泰山石是用于辟邪的镇邪物,源于我国的中原地区,这在山西民居中还有发现;4.辟邪镜与符咒;5.茶龛;6.门上的装饰构件有垂花、雀替等。再看室内的神龛。岷江上游茂汶地区的羌人家中室内的神龛上通常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众多信息表明邛笼建筑与中原农耕文化之间的紧密关系。<sup>[1]</sup>(图3-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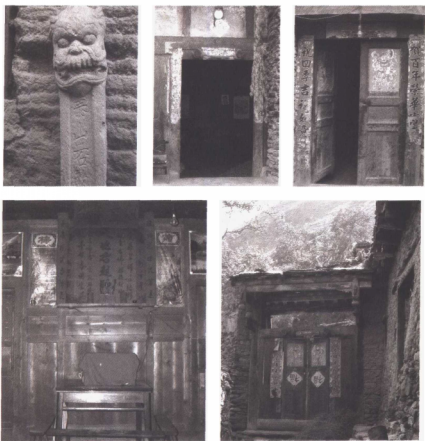


图 3-1-7 羌族门扉装饰带有明显的农耕文化烙印

与羌族的门扉相比,虽然建筑的形制大致相同,藏族与彝族的住屋无论是色彩还是装饰都要丰富得多,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这两个民族文化的发展。

藏族是我国民族中为数不多的在历史上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有明确的宗教信仰、天文历法以及语言文字的民族。早在公元 4 世纪,西藏高原逐渐形成三个较大的首邦(象雄、吐蕃、苏毗),并有了自己早期的文字和传统的宗教“本教”。大约在公元 640 年左右,松赞干布完成了统一青藏高原的大业,迁都拉萨,并不断向东部、西域、中亚、以及东南亚等几个方向进行强有力的扩张。公元 670 年,吐蕃与唐朝爆发了大规模的大非川战役,以吐蕃胜利告终。松赞干布建立了空前强大的吐蕃王朝。“原来寂寞无闻的中国广大西部,因强有力的吐蕃的出现,变得有声有色了”。<sup>[14]</sup>

在吐蕃时期,藏民族在各个方面都有所成就,体现了藏文化的发展和趋向成熟:如语言文字上的逐步完善,形成了统一的文字系统;文学上有以《格萨尔王》为代表的民间英雄史诗等以及藏医、天文历法等。最该着墨的是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藏传佛教。藏民族所处的地理空间处于中原与印度两大文化圈之间,是中印文化对流的交汇地带,自西而东的天竺佛教和自东而西的中原佛教在这里交融碰撞,形成了既有二者的遗传又不同与二者的藏传佛教。经过了长时间的弘法,藏传佛教在藏区遍及每个角落,渗透到文化生活的

各个领域,尤其是政教合一的政权组织方式更是使其影响空前强大。毫不夸张地说,藏民的世界就是宗教的世界:无论是老人还是小孩,或许他们斗字不识,缺少现代的各种知识,但他们绝对不缺少对宗教的了解和信仰,而宗教景观是藏区最宏伟和最特色的景观。(图 3-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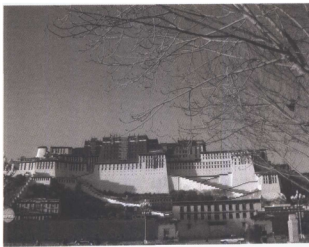
图 3-1-8 宗教景观  
是藏区最宏伟和最  
特色的景观



这种种方面的影响体现在了藏民族居住的住屋中了,典型地体现在其建筑的细部和装饰中了。建筑的细部和装饰往往是超越了“实用的功能”、“善”的需求,而趋向于“美”的追求,因而最能看出一个民族的审美情趣。其中,尤其是“装饰”是建筑各部分中最富有文化信息的部分,是民族文化特征的表现。打个类比,装饰在比较藏、羌、彝诸族住屋特点时,就犹如语言学上区分藏、羌、彝诸族虽属同一语系、同一语族而不同语支中的语支。陆元鼎先生在《中国传统民居的类型与特征》一文将传统民居特征归纳为三类:一是平面布局和环境特征;一是结构和外形特征;一是装饰装修和细部特征。“它反映了文化、习俗和审美意识在民居建筑中内部和外观艺术上的表现”。<sup>[15]</sup>

因此,藏族的住屋比起羌族的住屋还是有着相当的不同,而这种不同显示出与地理位置远近密切相关;越往西走,藏民居的特色就越鲜明;越靠东,藏羌民居就渐渐混为一体,甚至难以辨认了。这种现象体现了以藏文化为中心的文化“晕染渗透式”<sup>[16]</sup>发展。下面略举几例二者的差别之处:

图 3-1-9 藏族建筑  
色彩明确、肯定和  
强烈



一是色彩。比较而言,藏族住屋的色彩明确、肯定和浓烈,与湛蓝的天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藏族建筑常用三种颜色,即白、红、黑,且以白色为主。藏族建筑应用白色,“一方面来自对原始神灵家族之——“天上神”“白年神”的崇拜,一方面来自佛教的影响。……藏传佛教视白色为神圣、崇高”。可以说,白色围绕着藏民族。住屋中间有红色和黑色,但使用的部位和所占的比例都很小,只起到适当的点缀作用。红与黄主要应用在宗教建筑中,在大面积的白色中突出了主体的重要性,使之达到庄重、华丽的效果,如布达拉宫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图 3-1-9)相对地,羌族民居的色彩则要暗淡得多。羌之邛笼基

本是建筑材料的本色,用碎石片间与泥土砌筑或黄土版筑后并不多施其他涂料,留与建筑自然材料的本色。如果不加分辨,在群山峻岭盘旋中很难明显发现羌寨所在,它们基本上与大山融为一体了。(图3-1-10)藏族建筑的浓烈色彩、有等级区分的色彩等级与羌族建筑低调、简单的色彩处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藏、羌民族文化上的差别。



图3-1-10 羌之邛崃  
原色低调

二是建筑的装饰。羌族住屋的装饰甚少,以“白石”为显著特征。<sup>[17]</sup>白石多置于屋角或正面墙体顶部中间,在太阳的照射下闪闪发亮,点缀了沉闷低调的邛崃。(图3-1-11)另外,在门窗等洞口的位置处理也很简单。除了前文提到“门”的位置受中原文化的影响稍加处理外,窗洞口多以木格栅为窗扇居多。相比之下,藏族的住屋在装饰上也明显比羌族之住屋更加复杂和繁琐。如洞口的处理,“入口大门及窗的上部有二、三层逐层出挑的小椽,最上一层出挑小篷,用石片和土作面层。在小椽上装饰彩画。……有的大门两旁装有古老的贴墙斗拱。由华拱出挑支撑大斗,大斗出令散斗,散斗支撑挑檐,在斗拱和挑檐上装饰彩画。还有的大门边框、额枋雕绘有生动细致的几何纹样、卷草图案,彩绘装饰。”<sup>[18]</sup>(图3-1-12)



图3-1-11 羌族邛崃  
的“白石”

图 3-1-12 藏族建筑之装饰



三是关于“宗教建筑”。羌民族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也不如藏民族那样强烈;活动的地理空间处于游牧与农耕的交界地带,宗教信仰也多受二者的影响:接近藏区的羌民信仰藏传佛教,接近汉区的却又崇信道教和汉地佛教,同时又有羌族自身的自然崇拜,从而形成了“多神信仰”。但是又没有哪一种信仰在该地区处于统领的位置,反映在建筑上就是羌区既有道观又有庙堂,然而也没有规模

宏大的宗教建筑。藏区则不然。由于藏传佛教在藏区占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宗教生活是藏民生活主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所以藏区中的寺庙建筑不仅规模宏大、建造精美而且分布广泛。在藏民聚居不远的地方,通常就有寺庙、白塔,而沿途的路中就有数不清的“玛尼堆”和经幡。(图 3-1-13)

图 3-1-13 藏区之宗教景观



## 六、传播与变异:喜马拉雅山麓、甘肃、青海等地的“邛笼”建筑

从更广阔的地域范围来看,“邛笼”事实上是一种“泛文化”现象,这种“平顶密勒梁”的建筑广泛地分布在北达甘肃、青海,南至云南红河,西至喜马拉雅东南山麓等地区,远的地区甚至北达新疆、西至阿富汗。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中原地区合院建筑的房屋形态,占有相当大的数量。(图 3-1-14)作为一种介于东亚西部和西亚东部之间的广泛的文化现象,邛笼建筑长期以来并没有受到主流文化的重视,更缺少用联系、动态的观点、方法进行系统考察。对于邛笼建筑的形成、发展、地区间的差异等还需更进一步的研究和学习,还有相当大的学术空白。

近年来,随着中华文化研究的深入,从早先的文化本体研究开始注重向文化的传播、演化、相互影响等方面发展;从认识文化现象到探究文化形成的过程及其间的变化成因等等。这就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周边的、甚至更远地方的文化存在;二是文化传播的通道。这种“哑铃”型的文化结构是一种非常有趣的文化现象。从“此地”(强势文化)到“彼地”(另一强势文化)的文化传播或说文化的互动,更多的价值可能还是在“通道”之中。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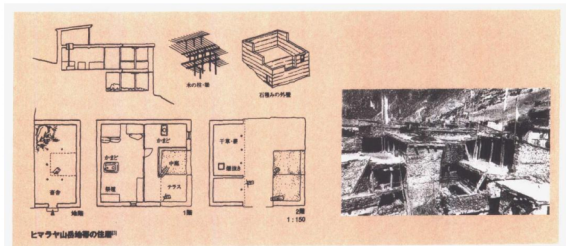


图 3-1-14 喜马拉雅山麓的民居建筑

是为什么近几年沟通汉唐长安与中亚、西亚直至罗马的“丝绸之路”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这条通道上存留着太多古老的信息，它不仅是一条商贸的道路，也是宗教传播、民族迁徙、民族交融的道路，同时也更是各国政权长期政治斗争、大动干戈的道路。强势文化衰弱、更替了，它的文化信息却遗留在遥远的地方。

“陇文化”是中国西北高原上一支独特的地域文化，它不仅是中华的发祥地之一，有着多元文化，多种民族色彩的历史背景，同时也是丝绸之路上一段重要的一段。这片土地不仅仅是承载东西文化的脊梁，由此发源，它与西南地区，尤其是西南中的川西北地区，也有着密切的关联。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有贯穿南北的“横断山脉”、“茶马古道”等。前文也提到了“横断山脉”是民族迁徙的走廊，其间有着丰富的民族文化信息存留，而邛笮建筑就是留存至今的，西南西北具有的活的文化现象，其身上也载留着大量的文化信息。以邛笮建筑特有的“托木”（梁与柱之间的一个构件）为例，它既不同与汉文化背景下的“斗拱”，也与两河流域文化背景下的“柱头”有异，但是从形式与功能上看它似乎又与二者都有关联。这种特殊的“托木”构件广泛地存在于中国的西南、西北、中亚的阿富汗乃至印度等地区，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建筑构件。宿白先生在研究西藏寺庙建筑时就非常重视“托木”的演化和演变。

因此用更广阔的视野审视、考察邛笮建筑，将其作为一种“文化物种”来研究，将其置于文化生态环境中来研究可能会获得更有效果的成果。

## 第二节 干栏

所谓的“干栏建筑”，是适应于炎热地区湿热多蛇虫的气候条件产生的一种底层架空，上层住人，以竹、木、草为主要建筑材料的建筑形式。关于这种建筑形态，史料多有记

载。如《魏书》和《北史》的“僚传”皆云：

“僚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皆有，种类甚多，散居山谷，路无氏之别”，“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栏。干栏大小，随其家口之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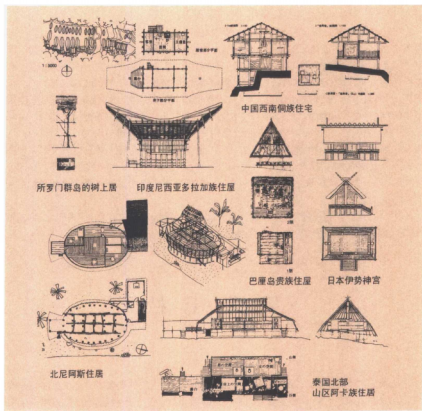
《旧唐书·南蛮西南蛮列传》曰：南平僚者，……土气多瘴疠，山有毒草及地虱蝮蛇，人并楼居，登梯而上，号曰干栏。

历史时期的云贵巴地区生活着大量的少数民族，至今依然是我国少数民族分布最为广泛和最为错综复杂的地区。但总的来看，该地区的民族以南方民族为主，包括百越、苗瑶和百濮三支族系。（参见第二章）这些民族因为相近的自然生态环境，相近的生产方式，在器物的形态上留存有许多相近的共性。其中，干栏建筑便是这些民族主要的住屋形态，是他们文化共性中的一种。因为干栏建筑在云贵地区分布广泛，特征明显，历时时间长，至今还留有相当的数量，因而将其作为西南地域建筑文化生态圈中主要的物种之一。

### 一、东亚、东南亚、中国南方地区“干栏”

和“邛笮”一样，“干栏”住屋也是一种泛文化现象。根据德国民族学家J·鲁玛、R·哈依纳·格洛特鲁等广泛调查和研究，“干栏”普遍存在于世界各个地区，但相对集中在东南亚与中国的华南地区（图3-2-1）<sup>①</sup>。从众多资料看，干栏建筑不仅存在于西南地区，同时

图 3-2-1 东亚、东南亚以及中国南方地区的干栏住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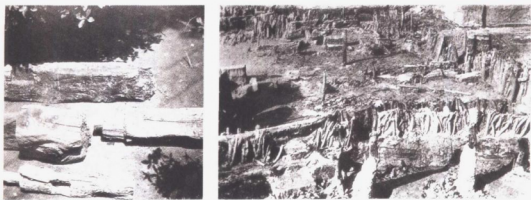
更及荆楚吴越,远至日本、东南亚,成为了东亚、东南亚、中国长江以南地区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据研究表明,中国南方、东南亚、东太平洋岛屿、南美洲的北海岸和西海岸、非洲马达加斯加都属于这种干栏式建筑的分布圈,而东南亚和中国南方是干栏式建筑的中心地区<sup>[2]</sup>。另一方面,在亚洲干栏的源流发展考证中,诸多日本学者通过比较研究中日文化关联或日本文化溯源时,从华南地区早期的青铜器干栏房屋、陶器房屋、大量的干栏现象存留(如谷仓、禾晾、度量衡、火塘等)以及它们与日本、东南亚地区构造方式和形态的相似性,提出了其间存在亲缘关系的观点。再有学者从生产方式、民族习性、民族谱系等方面来论证东亚、东南亚以及华南地区文化上的共性等,比如我国台湾学者凌纯声、美国学者克娄伯、日本学者中尾佐助、佐佐木高明等。

基于以上诸地区民族源流、民族生活习性、生态环境等的相似性,有学者提出“亚太干栏文化圈”的概念,即指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空间概念中,以干栏住屋为中心所具有相同或相似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空间分布范围。“这个文化圈是由于干栏民居及其伴生的稻作、纺织、语言、宗教等一定数量的文化因子所标定,随着人口的流动逐渐向四周传播,形成该文化因子的分布区”。<sup>[3]</sup>这种通过文化诸特征识别,在广域范围领域建立相似文化特性的文化圈,然后进行亚区间的比较研究,通常更有助于认识文化的源流、演化和特征。

## 二、水田稻作与干栏

长江中下游地区是亚洲主要的水田稻作农业区。该地区降雨丰富,水道纵横,是中华文明主要的发源地之一。(参见第二章)早在公元前七千多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上,就有大量的灿稻遗存出土,与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还有发达的农耕用具、猪狗家畜饲养、陶器制作、纺织工艺等。更令人惊讶的是大面积的干栏房屋建筑遗址和成熟的木构技术。其中的双层榑头、燕尾榑、企口板等榑接构件说明了当时的木作技艺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图 3-2-2)<sup>[4]</sup>

图 3-2-2 浙江余姚河姆渡干栏遗址



百越族系通常被认为是这一地区活动的民族主体。《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瓌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性。也就是说,自今浙江、福建、到广东、至广西以西都有古代越人的分布,但是“各有种性”,不相统属。因为类似的生存环境(丰富的水资源)、生产方式(稻作),百越族系发展出了一系列的相近的文化特征,比如纹身断发、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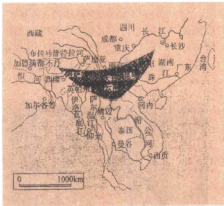
铜鼓、居住干栏等等。同时也因为所处的地理空间、接临民族等关系,有相当一部分已经融合为其他民族,但是今天与他们有着族源关系的壮、傣、布依等民族,因为相近的生态环境,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古代稻作文化的生活习性。中国西南的黔东南、桂北等地区,沿着乌江、都柳江流域两岸还集中有巨大数量的、以水田稻作为主的、自给自足的苗、侗诸族。他们依然聚寨而居、居住干栏、纺织织布,甚至还有一部分保留有古代文献中“髡首”的习惯。这是一片很值得深入研究的区域。

通过对地域的生产资料、生产方式、生产工具的文化生态学研究,比较分析它们之间的差异与关联是近年来对文化起源研究的一种主要方法。日本学者中尾佐助、佐佐木高明等在对日本文化起源的追寻过程中提出了“照叶树林文化”、“稻作文化”之说。所谓的“照叶树林文化”学说大意如下:

喜马拉雅山脉南麓海拔自1500米至2500米一带分布着和日本非常相似的以常绿树为主的森林。这种森林分布于喜马拉雅山南麓、阿萨姆、东南亚北部山地、云南高原、长江南侧(江南一带)的山地和日本的西南部,覆盖了整个东南亚的暖温带。构成这片森林的树种以栎树、杉树、楠树、山茶树为主,全是常绿乔木,树叶的表面会象山茶树叶那样闪光,所以被称为“照叶树林”。很多民族居住于照叶树林带,他们的文化生活中存在着许多共同的要素。<sup>[2]</sup>

根据他们的研究,照叶树林文化的中心在中国的云南高原;以云南高原为中心,西起阿萨姆,东至湖南省的半月形地带,并称之为“东亚半月弧”(East Asian Crescent)。(图3-2-3)在这个半月弧中存在着许多共同的文化要素,包括生活习俗、器物以及神话、礼仪等。

图 3-2-3 东亚半月弧



佐佐木高明将照叶树林文化分为三个发展阶段:1.前农耕阶段(采集、半栽培文化)2.以杂谷为主的刀耕火种阶段(刀耕火种农耕文化)3.以稻作为主的阶段(水田稻作农耕文化)。对于照叶树林文化的高级阶段——稻作文化,“据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学研究表明,中国是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地之一。而已发现人工栽培稻谷遗迹的二十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绝大部分集中在南方”,“从广义来看,‘稻作文化’是指包括由于稻作生产发生出来的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它不仅是有关谷物主体的产生、发展及其生产的一系列问

题,而且包括由于稻作生产而影响所及的民间的生活方式和生产中的种稻习俗与仪轨,以及稻作民族的特有的性格、爱好与文化心态等。因此,考察稻作文化,还可以从对稻作区及稻作民族的民俗、语言特点的考察入手。……美国的克斐伯、我国学者凌纯声等曾分别对百越民族的文化特质作出总结,其中居干栏、种稻、梯田、铜鼓、重祭祀等与稻作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sup>[26]</sup>

滇黔地区处于照叶树林文化带的中心,是“东亚半月弧”的主要覆盖区。从民族生活的相似性、生产生活方式的关联、物质形态的共性等等诸多方面,照叶树林文化和稻作文化的理论为西南滇黔地区的文化共性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同时也为处于滇黔文化影响下的建筑文化共性形成提供了有力的理论背景。

### 三、分类与分布

干栏建筑的分类同样有多种分法：一种根据其发展过程可以分为早期的巢居——树上居和后来的楼居两种形式，这种分法可以了解干栏建筑从原始低级向成熟形态过渡的发展变化；一种根据其所处的不同环境可以分为滨水干栏、平地干栏和山地干栏三类，从中发现干栏建筑对不同场所的适应性；另外根据构筑的不同方式，可以分为捆绑式、井干式、穿斗式、抬梁式以及混合式等，了解人们是如何利用不同的手段来获得相近的居住形态的；还有一种就是根据房屋的外观形态进行划分。干栏建筑的地域分布极为广泛，使用的民族纷繁复杂，每个民族又根据自身的需求对之进行改造，从而衍化出多种多样的形态。是故干栏建筑不如邛笼建筑那样源流清晰，容易把握。

“楼居干栏习俗发展到近代，在西南少数民族中就衍生出吊脚楼、竹楼（千脚落地竹蔑房）、木楼（木楞房）等多种类型。吊脚楼分布于‘整个川东、湘鄂西、黔北、川西北，乃至藏区腹地’，以川东土家族的吊脚楼和四川会东、南宁的布依族的‘半边楼’最为典型。竹楼类型较多，分布地区很广。有金沙江沿岸和西双版纳傣族的竹楼，有贵州‘楼居黑苗’的野外竹楼——马郎房，有基诺族的长形大竹楼和崩龙族的诸葛亮冠式竹楼，有滇西傈僳族的‘千脚落地竹蔑房’。至于木楼类型，则有川西南盐源、木里纳西族的木阁楼”和壮族的“干栏”，有安宁河、雅砻江和金沙江的傈僳族、小金河的纳日、拉热人，四川冕宁的纳木依人、云南摩梭、普米人的‘木楞房’、‘木罗子房’。”<sup>[25]</sup>

目前西南地区的不少民族依然以干栏建筑为主要的居住样式，如傣族、壮族、仡族、土家族以及一部分居住在山地地区的汉族等。这些民族的居住样式各有特色，是研究干栏建筑的“活化石”。从现存典型的干栏建筑来看，有贵州与川东地区吊脚楼以及滇南地区的竹楼式干栏建筑。（图3-2-4）“气候湿润而多山多林是形成这种吊脚楼民居建筑的重要原因。其中以苗族、仡族、布依族、土家族和川东的汉族的吊脚楼最具特色。这些地区多是农耕区，即便改为地面式建筑民居，也一般都配有高脚仓，用于养牲畜和存放稻草，仍有干栏式建筑的遗风。”<sup>[26]</sup>而滇南地区的竹楼式干栏则与该地区丰富的日照和降雨量、潮湿多树林以及多猛兽虫蛇有密切关系。滇南的竹楼式干栏与巴地至湘西广大山地干栏虽然同属于干栏，民族主体虽然以百越族系为主，但是却有着很大的不同。滇南的竹楼式干栏大多为平地干栏，屋顶大且陡，基本上没有或者看不到垂直方向的围护墙体。应该说，从“建筑基因”的相似性上看，东南亚地区的热带居住建筑与滇南地区的热带干栏有更近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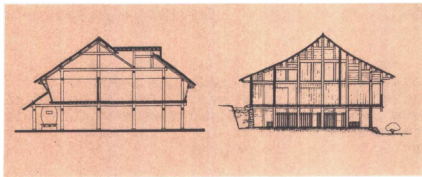


图3-2-4 西南地区两种典型的干栏建筑

## 四、基本模式与特征

### 1. 巢居

早期的干栏大多为巢居。历史上有不少关于“巢居”的记载。《韩非子·五蠹》云：“上古之时，……构木为巢，以避群害。……号之曰‘有巢氏’。《太平寰宇记》载，岭南道贺州风俗是“多构木为巢，以避瘴气”。《云南志略》谓，“黔泥蛮，……巢居山林极险”。《贵州通志·土民志一》谓，花苗“架木如鸟巢窠处”等等。可见，人们的“巢居”主要是为了躲避“禽兽”的侵袭和“瘴气”的危害。随着生产技能的提高，这种原始的“巢居”逐渐被有一定设施的“树屋”所代替。在川东地区，考古发现有一亭，上面铸有“象依树构屋以居之形”的巴族象形图案文字，如图系在两棵大树之树杈上悬空建造“人”字形屋脊状的住宅，壁上还有圆形窗孔与外面相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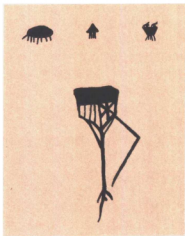


图 3-2-5 沧源崖画中的房屋建筑

这就是一种树屋形象，它表明在古代巴族地区曾有过这种建筑。另外，在云南佤族地区的沧源崖画中有房屋建筑图。（图 3-2-5）其形状近似为长方形，屋顶微拱，底部除树干外，另有六根左右的树枝或柱子作为支撑，此外，还有一根长木自地面斜搭于树屋，作为上下之用的简易木梯。

### 2. 楼居

楼居是树上居进一步的发展形式。“干栏式建筑多选择在河道旁滨水低洼地带，多为冲积平原沼泽地，建筑材料多以未加工的圆木或加工过的方木作柱柱，墙体多作竹竿、树枝编织，里外抹泥，屋顶多用树枝或竹竿，编夹树皮，建筑方法有蔑片绑扎，也有穿榫结构。居住面一般高出地面，多为栽柱架板，也有立柱式地面建筑”，“从秦汉到唐宋时期，楼居干栏在岷江流域和整个巴蜀地区有广泛的分布，而且集中于僚人区域。如南平僚散布于江州、昌州（今重庆市地域）、嘉州（今乐山地区）等地，‘以竹木为楼居’，‘悉住丛箐，悉虚构屋，号阁栏’。‘箐’是蜀人方言，‘蜀人谓篁竹之间为箐’，‘把阁栏建在篁竹林箐之间，是蜀人的特色。‘平地才应一顷余，阁栏都大似巢居’，以‘山坡架木为居’，叫做‘阁栏头’或‘竹棚头’，这是巴人的特色。在戎州（今宜宾）和泸州（今泸州）之间还分布着因‘葛栏’即干栏而得名的‘葛僚’，‘其民人散居村等’。它是贵州仡佬族和云南昭通地带壮族的前身，其‘葛栏’习俗流传至今。”<sup>〔2〕</sup>

### 3. 寨居

寨居是干栏建筑形成起来的聚落。直到今天，在岷江上游地区松潘、汶川一带还可看到这种用木栅围起来的村落或寨子，其建筑皆为竹木干栏。这种寨子，一般以寨中央的寨心柱为核心，周围环绕竹楼或木楼。寨居的进一步扩大，是棚居聚邑。古代的成都城就是棚居城，它是通过干栏发展起来的。因为干栏的特征是楼居，所以，成都在古代一直保留着带有楼居特征的“层城”、“重城”的称呼。江州（今重庆）巴人的“重屋累居”就是吊脚楼棚居城。因其滨江，还出现了“结防水居者五百余家”。

## 五、黔东南、桂北苗侗干栏聚居区

黔东南与桂北是我国干栏建筑分布相对集中的区域,从南至北大致包括了广西的融安、融水、龙胜、三江、贵州的从江、榕江、黎平、肇兴、雷山等地区,民族主体以侗、苗为主,还有部分壮、水等族。该地区的干栏建筑形式简洁、构架清晰、穿棹紧凑,是西南地区典型的干栏住屋之一。同时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该地区的苗侗民族虽然逐步接受现代的生活方式,但大量的还是从事水田稻作,居住干栏。在一个活的文化生态环境中研究其中的某一物种,比起研究“文化标本”更具有条件,同时也更有可能理解该“文化物种”的演化。

### 1. 山水生境

这里土熟地好,  
满山密林是百鸟栖身的地方  
青山绵延不断,  
绿水环抱山旁。  
溪边那块小坝,  
田中禾秆粗得像大腿一样;  
林中的青菜有甌子粗,  
张张菜叶似蒲扇大。  
六堂恋这地方的土肥,  
安富恋这地方的密林深山,  
六堂邀六宝在这里住下,  
安富邀女婿在这里建造家园  
住它三百年也不晓得,  
住它五百载也不嫌长。”

——《仡族祖先哪里来》<sup>[2]</sup>

连绵起伏的群山、层层叠叠的梯田,或是奔流不息的大河、或是清静蜿蜒的小溪,这就是苗侗人们居住的大地景观。稻作离不开水,于是水就成了他们选址的第一要素。常常,从一座山到另外一座山,在开阔一点的地方,在河湾的地方,就会发现或密或疏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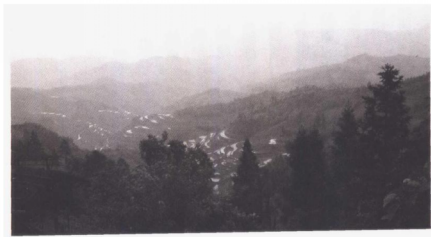


图 3-2-6 苗侗民族  
的典型生境空间

家。房屋的前面是一大片的水田,田里浅浅的水映出了天光云影。

这里的山不是川西北的山。川西北的山很冷,很高,也很险;川西北的山也有水,但是和大山的体量一比,它的水蜿蜒细长,很不般配,很怕再走一点它就会断掉了;川西北的山通常很少有植被,有也是稀稀疏疏的,很难覆盖住山的全部,于是它们露出了褐黄的颜色。这里的山很不同,这里的山很舒展从容。虽然它也很高大,但是因为有了郁郁葱葱的山林,有了日月奔腾不息的大江河流,有了袅袅的炊烟,这里的山多了一份灵性。

有了山,就会有树,有了树,就可以盖房子。而有了水,就可以种地,就有了粮食。虽然山多坡地少坪坝,但是只要多付出一点劳动,就可以把大山变成田地,变成生长粮食的地方。于是,当汽车盘旋在苗侗地区的大山里时,就会看到这些山已经变了模样,缠上了层层层的腰带,很有韵律地伸向远方。这是一幅很美的风景,可是又看到人们在这些坡地的田里耕作时,想到每一块小田地都必需担水担肥来灌溉,就会从美的感受回到现实中来。贵州凯里的雷山县有一个西江千户苗寨,人们世代居住在一起,人多了,耕田不够了。于是有的人家的田地就很远,据他们自己说,一天只够担一担粪来回。问他们为什么不搬迁,他们说在一起热闹,更多的人说,“我们这里的水好!”。

“这里确实是水的高处了,高山深谷,古树箐竹,众水在这里发源、汇聚,然后向东南、东北方向流去,历史上著名的五溪就发源和流布于这片地域。很早的时代,苗、侗、瑶、土家等民族就聚居在这里,被统称为‘五溪蛮’,是有名的蛮夷之地。”

侗苗民族“居住的这一片狭长山地,位于东经  $106^{\circ}-110^{\circ}$ ,北纬  $25^{\circ}-31^{\circ}$ 之间,属于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湿度较大,热量较丰,雨热同季,日照偏少,

夏无酷暑,冬少严寒,适宜多种植物生长。从地质地貌分析,侗族居住地区西北高,东南低,由西北向东南倾斜,以低中山和丘陵、盆地、谷地为主,土壤系由变质岩系,主要是砂岩,砂页岩发育而成,以红壤、黄壤为主,土层深厚,结构疏松,保水保肥性好,有机质含量较高,是各种植物生长的天然基地,孕育着世界同纬度地区罕见的常绿阔叶林,常绿落叶混交林和针阔叶混交林。”<sup>[2]</sup>

## 2. 聚落空间与微环境圈像

苗、侗民族聚族而居,以血缘、地域为纽带聚居一起。小的几户或几十户形成一个村子、寨子,大的有近千户,如西江的千户苗寨,肇兴的千户侗寨等。苗、侗民族社会组织形式松散:苗族有方老、寨老、榔头、理老等解决民事纠纷的民间领袖。“议榔”是他们的群众议事会。侗族则有“合款”,是一种村与村、寨与寨联盟的组织方式,首脑称为“款首”。他们都是“众人推选,有事理事,无事在家劳动,没有(或者很少一笔著注)物质津贴和薪俸”。<sup>[3]</sup>

这种组织形式的形成与聚落空间形态有很大关系。有限的资源限制了人口的扩张,山地的地形限制了聚落空间的扩展。沿着河流的两岸大小小若干个聚落,因为较小的村寨规模,熟悉的邻里关系无需更强有力的社会组织形式,推选出来的“寨老”、“款首”就可以解决民间的纠纷。

同样因为山地地形与水的关系,限制了聚落的选址。

图 3-2-7 侗族村落选址的三种模式(1.山麓河谷型;2.坪坝河谷型;3.山间高地型。)



通常来看,侗族村落的布局有三种模式。(图 3-2-7)

一是山麓河谷型。这是最典型的一种模式,也是侗族人们选择栖息地的最理想模式。(图 3-2-8)“从侗族风水观念来看,他们把绵延起伏的山脉比喻为龙脉,龙总要朝向水,朝向开阔之地,侗族村寨就建立在这样的龙脉之上。他们把山势(即龙脉)绵延而来至坝区或溪流边戛然而止之地称为‘龙头’。龙头前面是环绕的溪流和开阔的坝子,龙头后面是起伏跌宕、来势凶猛的山脉(龙脉),侗族村寨就立在这样的龙头处,侗家人称为‘坐龙嘴’。后山山势来势凶猛,侗家人便在后山多蓄古树青竹,作为风水林,以镇凶邪,以保清吉,以祈福祉;溪涧源源流去,隘口穿风而过,会把财源带走,会让福气漏掉,侗家人便多在溪涧上架设风雨桥(也称福桥),封住财源,在隘口多建凉亭,堵住风口。山、水、树、桥、亭、路,是侗族村寨的重要配置,是侗族村寨的重要的文化符号,它们共同构成了侗族村寨的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sup>[30]</sup>

一是坪坝河谷型。这当然也是理想模式,但是西南地区山高坡陡,坪坝并不多见,有的多是在河谷冲击地带或山间的小盆地。有坪坝的地方,就是有可能形成较大规模的村寨。因为空间的扩展,邻里的复杂,其组织形式相对完善,节日庆典活动,生产活动经验的交流、生产工具的流通也较其他地区频繁,因此常常就会成为周边地区的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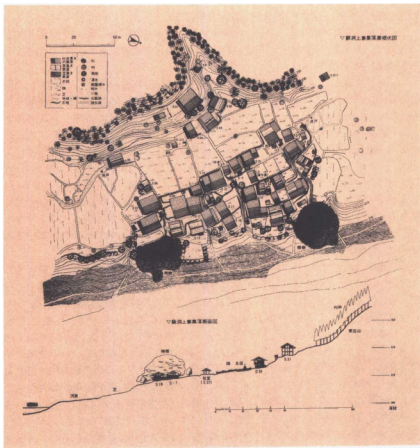


图 3-2-8 山麓河岸处是理想而典型的聚落选址(侗族苏洞村,贵州)

还有一种是山间高地型。这种类型的村寨通常规模较小,因为大寨人口过于密集而分裂出来,因此也常常是大寨的附属。

### 3. 构架与营造

苗侗人们的生活中,除了和水田稻作有关的生产劳动之外,还有许多与家庭、邻里有关的社会活动,而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建造房屋的技术和礼仪。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苗侗民族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成熟的技术和礼仪体系。

在他们的概念中,房屋的大小不是用多少面积,多少平方米来衡量,向他们描述有多少的面积多半徒劳。在他们的概念中,房屋是用多少“扇”(或者“排”),“几柱几瓜”来表达的。所谓的“扇”,即沿着纵深方向完整的一幅木构架,是组成一个开间的基本支撑单元(Basic Framework)。有几扇,就决定了有多少开间。所谓的“几柱几瓜”,描述指的是“扇”的组成。柱数、瓜数越多,“扇”的跨度就越大。(图3-2-9)空间的高度通常是固定的,大约在八尺(-2.5米)左右。因此“扇”、“柱”、“瓜”就决定了房屋的大小、所需的用料等。民谚“三柱两瓜屋,七十二根木”,就是说一栋最小规模的楼房,最少需要七十二根木材。

因为经济条件的限制,人口的分化等原因,“四扇三间”,两边在配上3到6尺宽的偏厦的“型制”是大多数房屋的规模。(图3-2-10)但并不是没有大型的房屋,在这些地区,房屋的大小通常还是“随其家口之数”的。人口众多的,有六扇五进和八扇七进,甚至更有九扇八进,十四扇十三进的。因此偶数开间并不稀奇。

造屋首先需要掌墨师傅。请来的掌墨师傅在听取主人家的想法后,对于建造怎样的一栋房屋大致有数。有的掌墨师傅通过制作小模型向主人家解释设计,而有的则通过绘制草图的方式。(图3-2-11)

经过了准备木料、选定中柱、截取各主要构件、选定朝向、选定良辰吉日等过程,造屋的工程就正式开始了。“侗族的干栏式民居不用一钉一铆,主要是通过柱、瓜、枋榫来连接。枋是连接柱瓜的,柱越多,瓜越多,穿枋越大,那么,连接就越牢实、紧密。不管哪种类型的房屋,屋架一般都用五根主柱或七根主柱和相应的长短不一的瓜柱通过穿枋(也称排枋)串成排(扇),将排相对竖立,再用过间枋连接成骨架,使之稳定;在扇与扇之间的柱、瓜顶上架上横子,横子上钉上橡皮,橡皮上以青瓦覆盖或用木皮覆盖。为便于承接雨水,减轻风力,屋顶一般呈人字形,前后两边倒水,屋面的水步按‘檐四中五顶六’的斜面设计,形成上陡下平的檐面,瓦片也不易为风吹移。屋檐微翘,形势如一支正振翅欲飞的大鸟。瓜立于二楼以上的排扇枋上,柱则卡于连接好,呈十字形或直角的地脚枋上,柱下垫方形基石,以分散压力。一般情况下,房屋两侧的屋架要略高,民间称为‘升山’;中间稍低内收,民间称为‘收山’;重心因此趋中,就增加稳定性,使房屋不易倾斜。”<sup>[32]</sup>

在地面上通过穿枋将屋柱和瓜柱穿接起来,形成了完整的几“扇”之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竖屋”。大家各负其责,统一听从掌墨师傅指挥。先立中堂左边一扇再立中堂右边一扇。两扇屋柱立起来后,就用过间枋把它们连接起来。“这是竖屋中难度最大的一道工序。这时两扇屋柱都还没有固定下来,都还处于倾斜、摇晃状态,但要派人爬上屋柱去,把过间枋装接到榫头上。每根屋柱上都要爬上去三个人,中柱要上去四个人,他们分别站在每一层的穿枋上。先把过间枋拉上来,然后他们一手抱着几十斤重的过间枋,一手抱着柱子稳定自己,等待掌墨师的命令。大家都准备好了之后,掌墨师一声号令:‘开扇!’下面的人就拉索子,搬木梯,拿动扬叉,把立好的两扇屋柱向两边拉开以便对接穿枋。站在屋柱上的人,为了托住过间枋,身子不得不向里倾斜。他们一手抱着屋柱,一手托住过间枋,站成一种凌空欲飞的姿势。当每个人负责的过间枋的榫头都对准了柱眼时,掌墨师一声高喊:‘合扇!’……两列拉开的屋柱又慢慢合拢来,由过间枋连在了一起。合了扇,还要用木槌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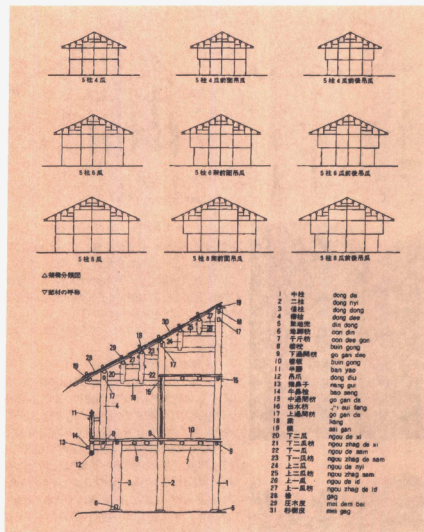


图 3-2-9 梁架种类与各部名称 (援引自《住宅建筑》, 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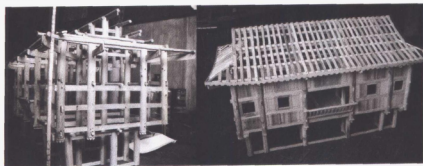


图 3-2-10 “四扇三间加偏厦”的基本形制(模型)

图 3-2-11 西江苗寨  
师傅绘制的草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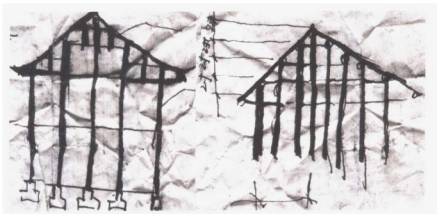


图 3-2-12 排角上“饱  
樑”



图 3-2-13 林溪整阳  
风雨桥

打木柱,让榫头和柱眼卡紧,这叫“饱樑”。之后,把挂柱加上,连起来,就稳如泰山了。……随后,又继续把遣下的几扇屋柱立起来。……至此,建房的主要工程也就完成了。剩下的就是木匠给房屋装壁板,再分隔为具体的小间了。把房屋的构架立起来了,基本上就意味着一幢房屋已经立好了,也可以吃竖屋酒了,亲朋好友都会来朝贺。”<sup>[33]</sup>(图 3-2-12)

#### 4. 鼓楼、风雨桥及其他

鼓楼、风雨桥、凉亭等是侗族地区特有的建筑形式,也是侗族人们的公共建筑。鼓楼、风雨桥一方面体现了侗族聚落社会组织的完善,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高超的建筑技艺。“风雨桥”通常被人们认为是用来躲避风雨,因此而得名(图 3-2-13)。事实上,风雨桥还有一个被遗忘的名字“福桥”。福桥侗语为“wuc juoc”,是本名,也是通名。理解“风雨桥”还必须从侗族聚落的选址、构成要素,从风雨桥在整个聚落中的作用来看才有可能获得较为客观的认识,否则很难理解全寨人为了一个交通性的建筑而兴师动众,大费钱财。

前文也提到侗民族选址非常重视风水,尤其注重选龙脉。其理想模式与汉族的“左青龙,右白虎”“前朝后案”的模式颇为相近。村寨前面必须有河流,但河流不能太过于畅通,太畅则风水不佳,钱财易受冲克。可以说,福桥就是在这种地势风水不尽如人意的时候产生的,“堵风水,拦村寨”“消除地势之弊,补神风水之益”是福桥在整个侗族聚落文化生态中的文化功用。当然,福桥也具有交通、躲避风雨以及作为村寨人口形象之功效。因为在人口,因此也成为侗族村寨的标志之一。



然而即使在同一文化生态环境中,也还存在“历时性”的变化。通过日本学者对于“苏洞上寨”的调研可以看到,寨中共 37 栋房屋中除了有两栋是“祖母房”与“斗牛房”,其他的 18 栋是高脚干栏房屋,12 栋是地面式房屋,4 栋是吊脚楼房屋,1 栋是阁楼式房屋。高脚干栏的居住者是村里的长久住户,是本地的“世系”;地面式房屋的居住者有三种情况:从其他村搬来的人、老人、分家后的年轻一代;阁楼式房屋的主人是政府干部,居住的布局更加汉化。“高脚干栏”和“阁楼式”房屋是受人们羡慕的住居,“地面”与“吊脚”房屋则是等级较低的住居。<sup>[8]</sup>这些数据 displays 在同一环境中“建筑物种”的变化。然而这些“住屋”类型虽然繁简不一,但是其中使用的技术方式却是大致相近。在笔者的调研中,由南至北,也可感受到高脚干栏逐渐向地面靠近趋势,由“高脚”而“矮脚”,由“矮脚”而“地面”。

其实某一文化物种无法单独存在,它必须与其他文化物种发生关系,同时它存在于两种环境之中:一种是自然的环境,一种是人文的环境。其中任何一种环境的变化都将引起“物种基因”的变化。以“干栏住屋”为例,房屋的原始材料杉木、桐油等取自于周边的树林。但是“取”法有许多种,其效率更多取决于使用的工具。只有工具(尤其是铁具)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有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砍伐”“凿榫”。西南地区至今还有相当地区的干栏住屋使用“捆绑”技术,这和铁器在其地区未广泛使用应有很大关系。桂北与黔东南地区的苗侗民族之所以保留了大量形态的干栏建筑,这和该地区相对稳定的自然、文化生态有因果关系;婚姻与家庭结构没有太大变化、建屋所需的材料来源相对稳定、生产劳作方式依然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还有大量的传统工匠传统工艺以及他们经验的传承存在,建房的风俗节日的庆典等虽然不如往日的浓烈但还是常有发生。

当然,新的历时时期有新的社会生态,这在村寨的结构上更多体现在权利结构的变化、教育方式的变化等。有些村寨中出现了政府办公楼、小学教育设施、卫生所等现代类型的建筑,房屋的样式多是二至三层现代平屋顶砖混结构样子。这些新类型房屋的出现是新的社会生态的客观产物。对于“住屋”这类最基本的房屋类型则影响较小,最大的变化在于“火塘”功能的弱化和移置。<sup>[9]</sup>另外就是使用现代建筑材料的影响。在靠近县城的村寨,砖、混凝土、玻璃等材料也出现在了新的房屋式样中。

### 第三节 合院

合院建筑是我国最为普遍的一种建筑类型,发源于中原地区,随中原文化向四周地区渗透、扩展而遍及大江南北。北方以“北京四合院”为典型:房屋布局多坐北朝南,主要的建筑位于中轴线上;多进院落,主要的合院面宽且有相当深度;在一定的礼制秩序的规矩下,房屋布局带有浓厚的礼仪、等级色彩;合院的私密性随着进深深入而加强。北方四合院的形成有其深刻的自然气候与历史文化背景。从西周时期的陕西岐山凤雏村遗址就可以看出北方四合院建筑的“历史悠久”(图 3-3-1)。

关于“合院”的成因有诸多说法从不同侧面解释,分析合院的形成,本文则认为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形成“院”就必须用墙体或房屋来围合,势必产生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元素。这种多元素共同出现在“一个”建筑中,是上文涉及的“邛笕建筑”体系、“干栏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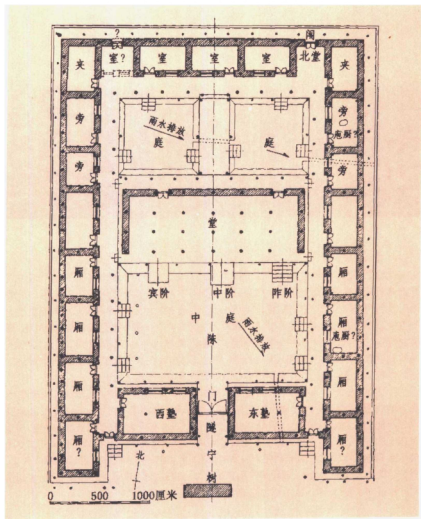


图 3-3-1 陕西岐山  
凤雏村遗址中的合  
院建筑

筑”体系中所没有的；这应该就是“合院建筑”的一个最大优势：由于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房屋功能的布局有了更合理安排的可能，弹性更大；另一方面，也由于合院的多重组合性，可以满足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的功能需求，使得合院建筑长久不衰。尽管跟随着文化的南迁，合院的大小高深因地域气候的变化而有所变化，但是它还是很快而且牢固地占了上风，使得原有的本土建筑，尤其是平地干栏建筑纷纷被其所替代。

在西南的平坝河谷地区，这种现象十分普遍。前面的章节中已经简要提及，如蜀地至迟到汉代已经由原来的干栏建筑为主流转变为以合院建筑为主流。而在云南的大理、丽江等地区，随明清时期的大量移民，形成了多文化融合为背景的“三坊一壁照”的合院建筑。“可以说现代白族建筑是南北朝以来中国南北汉族建筑与云南本土建筑的结晶”。<sup>[25]</sup> (图 3-3-2)



图 3-3-2 西南平坝地区的合院建筑

## 一、农耕文化与合院建筑

农耕文化要求人们在一个地方“固定”下来,从事农业活动。农事离不开“水”,灌溉成为农业活动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于是一部分人从普通的农事活动中脱离出来,专门从事农田水利的管理。社会的分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各种社会阶层的出现,从而更进一步促进了文明的发展。这也许就是以农耕为主的中原文化最终比之北方的游牧文化、南方的渔猎文化更为成熟的一个基本原因。早在汉武帝时期,统治者就时常有“北有强胡,南有劲越”之忧,虽然历经漫长历史时期,有过北方游牧民族统治中国的局面,但最终中原的农耕文化还是因其文化上的优势在中华大地上起到了主流的影响。

合院建筑的产生与发展与农耕文化紧密相关。对于合院建筑的源起地点似乎难有定论,但较完整的合院早在西周时期就有发现,这说明了黄河中下游地区至少是合院建筑的起源地之一。而随着该地区农耕(旱地农业)文化的兴起和发展,至迟到秦汉时期,从众多出土的“画像砖”以及相关的文字资料都可洞悉合院建筑已经发展为一套从礼制文化要求到营造技术等方方面面都较为成熟的体系,并从此“一气呵成”,延续了 2000 多年,成为中国大地上最主要的、最辉煌一种建筑类型。也难怪许多人在谈及“中国”传统建筑时,观念中也就仅有以汉族为主创造的合院建筑了。

## 二、分布与分类

合院建筑在西南地区的分布是伴随着中原文化和汉民族的进入而扩展的。从公元前 216 年秦统一巴蜀之后,伴随着各类官道的开通、民间贸易通道的开通<sup>[37]</sup>,伴随着战争、移民、贸易、屯边等活动,带有各种中原文化特征的形态,包括无形的生活、娱乐方式、宗教教义等,以及有形文学诗歌绘画、摩崖造像以及合院建筑在西南广大地区蔓延开来,尤其是重要的城市 and 交通、战争要塞,往往成为首当其冲的文化冲击场所。

对传统院落的框架体系的分类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进行。譬如,根据庭院布局的差异进行归类,“庭院的布局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种在纵轴上先安置主要建筑,再在院子的左右两侧,依着横轴线以两座体形较小的次要建筑相对峙……形成封闭性较强的整体。……另一种庭院布局是厢院。”<sup>[38]</sup>又如,可以根据地理条件划分为平原院落和山地院落;又可以根据

据其结构形式划分为土木结构、穿斗木结构、抬梁木结构、砖木结构等；或根据其围合形式分为四合院、三合院、二合院等。又有根据地区建筑特色差别将其分为以中国北方为主 的房房相离式院落建筑和以中国南方为主的房房相连式院落建筑。而在南方的院落中又 存在两种差异较大的院落空间形态，即以中国西南地区为代表的一颗印式院落和以东南 地区为代表的天井式院落，与房房相离式院落共同构成两大类。<sup>[30]</sup>北方合院内部庭院较 为宽广；其优点在于纳阳、防风、避沙、保温、抗震，这种空间形式多建在气候寒冷的平原 地区。一颗印式院落则院落各房之间相互连成一体，房屋之间联系紧凑，并以单个内院组 织院落空间；这种院落的优点为、避风、防盗、抗震，多建在西南高原地带。而天井式院落 的基本特征是以数目不等的小天井组织院落的空间；因其大多建于低纬度地带的东南地 区，总的来讲，较小的天井有益于防止夏季阳光曝晒，且更利于组织通风。

从西南地区现存典型的合院建筑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蜀地周边地区的 合院建筑，比如阆中古城民居。“在四川民居中，它最具代表性。其特点是正房居中布置， 划分出在尺度、功能等方面都有区别的前后两院。前院在宽敞的主天井两侧布置了书房， 形成一静谧安逸的环境……后院则布置厨房、厕所、储藏等家务用房，使内与外、主与次、 乱与静得到明确的区分。”<sup>[31]</sup>（图 3-3-3）另一类则是滇西、滇中地区的合院建筑。（图 3-3-4）比如丽江大研古镇民居、大理喜州民居、建水民居等，以“一颗印”和“三坊一照壁”民居

图 3-3-3 阆中古城 民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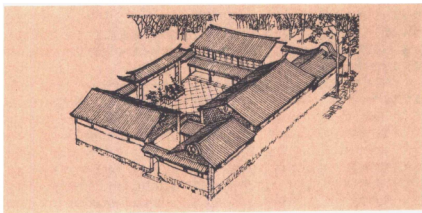


图 3-3-4 典型的“三 坊一照壁”民居

为典型代表,“这个地区是云南历史时期汉化最为明显的地区,大理白族、丽江纳西族和部分彝族都是汉化比较明显的民族。云南地区从唐代以来,受中国南北地区汉族移民的影响都十分大,故其民居既有抬梁式,也有较多的穿逗式;既有南方徽派建筑的风格,也有北方四合院的韵味。”<sup>[41]</sup>

### 三、基本特征:“通用设计”与“外部空间设计”

西南地区的合院建筑作为中原合院建筑影响下的一种建筑类型,同样具有中原合院建筑的基本特征。李允禾在《华夏意匠》中提出“在中国的传统设计思想上,对一切的房屋车服礼器等的制作都是采用一种灵活性很大的通用式设计(all purpose design)”<sup>[42]</sup>。这种通用式设计使得合院建筑以一种形态来满足各种复杂的社会功能。“宫殿、佛寺、道观、文庙、武庙、陵墓、官衙、住宅等,大都以同样之方针配置之。即中间置最主要之大屋,其前为前庭,庭之两旁取左右均齐之状,而以廊连接之。”<sup>[43]</sup>(图 3-3-5)——从而使得合院建筑不若西洋建筑有因功能不同而变化出各种各样的建筑类型。举个简单的类比,合院建筑的组合有如中国的围棋,用黑白两种颜色的棋子变化出无穷样式来。也就是说,传统的合院不是西洋建筑的“量体裁衣”,针对不同的建筑功能而有不同的建筑形态,功能变而房屋可以不变。在欧洲,教堂的形式绝不与普通的房屋类似;而在中国的合院建筑中,佛寺往往就有可能来自于一般的民居。

这其中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合院建筑是如何满足日趋复杂的社会功能?“以木构架结构为主的中国建筑体系,在平面布局方面具有一种简明的组织规律。就是以‘间’为单位构成单座建筑,再以单座建筑组成庭院,进而以庭院为单元,组成各种形式的群组。”<sup>[44]</sup>既然是通过庭院的组合扩展,那么这种扩展方式又是如何进行的?是通过什么原则、或者是什么“规矩”进行组合的,这就构成合院建筑体系极其重要的一个内容。换另一种思维,合院建筑的空间核心在于“院落”,那么在进行建筑群体组合时,是如何来控制合院的大小尺度的?也就是说,是如何进行“外部空间”的尺度和空间序列安排的?要突出主体建筑不仅要依靠建筑体量的宏大,而且还需与周边建筑处理好关系。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目前的学术成果较少,人们长期以来将眼光更多地投向了实体的建筑形态研究,而忽略了合院建筑的精髓之一——“外部空间”的重要性。应该说,对于“院”的精心处理也是合院建筑的一个典型特征。其中涉及到古代各个时期的度量衡、视觉和心理感受的控制等,尤其是其中必定贯穿有中国传统合院建筑的数理美学在内,是一个有重要价值的研究课题。对于传统建筑的学习,继承的重点不在于模仿它的形态,比如过去几十年中对于大屋顶的抄袭、拷贝,不管作品成功与否,都不应该成为提倡的榜样;更重要的在于对其中心体察入微的艺术洞察力的研究,对于其中设计原则的揣摩。本书末附有一篇对于合院建筑外部空间设计的初步探讨的文章,作为研究的开始。

另外,虽然合院建筑采取的是一种“通用式设计”设计,但是绝非是一成不变的设计。根据等级制度确定的房屋等级形成了一整套包括建筑实体与外部空间的完整的设计、施工系统,建筑上的区别依靠礼仪等级上的差别、建筑的体量、装修、装饰、色彩来体现,其中尤其是碑刻题记和诗书楹联成了建筑中的“点睛”之笔。“中国各类建筑并不是完全依靠房屋本身的布局或者外形来达到性格表现,而是主要靠各种装修、装饰和摆放而构成本身应有的格调,或者说说明其内容的精神。同时,中国是一个善于用文字文学来表达意念的国家,建筑物中的“匾额”和“对联”常常就是表达建筑内容的手段,引导建筑的欣赏者进入一个诗情的世界。”<sup>[45]</sup>碑刻题记,诗书楹联,往往以极其精练,极其生动的文字提示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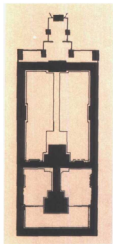


图 3-3-5 合院建筑的基本空间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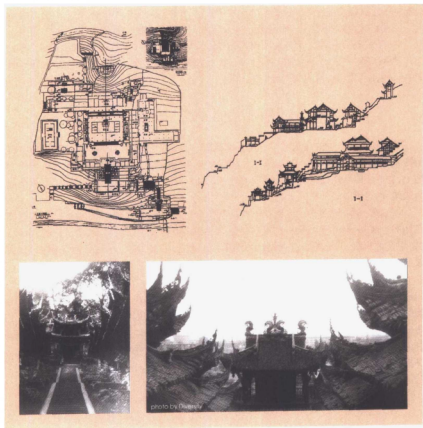
筑尤其是环境的主题,升华建筑的意境。《红楼梦》第十七回论述了大观园工程基本就绪,贾政及众宾客一边赏景,一边为园林中各景致建构题名赋文,此时作者借贾政之口,表达对题名的看法,“若干景致,若干亭榭,无字标题,即是花柳山水,也断不能生色”,确切地说明了文字题记的重要作用。

#### 四、合院与山地

合院的建筑形态对于山地而言,比起“干栏建筑”在建造时是需要更多努力的。除了工程上所需的筑台,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合院建筑需要的场地实在是很大。这在少见平地的山地空间中成为限制发展一个瓶颈。所以在山地地区,除了因文化上影响甚深,而又喜择人烟稀少的“山林”作为基址的寺观之外,合院建筑并不多见。其中以四川青城山的寺观建筑群最为典型。(图3-3-6)

由此,西南地区的山地寺观便成为了一种文化影响下的观念与地区自然、地理条件相结合的典型案例。如何在复杂的山地空间中贯彻一整套完整的、成熟的空间设计理念,——在这里,房屋的形态、构造、装饰等并不是处理的难点,这通常只需按部就班,依照“则例”、通常做法或略加调整即可;关键的不在于处理建筑单体的设计,而更在于调整

图 3-3-6 青城山二王庙



单体间的关系,尤其是建筑群体与起伏变化的大地基面的关系。这是“外来”的设计观念面临了新问题,也可以说是合院建筑外部空间设计方法的本地化过程。这理应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课题。然而它必须基于平原地区合院建筑“外部空间设计方法”的基础之上,但是如前文所说,学术界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尚在起步之中。因此关于“建筑群外部空间”的研究有待于学界整体学术研究的深入和提高。

## 第四节 关于井干

### 一、“井干式”结构

关于“井干”式结构,很有可能是我国古代一种主要的建筑结构形式。“井干式结构在力学上可以发挥很大的效能,因此可以堆叠得很高。在汉代有一座据说高达五十丈的‘井干楼’,就因井干式的结构方法而得名。后汉张衡《西京赋》中有‘井干叠而百层,上飞间而仰眺’之句。《长安志》曰:‘井干楼,积木高而为楼,若井干之形也’。相信,在古代以这种结构曾经作过高楼和高台的一种重要的构成形式。”<sup>[4]</sup>戴裔瑑在《干栏——西南中国原始住宅的研究》也曾经指出“井干式”结构的房屋很有可能是最早的一种建筑形式。

“井干式建筑”是以结构形式的特征称呼之,犹如“抬梁式建筑”、“穿逗式建筑”等。因此,“井干”首先是一种结构形式。“井干式木构架是用天然圆木或方形、矩形、六角形断面的木料,层层累叠,构成房屋的墙体。”<sup>[5]</sup>

### 二、井干房的分类与分布

关于井干式结构的建筑究竟是何种建筑形态,刘敦桢先生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中有所论及,“至于井干式结构的房屋,据汉代西南兄弟民族的随葬铜器所示,既可直接建于地上,也可像穿斗式构架一样,建于干栏木架之上。”<sup>[6]</sup>也就是说,“井干式建筑”既可是地面式建筑,也可以是干栏式建筑。

从分布上看,地面式建筑更多分布在中国的北方地区,尤其是北部的林业地区,直接在地面上起井干;井干式干栏则更多在亚热带和热带林区。如杜昌丁《藏行记程》中载:“屋用全木积垒,四面为墙,高可数丈,中开一穴为门,下畜牛马,上居人,独木壁齿为梯,以便上下。”便是典型的井干式干栏。

西南地区井干房的分布主要在川西及滇西地区。在这些高原多林木地带,还有相当民族在使用井干房,土语“木楞房”。“在丽江地区,木里、盐源、兰坪、维西、宁蒗山区纳西族‘木楞房’,四壁都用圆木垒成,门较矮,……在中甸、维西的纳西族井架式木楞房圆木堆成四方形,门也较矮。独龙族则与中甸和维西的纳西族一样也盛行‘井干式木楞房’,即井干干栏式。靠近丽江地区的傈僳族也流行井干式民居。洱源西山的白族、云南西部地区彝族都盛行‘垛木房’,彝族称为‘木罗罗’,其制双斜面屋顶,细木片覆盖。普米族和滇西的怒族也盛行‘木楞房子’”<sup>[7]</sup>(图3-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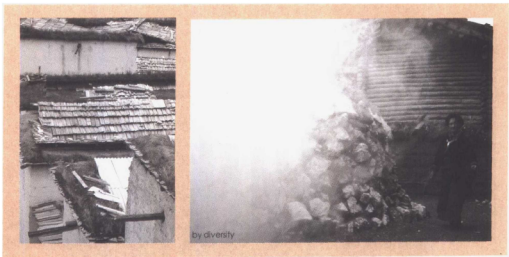


图 3-4-1 井干板屋

### 三、井干房的结构形式与建筑类型

长期以来,由于对“井干式建筑”的形态缺乏一个共识的称谓,造成了一定的混淆。杨昌鸣在《东南亚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建筑文化探析》中曾经提出对于“结构形式”与“建筑类型”混淆不清的状况提出置疑:“我们所说的干栏建筑,其最基本特征就是底层架空,主要居住面位于楼面,至于用什么方式将底层架空则无一定之规,……如果仅仅因为以桩、柱作为下部支撑的情况较为常见,就将其他支撑结构排除在外,显然有欠公允。另一方面,建筑学所划分的结构类型并没有规定它只能出现于某种特定的建筑类型之中。正如穿斗结构同样会出现在干栏式建筑中一样,井干结构又何尝不能出现在干栏式建筑中?不弄清这一点,就会在概念上含混不清,将建筑类型与结构类型混为一谈。”<sup>[90]</sup>

事实上,关于“井干房”史料中多有记载。

正德《云南志》卷十一《丽江府》:板屋,摩些蛮所居,用圆木纵横相架,层而高之,至十八尺,即加橡桁,覆之以木板,石压其上……《诗注》西戎之俗,以木板为屋,其来远矣。——这是一个对于板屋较为完整的解释,也是最为典型的井干房。“井干”既为结构又为围护墙体,同时屋面覆以木板,故称之为“板屋”。

《南齐书·氐传》:氐于上平地立宫室、果园、仓库,无贵贱皆为板屋土墙。

又有任乃强著《羌族源流探索》:“凡汉人所称之为氐人,皆住矮屋。劈杉木为木板覆盖,称为板屋”等。

看来,“井干”结构的房屋长期是以“板屋”的称谓出现在史料之中。也就是说,“板屋”可以用来指代结构形式为“井干”结构的房屋。

### 四、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井干”板屋

早期“井干”式结构的房屋分布广泛,后期由于多种原因<sup>[91]</sup>只在川西与滇西地区有较多存留,成为西南地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将“井干”式结构的房屋归于“板屋”有其

合理的理由,但是,其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无论是史料还是现在的资料都表明,“板屋”存在两种形态,一种是井干结构的墙体,另一种是土墙。蒋高宸著《云南民族住屋文化》中指出“板屋”两种最常见的构造方式,即为井干式和冲土墙,因此又将“板屋”分为井干板屋和土墙板屋。<sup>[52]</sup>事实上,还存在着一种两种构造方式结合的板屋,即既有土筑又有井干。

目前由于考古资料的限制,很难断定“井干”板屋的起源大致在什么时候,什么地区。但是可以获知的是“井干”早在商代就已经发展比较成熟,成为当时主要的一种构筑方式。“据商代后期陵墓内已经使用井干室木墩,可知这种结构法应该产生于这时期以前。此后,周朝到汉朝的陵墓曾长期使用这种木墩。”<sup>[53]</sup>另外,关于使用这种建筑类型早期的民族主体也不很清楚。应该存在多种民族共同使用“井干”房的一个时期,但是史料上的记载大多为“氐人”。氐人早期在甘、青一带活动,后来由于历史等方面原因沿着“横断山脉走廊”向西南地区迁移,并逐步与其他民族或当地土著进一步融合,或者有过文化上的冲突等等。

如果将“氐人”作为早期“井干”板屋的使用主体,或者说还依然使用“井干”板屋的民族主体,以及从“氐人”向西南迁移的过程来看,由此是不是可以说“井干”板屋有可能与其他形式的建筑类型相互影响,并由于生态环境与地理气候的变迁,成为了今日西南地区邛笮建筑甚至干栏建筑谱系主要的一个遗传基因?

提出这样的设想是存在相当风险的。一方面,人们长期以来习惯于将各种建筑类型并置,较少考虑到相互之间的影响和关系;另一方面,由于这几类建筑发展历时久远,缺乏足够的资料等等都造成了验证这一设想的困难。以下是笔者提出这样设想的基本缘由:

### 1. 氐族·氐族板屋·邛笮

远古时代的氐羌民族大致生活在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并不断沿着横断山脉向南迁移。氐与羌原来可能是一种民族,所以典籍中常将氐羌并置。但随着民族的南迁,气候与地理条件的变化,其中的一些部落逐渐改变游牧习惯,开始了游牧兼事农业。“农耕需要定居在低下的平原河谷,所以这部分羌族就称为氐。《逸周书·王会解》:氐羌以鸾鸟”。孔晁注:‘氐地之羌不同,故谓之氐羌,今谓之氐矣。’汉代以氐字作为高低的低字。……可见西汉时氐羌已经成为了两种民族。到南北朝时,氐羌不但区别显著,而且氐族的统治者自认为文化先进,轻视羌族”。<sup>[54]</sup>

羌族原来并不居“邛笮”。古代羌族的住房,由于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一种帐篷式的住房。“如魏晋时富昌羌,‘俗皆土著,居有屋宇,其屋织津牛尾及投羊毛复之’。唐代的党项羌,‘居有栋宇,其屋织津牛尾及羊毛覆之,每年一易。’他们是不能早在秦汉时代就掌握土石建造技术的”<sup>[55]</sup>,而氐族“无贵贱皆为板屋土墙”。早在甘青地区,他们就有建造“板屋”的经验,进入西南山地之后,很容易“因地取材”,“累石为室”,修建邛笮。《新唐书·南蛮传》记“(黎、邛二州)西有三蛮,盖笮都夷、白马氐之遗种。……叠甃而居,号碉舍”,足证直至唐代,氐族仍然保存了累石为室的习惯。而这一地区羌族居石室,则很可能是接受氐族影响的结果。<sup>[56]</sup>另外的一个旁证是氐人的石棺葬。石棺葬用的石棺,四壁整齐,封闭严密,足证建造者对于砌石技术是相当熟悉的。而且死后葬用石棺,可能与生前住宅用石砌有一定的关系。

从上述的史料记载与考古学者的分析可以初步断定,早期氐人居住“板屋”,进入西南地区后,尤其在岷江上游地区,住屋的形态由“板屋”转化为了“邛笮”“碉舍”,可见二者在时间上存在一定的继承关系,而且在构筑形态上也有一定关联。板屋的“累木为室”与邛笮的“累石为室”以及后来的“累土为室”在构造方式上有很大的相近之处。

## 2. 民族迁徙走廊·地理环境·房屋形态

横断山脉地区长期以来是民族迁徙的走廊,具体来看,其间又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即西部的金沙江与雅砻江走廊;中部的大渡河走廊;以及东部的岷江上游走廊。不同的走廊联系不同的地区,有着相异的地理环境,因此从目前看来其间存留的房屋形态就有略微差异。前两通道北接甘青、南抵云南,沟通了藏彝地区,从北至南大致分布着土墙板屋—井干板屋—土墙与井干结合板屋—土掌房—干栏建筑等。这种分布与地理环境的差异有一定内在的关联,反映了从西北少雨少木材地区—高原林区—林区边缘—干热河谷地区—热带地区这一过程的变化。

另外,氐羌民族在迁徙过程中,“……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分化出多支亚种。根据民族学考古资料,氐族的分化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留在川西北地区,包括了今天的丹巴、靖化、懋功以及汶川、理县一带。住屋形态同样已经转变为“邛笼”。《隋书》卷八十三《附国》载:

附国者,蜀郡西北二千余里,即汉之西南夷也。有嘉良夷,即其东部,所居种性自相率领,土俗与附国同,言语殊,不相统一。……其国南北八百里,东南千五百里,无城栅,近川谷,傍山险。俗好复仇,故垒石为巢而居,以避其患。

另外一部分氐人,“在汉以后可能继续往南迁徙,与蛮、僚杂居,不易分辨。《魏略·西戎传》说氐人‘称盘瓠之后’,明显是接受南方民族影响以后产生的意识。”<sup>[1]</sup>往南迁徙的氐人与蛮、僚杂居,住屋形态上势必相关影响。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模型中表现出的井干式干栏很有可能就是多元文化复合的结果。(图3-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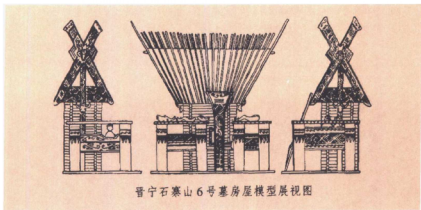


图3-4-2 晋宁石寨山出土的井干式干栏青铜模型

当然,“井干板屋有可能是今日西南地区邛笼建筑甚至干栏建筑体系主要的一个遗传基因”这样的设想只是一种假定,还需多学科共同努力,进行进一步的验证。所以在行文中也不将其单独列为一个“建筑体系”来阐述,仅作一个置疑和讨论。但是无论如何,用更加宽广的视野,更加审慎的态度,用动态分析、联系的观点来审视建筑文化的发生、发展都是应以大力提倡的。

[1] 刘敦桢:《刘敦桢文集》三,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7年版,第320—321页。

[2] 谭继和:论古“江源”流域巢居文化渊源及其历史发展,载《四川岷江上游历史文化研究》,四川

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9页。所谓“江源”,指的是岷江流域,也就是川西地区。

[3] 历代各族传记汇编第二编第2120页引丁谦说。

[4] 胡鑑民:《羌民的经济活动形式》,载中山文化学院民族学研究集刊,第4期。

[5] 董恩正:《南方文明》,《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

[6] 何耀华:《古代羌人与藏区土著居民的融合》,《中国西南历史民族学论集》,第83页。

[7] 何耀华:《试论古代羌人的地理分布》,《中国西南历史民族学论集》,第65页。

[8] 杨庭硕 罗康隆:《西南与中原》,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1页。

[9] 摘自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73页。

[10] 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75页。

[11][12] 廖伯琴:《朦胧的理性之光》,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88页。

[13] 这些物质形态上留存的文化信息在其他地区已经很难找得到了,尤其是在还有人居住的建筑中。这为研究民俗景观与建筑文化提供了非常珍贵的“活的标本”。

[14]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三编第二册,第490页。

[15] 陆元鼎:《中国传统民居的类型和特征》,《民居史论与文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第2页。

[16] 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56页。

[17] 羌族的“白石”崇拜说法颇杂,其中以《羌戈大战》中的传说为多。传说中羌人因为有白石神相助,打败了纵目的戈基人,占领了生存空间较好的区域,因而有了“白石”崇拜。白石多为白色的石英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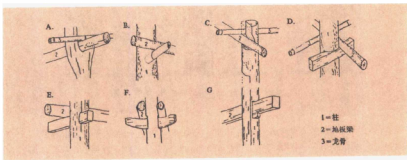
[18] 杨春风:《西藏传统民居建筑环境色彩文化》,《民居史论与文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 参见黄才贵:《亚太干栏文化比较研究》,《建筑与文化论集》,第155页。

[20] 戴嘉雄:《干栏——西南中国原始住宅的研究》,转引自刘小兵《滇文化史》,第62页。

[21] 黄才贵:《亚太干栏文化比较研究》,《建筑与文化论集》,第157页。

[22] 但因地区发展不平衡性,早在七千年前的穿樯技术并没有在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完全传播开来,尤其是西南地区特殊的山地地形限制了技术范式、使用工具的传播。今天西南地区的干栏建筑还存有多种方式的穿樯方式,有些还只能称之为前穿樯方式。见下图。



干栏建筑的几种梁架交接方式(引自《东南亚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建筑文化探析》)。

[23] 参见佐佐木高明:《照叶树林文化之路——自不丹、云南至日本》,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4] 姜彬:《稻作文化与江南民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25] 谭继和:《论古“江源”流域巢居文化渊源及其历史发展》,四川岷江上游历史文化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1页。

[26] 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84页。

- [27] 谭继和:《论古“江源”流域集居文化渊源及其历史发展》,四川岷江上游历史文化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第230-238页。
- [28] 杨国仁、吴定国编《侗族祖先哪里来》,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6页。该民歌是对侗苗民族生境言简意赅的生态描述:山、水、林、坝,以及人们对于土地的热爱。
- [29] 余达忠:《侗族民居》,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 [30] 雷山县志编纂委员会:雷山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第109页。
- [31] 余达忠:《侗族民居》,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66-67页。
- [32] [33] 余达忠:《侗族民居》,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94-95页,第125-126页。
- [34] [35] 参见日本《住宅建筑》。
- [36] 火塘是包括百越族系、氏羌族系等等在内的多民族日常生活的中心,是住屋中最重要的、最原始一个元素,同时也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文化现象。它的位置、构造、作用、使用方式,尤其是不同民族火塘的比较研究都会是很有趣的课题。近年来,新的生活方式,主要是电力的使用以及火的使用容易引起火灾等原因,火塘的功能逐渐衰弱,有些甚至被移置出堂屋。
- [37] 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82页。
- [38] 参见第二章第六节“廊道”。
- [39] 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2页。
- [40] 参见陆翔、王其明:《北京四合院》,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年版。
- [41] 蒋高宸:《云南民族住屋文化》,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63页。
- [42] 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82页。
- [43] 李允禾:《华夏意匠》,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79页。
- [44] 伊东忠太:《中国建筑史》。
- [45] 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 [46] 李允禾:《华夏意匠》,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79页。
- [47] 李允禾:《华夏意匠》,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207页。
- [48] 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
- [49] 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65页。
- [50] 杨昌鸣:《东南亚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建筑文化探析》,《东方建筑研究》下册,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3页。
- [51] 其中很重要一个原因很可能就是生态环境的变化导致可获得木材的减少,以及“井干式”板屋本身消耗木材巨量等原因造成了该种建筑类型的逐步消失。而在西南有较多留存,一是与民族的迁徙密切相关,另外则与西南“大分散、小聚集”的文化空间结构有关。某一种形态一旦传入并获得生存的空间,那么就很有可能历经久而不变。
- [52] 参见蒋高宸:《云南民族住屋文化》,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6页。
- [53] 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
- [54] 童恩正:《四川西南地区石棺葬族属试探——附谈有关古代氏族的几个问题》,《古代的巴蜀》,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第279页。
- [55] [56] 童恩正:《阆中境内的各种民族》,《古代的巴蜀》,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页。
- [57] 童恩正:《四川西南地区石棺葬族属试探——附谈有关古代氏族的几个问题》,《古代的巴蜀》,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第283页。





中國西南地域建築文化

第四章

西南地域建筑类型  
与现象

由于西南所处地理环境的复杂多样,民族众多,而且各民族的社会经济、社会形态与生产方式等极不平衡,加之战争频繁及多次移民带来文化的破坏、冲突、融合等,客观上导致西南山地建筑研究的困难。早在1940年刘敦桢先生受事中国营造学社对西南古建筑进行调查,就认为“(西南诸省)……因地理、气候、材料、风俗、及其他背景之特殊,产生各种大同小异之作风。每种作风,又随时时代之递嬗,而形成若干变化。故吾人欲于短时间内完成详尽而系统之调查,殆为事实所难许可”;又言“川省地势,为崇山峻岭所环障,在交通工具尚未发达时期,外部影响较难输入,惟一旦输入采用,成为定式,则又颇能维持较久时间。故时至今日,其一般建筑,犹能保存若干古代做法,供治建筑史者参考”;再言“且四川据建瓴之势,浮江东下,可以卷席吴、楚。故历代用兵东南,以图一统之业者,若晋、若宋、若元,皆以争取四川为急务……古代寺观,多毁于是时(元),而现存之木建筑,大半属于明清二代,足窥宋、元之际,川中兵革之惨”。<sup>[1]</sup>

引用刘敦桢先生的论述,想说明的有几点:1.西南地域建筑文化研究的复杂性 2.西南传统建筑尚有相当留存,载有丰富的文化信息 3.西南地域建筑文化的特殊性。所谓的特殊性,是指西南文化中的主体文化巴蜀文化、滇文化等剧烈变迁对建筑文化研究的影响。相对较发达的巴蜀文化、滇文化对周边的文化具有辐射作用;然而至秦始皇开五尺道,汉武帝开西南夷以来,始与中原有密切联系;而后经三国、晋、唐、宋、元等历史时期大量人口南迁,尤其是明洪武年间数十万军队及其家属及后来清康熙年间以湖广人为主“填四川”的一浪接一浪的移民流动,客观上强烈冲击着西南的地域文化。从另一个侧面看,西南地域文化,尤其是平原、坝子地区的文化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移民文化。各种不同时间、不同地域、不同种族的文化在此接触、冲突、交融,客观上造成了西南地域文化的特殊性。相对地,地域文化的变迁对建筑文化就有很大的影响,从生活方式、营造技术到建筑类型等都有相当的作用,如“会馆”就是明清以来发展起来的特殊建筑类型。另一方面,由于复杂的地理环境,困难而险要的交通,外来文化的影响更多在于原本文化发达,交通相对便利的地区——这就造成西南文化研究的两个侧重点,一是如巴、蜀、滇等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融整合,一是相对独立的其他文化脉络的发展。对西南山地建筑文化的研究,也应同样着眼于此。在第一、第二章中已经明确指出西南地域建筑文化的三大谱系,即以平原坝子地区为主的合院建筑体系、以高原山地地区为主的碉楼建筑体系以及以滨水山地地区为主的干栏建筑体系。在这三大谱系中,以平原坝子地区的合院建筑体系最为成熟;以“院”为基本语汇,结合该地区的多样的社会功能,衍生出多样的建筑类型。从更广的视野看,这些地区最为发达同时也最先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当现代化的浪潮滚滚而来时,合院建筑也最先受到毁灭性的冲刷——除了少量的重要历史建筑尚有存留,其他的基本上已经不复存在。相对地,碉楼与干栏因为所处的地理空间较为偏远,经济和文化上所受的冲击较小,所以至今依然还有人居住其中,成为研究工作极好的“活化石”。

下文将有选择地对西南地区内类比其他地区具有相对独特特征的建筑类型和现象进行阐述和论述,以期通过对客观存在的概貌白描和其背后发生机理的探究,更深入了解西南地域文化的内质。所谓相对独特的建筑类型是指在西南地域生态基质上发展起来的,有别于其他地区,同时具有较为典型西南山地文化特征的各种建筑形态。基于西南山地建筑文化的复杂性与特殊性,本章主要从以下几个主题,择取适当的案例进行研究,包括了:聚落模式与特征、移民与会馆建筑、摩崖石刻与摩崖建筑等。这几个方面的研究除了涉及本身一定的形态外,更加注重的是其与相关内容的联系研究。

## 第一节 地理空间与聚落模式

### 地理环境

按照地理环境的差异又可以分为高原山地聚落模式、山地村寨聚落模式以及平坝集镇模式,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分别是邛笼、干栏和合院建筑典型的聚落形态。

### 高原山地聚落

高原山地聚落模式是西南地区独具特色的聚落模式。徐新建在《西南研究论》中将其称之为“雪域”聚落,更为形象。文中他阐述了该种聚落模式的三个特征:第一具有“农牧结合”的特点。“这一点可说是由雪域地区的自然生态所决定的。成片的草坡为畜牧文化提供了便利环境。雪山融化之水形成的若干水源又为农耕方式创造了滋润的条件。……仅从饮食结构看,就在‘粘粑、牛肉、酥油茶’这一巧妙结合中,即体现出雪域模式的丰富内容了。”<sup>[2]</sup>第二,具有“神人结合”的特点。“‘神’几乎成了其全部文化的核心。在这里,神不仅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中,外化在寺庙的塑像上,遍布于所有的万物间,同时,更融化在人类生命的性灵内。”<sup>[3]</sup>第三,具有“三权结合”的特点。即形成了神权、政权、教权三权合一的组织制度。

徐文的论述中,第一特征事实上是对于“生产方式”的描述。农牧结合的生产方式决定了聚落的表现由两种形态组成,一种是游牧时为主的帐篷,一种是农耕期为主的邛笼。随着农与牧的不同侧重,聚落的组织又有所区别。侧重“农耕”的地区,邛笼分布较为密集,而且由于恶劣气候条件的影响,邛笼间形成了狭隘的外部空间,并有较一致的朝向。在我们上文分析的形态组织诸多特点中,以“同向无中心、主中心、多中心”的情况居多。另外,还有以下几个特点(图4-1-1)<sup>[4]</sup>:

1. 哪里有较多耕地,哪里便有聚居群,它的位置,主要便于农牧生产,便于看守、防止盗窃及野兽损害庄稼。
2. 不占熟地。住宅大都集中建在耕地的边缘,不占用有限的熟地,因各户都兼营农牧业,以防止放牧的畜群穿过农地,以免践踏或啃吃青苗。



图4-1-1 典型的高原山地聚落

3. 选择向阳基地,利用太阳能,选择温暖舒适环境。他们根据当地气候情况,创造了能避风向阳的住宅。

4. 靠近泉水、溪流或河道。因高山地区,雨水稀少,生活用水困难,故住宅群或城镇,莫不靠近溪泉、河道。

徐文中的第二、第三特征则是对于高原山地聚落“人文特征”的描述。由于宗教在高原山地地区的统治地位,其聚落形态显示出了浓厚的宗教审美情趣。从聚落的单元——个体住屋到外部空间环境,宗教的影响无处不在。(图4-1-2)这形成了高原山地地区大地景观中最为壮丽、最有特色的景象。

图4-1-2 宗教与高原山地聚落



#### 山地村寨聚落

山地村寨聚落处于西南地域空间的第二级阶梯。由于西南整个地域空间的大切割,形成了典型的山地空间<sup>[5]</sup>。因此我们也可以将西南地域建筑文化称之为建立于山地之上的建筑文化。同样,山地村寨聚落也是西南地域空间最为普遍的现象存在(图4-1-3)。由于山地空间的多向切割,导致了村寨间“大分散、小聚集”的状态。这种客观限制与其聚落特征息息相关:生存空间切割和限制导致了一方面缺乏文化交流,另一方面发展乏力。文

图4-1-3 山地村寨聚落



化的强弱与聚落中心性的强弱正相关,文化越成熟的群体,其聚落中的中心性就越强,反之亦然。比较高原山地聚落与山地村寨聚落,前者强烈宗教特征在聚落空间上就体现出强烈的以宗教寺庙为中心的结构,而后者则要弱得多。因此在形态组织诸多特点中,以“多向无中心、多向主中心”的情况居多。同样由于其山地地形,干栏的接地方式可能是一种最简单、最快捷的在不平山地中营造出适合人居住的水平空间的一种方式,因此干栏建筑是山地地区最普遍的聚落形态存在,是组成山地村寨的基本单元。

#### 平坝集镇聚落

在西南地区,平坝聚落的形成离不开山寨聚落,二者是一种共生的关系。在西南地域内,散布着各种被山体分割开来的大大小小的山地坝子。这些坝子往往成为周边山寨经济、文化甚至战争活动的交汇地,因此平坝聚落比起山寨聚落有着更多的故事。从

本地区的文化发展上看,二者在文化上形成一种微妙的关系。山寨文化为平坝文化提供元素,而由于融合了多支文化而相对发达的平坝文化反过来又一定程度影响了山寨文化。“经过长期交往和渗透,一个坝子往往就成了一个特定社区的象征,起到了使其辐射范围内若干山寨形成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方面的某种社区聚同作用,打破了社区形成以前各山寨和族类间所原有的外在差异。”<sup>[6]</sup>也就是说,平坝聚落具有凝聚周边山寨文化的功能,当这一功能强大到一定程度时,就形成超越寨别与族别的社区集镇、都城甚至国府。从与外界的文化交流看,平坝聚落又是西南地区文化渗透、交融的节点。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第一章中有不少的阐述。比如“茶马古道”,比如“西南丝绸之路”等,均是以坝子聚落为一个节点,一个暂停点,然后又向另一个坝子聚落前进。同时,也是中原等其他强大的外来文化侵入的扼点。于是,平坝聚落出现的独特的二元对立现象:“本土文化的自然进程被打断,尚未完善、互不平衡的社区结构遭冲击,外来结构又与己差异巨大,难以认同,于是冲突和刺激同时产生。”<sup>[7]</sup>最后形成的面貌往往就是以占优势的文化为主导的多元文化并存的现象。

总体来看,西南地域间的平坝聚落首当其冲受到了来自周边多种文化的影响,包括了北方的游牧文化、中原农耕文化、南方的荆楚文化、西方的印度佛教文化等等。<sup>[8]</sup>这种影响体现出一种与空间距离成反比的势态,今日形成的文化格局与这种影响紧密相关。比较而言,中原汉文化在西南平坝聚落的文化争斗中占有优势,其聚落形态的背景文化相当一部分源于中原汉文化,因此在其单元形态上,也往往由原来的本土形态转变为“合院建筑”为主导地位的多元并存形态。这在今日尚有相当存留的云南丽江坝子地区获得佐证。(图4-1-4)



图4-1-4 平坝聚落

## 一、属性构成

毛泽东在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时指出了中国社会存在着三种权力支配系统:一是由国、省、县、乡的政权构成的“国家”系统,二是由宗祠、支祠以及家长的族权构成的“家族

系统”，三是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十地菩萨以及玉皇大帝和各种神怪的神权构成的“阴间系统”和“鬼神系统”。这三种层面在西南地域中同样存在——“国家法制”的层面在西南地域显得过于空泛；“家族系统”反映在聚落形态上就是宗族聚落；“阴间系统”和“鬼神系统”则是一种对未知世界想象、崇敬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一整套宗教组织，反映在聚落中就是以宗教为主导因素的宗教聚落。另外，由于西南地域空间的严重切割，物质、信息等的交流就显得相对重要，基于此点而产生了以物资交流为主的大小聚落形态。这里提到的聚落“属性构成”就包括了上述的宗族聚落、宗教聚落和贸易聚落三种状态。当然，从宽广的范围来看，现实的聚落不会仅是某种性质的聚落，或是仅带有某一种属性的聚落，而有的聚落超越了宗教、宗族以及经济贸易等单一要素而成为都府或国府。但是为了更清晰揭示西南地域聚落的原始面貌，基于宗族制度、宗教信仰以及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对于聚落形态的重要影响，文中还是按照上述三种聚落的不同主导属性展开论述。

### 宗族聚落

所谓的宗族聚落指的是“在同一地域中生息劳作的家族依地缘关系组成村落共同体，构成以共同的风俗习惯和规范为纽带的自治群体，在内部实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一个一切以传统为准绳的封闭、自律的社会生活组织，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自上而下都打上了父系家长制的烙印。”<sup>9</sup>宗族聚落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最普遍的社会现象，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在西南地区从云贵到巴蜀，宗族聚落广泛地存在。长期以来学术界将研究重点放在少量而突出的现象而对于大量存在的现象则缺少关注。目前终于有人将研究视野从代表“国家”系统的皇权建筑、官宦建筑以及代表“宗教信仰”的佛寺神祇扩展到普通老百姓的住屋了，比如陈志华结合民俗文化对楠溪江畔村落群的研究，王沪宁对于中国村落家族文化的现代化研究等等。从基质构成上看宗族聚落具有以下八个特点：血缘性、聚居性、等级性、礼俗性、农耕性、自给性、封闭性、稳定性等。<sup>10</sup>

宗族聚落的社会属性决定了其形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聚落空间形态的等级性。由于社会属性的等级性，依据其社会功能的重要性和多样性，就出现了等级不同的社会活动空间。与族群越相关的礼仪、活动的容纳空间其等级性也就越高。2.聚落空间形态的中心性。伴随着等级性出现形态空间的中心性。处于中心位置的建筑往往是族群商议大事、奖罚赏罚、祭祖祭宗的地方，比如宗祠，比如同族的鼓楼等。3.聚落空间单元形态的相似性。由于气候、环境、生产方式、技术含量以及容纳的功能、社会组织形态的相近，客观上决定了聚落单元形态的相似性。4.聚落结构的稳定性。由于聚落的自给性、封闭性，聚落可以看成相对独立的生态单元。由于缺乏外来新的因素的介入，聚落的结构始终具有稳定性。这种稳定性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本身已经形成的形态历经千百年没有太大的改变；二是延展的方式具有一致性。

### 宗教聚落

宗教聚落比之于宗族聚落，最大的不同点就在于维护群体正常运作的社会关系从以宗族为中心从转向了以宗教为中心。居民间的亲属关系同样存在，但已经不是维持人群关系最重要的因素了。宗教的影响在此有着超乎一切的力量。尤其是在藏族或傣族群体中，文化的延续与发展很大程度依靠宗教人员的承传。“佛寺是村寨事务活动中心，进行斋僧宴佛等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是向人们传授文化知识及各种专业技能的学校。在寺院中有历史、地理、天文、历法、语言、文学等方面的书籍。人们只有入寺为僧，才能通过宗教教育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sup>11</sup>

因此宗教聚落的中心性就显得十分突出。聚落的中心位置或者有利位置通常都是极尽能事的宗教庙堂。宗教庙堂成了资金、能量、信息最为集中的地方。宗教聚落与宗族聚落一

样,同样具有空间形态的等级性、形态的中心性、单元形态的相似性以及聚落结构的稳定性等,但是其等级的层次少,等级的差异性大,中心性则异常突出。而通常由于用地的限制,聚落结构的稳定性更体现在重新修建一个新村寨的空间模式与原有模式的一致性。

### 商贸集市聚落

因为物资交流而形成的聚落我们称之为商贸集市聚落。从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到物资交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商贸集市聚落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西南多山地少平地。有平地的地方就有可能成为商贸集市,由此发展成为聚落形态,尤其是在商品交换较为发达的白族、壮族、纳西族中更为常见。“据民国22年的不完全统计,广西94个县,共有圩场1424个”。<sup>[12]</sup>这种聚落具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围绕着某个或若干个平坝为中心布置房屋,形成集镇。这种集镇有几个共性<sup>[13]</sup>:1.聚落多位于坝区、河谷或半山区;2.聚落中有一面积较大,大小不等的广场;3.房屋朝向或围绕广场,或沿主要街道布置,密度随与广场平坝的距离远近成反比,越靠中心越集中;4.道路由中心广场向四面八方延展;5.聚落中有水系穿过,或天然或人工。另一种则是因为平坝面积有限,不可能在其周围建设房屋,几个村寨聚落乃自发约定在某固定的平坝固定的时间进行交换、贸易活动,即所谓的“赶场”,由此形成了一种松散的贸易集市聚落。这种松散的聚落形态在西南的广大地区还有相当广泛的分布。

## 二、形态构成

带状聚居形态:带状聚居通常是由于周边环境的限制而形成。由于一边或两边的山地地形限制,聚落的发展无法沿着纵深方向发展,只有沿着河谷走向形成带状形态。也有因为“两点成线”而形成的带状聚落。前一种状况典型例子有四川通江县城、汶川县城、奢群丰都县城、忠县县城、云阳县城、巴东县城等。这类城镇位于江河与两岸高山所夹的带形台地上,背山面水,临江处坡度一般较缓,之后坡度随城镇进深的加大而剧增,甚至出现陡峭的山崖。这种特殊的地形条件往往成为城镇发展难以逾越的“鸿沟”,由此决定了聚落只能沿江岸扩展。后一种形态如石柱县的西沱镇。在物资集散码头与上部的生活空间之间连线形成了具有特色的“云梯街”。(图4-1-5)西沱镇位于长江南岸,是原黔江地区和武陵山区惟一的长江口岸,历史上就是重要的物资集散地。西沱镇的主要街道“云梯街”起于长江岸边,垂直山脊等高线曲折而上,总长约2.5公里、113个阶梯段、1124级踏步。较其左右山坡而言,基地较为平坦,且下层为石板岩,利于凿石开梯,故有今日之“云梯街”。其街宽5米左右,两侧多为2层的木构建筑,随街道的起伏转折,参差错落,富有

图 4-1-5 (1) 云梯街平面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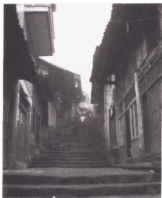


图 4-1-5 (2) 云梯街

一定的韵律感和节奏感。此类城镇的结构布局更为简单,“梯街”是整个生活方式的核心,交易、交往、娱乐、婚丧嫁娶等均集中于此,且每逢赶场,乡民云集,更显热闹,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

团状聚居形态:团状聚居大多因为用地的许可,房屋的建设沿着四周铺展开来,呈现蔓延状态。当其中有障碍物难以逾越时就形成了环状形态。上文提到的坝子聚落基本上属于这种团状形态。环状的聚落形态如忠县石宝寨。石宝寨前临长江,后倚奇峰,十二层寨楼飞檐展翼,层层收缩,与巨石浑然一体。而石宝镇又环石布局,随地形弯曲,环状的石板街道随景移,呈现出丰富的山地景观。(图 4-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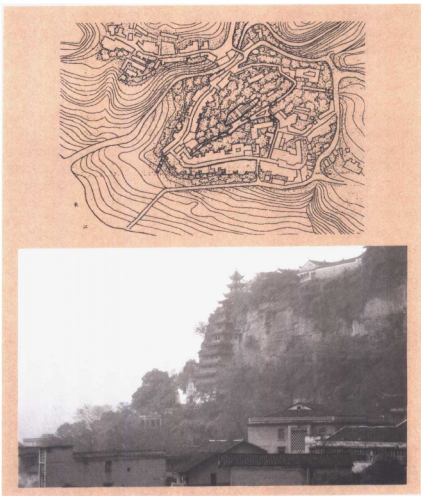


图 4-1-6 忠县石宝寨



组团状聚居形态:组团状事实上是一种群体聚居形态,它是团状与带状的结合。通常的情况都是首先形成团状聚居形态,随着团状间的联系强化而形成组团状聚居形态。典型的例子如重庆市、涪陵、万州等。随着组团的发展、蔓延,其最终的发展状态又有可能形成团状。<sup>[4]</sup>

### 三、形态特征

一切的追问都源于形态的表征,一切关于聚落研究的最初指向源于聚落的形态。因此在进一步探究聚落的深层内涵时,有必要总结归纳聚落形态组织特点。

1. 多向无中心:也叫“离散无中心”。这是聚落的早期形态,单元要素间无相关的联系,更没有形成中心的可能性。“多朝向”的出现大多发生在气候条件并不十分恶劣的山地地区。自然的气候等条件对于建筑的朝向无需太大的限制。

2. 同向无中心:单元要素之间由于某种制约(这种制约可能是自然的因素、如日照、风向等,也可能是社会礼制影响而形成的观念),形成了大致相近的布局方式,单元与单元之间均质发展,无主导因素出现。比如由于气候条件的恶劣,高原山地的羌族邛笼聚落,或者是彝族的土掌房聚落,为了抵御冬季寒冷气流的影响,在布局上有着相近的朝向。(图4-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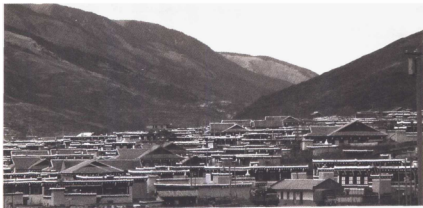


图4-1-7 同向无中心的聚落

3. 同向主中心:单元之间有共同的倾向,同时出现主导的因素,形成了空间的中心性。其中的主导因素多为宗教或者是宗族的因素。比如在高原山地藏族的邛笼聚落中,由于喇嘛寺庙的出现,打破了均质的空间结构,出现了以寺庙为中心的空间聚散方式。(图4-1-8)

4. 多向主中心:单元要素间并不强调形成共同的方位布局,但其间有主导因素存在,单元要素围绕中心布局,形成多向主中心的状态。

5. 多向多中心:该种组织特点是“多向主中心”的延伸,即单元要素围绕多个中心布局。典型的案例如何族的村寨,以“若干个鼓楼”为中心,其他房屋围绕着它们分布。

6. 同向多中心:单元要素之间形成共同趋向的过程中出现多个主导因素,促使空间结构形成多中心状态。这种状态通常出现在聚落发展的成熟时期,由于日益增加和丰富的社会功能,单一中心已经无法满足社会活动的需求,由此而衍生出“多中心”状态。但各



图 4-1-8 以宗教建筑为中心的聚落形态

中心的“中心化”程度并不一致,随其社会功能意义的强弱而呈现涨落变化。“同向多中心”的组织方式以平原、丘陵城市的空间格局为典例。比如清代北京的街坊,房屋的布置大致以南北朝向为主,呈现出均质性,同时又有寺庙、市场、皇宫等社会功能的存在,形成了多元的中心状态。“同向多中心”是“同向主中心”的发展样式。

聚落形态的空间结构与很多因素相关,其基本的一个要素是所处环境的自然条件,包括地形、气候、主导风向等。该因素决定了聚落的自然属性。而在大致相同的自然环境中却有很不相同的聚落结构,根本的原因还在社会属性的差异,这其中与宗族结构、宗教发展以及社会功能的丰富程度紧密相关。换言之,聚落的自然属性决定了聚落单元的基本形态并影响了聚落单元间的空间聚散关系;聚落的社会属性则决定了聚落主要的空间结构。两者的组合形成了以上几种可能的形态组织。

## 第二节 移民与会馆建筑

争修会馆斗奢华,不惜金银亿万花

清·吴好文《成都竹枝词》

### 一、会馆产生的社会背景

元明清时期的西南地区,最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就是“大规模”移民,而移民的根本原因是以“巴蜀”为中心的地区的战争频繁,导致川中人口剧减,生产力严重下降,很大程度影响到全国整体的经济协调。四川向来有“天府之国”美誉,其丰富的粮食生产、储备等为其他省份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历史上秦汉时期多有发生统治者命四川周边饥民“入蜀就食”的事件。因此为了恢复生产力,明清时期政府部门陆续将长江中下游地区人口密集的区域

城迁移一部分民众到以巴蜀为主的西南地区<sup>15</sup>，形成了人们常说的“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事实上，进入四川的移民远不止湖北、湖南两省，还包括了福建、广西、江西、江苏、安徽等等众多省份。

上节谈到“宗族聚落”是中国最为普遍的一种民间组织形式。这是一种以“血缘”为基础和纽带的组织调控方式。当将眼光投向广阔一点的范围，就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着一种与居住、生活的地理空间位置远近相关的关系，相近的生存环境有着更多相近的生活习俗、文化背景，也存在着更多的交流。基于此点上形成了以“地缘”为基础和纽带的组织调控方式。这种“地缘”纽带的出现只有在和其他区域的人群接触时才会体现出来。费孝通先生谈到“汉族”作为一个族名的形成是在汉代及其后中原的人和周围外族人接触中产生的。“生活在一个共同社区之内的人，如果不和外界接触不会自觉地认同。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会发生民族的认同。”<sup>16</sup>“地缘”人群的产生道理亦然。

“会馆”产生的基本原因就是基于以上两点：因多省份“移民”形成“民的种类”差异，而为了进一步强化“地缘”关系，形成“乡亲互助”，由此产生了各地的“会馆”建筑。“由于语言、习俗等差异，刚到一个陌生之地的移民群体与土著及其他移民间存在较大的隔阂，缺乏共同的信任感，使得各省和各地区间的移民内部需要有一种内聚的集体组织，互相帮助，共同抵御外来势力。而对乡土的眷恋和共同本土信仰的因素，使这种组织以会馆及相应的庙会形式出现。”<sup>17</sup>后期由于移民入川已久，“地缘”观念渐弱而“业缘”观念渐兴，会馆性质也渐由移民会馆转至行业会馆（公所）。

## 二、会馆职能

会馆建设的资金大多为同乡募捐而来，其中又分为同籍商人与地主捐资、同籍与当地官宦共同捐资以及官民合建等。称呼上有为“会馆”——多为移民会馆，也有叫“公所”——多为行业会馆。早期会馆的职能比较简单，以联络乡谊，互通声息，扶持乡友，抵御外来的侵扰为主。随着会馆形式的兴盛——清代西南地区会馆有“繁不胜举”之称，会馆在社会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当时民间社会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之一，其所担负的职能也日趋复杂。归纳起来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政治经济职能，一是文化宗教职能。

所谓的政治经济职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内维护同乡利益，调解纠纷，联络乡谊。因“地缘”或“业缘”形成的群体在重大节日通常组织团拜活动，走访乡里或同业，举办庆典，强化内部的关系纽带，同时对政务作总结，以求未来更好发展。二则对外主动参与社会各方面的公务活动。这一方面提升了会馆本身在社会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也使得当时的社会权力分散化。“由于移民的地缘关系产生的会馆建筑，从最初的保护外省商人和寄居的外省移民的一般权益到近代经济职能加强，对政治、宗教等社会各个方面的介入，使会馆实际上成了相当长的时期内聚居活动的核心。当会馆成为城镇聚居结构中重要的节点后，肇始的作为城镇惟一的结构中心的特点逐渐淡化。这种结构中心分散的特点在地理条件的影响下，又显得更为突出。”<sup>18</sup>早在1892年，重庆已有湖广、广东、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山西、陕西、云贵等9个外省会馆，后又陆续建造了广西会馆等。其中的大多数集中在重庆东水门太华楼巷、洪学巷一带，如湖广会馆、广东公所、齐安公所、广西会馆等，人们统称为“湖广会馆”。重庆会馆建筑的大量出现，与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重庆方便的水运交通以及明、清两朝重庆完成由四川军政中心向川东商业重镇的历史性转变

密切相关。这些会馆始建时的主要职责在于保护外省商人和外省人士的一般权益,与科举制度也有一定的关系。但到了近代,会馆的经济职能明显加强,成为行业帮会结社的场所,然后进一步发展为比较规范、约束力更强的同业公会。会馆还参与当地捐税征收,重大债务清理等活动。此时,会馆也被称为‘公所’了。从1901年重庆同业公会的业务概况可以看出,会馆在联系这些行业经济行为时已经发挥着相当重要的经济职能。”(见下表)又有“县衙和帮会处理地方事务若没有八省客长许可,也难以办妥。同时移民客长权威十分重要,……凡有命案重件……客长权柄最大,胥吏往拿案犯,非客长同去不能得手。”<sup>[18]</sup>再有“(重庆)八省会馆富有,掌握重庆经济命脉。同治二年(1863)教案赔款;光绪二十九年(1903)赎回打枪坝款项概由八省会馆垫付。”<sup>[19]</sup>——可见当时的会馆涉入社会事务之深。

1901年重庆同业公会情况表

同业公会名称	经营种类
八省公所	棉花
买帮公所	棉花
行帮公所	棉花
盐帮公所	食盐
同庆公所	棉纱
纸帮公所	纸张
酒帮公所	酒类
糖帮公所	食糖
绸帮公所	丝货
书帮公所	书籍
河南公所	杂货
扣帮公所	纽扣

#### 文化宗教职能:

除了政治经济职能,会馆的另一项职能是文化宗教职能。会馆通常通过某种形式的庆典活动,尤其是通过的共同信仰,来维系乡土感情。不同省份由于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各自信仰的神灵就有所不同,各省移民在西南地区的汇集形成了丰富多样的信仰。

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地域观念和封建宗法制度结合起来的“移民会馆”,限制了同行业的自由竞争,不能适应更大范围的商品贸易的需求,故渐有“行业会馆”的产生。“原属江苏各府木商所建的地域性行馆人兴会馆,道光以后,改弦易辙,允许他省在苏州的木商加入,成为木商行共同会馆。”<sup>[20]</sup>“行业会馆”与“移民会馆”有着不同的信仰,通常选择历史上同行业的或相关联的名人作为其崇拜的行业神,如屠宰业会馆中通常称为张爷庙或恒侯庙,内供奉“张飞”,船帮会馆中则为王爷庙,内供“镇江王爷”等。(图4-2-1)

各会馆主要的活动就是庙会活动以及其间的大型灯会、戏剧演出。“每遇节日,演戏酬神,习以为常”<sup>[21]</sup>。“每当会期,会馆为壮自己的声势,纷纷暗中互赛,各自自带乡班或尽量聘请名角、名班演出。清末成都福建、山西、陕西等会馆‘在太平全盛时,无日不演戏,且有一馆数台同日皆演者’,……正因为如此,一般会馆都修有戏台,成为会馆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所谓‘每一庙、馆大抵对面,必皆有戏楼’,还有外台,内台之分。”<sup>[22]</sup>(图4-2-2)



图 4-2-1 恒侯庙与王爷庙



图 4-2-2 阆中陕西会馆

另外顺便提及的是“川剧”的产生与移民及移民会馆的关联。川剧形成于清代中后期，与外省移民进入及其带来的戏剧有很大的关系。“四川原来本土的戏剧与移民的戏剧，特别是昆剧、秦腔的融合，才形成今天的川剧，而清代的移民会馆在清后期为这种融合提供了必要的场所。”<sup>[2]</sup>随着后期社会的发展会馆建筑的消失，川剧逐渐失去了表演的舞台，也是其没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 三、会馆特征

会馆建筑的特征在于两点,一是本身属于合院建筑的体系,难脱合院建筑的基本特征。二则因其本身功能需求而衍生出来的布局、形态、装饰等。

合院建筑的基本特征就是以“院子”及其周边房屋为基本单元,不断组合发展。<sup>[24]</sup>院子的大小与气候有很大的关联。北方院子大,捕获冬日难得的阳光;南方院子高而窄;空间剖面往往往上窄下大,有助于院子拔风的同时遮挡炎炎烈日。会馆建筑也是以“合院”为

基本单元向四周,尤其是向纵深方向发展。规模大的会馆,有几进院落,规模较小的则仅有一进院落。但是会馆前院却与气候没有太大的关联。自贡西秦会馆的前院戏楼广场(天街院坝),面积达500多平方米,主要的目的是满足观戏和商贸的要求。(图4-2-3)

从具体的平面形制上看,“各地会馆建筑平面形制大体相似,已基本定型,一般都由正殿、戏台、厢房三部分围成四合院。用地条件较好的会馆一般把底层架空的戏台当做主入口,厢房多为一楼一底,用走廊与正殿相连,……这样的布局方式使空间功能根据具体的情况可以灵活转换,有很强的实用性。譬如,天井平时作为通风采光排水之用;演戏时,又是观戏的场地;在某些时候,还可以作为行业的交易市场。另外,建筑的重要性使防火显得非常重要,同时为了互相攀比,显示气派,会馆的封火墙一般都非常高大,并且造型考究,风格各异。布局形制的基本相同,使各省会馆之间区别之处主要是由于俗尚不同,在建筑造型和装饰上也表达出不同的地域文化特色。”<sup>[25]</sup>(图4-2-4)

各会馆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以下几点:一是因为经济能力的高下,营建的规模和用功有所差异;通常处于中心城市或主要的交通(水运)干道上,如成都、重庆、广汉、自贡、云南保山、蒙自等,往往所建的会馆数量多,规模大,等级高,建筑的艺术成也较高。二是因为不同的信仰,供奉的神灵不同,会馆建筑的主题也就不相类似,在此基础上建筑装饰也就有很大的差别。会馆中通常有很多木制的浅浮雕,上面所表

图 4-2-3 自贡西秦会馆的前院戏楼广场



图 4-2-4 装饰表达不同的地域文化特色



达的内容与会馆供奉的神灵有很大的关联。以自贡恒侯庙为例,其间的浮雕主题大多以供奉的“张飞”为主题展开,包括有《忠义堂》等木雕。(图4-2-5)三是因地形的变化导致布局上的微差:西南地区多山地,多丘陵,会馆建筑的用地多不平整,很难完全遵循某一种固定的形制,因此在具体处理某一坡地或山地地形时,就必然出现一些差异。



图 4-2-5 恒侯庙中的木雕

#### 四、会馆建筑退出历史舞台及其社会意义

某种建筑类型的存在与消失完全在于社会的需求与否。会馆建筑由早期的“地缘”到后来的“业缘”到最后行业垄断被打破,加上清朝之后的社会动荡,基本上已经失去其存在的基础。也可以说,“移民”或者“移民概念”的消失以及“行会”的消失客观上导致了“移民会馆”和“行业会馆”的消失。民国时期,许多会馆逐渐变为它用——会馆建筑从此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会馆建筑是明清时期特有的建筑类型,由于西南地区大量的移民,因此在该地域内有着大量的存留。通过会馆建筑可以了解到当时社会的一个断面: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到明清时期已经有所发展,商品经济逐渐发达起来——这在会馆建筑极尽能事的装饰中可得窥视,自贡西秦会馆中甚至有了“龙”的形象出现(图4-2-6),这说明了有了相当经济地位的一部分社会阶层在努力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力,试图在社会上层中占有一席之地。有“自贡盐商豪富王朗云捐七万金,清廷遂科加按察使銜,赏二品顶戴及三代一品封典。”<sup>[2]</sup>之记载。但是1840年后的中国传统社会受到了外来的严重冲击,使得这种发展并没有继续进一步地延续下去。

无论如何,会馆建筑记录了这个时



图 4-2-6 自贡西秦会馆中“龙风”形象

期社会面貌的一个侧面。作为历史的记忆,会馆建筑在当今的社会发展中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自贡西秦会馆结合自贡的历史文化,将其改造成为盐业博物馆,是一个成功改造的例子。(图4-2-7)但是更多的由于今日经济建设中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文化保护与发展的普遍失误,许多会馆建筑惨遭摧毁,以自贡王爷庙为例。王爷庙目前仅存戏楼与部分回廊,正殿等建筑在修建并邓公路时被拆毁。保留住整体建筑本是很简单的,只需要稍稍修正一下道路的走向,但是现实只留给大众一座残缺的王爷庙。还有相当数量的会馆因历史的原因成为居民密集的住所,由于缺乏现代生活必需的设备设施,会馆及其周边的环境渐渐沦为城市贫民窟,重庆的“湖广会馆”便是一例。事实上不仅仅是会馆建筑有如此遭遇,这是传统建筑普遍遇到的问题:如何保护或者更新以适应新时期的社会需求。一个城市的历史是过去漫长时间层叠下来的历史,绝不能用某一时期的历史掩盖掉过去沉甸甸的历史,而这种现象在我国,在西南地区却大量地存在:迫不及待铲除掉老的建筑,迫不及待修起新的房子!这种自断历史、文化命脉的做法没有得到该有的遏制,没有引起足够的反思!

图4-2-7 自贡盐业  
历史博物馆



联合国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时——“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能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似乎倾向于关注世界能源、资源的分配,而对于文化这种特殊的“资源”却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借用这一概念,是不是可以说在文化建设上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同时当代人也有义务为后代创造出更好的文化环境;但是却不能不加选择地抹掉前代人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后代人理应享有分享这些文化遗产的权利。如果将这一概念称之为文化的可持续发展,那么我认为大力强调、深化推广这一文化上的可持续发展比起通常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对于我国目前的现状,对于西南地区的现状具有更加现实的意义。



四川会馆主要的庙会活动内容

会 名	行业、职业	祭祀神灵和起因	会期(农历)
轩辕会	纺织业	供奉轩辕皇帝。相传黄帝制轩辕之服。	九月十六日
老君会	铁器、铸造业	祭祀李耳。取其设八卦炉炼丹。	二月十五日
桓侯会	屠宰业	供奉张飞。取其为杀猪匠出身。	八月二十二日
詹皇会	厨子、餐饮业	供奉詹姓厨师。相传皇帝任系詹厨，天公落雨化雨，皇帝悔悟封为天师。	八月十三日
梅葛会	染布业	供奉梅、葛二仙。据传封神人物梅、葛二仙采野生植物作染料。	九月十三日
机神会	织布业	供奉嫫祖。传说黄帝之妻嫫祖是养蚕治丝的始祖。又供奉九天玄女。	九月初九
杜康会	酿酒业	供奉杜康。传说杜康发明酿酒术。	四月二十八日
财和会	南货、绸缎等业	供奉赵公元帅。传说封神人物赵公明从事于鲜贸易发财。	五月十九日
诸葛亮会	烟叶业	供奉诸葛亮。蒜出亮渡泸水时，士兵饮毒水失语，得孟获兄献芸香草解毒。后转种蜀地，为烟叶之源。	七月十五
云师会	轿夫业	供奉孔子。俗传三教(道、释、儒)中唯儒教不能腾云驾雾，以轿抬孔子，称抬轿者为“云抬会师”。	
雷祖会	饮食、小吃、栈房业	供奉钟王叔段文中。相传，段文中从业小吃行，与姜子牙相遇，封为雷祖。	六月二十日
玉皇会	行医、阉割等业	供奉玉皇。相传玉皇大帝包治百病，并行开刀、阉割之术。	四月初四
药王会	医药业	供奉药王孙思邈。	四月二十八日
七星会	丝绸业	供奉七仙姑。相传七仙姑织天上彩虹。	七月初七
鲁班会	石、泥、木、篾匠及制伞、水车业	供奉鲁班。源自春秋公输班为建筑工匠。	腊月二十
牛王会	养牛者	供奉牛王。传说牛王体健无病。	八月初二
山王会	打猎、赶鸭、开矿、烧炭等业	供奉山王菩萨。相传山王菩萨管理野外动植物和矿藏。	三月初三

清代四川移民会馆分布统计总表

分区	厅州县	湖广会馆	广东会馆	江西会馆	福建会馆	陕西会馆	贵州会馆	云南会馆	江南会馆	河南会馆	山西会馆	广西会馆	燕鲁公所
成都	182 100%	47 25.82	24 13.19	49 26.29	18 9.90	25 13.78	7 3.84	1 0.54	5 2.74	2 1.10	2 1.10	1 0.54	1 0.54
川东	156 100%	81 51.92	9 5.77	34 21.80	13 8.33	12 7.69	2 1.28		4 2.56		1 0.64		
川中	324 100%	126 38.89	59 18.20	78 24.07	28 8.64	21 6.48	11 3.40					1 0.31	
川西	58 100%	14 24.14	6 10.34	13 22.4	3 5.17	18 31.03	2 3.48				2 3.48		
川北	212 100%	57 26.89	39 18.40	29 13.68	11 5.10	70 33.02	4 1.89		1 0.47			1 0.47	
川南	374 100%	129 34.50	81 21.65	93 24.87	39 9.42	18 4.81	12 3.32	1 0.27	1 0.27				
川西南	94 100%	23 24.47	24 25.43	24 25.53	4 4.62	5 5.32	11 1.70	3 3.19					
总计	1400 100%	477 34.07	242 7.92	320 22.86	116 8.29	169 2.07	49 3.05	5 0.36	11 0.79	9 0.14	6 0.43	2 0.14	1 0.07

(引自蓝勇《西南历史地理文化》)

### 第三节 摩崖石窟与摩崖寺庙

“……四川之汉阙、崖墓，与梁以来之摩崖造像，实为我国文化史重要之遗迹。其中后者数量尤多，分布亦广。”

——刘敦桢《刘敦桢文集》三

“宗教毕竟自是现实的麻药，天上到底是人间的折射”

——李泽厚《美的历程》

摩崖石窟是佛教传入我国以后的一种艺术类型。它以摩崖造像为主，附以相关之主题的一种带有浓烈宗教色彩的既是“雕塑”又是“建筑”的特殊艺术类型。摩崖石窟的出现总体来看与佛教的传入、兴盛和黯淡是合拍的，起于东汉，兴于南北朝至唐而败于元之后。——敦煌、云冈、龙门石窟都是起于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摩崖造像群。然宋之后的西南地区，尤其在西南的四川，却有着数量惊人的摩崖石窟在建造，今日依然有大量存留——这些石窟不仅在造像的体量上，在造像的内容、题材上都比以往的石窟有一定的突破<sup>[2]</sup>，其中尤以大足县的摩崖石窟群为著名。“南方地区的石窟建筑主要集中于四川。据统计，该省窟龛在十个以上的石窟就有124处，其中唐和唐以前的63处。”<sup>[3]</sup>这是有其深刻背景的。一方面与历史的发展因缘有关：自唐以降，中唐之乱后“唐衣冠上族多避难于蜀”，不少高僧、名士、手艺人迁居巴蜀，由此北方文化艺术对巴蜀文化进行了大融合，这样使得巴蜀之地的摩崖造像在中唐以后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创作了大量令人叹为观止的摩崖造像精品。另一方面与西南多山地的特殊地理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营造条件颇有关联。

#### 一、从石窟到寺庙的空间形制演变

大体来看，摩崖石窟的形成经历了从石窟到寺庙的空间形制演变。早期的石窟源于僧侣修行时的石窟，梵语“毗诃罗”。“它的中央是方形或长方形的讲堂，左右两侧和正面开凿很多小型石室，约‘一丈见方’的面积，每室只能容纳一僧住在里面坐禅修行。”“‘支提’式塔传入中国后，发展成为石窟寺。只是中国的僧侣……没有在石窟中苦修的传统。因此中国的石窟很小，没有集中讲经的讲堂，而是在洞窟的前面或旁边另建寺院，作为僧侣居住和集会的场所，原来窟内后部的塔也发展为塔柱或中心柱。”<sup>[4]</sup>也就是说，支提窟传到中国形成了中心塔柱式的石窟，这种石窟大致有三类：一类是典型的保留有印度支提窟模式影响的新疆克孜尔石窟为代表。一类是以云冈石窟为代表的方形平面空间，塔柱立中间，窟顶多平置，体现更多中国化倾向的石窟。另一类则是介于前两者之间的敦煌石窟为代表，带有前室和后室<sup>[5]</sup>。这三种类别也体现佛教在中国境内东传过程中本土特征减弱，地域特征增强的特点。

再往后的发展，塔心柱逐渐改为佛座的窟洞渐多。初唐盛行前后二室，前室供信徒们朝拜，后室供奉佛像。随着佛教民间信仰的普及，盛唐以后将二者合一的居多，改为单一的大空间平面，后壁凿佛龛容纳佛像，使得空间更为开阔和完整，以容纳佛徒礼仪和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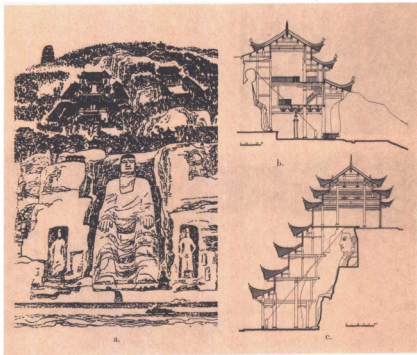
俗弟子供奉香火的活动,形制如同寺庙佛殿。龙门石窟中的最大一窟,奉先寺就是属于这种类型。窟壁上凿有方正梁眼,可见现存“卢舍那大佛”外围原来必建有木构建筑,属于早期的摩崖寺庙。(图4-3-1)这种摩崖寺庙的形态在西南地区大量存在,包括了著名的乐山凌云寺大佛,潼南大佛寺以及合川涪滩二佛寺等等。(图4-3-2)

摩崖寺庙之后的发展呈现出强烈的空间分异性。超大尺度的摩崖寺庙室内空间依然无法容纳越来越多的信徒的活动要求,因此形成了在天然崖面上造浅龛或直接凿造像而不开洞窟的造像形式——摩崖造像,将室内的活动空间完全室外化,也有人将形成的空间称之为摩崖式的开敞空间。“摩崖空间(摩崖造像)日照光线充足,便于利用大面积崖面,雕刻铺叙佛经中所说的故事情节,同时,可能容纳成千上万世俗信徒,沿着造像的布局路线,往来礼拜和远近观赏。”<sup>[31]</sup>——该种形式属于摩崖石窟的后期形式,在西南地区却有着最广泛的存在,它与摩崖寺庙一起共同成为西南地区摩崖石窟这一艺术类型中最为典型的特征。这与摩崖石窟后期的发展中心由北而南迁移不无关系。

图4-3-1 龙门石窟  
卢舍那大佛



图4-3-2 a.乐山大佛  
b.合川涪滩二佛寺剖面  
c.潼南大佛寺剖面 (采  
自重庆建筑大学建  
筑规划学院测绘资  
料)



## 二、摩崖石窟与摩崖寺庙的分布路线

佛教在西南地区的传播来自三个方向,北来的中原佛教,南来的上部座佛教以及西来的藏传佛教。<sup>[2]</sup>从现有的资料看,藏传佛教对于摩崖石窟的影响似乎不大,在此暂且不论。“从石窟的整体分布看,它与佛教传入中国的路线基本一致,是自西而东,自北而南,是沿着古“丝绸之路”,由新疆经甘肃,宁夏到陕西、山西、河北、辽宁、山东、河南,然后再经四川向南发展。”<sup>[3]</sup>这是从佛教北传的路线。北来的中原佛教影响,也是沿着第一部分提到的“文化交流的走廊”而传播的<sup>[4]</sup>,离不开“四通八达的江河水系”以及因为战争、贸易需求而开拓的一些道路。摩崖石窟与摩崖寺庙的分布同样也是基于此。“石窟造像沿着金牛道、米仓道、阴平道等主要交通路线向川中腹地传播,以处于军事、交通、经济上重要

地位的州、郡为重点,再扩展到附近的各县区。至唐宋……形成了东至忠县、南至宜宾、昭觉,西致邛崃、茂汶,北至广元、通江的石窟造像网络。”<sup>[5]</sup>另外,又有“佛教东传中,还有经缅甸、越南而进入中国云、贵、川的南传路线。现在云南地区的石钟山、金华山、晋宁、洛阳山等石窟与四川境内的梓潼、乐山、夹江、荣县、安岳、大足,以及广元、巴中等众多的石窟形成一片,与北线汇合于古时的汉中地区。”<sup>[6]</sup>(图4-3-3)

南北朝时期,西南地区的石窟寺造像大多集中在川北的广元地区。“研究表明,广元石窟是巴蜀地区开凿最早的石窟群,它的开凿为隋唐以后的巴蜀地区石窟造像的传播乃至繁荣准备了条件,而且其造像风格明显带有北方地区同时期石窟造像的特点”<sup>[7]</sup>。作为北传的中原佛教在西南地区的有明显印迹的传播点,广元的摩崖石窟同样也体现了文化传播过程中在空间距离上的变化。

图4-3-3 川北地区的  
国中大佛和宋代  
石刻



### 三、摩崖石窟与摩崖寺庙的特点

以现实胜：“在宗教雕塑里，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异，有各种不同的审美标准和美的理想。概括说来，大体可划为三种：即魏、唐、宋。一以理想胜（魏），一以现实胜（宋），一以二者结合胜（唐）。它们美的标准不同。”<sup>[18]</sup>摩崖造像就全国范围来看，唐宋之后在中原地区迅速衰弱，而在偏西南隅的四川地区大加兴盛起来。作为已经纳入全国经济政治文化网络的四川、云南地区，宋及宋之后“以现实胜”的审美标准强烈地体现在摩崖石窟的艺术处理上。

以著名的“大足石窟”为例，宝顶大佛湾的摩崖造像中大规模地出现了反映现实生活的造像，这些造像似乎是与宗教无关的世俗生活的再现，充满了浓厚的人间烟火场面。“它们表现了对真正的现实世俗生活的同一意兴。它的重要意义在于：人世的生活战胜了天国的信仰，艺术的形象超过了宗教的教义。”<sup>[19]</sup>——“且不说《地狱变相》中“养鸡女”养鸡的动作神态，“饮酒人”醉后的昏乱情景，以及《大方广佛报恩经变相》中六师外道手舞足蹈，独奏横笛的民间歌舞场面，单就《父母恩重经变相》图中佛前求子、怀胎守护、临产受苦、生子忘忧、哺乳小孩、母子同睡、咽苦吐甘、婚娶宴会、送别教诲等一系列养育儿子的场景的表现来看，或者仅就《牧牛图》中溪泉潺潺、流水淙淙，仙鹤伫立、牧人放牧这种山水美景和劳动者辛勤劳作融为一体的牧牛场面来看，都是把当时人们喜闻乐见的生活情趣融入了宗教艺术之中，从而使它们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成为大足石窟世俗化作品的典范。”<sup>[20]</sup>（图4-3-4）

图 4-3-4 大足石窟  
经殿

·大佛造像以及由此形成的摩崖寺庙居多：大佛造像并不是西南或者中国摩崖石窟艺术所特有的。从阿富汗的“巴米扬”石窟大佛可知这种大佛造像早已有之：通过天然的山丘岩体雕凿巨型的佛像，夸大佛像的尺度，以此达到震慑心灵的作用。中原地区的大佛造像以中唐雕凿的云冈石窟第20窟一奉先寺卢舍那大佛最为典型。这种故意夸大主体艺术形象，附于其他较小的、次要的人物的做法，在相关艺术门类中也多有体现，比如壁画与国画等这种艺术处理手法随着审美标准的变化，唐之后在中原地区已经逐渐消失。以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为例，张择端在其中所描绘的就是纯粹的一幅市井生活图，是以“现实”胜。然而这种大佛造像艺术处理手法在西南地区陆续还有所开凿，如著名的大足宝顶卧佛、荣县大佛、合川涪滩大佛、阆中大佛、威远大佛等都开凿于宋代，并由此形成摩崖寺庙。如上文所言，这一方面与佛教中心南移，而且西南地区原来主导的道教势力渐微，佛教日盛有关。另一方面与西南多山地有关。

从类型上看，大佛造像大致有两类。一类是以某一单一大型佛像为主以及由此发展出来的相关内容。比如乐山凌云寺大佛、荣县大佛寺、潼南大佛寺以及江津大佛寺等。另一类则是道场造像，即以多佛为中心的有



组织和整体规划的大型造像群。这种类型以合川涪滩二佛寺和大足宝顶佛湾为主。下表附巴蜀地区主要的大佛造像及其寺庙佛殿。<sup>[4]</sup>

巴蜀地区主要的大佛造像及其寺庙佛殿

摩崖佛寺及梯殿	所在地	造像题材	像高	摩崖佛殿规模形制	始、就年代	主持修建者
乐山凌云寺大像阁	四川乐山	弥勒坐像	71米	13层楼阁(已毁)	像始建于唐开元初(713),成于公元803年,之后并建大像阁	僧海通募造
荣县大佛寺大佛阁	四川荣县	释迦牟尼坐像	36.67米	初为10层楼阁(现为4层楼阁)	像始凿北宋元丰八年(1085),成于元祐七年(1092)之后并建大像阁	僧德淳募修
潼南大佛寺大佛殿	重庆潼南县	释迦牟尼坐像,又名八丈金仙	18.43米	初为5层楼阁(现为7檐歇山)	像始建于唐咸通年间(860-874),成于北宋靖康元年(1126),次年建殿(1127)	道士王了知完成
合川涪滩二佛寺下殿	重庆合川市涪滩镇	禅宗道场	12.5米	3檐歇山	南宋	不详
大足宝顶大悲阁	重庆大足县宝顶	密宗道场千手观音	7.2米	重檐歇山	像始建于南宋淳熙元年至淳祐年间(1174-1252)清代建大悲阁	僧赵智凤主持
江津石门大佛寺大佛阁	重庆江津市石门场	观音坐像	13.5米	7檐歇山	明代	不详

四川主要大佛分布表

俗名	姿态	佛名	高(长)度(米)	建造年代
乐山大佛	坐	弥勒	71	唐开元
荣县大佛	坐	释迦	36.67	宋元丰
控南大佛	卧	释迦	36	民国
屏山大佛	立	释迦	32	明
大足卧佛	卧	释迦	31	宋
安岳卧佛	卧	释迦	23	唐开元
江津大佛	坐	毗卢	23	明
资阳大佛	坐	弥勒	21.4	唐贞元
造南大佛	坐	弥勒	18	唐咸通
南部大佛	立	释迦	17.5	晚唐
仁寿高家大佛	坐	弥勒	15.85	唐开元
仁寿太乙大佛	坐		15	明
资阳大佛	坐		13	唐
乐至大佛	卧	释迦	12.6	唐
合川大佛	坐	释迦	12.5	唐
仁寿牛角寨摩崖佛	坐	弥勒	12	
威远大佛	立	阿弥陀	11.82	宋
合川钓鱼大佛	卧	释迦	11	宋
阆中大佛	坐	释迦	9.88	宋

资料来源:袁庭栋《巴蜀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底

·摩崖造像为主;从支提窟模样到中心塔心柱石窟,摩崖寺庙到晚期的直接在摩崖上造像,虽然这几种摩崖石窟类型在西南大都所有存留,但其中以摩崖造像为主,这与佛教在西南地区的兴盛时间有关。摩崖造像的龕都较浅,无深入的窟洞,基本上属于浅浮雕造像。随着佛教及其佛教艺术的进一步中国化,摩崖造像这一艺术形式在佛教艺术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宋代及宋之后石窟造像的主要形式。大足以宝顶大佛湾为其代表。“此处石窟除‘毗卢道场’和‘圆觉道场’两窟外,其余造像全部开凿在长达五百米,崖高十余米的岩面上,并直接利用崖沿覆盖雕像。这样处理的结果,一是几乎使大佛湾所有造像都裸露在外,与山崖连成一气,在直观上就给人一种宏伟壮丽的博大气势,似雕刻家们‘以苍天为室,以大地为纸’绘制出的巨幅历史长卷画。二是由于雕像依岩开凿,因势而建,故不受光线、地形的制约,具有一定的随意性;便于题材的展开和内容的连贯。这一点,正是宝顶大佛湾石窟能形成诸多特征的首要因素。”(图4-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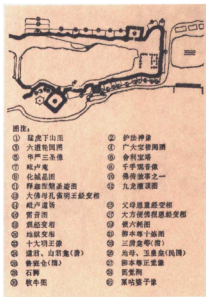


图4-3-5 “苍天为室,大地为纸”的大足石刻 引自黎方银《大足石窟艺术》

## 第四节 山地交通与码头文化

西南多山地的复杂地理空间带来了交通方式的多元性,而随着时代技术的不断发展,交通的方式也在不断地更新替换。由于西南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除了远古时期的栈道外,其他的交通方式在西南的各个地区还有留存。这里所指的山地交通包括了两个方面,即方式与工具。这其中包括了陆路中驿道、全靠畜力的马帮、人力的背篓、水路中的溜索、羊桥、廊桥、船运等等。“马帮”和“背篓”在今天的川西滇西等山高谷深的地区还广泛地使用着。(图4-4-1)而关于“背篓”,在早年英国传教士伯格里从重庆到云南的日记中有一段很形象的记录。

“有许多身背一百多磅铜的苦力经过。一些十二和十三岁的男孩子背负重载,艰难地行走。他们休息的一种方式是用根丁字形的木杖——T一停下来时曲背把自己的重载放在木杖上。路真让人胆寒,滑得厉害。今天走了七十五里。”

(第二天)

我与一个背着重载的男孩子相遇。

“你要去哪里?”——“老鸦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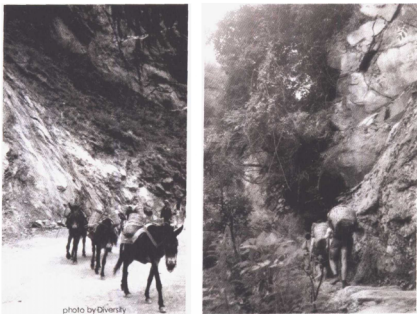


图 4-4-1 “马帮”和“背篓”

“你从哪里来?”——“王场。”

“在路上你要走多少天?”——“六到七天。”(到老鸦滩要用三天多的时间)

“你背了多重的东西?”——“一百二十多磅。”

“这一趟你能挣多少钱?”——“六百六十文钱。”

“你多大年纪了?”——“十三岁。”

……那个小家伙走不上几步就耗尽力气,要停下来歇歇脚,然后再走几步,再停下来喘喘气。而有些男子的负荷则不会下于一百八十磅。”<sup>[4]</sup>

从伯格里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在西南旅行的艰难,物资的交流更是困难。经过长期与自然的调适,西南诸民族创造出了各种各样的克服不利条件的交通方式,开辟了主要城镇之间的驿道,加速了人们之间的沟通,早期开辟的道路尤以“西南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为著名。<sup>[4]</sup>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西南与东部的联系加强以及川中水路网络的四通八达,“船运”在西南的东部逐渐成为主要的一种交通方式,并由此形成了沿江普遍而独特的文化现象——码头文化。

## 一、从“水驿”到“码头”

码头的出现首先是一种经济现象。早期由于商品经济的不发达,水路交通通常以旅客航行为主,称之为“水驿”。史载成都江陵水道,“至元十五年(1278),元建国不久,便‘立川蜀水驿,自叙州达荆南府。’据《经世大典》载,元初重庆到荆南共二千里,水驿 14 个,后因‘其间多阙站’,便增设到 19 个;后来又增设了巫山县一站,归州万流站一站,共 21 站,合 2001 户,船 212 艘。

《折津志》载有成都到重庆的川江水路如下:成都、广都、安平、龙山、眉州、鱼凤、青



神、峰门、牟差、喜定、越坝、净江、三圣、犍为、月波峰、宣化、真溪、喝口、叙州、江安、泸州、石门、重庆……以上合计 23 站。”<sup>44</sup>

自明清以来，商品交换有了很大的发展，加之水路交通在当时成为最高效率的运输方式直接导致了水码头的蓬勃兴旺。水码头多在原来的“水驿”基础上扩大发展而来，或更据需求开拓新的码头位置。物资的交流加速了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繁荣又推动了城镇的建设。小城镇通常由少数码头为主发展起来，大规模的城镇由于是物资的集散中心，往往拥有多个不同性质的行业码头。自贡地区产盐，制盐业及相关的行业极为发达。水路交通成为当时运盐的最主要方式，釜溪河上曾经百舸争流，王爷庙前千帆密布，形成蔚为壮观的景象。

重庆是长江上重要的一个物质集散地，大量进来、出去的物流、人流、信息流往往就是通过“码头”这一特定的场所传播、扩散出去。重庆地处两江（嘉陵江、长江）汇合之处，码头密布，形成了各种性质的行业码头。（图 4-4-2）其中尤其以两江汇合处的朝天门码头

图 4-4-2 民国时期  
地图记录的各种码头



最为壮观和气势宏大。朝天门码头地理位置独特,位于重庆市半岛尖端,是典型的山地岬角半岛型开敞空间,历来为城市的水上大门与重要口岸,是旧重庆“迎官接圣”之处(“朝天”一名由此而来),朝天门襟带长江、嘉陵两江,原有两排大石梯比肩而上,气势磅礴,大有“朝天”之势,空间极富张力,而且原有古城墙萦回其中,更有黄槐树附壁高悬,荫及一方,是一个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交汇区。(图 4-4-3)另外,重庆山地地貌复杂,修建码头比起平原城市更为困难,史料也有颇多记载。(图 4-4-4)

图 4-4-3 昔日朝天门码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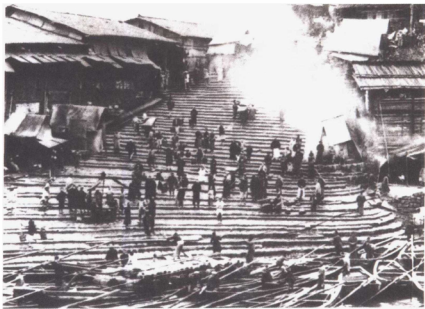


图 4-4-4 民国《巴县志》载重庆各码头的修建情况

共長四百尺寬五十尺自一十一年三月開工至四月完成	千廟門碼頭共長二百八十餘尺寬五十尺平臺三石	梯二左方至二面廟街梯級加寬為十六尺計平臺三	右梯三右方特開挑水道自十九年七月興工至十月完成	飛渡碼頭由南區幹路與舊洞起遠達面西經機官廟	遠大江邊經兩廟飛渡碼頭山勢陡峭由懸崖至深潭	高差約為一百八十尺水平距離約長三百五十尺作	梯級三梯碼頭定寬度為十六尺板地勢陡起石欄保	坎工皆須共開二千八百餘方梯內設有階溝而作十	尺梯級左右以三尺餘地植樹共造梯三百有四百步設	平臺四架安大暗溝一道三尺五寸經面洞一用以街	後南區幹路所出水自二十四年二月興工十一月完	成	金紫廟頭為金紫支路與南城第一主幹經路交點因	經路開工建築特將碼頭同時興造按原定計畫寬度	為四十尺長度為一百三十六尺自二十四年三月開	工至四月完成	儲奇碼頭為集運貨物起卸之地且當川黔交通孔道	舊碼頭上半段既狹且破遂乃由碼頭第一平臺起將	路拓開為三十尺至六十尺從前舊城一遺悉折毀舊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码头”的败落与更新

某种建筑类型的发源、存在、发展、繁盛而至衰败是和其所处的社会生活环境紧密相关的。社会需要什么,这种建筑类型就会应运而生;当环境变化了,社会生活对于该种建筑类型不再需要了,那么它就将逐渐消失,新的建筑类型随之产生。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建筑记载了历史”。上文的移民会馆、摩崖石刻以及水码头都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而产生、繁盛、衰败。

码头的衰败是伴随着陆路交通的兴盛、水路的衰退产生的。物质、信息、人流流动方式的改变对于城市、城镇的空间结构发展模式有着相当大的影响。水路交通导致城镇的空间发展通常是由城市边缘至城市中心,而且形成了以“码头”为中心的一种点线结构;陆路则相反,通常是由中心至边缘。陆路交通的兴盛使得城市空间重心转移,导致了水码头及其周围地区的败落,并逐渐沦为城市的贫民窟。这种现象在重庆地区颇为普遍。下文将以重庆两个较有特色的码头为例(即磁器口和临江门码头),通过案例的研究表达笔者对于城市空间演变过程中的一些思考。

## 三、案例简析

### 1. 建筑类型学分析在古镇磁器口改造中的应用

和其他所有的码头一样,磁器口码头曾经因水运的兴旺而繁盛。现代社会环境的变迁使得磁器口变成一个因与外界联系不便而经济凋零的片区。公路的建设,水运的凋落导致码头经济的黯淡。可以说是磁器口的更新属于典型的产业变更导致城镇建设疲软的案例。更新“古镇”往往需要多学科,多部门的共同参与,从古镇的产业结构、与周边地区的关系、交通网络的设置以及结合现代生活对于古镇风貌的塑造,对于古镇空间结构的改造等一系列问题入手,才能有所起效,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保护和更新。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在此仅简要介绍建筑类型学分析在古镇更新中的应用。阿尔托·罗西认为:“类型并不意味着事物形象的抄袭和完美的模仿,而是意味着某一种因素的观念,这种观念本身即是形成模型的法则。模型就其艺术的实践范围来说是事物的原原本本的重复,而类型则是人们据此能划出多种绝不完全相似的作品概念……因此,类型所模拟的总是情感和精神所认可的事物”。——通过类型元素的收集、分析、抽象、提炼,有助于从更深层面了解特定地域场所的建筑特性,认识特定片区的各种建筑空间形态、空间语汇、色彩、材料、建筑样式等,使得设计者在进行规划或方案设计时有所依据,而不至于凭空想象。(图4-4-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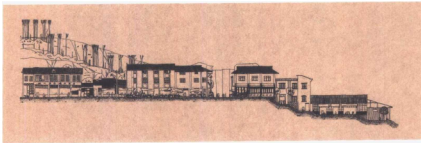


图4-4-5 磁器口正街立面测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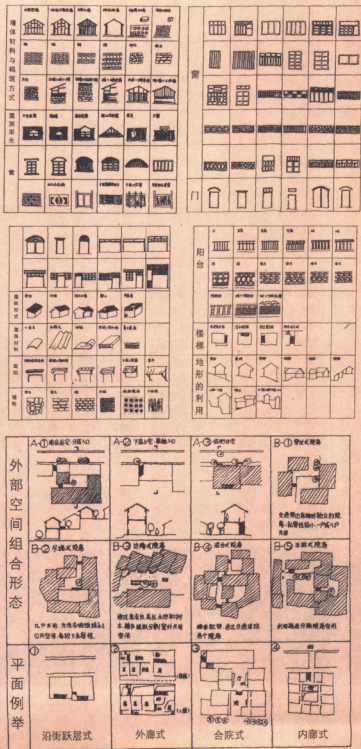


图 4-4-6 磁器口古镇建筑的各种类型分析

## 2. 重庆临江门旧城片区改造案

重庆临江门位于市区西北边,北临嘉陵江,地形坡度大。地块狭长,历史上曾因水运发达而兴盛,成为水手、船工、商贾聚居之地。解放后随道路交通的发展和航运消退,该地区已衰落,成了重庆市“著名”的一个贫民区;(图4-4-7)然而,因该区民居形式及街巷布置基本保持了四五十年前的形式,同时也是重庆市比较敏感的一块“传统保护区”。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准的提高,这一“贫民窟”已难以满足社会需求,急需拆迁和开发。然而,又如何来面对这承重的历史包袱呢?所有的这些现状构成了这块开发区的矛盾因子;制约中包含着巨大的可掘潜力。

因此,如何与边界条件契合,与周围大环境对话,如何对小环境扬长避短,如何重视和关注人的自身要求等等,这一系列自然环境、城市文脉、人性关怀的问题,成为设计本身的立足点和依据。

以下就从几点来阐述方案的构思。

“城市花园”:设计中针对原区域缺乏具有凝聚力的公共活动中心,建立了城市花园的概念。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方式的逐渐转变,人与人之间需要交流、接触,需要相互关怀。于是设计中把这一想法固定在了“城市花园”这种建筑形式上。城市干道为边界,电梯和岩崖为景观点,原有土地庙为核心,周围建筑为陪衬,绿化为点缀,人的出现为精华之笔,共同塑造了这一富有魅力的中心。小作坊、茶室、诊所、图书馆、小邮局等一系列的公共建筑设施为人们茶余饭后提供了良好去处。(图4-4-8)



图 4-4-7 临江门旧城片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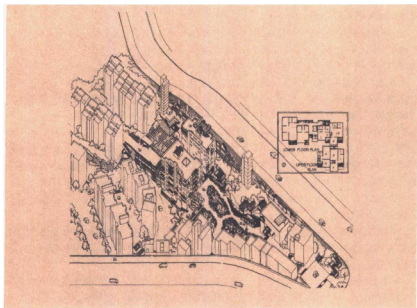


图 4-4-8 临江门改造设计案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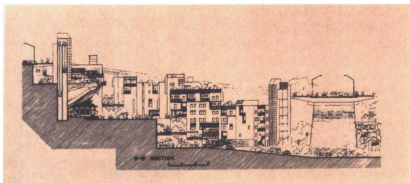


图 4-4-8 临江门改造设计案 b

“城市墙”：从新建的临江门高架桥俯视基地，一面长二三百米坚硬稳固的石头墙围绕之而为一强有力的界定面。从城市景观上而言，这面墙具有丰富的价值，可以说是此区的一个标志。这一特殊而敏感的区域既是一道难解的方解，但同时也为设计构思独辟蹊径。设计中以小尺度的传统式样的建筑为构图元素重新构筑了一面大写意的“墙”，既保留了原有部分的墙面，新因素的介入又使这气势宏伟的墙面充满了生机；作为外来人，他可明显地感受到新与旧的并存，感受到过去、现在一种和谐的对话。同时，它又为原有拆迁户提供就业机会，沿袭了原有住户依靠自家房屋而谋生的生活方式，使其成为以良好的商业步行街，一个充满传统气息，亲切、轻松的商业步行带。

“城市电梯”：当新事物介入环境时，它应能使环境质量有所提高或推动社区的更新。故设计中，首先考虑的是电梯能给此区带来什么。陡坡和大高差一直是这一区域经济发展滞后的重要客观因素。由于山地交通的不便，使这里的人们丧失了许多向外延伸的契机，失去了活力和富裕的机会。因此，方案中在小区的出入口设置三组标志性的电梯，每组电梯都联系着广场和绿地。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举：建筑形式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反映着社会状况、反映着社会对于人的关心程度。而作为建筑学，它的任务不单在于创造单体的形式，而更应体现对人的关怀和爱护；它的两个外在形式就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在这个区域里，人们的第一需求是生存，是谋生；如果设计中不解决这一问题，那么此区域必将畸形发展。为此，方案中设计了几种不同层次的居住带，提供给不同收入水准的居民，满足多种需求。沿街道周边和进出口的为低造价住宅。这部分住宅底层开辟为商店和其他共建设施，解决一部分的就业问题，特别是“城市墙”这两百多米长的商业带，上宅下店，既为老居民提供了居住和生活保障，同时又成为整个小区，甚至整个城市不可多得的展示面。靠近花园的住宅，具有良好的视线和安静的小环境，公共建设设施齐全，绿地面积大，故标准稍高……在保证可生存的前提下，促使各种不同收入层次的人居住在一起，是一个地区保持活力的条件，存在差异才能产生动力，才能推动整个区域的更新和发展。

另外，空间形态从开放空间、半私密空间到私密空间的这一变化过程也是方案中注重社会效益的举措之一；它符合人们行进流程中的心理程序，利于人们的居住和交往，也有助于社区的安全。

·类型学在旧城改造中的应用：人们对于自己所经历的环境形象和生活场所均有一定的心理沉淀。同一组别的大多数人对于环境的具体形象可能不尽相同。但它们必可抽

象,还原为“原型”。这成为设计中的一个依据。

调研过程中将这个区域的建筑形式、室内外空间、材料构造等进行提取归纳,使其条理化、明晰化,从单体屋顶、阳台、墙身到基底;从窗洞口比例、门的样式材质对比;从过渡空间、休息平台高差处理等。对于以后的设计有很大帮助,尤其是在抽象和分析中,对于传统建筑的感知也得以进一步深化。

设计中力图让传统建筑的片断,符号在新建筑中得到一种概念的记忆和强化,使这一区域能够反映过去的某些特征却又不乏现代气息。如新建筑单体的多种阳台形式,材质对比,垂直交通处交往空间的处理等等,均据于此——只有这样才能使新区尊重历史,面对现实,才能使之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特征。

## 第五节 小结

基于篇幅和研究的侧重点所限,本章选取了西南山地建筑文化的几个侧面(聚落、移民会馆、摩崖石刻与寺庙、码头文化等),对之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为的是更加清晰地勾勒出西南山地建筑文化的轮廓。“归纳”的方法基于大量案例的研究,因此更进一步的研究有待于对西南山地建筑更多方面的探讨,比如“西南道教与道教建筑”、“上部座佛教以及寺庙”、“山地地貌与寺观园林”以及西南地区多种多样的“墓葬方式及其建筑”等等,都是较有意义和价值的课题。只有从多个方面对西南山地建筑文化进行研究,并注重其间的联系,才有可能进一步弄清西南地域建筑文化的概貌。

[1] 刘敦桢:《刘敦桢文集》三,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 徐新建:《西南研究论》,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51-152页。

[3] 徐新建:《西南研究论》,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51-152页。

[4] 叶启桑:《四川藏族住宅》,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59页。

[5] 参见绪论部分。

[6] 徐新建:《西南研究论》,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68页。

[7] 徐新建:《西南研究论》,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69页。

[8] 参见第一章。

[9] 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

[10] 参见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9页。

[11] 斯心直:《西南民族建筑研究》,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81页。

[12] 梁庭望:《壮族民俗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页。

[13] 斯心直:《西南民族建筑研究》,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86-87页。

[14] 参见黄天琪、邹殿扬:《山地城镇空间结构演变的生态学控制》,山地城镇规划建设与环境生态,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0页。

[15] 详见第一章。

- [16]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10页。
- [17] 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07页。
- [18] 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16页。
- [19] 中国人民协商会议重庆市巴南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巴南文史资料》第13辑，第8页。
- [20] 江苏石刻，第166页。
- [21] 四川省文史馆：《成都城坊古迹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4页。
- [22] 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19页。
- [23] 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19页。
- [24] 参见第二章。
- [25] 重庆建筑大学硕士论文。
- [26] 《四川自赞：益》，第10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
- [27] 刘敦桢先生称之为“不仅数量之伙，令人惊异，其题材中且有他处未有之观经变相……俱为我国雕塑史中极罕见之资料”。见刘敦桢：《刘敦桢文集》三，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7年版，第348页。
- [28] 张步天：《中国历史文化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 [29] 罗哲文，黄彬：《漫谈塔的来源及演变》，《文史知识》86/10，87/5，88/6合刊，中华书局，第189页。
- [30] 参见黄河涛：《禅与中国艺术精神的嬗变》，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87页。
- [31] 黄河涛：《禅与中国艺术精神的嬗变》，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91页。
- [32][34][43] 参见第一章。
- [33] 黄河涛：《禅与中国艺术精神的嬗变》，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46页。
- [35] 郭璇：《巴蜀摩崖佛寺研究》，重庆大学硕士论文，2001年版，第7页。
- [36] 黎方银：《大足石窟艺术》，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 [37] 郭璇：《巴蜀摩崖佛寺研究》，重庆大学硕士论文，2001年版，第6页。
- [38] 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122页。
- [39] 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119页。
- [40] 黎方银：《大足石窟艺术》，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 [41] 转引自郭璇：《巴蜀摩崖佛寺研究》，重庆大学硕士论文，2001年版，第8页。
- [42] 转引自《伯格曼日记》。
- [44] 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中国西南地域建筑文化

第五章

地域技术与西南地域  
建筑文化

“如果能进一步弄清不同地区建筑文化的渊源,和各地区建筑文化发展的内在的,而非臆造的规律,比较它们相互之间的差异,研究其空间格局,这将不仅大大深化我们对中国建筑发展的整体认识,并进一步阐明其个性所在,加深对整体个性的理解,且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建筑的区域特色,从而培育具有地方特色的建筑学派,各逞风流,使中国建筑创作真正地实现和而不同,同中有异的繁盛局面”。

——吴良镛《江南建筑文化与地区建筑学》

## 第一节 地域主义批判

### 一、地域主义在中国

自从中国稳固的社会结构被打破之后,中国建筑界在建筑创作上似乎要努力保持一种中华文化的印记,尽管其中的缘由不同。从欧美诸国学成归来的建筑师尝试将中国传统的建筑语汇与西洋的形式美学以及新的社会功能结合起来,这就是“中国固有式”这种新的建筑形式的来源。这或许可以称之为“地域主义”的情结在中国的端倪。早期建筑师们的这种努力或许还表现出对于曾经有过“辉煌文化”的眷恋,一种自发的眷恋,而后来的诸多尝试,包括“社会主义”的形式、恢复“古都风貌”等,似乎更是一种政治运动或是政治口号下的行为,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建筑的畸形发展<sup>[1]</sup>。

建筑界在缺乏明确理论指导的情况下迎来了改革开放,在理论阵地毫无防守的情况下从西方舶来了“后现代理论”——一方面“后现代理论”与怀旧的情结、与过去的文化似乎有某种关联,另一方面它又将矛头指向了被指责为“千篇一律”的现代建筑,恰恰符合了当时人们心理上的需求,加上其手法的简单:剪取历史形式符号拼贴而成,因此很快就成为中国建筑界的热门话题,甚至比其本土发源地还要“深入人心”。然而激情过后,理智的人们很快就发现“后现代主义”的浅薄:要寻找建筑的发展道路,不能简单在形式语言上玩花样。“符号不仅成为简化历史的工具,而且对之肤浅的理解还造成时空上的错位。……如果说这些错乱的地域符号及其粉饰的场所有什么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它们与实际所处的环境特质并无关联。从大的范围看,这是地缘的混乱,从局部上看是真实场所的丧失。”<sup>[2]</sup>——这或许也可以称为“地域主义”的新一轮的尝试,或许由于其涉及的层面太浅无法纳入我们后来理解的“地域主义”范畴,仅能称之为“伪地域主义”,但是无论如何,经过“后现代理论”的传入、宣传、争论、批判这一过程,使人们有机会反思建筑的发展趋向。这是一个契机。

“后现代主义”之后可以说是一个理论的真空带,也可以说是充斥着各种未能占主导地位的五花八门的理论,更确切的说严重的理论滞后时期。由于理论无法指导现实的操作,在许多实际建成的房屋中出现了简单的复制、拷贝、模仿,其中以“欧陆风”为盛,刮遍大江南北。尽管新时代的建筑师中不乏个人追求,比如山东阙里宾舍、福建武夷山庄、广州越王墓博物馆、北京菊儿胡同等,但是从个人的努力到形成普遍“观念”还有相当长的路。

经过了不平坦的路,人们逐渐意识到建筑的形象不仅仅是表层形象,它还含有气候

的信息、地理的信息、技术的信息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的信息等等。建筑的创作要超越“形式”，了解形式背后的东西，基于这些信息而又回到形式。“我们重新提倡要首先了解建筑的本质，……我们要从沉醉与‘手法’、‘样式’、‘主义’中醒悟过来。”<sup>[3]</sup>——人们意识到不能以一种统一的模式、统一的语汇来解决所有的问题，要找到建筑的本质就必须回到最初的地方，从场所中的各种微妙气息中寻找建筑存在的依据。也就是说，人们希望、提倡“地域”的观念能够回到原本的位置。

这也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在不可避免的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人们更加关注文化的多元发展，开始学会对不同文化模式的尊重。地域主义作为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一种新的文化观出现在世界各地，并逐渐融入各地的地域文化创作之中。它再也不是一种模式或是一种流派，肯尼斯·弗兰普顿将建筑领域的这种力量称之为“批判的地域主义”，并归纳出其中的若干要点，即：对全球文明的抵抗、从泛文明走向亚文化、对现代主义的批判态度、重建场所与领域、统合文化与自然、复兴直接经验之价值等。<sup>[4]</sup>“地域化”成为各地文化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理论利器。

但是当以审视的眼光来观察现实的时候，就很难发现真正扎根于本土的、纯粹的地域建筑。这或许与文化背景的差异有关，或许与“地域文化”理解的差别有关，但更多的情况下可能还是与“文化的观念”尚未转变过来有关。在中国，要发展“地域文化”就必须改变文化的大一统观念，不能简单将某一种文化，或某一地区的文化特征来替代其他众多地区的文化面貌，正如不能将欧美建筑史当做世界建筑史，不能将合院式建筑当做中国所有传统建筑的特征。因此，要确实深入地域建筑文化的研究，从外围环境上看，首要的是要以一种“多元一体”的观念来看待“地域文化”与“大中华文化”的关系，既要注重整体的文化特征，又不能忽视地域文化的内质；从地域文化本身看，一方面则有必要真正深入了解地域文化的发生、发展、演变，了解地域文化的深层次内容，另一方面则必须从专业的层面系统了解传统地域建筑的技术内涵。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

## 二、技术：双刃剑

建筑文化的发展与建筑的营建技术息息相关。技术模式的变化往往是新的建筑文化、建筑形态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婚姻制度、生产生活方式、社会形态等很多影响建筑的内部布局，房间数量以及建筑的装饰装修形态，而技术的变化，更多的则是影响到材料的变化、具体构造形态的变化以及营建观念的变化（比如与自然的关系）等——从根本上改变了建筑的形态。这种变化自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的出现到二战结束的这一过程就可明显体现出来：西方社会的主流建筑文化从传统的古典建筑已彻底、完全地转至现代建筑。而就中国来看，最大的冲击不在清王朝的覆灭，不在国民党政权的败退，也不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于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而在于伴随着经济的开放带来的技术的盲目引进和遍地开花的应用。现代社会中对于文化“全球化”的担忧其根本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技术“全球化”所带来的。如何在不同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文化发展模式以及不同的地域生态背景中引入相应的技术模式已经成为现代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技术的双刃剑效应一方面通过现代化的传播媒介引导人们文化生活，……带来了许多新的空间和形式，并由此产生了技术美学、机器美学等美学思潮，……另一方面，泛技术化的倾向将大众直接引入到一种对技术力量的绝对依赖之中，使人的生存方式被限制在技术系统的领域内。在快节奏的城市现代生活中，人们都在紧张地忙碌着，高科技舍

量日益增加的生产手段将人和机器紧密联系起来,使人与人之间无眠沟通思想、交流感情,客观上把人“孤独”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因此,泛技术化时代……使技术等同于艺术,不同程度地削弱了艺术和审美的精神创造和情感体验。”<sup>[5]</sup>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不恰当的技术模式将带来难以消解的恶果,尤其是带来对传统文化的不加区分的践踏。“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全球化带来了人与传统地域空间的分离,地域文化的特色渐趋衰微;标准化的商品生产致使建筑环境趋同,设计平庸,建筑文化的多样性遭到扼杀。”<sup>[6]</sup>

正如上文所说,世界的文化是多元的文化,不能以一种文化的声音替代全世界各个文化的声音;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文化背景,不能以一种发展模式来解决各个地区的问题;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自然地理空间、历史文化传统,有自己的建筑文化和相应的建造技术,不能企图以一种技术方式来替代所有地区的建造技术。这就是地域化过程中必须关注的问题:如何面对经济、文化和技术上的大同。当在反思这一问题时,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值得深究,一个是与文化趋同相关的两个重要因素:“文化观念”与“技术模式”,另一个是对文化趋同的空间领域认识。

### 三、“文化观念”与“技术模式”

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文化观念”与“技术模式”是两个相辅相成的因素。观念的改变可能导致新的技术模式的生产或选用,而新的技术模式则有可能促使文化观念的转变。这种关系在建筑文化的发展中同样适用,因此在下文的论述中将包括引起环境关注、生态关怀的“文化观念”探讨以及互动影响下的“技术模式”类型的研究,作为西南地域建筑文化之参照。另外,不仅要认识到以欧美文化为主流的世界文化对于中国大地的影响——这是基于全球空间领域的视野来审视全球文化的格局变化,还要认识到中国本身的空间内不同的地域文化发展以及更深及不同地域内的文化趋同与差异,上文中已经一再强调——这是“内省”,也是目前人们所不太重视的却应该大加研究的。中华文化是整体的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文化。“整体”是对外的观念,“多元”是向内的观念,二者是辩证的统一;如果不认识“多元”就很难认识“整体”。关于这一点有待于我们更深一步的反思。

## 第二节 回归的路程

### ——生态关怀的“文化观念”

对于生态环境的危机认识最早总是起于生态学家、社会学家等的研究之中。由于有了他们对于社会问题的观察、研究、对策,才有了社会各个方面、各个部门的反应,由此获得大众群体的共识。下面我们有选择地介绍几位有代表性意义的学者以及相关的会议,回溯具有生态关怀与地域情结的“文化”观念的产生以及大众认识和接受的过程。

## 一、学者与论著

首先应该提到的是蕾切尔·卡森和她的《寂静的春天》。蕾切尔·卡森是一位科普作家,写了不少关于海洋与环境发展方面的文章。一次在朋友的信中提到后院花园的小鸟越来越少了,百花齐放的春天少了小鸟的声音。这个现象引起了她的注意。在1962年,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她出版了《寂静的春天》这本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著作。在这本书中,她着重描述了由于大面积使用如DDT这类带有毒性的杀虫剂对于生物链的巨大破坏,以及对人类自身健康的影响。DDT极难消解,在食物链中的积聚和沉淀对许多生物造成了伤害,客观上导致一些物种的灭绝。<sup>[7]</sup>这本书出版以后,在当时的社会上造成了巨大的波动,从政府官员、企业主到普通百姓都为之一惊。由于涉及到许多工业企业的利益,蕾切尔·卡森不仅受到严厉的指责,甚至还受到了人身攻击。但她以一个科学工作者的严谨态度,通过不断的调研取证,坚定了她的观点。

由于蕾切尔·卡森的努力,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1972年起,也就是蕾切尔·卡森发表的《寂静的春天》后的十年,许多国家开始禁用DDT。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曾经这样评价蕾切尔·卡森和她的这本书:《寂静的春天》播下了新行动主义的种子……它的出版应该被看成现代环境运动的肇始。

蕾切尔·卡森通过行动和社会舆论引起了人们对于环境的重视,而阿尔多·莱奥波尔德则创立了“大地伦理学”,重新认识了自然的价值。在1942年出版的《沙乡年鉴》中,莱奥波尔德提出了自己主要的观点:1.生态价值观。他认为人类也是大地众生中的一部分。在这个整体中,各类生物占有自己的生态位,并因以“天敌”的制约关系而保持着动态稳定的生态平衡。但由于人类的进化失去了“天敌”,也就失去了制衡人类对于自然的需求,不加限制的开发客观上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恶化。他提出,应该借助“大地伦理”使人类在从事经济活动的时候遵守基本的生态规律。“当我们把大地看做是我们所归属的共同体时,我们就会开始带着爱和尊敬去利用它”;2.生态化思维。他认为我们之所以破坏大地环境,就是因为完全按照自己的利益需求向大自然索要,使我们对自然的理解与认识局限在狭隘的视野,导致了对自然的资源化与工具化理解,而不把自己当做自然整体的一个部分,由此而伤害了人类生存的基础。他提出人类应该“像一座山那样思考”——把山体上的所有存在都理解成是整体性的不可分割的;3.生态伦理。作为生态价值观和生态思维的体现和必然要求,他认为人类应该明确建立一门超越传统伦理学的大地伦理学,“大地伦理学扩大社会的边界,包括土壤、水域、植物和动物或其他它们的集合:大地”,而且应确立一套新型的大地伦理规范,其基本原则是“当一切事物趋向于保持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时,它就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

莱奥波尔德的大地伦理观,“可以说是西方文明第一个在包括非自然实体和整体在内的道德观意义上保持并有系统地发展伦理学的自我良知……莱奥波尔德在自然价值回归的历程中肯定是最为重要的一站”。<sup>[8]</sup>

E.F.舒马赫在其著作《小即美:对经济学的评估》中提出“小的就是美好”的观点,最初强调的是反对经济社会活动及其权力的日益集中化。他认为在经济规模在不断扩大和经营决策权向少数超大型公司集中的过程中,使得普通生产者日益失去了自己参与经济活动的控制权,同时也造成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他的这一理论成为生态主义改造未来绿色社会的重要的建构准则。这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1.基本生产生活单位的小规模符合人性特征。只有在小规模小尺度的生产单位和生活社区中,才能激发和维持人们整体认

同感与自觉关心意识,才能够保证人们对自己全面生活权利的有效控制,从而促进人们之间的了解与合作;2.社会整体分布非集权化的分散特征。小规模必然导致整体的分散化特点。而其中的每一个部分在整体的条件下形成有区域特点的生产生存方式,各个社区在满足成员基本需求的同时,相互间平等交换物质与文化产品,共同分享文化。<sup>[9]</sup>

这两个方面的内容非常符合西南地域众多地区的情况。

在此基础上,舒马赫提出了“佛教经济学”的概念——即通过最佳消费方式获得最大限度满足。其中包含几个方面的内容:资源的使用方式、不同类型资源的利用以及资源的分布与利用等。舒马赫明确指出,人类应当适度使用资源来满足自己的需求,而不是无止境地开发、耗费资源;而且应该明确区分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资源,“非再生物质只有在必不可缺的情况下才使用,而且必须十分爱惜地使用,特别重视加以保护。”<sup>[10]</sup>;还有一点就是“用地方资源生产满足地方需要,是最合理的经济方式,而依靠远地进口,从而也需要为输出给遥远的陌生人而生产,是非常不经济的”<sup>[11]</sup>。关于这一点后来从生态系统的整体观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使用地方性材料,减少外来特殊物资的引入,有助于减少对原有生态系统的破坏。

舒马赫同时还引用了甘地关于“大量生产”和“大众生产”的论断,并在大众技术的基础上,针对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中间技术”的概念。所谓的“中间技术”指的是区别于高技术与低技术(传统技术)的一种技术模式,它的技术含量介于高技术与低技术之间,是一种适应于当地生产生活方式的技术模式。采用“中间技术”所需的投入,远低于采用高技术所需的高成本,而生产的效率却要远高于传统的技术模式。“这种中间技术与土技术(这种技术往往处于衰退的状况)相比,生产率高得多,与现代工业的资本高度密集和高级技术相比要便宜得多。”<sup>[12]</sup>

舒马赫并不认为“中间技术”放之四海而皆准,也不反对现代工业技术的应用,但是他强调“中间技术”适宜于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场合。另外,形成“中间技术”有三个方面的来源:一是对于传统技术的改进;二是对于先进技术的改造,调整;三是进行实验和研究,直接服务于建立中间技术。因此中间技术无所谓先进或落后,它是一种适宜于地域的技术模式,因此中间技术的概念与后来的适用技术的概念有一定的交叉。

舒马赫的“小的就是美好”以及“中间技术”的观点不仅对于发展中国家有较大的影响,对于后来欧洲的绿色组织也有很大的影响,成为了它们的基本信条之一。

还有一个应该提及的是我国的马寅初先生。陷入环境恶化困境的最根本原因是人口的增长与有限资源之间的矛盾。马寅初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在其《新人口论》中,他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我国人口问题的性质、表现形式和解决的办法。提出了我国存在着人口问题的崭新观点:1.人口基数大2.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高,3.人口增长太快,4.我国人口质量低,身体素质较差,平均文化程度也较低,5.我国经济底子薄,人均各项经济指标低,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人口与经济的种种矛盾与问题。种种问题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对于社会文化的建设都存在着巨大的滞后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马寅初先生的观点不仅没有受到采纳,而且受到了不应有的指责。一直到70年代,中国才开始广泛开展“计划生育”的工作,卓有成效。如果将蕾切尔·卡森和她的《寂静的春天》看成现代环境运动的肇始,那么马寅初先生则可以认为是中国关注现代环境的第一人。

从“生态意识”到形成一种“生态价值观”事实上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上文提到的几位学者的努力只是回归路上的前脚印。随着人们认识的加深,有人提出“生态主义价值观”,也称之为“深层生态观”或“盖娅主义”。其中包含有众多人的努力,如阿诺德·汤因比及其《对生命的选择》;弗里乔夫·卡普拉及其《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转折点:科学、社

会,兴起中的新文化”等;彼德·拉塞尔以及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等等。<sup>[13]</sup>

## 二、报告与会议

另外简单回顾与环境发展相关的一些报告、会议。之所以提及它们是因为形成了报告、会议、组织,说明了人们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共识,这是长期努力的结果,也表明了一种动向。

### 《为了生存的蓝图》

首先应该提到的是1972年生态主义者撰写的研究报告《为了生存的蓝图》。它明确指出了未来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基于基本需求和价值观变革的节约型的“稳定社会”。这一社会有四个基本条件:1.生态过程的最小破坏,2.物质能源的最大保护,3.稳定的人口规模,4.个体由衷赞同而不是感觉受限于以上三个条件的社会体制。<sup>[14]</sup>《为了生存的蓝图》中提出的这几条原则由于具有深刻的生态意识而成为绿色组织、绿色政党等的理论基础。

### 《人类环境宣言》

1972年瑞典斯德哥尔摩联合国大会提出“可持续发展”议案经过30多年普及发展,如今已被全球众多国家接受,成为各行各业运作的指导原则。“为了这一代和将来世代代的利益,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其中包括空气、水、土地、植物和动物,特别是自然生态中具有代表性的标本,必须通过周密计划或适当管理加以保护”。<sup>[15]</sup>

其他的会议还包括《共同的未来》、《21世纪议程》以及1992年里约热内卢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等。

建筑的回应,通常在世界建协大会中的共同宪章以及小范围内的建筑组织的共同协定中得到体现。比如《马丘比丘宪章》、《北京宪章》以及欧洲地区的《太阳能在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中的应用》等。这些文件中的内容往往体现了社会大环境下的影响以及建筑师对于社会问题的反思。

## 第三节 绿色通道:生态观念影响下的技术模式

上文我们提到了诸多学者对于环境的关注,相关的报告、会议以及组织。环境的危机通过学者、政府、大众等的共同努力,形成了具有生态关怀与地域情结的“文化观念”。这种观念逐渐在各行各业形成了影响,反过来又强化了它的作用。但是对于人类的未来,对于其中的核心问题——人类未来命运,又明显地存在两种不同的声音:即增长有极限论与增长无极限论。

### 一、增长极限论与建筑技术模式的选择

增长有极限论以西蒙的《没有极限的增长》、泽伊的《擒获未来》、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等为代表,认为通过技术的进步可以解决环境问题,通过技术手段的不断

增长无限论以著名的罗马俱乐部报告《增长的极限》为代表,包括康芒纳的《封闭的循环》、米都斯等为代表,他们认为“世界末日”是客观存在的,应该采用控制增长的手段,而不能一味强调技术的作用。该论点侧重于采用适宜的技术手段控制增长,保护与保存、合理利用地球现有生态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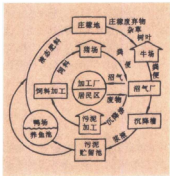
在增长极限论的影响下自然形成了两种相异的建筑设计观及其相应的技术模式。一种是在增长有极限论影响下的技术模式,这是一种“后观”的模式,侧重于传统模式、传统模式的改进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学习,从中获得建筑设计的形式语言、创作灵感等,倾向于利用低技术、中间技术和适宜技术等,强调合理利用地方性材料,从而实现对有限资源的合理配置,体现建筑设计的地域特色;另一种是在增长无限论影响下的技术模式,这是“前倾”的模式,它强调对于高技术的研究,通过技术的创新,提高建筑的使用效率,减少能源的损耗,重视“少费多用”的思想,从而实现对有限资源的高效利用,体现建筑设计的时代特色。在这两种思想的影响下,产生了相应的技术方式。

生态技术<sup>[8]</sup>、高技术、被动式技术与适用技术、中间技术等众多的技术概念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一方面是回应于具有生态关怀的文化观念,另一方面又因为不同的发展观产生诸多的技术模式。与人们已经意识到文化多样性对于世界文化的重要性一样,人们同样意识到了多样化、多层次的技术对于可持续发展的的重要性。在第二十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形成的共识——《北京宪章》中,对多样化的技术就作了充分的肯定。只有立足于营建技术的多样、多层次,才有建筑文化的“百花齐放”,也才有建筑形态的多姿多彩。从我国的建筑状况来看,建国以来,受苏联影响以及经济、技术条件的限制,建筑以“基本建造”要求为主要目的,技术手段单一,客观上导致建筑技术处理的简单化是造成建筑形式单一的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建筑业的发展和人们对环境的日益重视,形态与技术上的单一化趋势制约了各个不同地域的建筑特色保护和发展。

所谓的生态技术,指的是利用生态学的原理,从整体出发考虑问题,注意整个系统的优化,综合利用资源与能源,减少浪费和无谓的损耗,以较小的消耗获得较丰厚回报的一种技术手段。其目标近期看是获得资源与能源的合理利用,促进生存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远期目标则是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为“诗意栖居”这一理想努力。生态技术在各个行业的应用极为广泛。如工业生产中的生态工业,要求生产过程中输入的物质和能量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用,同时排出的废弃物最少,而且能够完全被自然界吸收、分解、利用。又如农业生产中的生态农场,利用生态学原理,提高太阳能的转化率,生物能的利用率 and 废弃物的再循环率,使农、林、牧、副、渔以及加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等都能获得发展。(图5-3-1)

图 5-3-1 生态农场  
中的物质循环





格(Thomas Herzog)为代表提出的《关于在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中应用太阳能的欧洲宪章》获得了广大欧洲建筑师的认同。这代表着建筑学回应于大环境的要求,向着“可持续发展”迈出了一大步。同时出版的《太阳能在建筑与城市规划中的应用》一书,充分体现了生态技术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

生态技术应用在建筑设计中,主要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类关注于建筑群体与之相关内容间的关系,另一类则在于探讨建筑本身的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 三、广义的建筑生态技术

第一种类型我们称之为广义的建筑生态技术——在充分了解自然的地形、地貌、气候条件、植被状况、生物分布、山川河流等的前提下,掌握人口的组成、活动规律、职业构成、交通状况等,使建筑的最终形成对于环境的影响最小(欧洲有些建筑师称之为 ZERO-EMISSION,即“零排放”),并有助于推动环境的建设。这种生态技术综合运用了规划、城市设计、建筑以及大地景观等学科的内容,并结合了其他门类(如人类学、社会学等)的相关知识。

广义的生态建筑技术事实上是一种整体观技术,它首先必须将建筑设计融入大的生态系统循环圈,从整体的角度考虑能源、资源等的流动,将城市与建筑使用过程中的消耗、产生纳入整个生态系统来考虑,从而改变以往资源与能源单向流动的方式,趋向良性循环的模式。其研究对象通常是大都市圈、城市与区域等范畴。清华大学吴良镛先生提出的“建立人居环境循环体系”,将人居环境的建设纳入动态的、生生不息的循环体系即是对广义生态技术的一种提倡;美国学者麦克哈格提出“设计结合自然”的观点也是基于对广义生态技术的运用。

### 四、针对建筑设计本身的生态技术

第二种建筑生态技术方式是针对建筑设计本身而言,从技术的含量、类型、产生的来源等来看,它可以明显分为着两种形式:其中一种便是人们常说的被动式生态技术方式;另一种则是高技生态技术。

#### 被动式生态技术

所谓建筑设计中的被动式生态技术是指建筑设计利用朝向、风向、日照、材料、建筑布局等取得与环境呼应,获得人所需要的使用环境;通过绿化、空间形式、光线的利用等产生较高的能源使用效率。我们在后文提及的西南地区内三种典型的传统建筑都大量使用了这种简单有效的技术手段。被动式设计技术在现代建筑中具有宽广的应用领域。20世纪70年代初,V.奥雅雅的《设计结合气候:建筑地方主义的生物气候研究》,概括了建筑设计与气候、地域关系研究的各种成果,提出“生物气候地方主义”的设计理论,是被动式生态技术的理论基础。埃及建筑师哈桑·法赛利用当地的材料、人力、当地的建筑形式与气候创造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建筑;印度建筑师查尔斯·柯里亚提出了“建筑遵循气候设计”的理论及其实践;保罗·索拉里至今仍在修建的“太阳城”以及三大著名事务所:福斯特事务所、赫尔佐格事务所和罗杰斯事务所联合设计的奥地利里芝——皮克林太阳城方案等均体现了被动式生态技术的重要价值。

事实上,传统建筑中蕴涵着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原则。它们往往利用朝南坡向获得更多日照;利用庭院式布局获得更良好的通风;利用长的挑檐减少雨水的侵蚀;利用支离

窗同时获得采光和通风……种种的处理方式使建筑和自然的关系更为协调,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感受到传统建筑惬意轻松的原因。这些利用建筑物自身形态、布局、朝向、空间关系以及采用地方材料等的处理方式是健康、自然建筑的被动式设计方法,是一种传统、简单而有效的设计方法。比如,中国北方四合院敞口大,平面布局水平舒展以便接纳更多冬日阳光;南方的四合院则敞口小且高,便于降低夏日热辐射,加大空气对流。新疆沙漠干旱地区建筑的外墙几乎没有洞口,通过严密的围护体阻隔与外界的热交流并通过通风塔来调节室内空气流动。1993年,在海口召开的“热带滨海城市塑造”国际研讨会中提出的模式化设计原则就是这种方法的一种体现:自然地形/重力排水/带状公园,为人而不是为车辆的淡水区/住宅多样化与功能多样化/不同建筑的共生/实用的私密·半私密院落/被动式节能技术/气流调节的建筑方法/蔽日设计与遮蔽式步行系数——种种的处理方式均是简单而又卓有成效的。

这种被动式设计方法需要建筑师对于大环境地理现状(气候、地形、地貌、风向、植被以及动物分布等)的了解,又需要建筑师对于小区域各个方面的充分感知。对于建筑师而言,则需要更为广博的知识面,需要拓宽知识领域,突破学科间的相互限制,综合应用整体性与系统性的思维方式。中国古人对于大地景观的深刻认识,对于四时气候变化的敏感是今日建筑师学习的榜样。

这种被动式设计方法,来自于对环境的关照,来自于对传统建筑的学习,然而对于现代的建筑设计,却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在维也纳,斯特德劳住宅群(Stadlau Housing Complexing)便是建筑师利用玻璃暖房和简单构造形式取得良好保温隔热效果的例子。在英国莱切斯特,索特与福特事务所(Short+Ford&Associates)设计的德·曼特福大学皇后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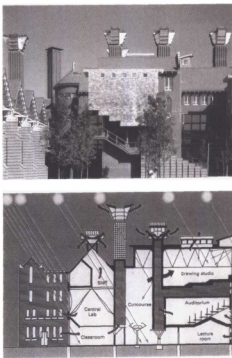
利用自然通风原理,将通风塔与建筑形式优美地结合起来,使建筑很大程度上减少对于人工能源的消耗(图5-3-2)。在墨西哥,墨西哥研究生院遵循炎热气候特点,将建筑的通风、空间形式、绿化、建筑遮阳等有机组合在一起,是利用自然能源的典例。

某种意义上说,被动式生态技术涵盖了相当部分的传统技术、低技术、中间技术、适宜技术等概念,是传统技术现代化的一种直接表达。对建筑师而言,根据当时当地的自然地理气候状况,结合现实生活,利用简单易用的技术进行设计,应是其创作的出发点。

#### 高技生态技术

所谓的建筑设计中的高技生态技术指的是建筑设计利用现代高科技手段、新型材料、构造与施工技术对建筑物物理性质(光线控制、温、湿度控制、通风控制、空气阻力分析、

图 5-3-2 德·曼特福大学皇后馆



建筑新材料特性等)进行最优配置,使建筑物最大限度、最大效率利用自然的能源。这种生态技术往往运用其他行业的技术成果(如航空和汽车工业技术手段、计算机软件、材料等),使建筑物具有时代前沿的特征。该设计方法往往需要建筑师把建筑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将其设计精确化、数量化、严密化;需要将建筑设计与建筑构造、建筑物理、计算机技术等紧密联系起来;需要关注于相关行业的技术动向。当汽车工业从关注于汽车的外型转向如何减少汽车阻力、减少废气对于环境的污染,有理由相信其中必有许多东西值得建筑师学习。近年来,欧洲的一些建筑师诸如托马斯·赫尔佐格(Thomas Herzog)、迈克尔·霍普金斯(Michael Hopkins)、皮阿诺(Renzo piano)等的作品均是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材料等使建筑对于不可再生能源的消耗少到最小并获得良好的人居环境,给了人们很多的启示。其中,英国建筑师格林纳姆的'92 西班牙 Seville 博览会英国展馆便是值得学习的优秀典例。(图 5-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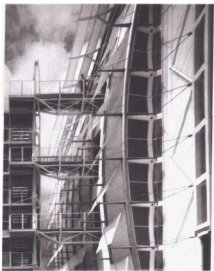


图 5-3-3 '92 西班牙 Seville 博览会英国展馆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建筑规模的巨量化,这种结合高新技术、材料、设备等的生态方法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除了运用被动式生态技术之外,由于现代建筑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的建筑更为宏伟巨大,容纳的空间也非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所能企及,这就更需要主动利用高、新技术手段来取得良好的活动环境。——巨型空间的支撑体系、维护结构、室内照明、温湿度以及通风等需要人们对于技术的掌握来解决。这是工业革命后新社会产生的新的建筑类型,出现的新问题,也是客观上导致对高技术研究、应用的社会因素。

关于高技术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首先应该提及的是美国富有传奇性色彩的人物——B.富勒。早在 1922 年富勒提出了“Ephemeralization”的概念,即使用较少的物资和能量,追求更出色效果的概念,也就是“少费多用”的思想。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富勒设计了 1927 年的 Dymaxion 住宅和 1967 年用“最少材料消耗建造最大容积的张拉杆件穹隆建筑”——蒙特利尔博览会美国馆。Dymaxion 住宅具有以下五个特点:一可大量建造费用低廉;二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机动性;三符合模数,便于生产安装和装配;四高效率,具有自洁能力和减轻使用者的家务劳动量的能力;五舒适,可以依据使用者需求重新划分平面。富勒的 Dymaxion 住宅以及后来的张拉杆件穹隆建筑科研说代表了高技生态技术的两个特点:“第一,贯彻‘少费多用’的思想:力争使用较少的原材料、能量和时间等,通过技术的发展和设计者的创造性劳动,创造出高效利用能源和物资材料的建筑;第二,具有一定的反地域倾向:……为了体现技术的发展和能对能量与物资材料的高效利用,……将地域的关注降到次一级的地位,……而调节特定气候与人体生物气候感受之间的矛盾,也是利用计算机、传感器等控制元件,依据外部气候条件的变化作出相应的反应”。<sup>[17]</sup>

高技术在二战后获得了巨大、快速的发展,对建筑设计同样也造成了冲击。甚至有人将建筑运营所需的设备作为建筑设计的造型语言,如蓬皮杜中心、劳埃德大厦等,可见影



图 5-3-4 关西国际航空港

响之大。高技生态技术在现代的大型公共建筑中越来越发挥其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伦佐·皮阿诺及其事务所(Renzo Piano Building Workshop)设计的关西国际航空港便是这种技术方式的典型体现。在挖山填海而成的 511h 人工岛上修建而成,关西国际航空港有着超尺度的建筑空间和巨大的吞吐能力;作为在外太空能够用肉眼观察到的第二个人工建筑物,很难想象用传统的建造方式来营建这一恢弘的建筑物。(图 5-3-4)有人这样描述它:“一个将技术的应用推向极限的例子,关西国际航空港优雅的结构与空间单元展现了下一个千年激动人心的景象”。<sup>[18]</sup>

无论是那一种生态技术方式,对于未来下一个千年的建筑设计都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十届世界建筑师大会的主旨报告中,不管是吴良镛先生还是肯尼斯·弗兰普顿先生的报告都将环境问题作为重要的一个主题来考虑。而生态技术则是建筑回应于环境的根本保证,是建筑迈向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手段。

#### 生态技术·高技术与建筑形式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高技与生态技术之间的区别概念模糊。事实上,生态技术与高技无论在目标、实施手段、结果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相当大的差异。生态技术的目标是充分利用环境资源,使建筑物的形成对环境破坏减至最小,对物资、能源的利用获得最大效益。相对地,高技则通过对高、新技术的应用,创造反映时代特征的建筑形式。应用上,生态技术既可以采取传统的被动式技术方式也可以利用高技术的手段来实现其目标。

另一方面看,高技是生态技术的催化剂。当高技从展现其自身的技术魅力转向对于人、对于环境、对于全球的关怀,它便可很容易地上升为生态技术。在 Catherine Slessor 编著的《Eco-Tech\_Sustainable Architecture and High Technology》一书中,诺曼·福斯特、理查·罗杰斯、伦佐·皮阿诺、尼古拉斯·格雷姆肖、迈克尔·霍普金斯等被划分为高技派的著名建筑师们在对技术炉火纯青的运用中,体现了深厚的生态意识和应用技巧。

建筑形式是建筑设计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其艺术性的体现。然而对于建筑的关注却不能仅仅停留于建筑形式上。当“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人们共同关注的问题,建筑作为全球 50%以上能源的消费者,有义务为之作出努力。——而生态技术则是建筑迈向“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证。因此,加大对技术的研究,尤其是对高新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是这一过程中的原始动力所在。同时,由于技术始终带动着建筑的发展,生态技术势必对建筑形式产生深远的影响。对生态因素的考虑及相应的设计手段、语言、符号应用势必产生新的建筑形式。马来西亚建筑师杨经文设计的绿色摩天楼已经向人们展示出生态技术对于建筑形式的作用。诺曼·福斯特设计的法兰克福商业银行,由于其中考虑了自然通风、自然采光以及人们的工作视域等,使建筑呈现出一种新的形态——有人称之为 21 世纪的建筑,充分体现了生态技术对建筑形式的影响。

除了生态技术,还有适用技术<sup>[19]</sup>、中间技术、传统技术<sup>[20]</sup>等等众多技术称谓。因为它

们有的因技术使用的结果命名,有的因技术的使用范围、层面命名,有的则按时间发展命名,因此虽然在实际技术的使用上可能有所叠合,但是却不相隶属。总的来说,如前文所述,可以将其分为两种倾向,一种是以“技术创新”为主的倾向,如生态技术、仿生技术、智能技术等;另一类以改进、适宜为主的倾向,如传统技术、中间技术等。

### 生态技术与发展中国家的建筑设计

人类的生产过程,从某些方面看是向大自然索要能源与物资的过程。大规模的开发相当程度破坏了自然的生态平衡;而人口的空前增长对于物质、能源、空间的需求也急剧加快了这一失衡。因此从全球发展来看,生态技术无论对于哪一行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对于建筑领域来说,由于建筑本身巨大能耗以及对人们生活品质的重要影响,在环境日趋恶劣的今天,生态技术的应用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尤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急欲脱离经济的落后往往建立在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对自然资源肆无忌惮的掠夺;而急欲表现经济的成就往往在城市与建筑设计上过分强调形式,过分讲究形式,常常使建筑呈现出耀武扬威、自我炫耀的模样,从而忘记了建筑的本原。(图 5-3-5)

因此,在建筑领域,理应呼吁与环境共呼吸的建筑设计观,提倡生态技术的应用。这不仅有助于推动全球环境品质的改善,而且有助于反思建筑创作的本原。建筑的终极目标是为了人们“诗意地栖息于大地”之上,而生态技术则是这一漫漫旅途中的绿色快车。因此,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加大对生态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无论从环境角度、能源角度或是建筑设计角度都将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在其中,我们更加强调对于“改进、适宜为主”的技术方式的应用。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西部的大部分地区还处于落后贫困的状态,在这些地方强调或使用“高技术”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sup>[21]</sup>。当然不应排除使用先进的技术,合理的使用它有助于对传统技术的改造,使传统技术焕发新的活力;同时更应强调对传统技术的认知、学习、提高、推进,从中获得创作的灵感。而这往往就是创造具有特色的地域性建筑的根源所在。



图 5-3-5 新时期上海和北京的新建筑



## 五、气候的启示:三种不同地域气候特征下的探讨

不同地域的自然地理气候特征对于建筑文化的发展有着本质的影响。很多建筑师在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注重地域气候与自然条件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探索。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属于干热地域气候的埃及建筑师哈桑·法赛、属于湿热为主的地域气候的印度建筑师查尔斯·柯里亚以及属于高寒地域气候的瑞典建筑师拉尔夫·厄斯金。埃及与

印度同中国一样,有着悠久又沉重的历史文化,哈桑·法赛与查尔斯·柯里亚都非常关注贫民的住宅,另外这三种气候特征正是西南地区典型的三种气候特征,因此通过这三位建筑师的研究,可以了解他们在处理相应的地域、气候条件下的建筑理念与设计策略,了解他们的文化观与设计手法,从中获得相应的有益启示。

#### 哈桑·法赛与干热地域气候的建筑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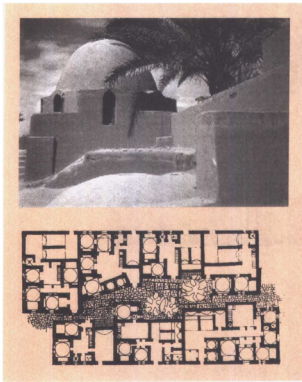
哈桑·法赛之所以成为建筑领域颇受瞩目的建筑师,很大的原因是其人文主义的思想以及对“穷人住宅”的关注和实践。哈桑·法赛的人文主义思想的主要论点之一是“文化的真实性”,“他认为只有植根于地域的地理文化环境中的本土建筑才是一个社会建筑的真实表达,同时他强调文化的不可替代性。……他认为基本的文化元素是在满足人类心理和环境需求进程中衍生的。如果某些格格不入的外来文化元素被塞进一个业已造就的和谐环境中,无疑将产生矛盾。”<sup>[2]</sup>另外一点就是“建筑的人性”,即“建筑必须满足人类生理、心理和文化上的要求。”他反对不加选择地引进国际风格,由此割断了人们和历史的联系;他一再反对现代主义带来的千篇一律,强调生活的丰富多彩与建筑的多样化;他还认为人们不可能以通用的技术将世界统一于一个相同的生活模式中;同时他一直在努力寻找人们熟悉而又有明显特征的建筑语汇,并通过适度改造使之产生新的生命力。

在具体的方式方法上哈桑·法赛主要借助现代物理学、人体科学以及相关学科的成果,如材料科学、物理学、空气动力学、气象学、生理学等,对传统技术的重新评估,进而提出改造、更新传统技术的设计策略。比如法赛从影响建筑微气候的7个方面:建筑的形态、建筑定位、空间设计、建筑材料、建筑表面肌理材料颜色和开敞空间的设计,分别对传统建筑设计方式进行了评价,并提出了相应的发展设计策略。

在实际的技术策略上哈桑·法赛主要针对几个方面的内容来采取措施:降低热吸收,包括热辐射与热传导;降低建筑周围的温度;加大室内空气流动并降低空气温度。另外,提倡、组织居民自助建造,他提出了“户主——工匠系统”“服务式训练”等的概念。

一、降低热吸收:比如从建筑材料研究角度出发,法赛重新评价了土坯砖的物理价值与文化价值,并以之作为重新构建新建筑的最基本元素。另外哈桑·法赛重新启用了传统的建筑语汇——拱顶。拱顶的利用有助于室内高度增加,保证了热气的上升和聚集在远离人体的位置;同时屋顶的表面积有所增加,太阳辐射作用在扩大的面积上,平均辐射强度相对降低,屋顶吸收的平均热量下降,因此对室内的辐射强度有所减少;再者在一天的多数时段,一部分屋顶处于阴影区,可以吸收室内和相对较热的屋顶部分的热量,将其辐射到阴影区内温度较低的空气中。——拱顶与土坯砖已经成为了哈桑·法赛建筑作品的主要特征。(图5-3-6a)

图 5-3-6a 哈桑·法赛建筑中的拱顶与土坯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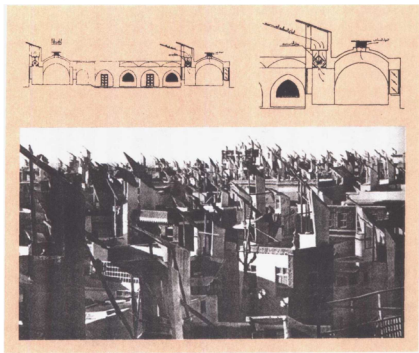


图 5-3-6b 捕风窗

二、降低建筑周围的温度：在这方面哈桑·法赛主要采用设置内庭院与屋顶敞廊等。内庭院中的空气保持相对稳定，有助于在热传导过程中降低建筑的温度。而屋顶敞廊遮挡了白天的阳光，在夜间则提供了舒适的睡觉场所。

三、加大室内空气流动并降低空气温度：干热地区由于要减少热辐射，建筑的开窗小而少，同时由于密集的建筑布局，客观上阻滞了空气的流动。哈桑·法赛重新修正了捕风窗<sup>[28]</sup>的设计，加大了捕风窗面积并在其中设置湿布，加速了室内的空气流动。（图 5-3-6b）

四、提倡、组织居民自助建造：哈桑·法赛在社区的建设中鼓励居民自助建造。他仅提供必要的结构支持与适合于本土的建筑语汇。他称之为“户主——工匠系统”。在这种运作模式下，建造者可以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创造性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熟悉邻里关系，由此产生良好的社区组织。同时他对于传统的营建方式进行改造，提供便利的生产工具、组织培训居民，获得较高的建设效率。哈桑·法赛不仅研究建筑的语汇，他还深知建筑师在强化住屋与居住者之间关系的重要性。这种做法后来成为了社区建设很有影响的方式之一。<sup>[29]</sup>

#### 查尔斯·柯里亚与湿热为主地域气候的建筑研究

由于媒体的广泛宣传，查尔斯·柯里亚在中国的业界中已经是众人熟悉的印度建筑师了。由于印度有着和中国类似的背景：悠久的历史与文化发展，同属于发展中国家，进入现代化的方式以及同样庞大规模的人口基数等等引起了一些建筑工作者的关注。在比较建筑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时，印度给了我们有益的参照。“印度受西方现代建筑影响的时间比我们长得多，有许多西方建筑大师去过印度并留下有影响的作品，不少印度建筑师受过大师的亲传。但是，从总体上看，他们的现代建筑面貌距离西方建筑大师却相当远。

这一点,值得我们站在世纪的门槛前仔细思考。”<sup>[25]</sup>

查尔斯·柯里亚的作品之所有使人感兴趣,不在于它的造型,而在于作品背后的深层的气候、文化思考。柯里亚认为:“在深层结构的层次上,气候条件决定了文化和它的表达方式,它的习俗,它的礼仪。在本原的意义上,气候乃是神话之源。”而肯尼斯·弗兰普顿在评析柯里亚及其作品时这样写道:“柯里亚与柯布西埃所共同具有的特质,在于他们对于……永恒之物的持久常新的信念。这是那种把柯里亚与自身的过去,与印度那取之不尽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深刻资源,这种历史表现一种过去、现在、将来并生共存的无穷无尽却无法解释的延续性。……因此印度大陆之于柯里亚,如同地中海之于勒·柯布西埃,乃是他精神食粮的来源,并深深地植根于一种特定的场所。”<sup>[26]</sup>

与哈桑·法赛一样,在具体的方式方法上查尔斯·柯里亚也是通过对传统文化、传统建筑的再学习与认识,从中提取相应的技术策略。柯里亚非常注重技术对于建筑的影响,他写道“作用于建筑的第四种力量在于技术。没有任何艺术是如此深刻地受制于技术的影响……先进的技术每十年都会发生变化。而当每次技术的变革,建筑学都必须创造它所赖以为基础的神话般的形象和价值。”<sup>[27]</sup>在对于现代技术的运用,柯里亚比法赛走得更远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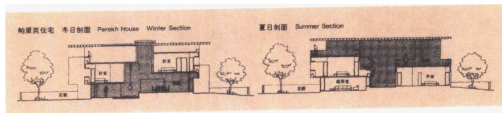
基于印度的炎热气候,柯里亚总结了几条主要的原则与策略并将其广泛应用于实践之中。首要的一条就是“向天开敞”的范式。在这条原则的约束下,产生了诸如建筑体块围合的庭院、建筑内部的通气孔等形态。另外一条范式就是“管式空间”。柯里亚似乎将埃及的捕风窗倒置,在管式空间中获得了所需的空气流动。捕风窗从高处将空气引入室内,而管式空间则利用建筑的空间剖面变化将空气引导向天空。拱顶与土坯砖是哈桑·法赛建筑作品的主要特征,而“向天开敞”和“管式空间”则是查尔斯·柯里亚建筑作品的主题。

在此基础上,查尔斯·柯里亚发展了一系列的设计策略:

·附属空间围绕主空间:这种手法是从印度传统有平台的住房中总结提取出来的。将主要空间放在中间,周围环绕于附属用房以及走廊、连廊或平台等,减少了外界炎热或寒冷气候对主要空间的影响。

·引导空气流动:这一点最初是基于管式空间的研究上产生的概念。在1961—1962年的古吉拉特邦住宅委员会的设计竞赛中,查尔斯·柯里亚提出了管式住宅的方案。管式住宅有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具有小面宽与长进深;二是空间剖面大小随高度递增而缩减,并在顶部设置出口;三是在进深方向尽量减少阻碍物,如横墙等。这种空间形态有助于引导空气的流动。管式空间在柯里亚设计的住宅中大量使用,获得了不错的实际效果,如凯伯利纳加住宅。后来在帕里克住宅中,柯里亚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概念。在空间剖面上演化出冬季与夏季两种不同的形态。所谓的夏季剖面,抽象来说就是正放的三角形的空间形态。夏季日照强烈,所以开口小,减少热辐射,同时上小下大的空间可以形成烟囱效应。而冬季剖面则是倒置的三角形的空间形态:将室内空间向天空开敞,在冬日里充分接受太阳的照射。(图5-3-7)

图 5-3-7 冬季与夏季两种空间剖面





·中间区域：柯里亚在孟买的海滨公寓因为景观与朝向、方向等的矛盾，设置了一个两层高的空中花园，并称之为中间区域。“中间区域”事实上在许多地区的传统建筑中普遍存在。顾名思义，“中间区域”就是介于建筑使用空间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一个区域。<sup>[28]</sup>从形态上看，它更趋向于半开敞空间。中间区域的存在减少了不良环境对于主体建筑的影响，同时还形成了有层次的空间形态。（图 5-3-8）

·分散组织：分散组织是一种取巧的做法却又能获得较好的通风效果。柯里亚在一些大型的公共项目中使用了这一手法。如甘地纪念馆、巴哈汶艺术中心等。（图 5-3-9）

#### 拉尔夫·厄斯金与高寒地域气候的研究

拉尔夫·厄斯金是瑞典的建筑师，也是 TEAM10 的小组成员之一。他的出名在于其组织公众参与设计的“拜克墙”住宅区。50—60 年代之后，许多建筑师开始反思建筑的根本目的，认为实际上过去的许多建筑设计往往就是建筑师自我标榜的手段，建筑应该更具社会性，建筑应该更贴近使用者，与使用者进行更多的沟通。“拜克墙”住宅就是在这种背景底下产生的。William j.r. curtis 曾经这样称赞过“拜克墙”住宅区：“在 1970 年代众多反‘英雄主义’的住宅计划案中，拜克墙是其中兼具社会性与建筑品位的最成功作品之一。”<sup>[29]</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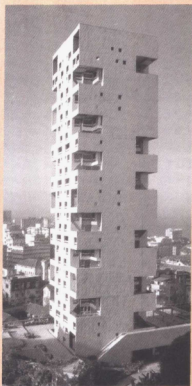


图 5-3-8 中间区域  
（引自《世界建筑导报》柯里亚专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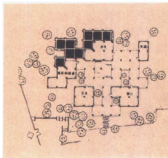


图 5-3-9 分散组织

当然在这里我们不仅是介绍拉尔夫·厄斯金公众参与的设计方法。拉尔夫·厄斯金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注意到建筑的社会性,也注意到如何在严寒的气候条件下处理建筑的设计。在研究过程中,他发现干热与干冷的气候条件下,适应这两种极端气候条件的建筑技术手段应该是相似的。他认为,寒冷地区与炎热地区的气候的确对于人们生活有很大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就建筑而言,为了保证适宜的建筑室内微环境,在具体的设计处理方式上应该相似的;建筑的目的就是尽量隔绝室内空间与外部的热交换,无论是热量传导由里及外,或是由外及内。<sup>[30]</sup>厄斯金根据该研究结果,将干热气候地区的阿拉伯住宅的形态应用在了寒冷的北欧地区,并在“拜克墙”住宅区中得到了实现。

另外,为了减少能源的消耗,在早期的研究中,厄斯金研究了各种各样建筑形体的能量耗散。由于在相同体积下,球形体的表面积最小,在相同条件下它的能量耗散应该最小,所以厄斯金早期的设计大多采用了半球形的形体。当然,这种“惟一”的形体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建筑师的创造,厄斯金在后来的设计中基本上放弃了这种方法,而从控制建筑单体的体形,转向控制形式和设计构造。他认识到不可能以一种“普遍”的方式来替代所有的情况,只有针对具体地点,具体问题才能找到具体的解决方法。基于这点认识,他非常注重严寒气候条件下的构造设计,在多元化的建筑形体的基础上通过构造设计尽量减少恶劣环境的影响。比如,在“拜克墙”住宅区的设计中他就采用了如下的设计策略:北向布置要房间,开小窗或不开窗,减少寒风或噪音影响;南向适度开窗,争取阳光。突出主体建筑的附属部分如阳台等在结构上与其分开,防止出现冷桥现象。在群体布局上,将高层建筑设置在冬季主导风向,低层设置在夏季主导风向,降低恶劣气候的影响。

同时厄斯金还注意到了季节、气候的变化对于人们活动区域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严寒地区显得更突出。比如寒冷的冬季里,人们喜欢在有阳光的区域活动,享受太阳的烘烤而不喜欢在阴森的阴影中。他还比较了两个从建筑美学角度看都很成功,然而在使用效率上却有很大差别的广场(意大利威尼斯广场与瑞典斯德哥尔摩市政广场)。针对这一点,厄斯金在住宅周围的外部空间设计了不同季节、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使用区域。

#### 启示与反思

以上三位建筑师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具有深刻的历史感,同时他们也不缺乏向前看的精神。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作品具有地域特色而又不陷入重复历史的泥潭之中的根本原因。他们都转过身去,仔细研究、剖析传统建筑文化的内涵,尤其对于其中的建造技术仔细琢磨,深刻体会;因为有了这一番了解,然后他们又自信地面朝自己锁定的方向前进。这也是他们获得人们尊重的原因。

任何人都知道,要踏上上一级台阶,必须踩在下一级台阶的台面上。这是个普通的常识。要研究、发展西南地域建筑文化也只有踏踏实实地在对传统建筑文化的认知、研究之上,结合具体地段、具体情况,才是一条可行的道路。任何企图超越这个阶段的幻想都是徒劳和不切实际的。哈桑·法赛曾经说过:“你若需要一朵花,勿以纸和胶为之。你必须付出体力与智慧寻找一块土地,播下种子,精心培养。”<sup>[31]</sup>“模仿”和“拼贴”无异于“纸和胶为之”。

当前在西南地区明显存在着以一种文化模式替代多种文化模式的危险,存在着以一种技术方式替代不同地域、不同气候条件下的多元技术方式的趋势。因此我们首要做的是认识这片土地,了解这片土地,研究这片土地上传统建筑是如何与自然地理空间、气候调适的。这是漫漫长路的第一步。

## 第四节 形式的背后:西南传统 地域建造技术初探

在第一章中已经明确阐述了西南是中国三大文化板块延伸、接触、碰撞、交融的地区,这使得西南建筑兼有三大文化板块的文化特征:包括了南下的以氐羌族系为主的北方游牧民族居住样式及其演化样式、百越族系为主的干栏建筑样式以及汉民族为主的合院建筑样式等。因此在下面的论述中我们也将因循这种划分方式,着重对三类不同建筑体系中回应于自然的地形、气候等方面的地域建造技术进行剖析。

### 一、厚重邛笼

川西滇西北地区的气候属于高原气候,山高谷深,地冻天寒、风大雨少、气候多变而且日照时间长。气候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 日照丰富:全年日照率为百分之五十,比盆地内的日照率大一倍,而且冬季日照时数又恰与盆地内各季日照时数相反,即冬春两季较夏秋(雨季)两季为多(12月至3月最多),故从藏族住宅的布局、造型可以看见他们在冬季利用太阳能的处理方式与经验。

2. 降雨量小:年平均降雨量约在600—700毫米之间,少量地区有所增加。降雨量的大小将直接影响到建筑的屋顶形式。

3. 干燥度大:丰富的日照和较小的降雨量决定了该地区的干燥气候。

4. 昼夜温差大:平均海拔1500米以上的山区,午间直射温度在35℃—45℃,夜晚则可能结冰。干燥的气候和较大的气温日差造成了或是干热或是干冷的气候环境,客观形成建筑的维护形态的实多虚少。

5. 风大且冷:在冬春雨季最多,风向大约以北纬30度为界,南部地区多偏南风,北部地区多西风或北风,而且多大风,如康定、甘孜等地,每年八级以上的大风有四五天,六级以上的大风有四五十天,五级风有十几天以上,五级以下的就更多了。在这些地区由于西、北风多,对于建筑的选址、朝向和开窗等,都有很大的关系。

6. 气候的立体分布:由于该地区为山地地区,海拔高度的剧烈变化造成了局部的气温相差巨大。例如泸定河面海拔约1100米,它左右两岸的山坡,有的高达5000米以上,故当夏与春之交,河面气温已30℃,两岸山腰才15℃—16℃,最高处气温还在零下。又如金沙江岸,从宁静山顶下到金沙江岸,恰如自冬越春而到仲夏。河谷气候又因南北向的河谷如雅砻江较温暖,东西向的河谷如康定多寒冷。东西向的山脉,则山南面比山北面暖和得多。<sup>[32]</sup>

#### 地冻天寒与实多虚少

因此在地冻天寒的气候条件下,邛笼建筑形体的实多虚少是获得良好热工性能的保证。迎风背阳的一面,基本上不开窗或只开小窗,减少寒冷气流对室内环境的影响。背风向阳的一面则适当开窗,获得必需的日光,而且洞口断面多呈梯形,内宽外窄。邛笼实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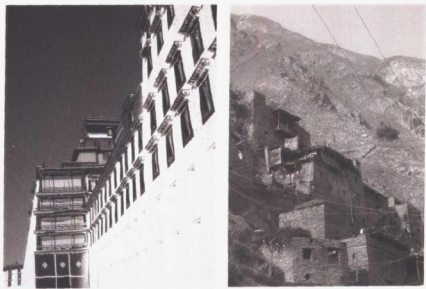


图 5-4-1 实多虚少的  
的玛尼建筑

虚少的建筑形象不仅与干旱险峻的西南高原融为一体，也是强悍的高原民族雄姿的体现，更是氐羌族系坚韧性格的描写。（图 5-4-1）

大面积的或是灰色，或是白色，或是红色的墙体是西南高原阳光的画布。强烈的阳光投在墙上，投在深陷的窗洞口，投在出挑的檐上，绘出了浓烈迷人的画像；间或有一个或几个穿着神秘的暗红色法衣的喇嘛走过，就是一幅绝佳的图照。

#### “空气间层”与“核心”空间

“空气间层”<sup>[3]</sup>事实上是传统建筑最常用的一种隔绝不良气候条件的最有效措施之一。后文论及的干栏和合院都大量应用了空气间层。由于玛尼建筑所处的自然环境条件比起干栏与合院都要严峻得多，因而它的“空气间层”的应用就更为复杂些。

所谓的建筑设计中的“空气间层”指的是利用建筑的筑造方式，在达到最主要的使用场所过程中营造的一系列建筑附属空间。举个简单的类比，建筑的“空气间层”作用就好比人体为御寒或防晒而穿着的衣服，布料和衣物中相对静止的空气起到有效的保温隔热作用。相对于人体“空气间层”的多个层次（如房屋、衣服、毛发、皮肤等），到达玛尼建筑的核心空间——主室过程中，同样也有着多个层次，这就是：室外——厚重的石砌或黄土版筑墙——底层牲畜过冬场所——二层围绕主室的其他功能房——主室——顶层的罩房。经过这么一个过程，可以说主室的空间基本上被层层包围，上下左右完全被其他附属房间与外界恶劣的气候环境隔离开来，最大限度获得了人们所需的室内微环境。

现代建筑设计中，“空气间层”远远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当现代工业能够提供大量的能源之时，人们便忘记了自然的存在。许多现代建筑往往就如处在寒冷环境中的而又穿得单薄的人，为了维持正常的机体运行，不得不大量地喝酒进食——需要巨大的能源输入。事实上已经有许多建筑师注意到传统建筑中“空气间层”的价值，并成功地将其原理应用在他们的设计作品中，并取得了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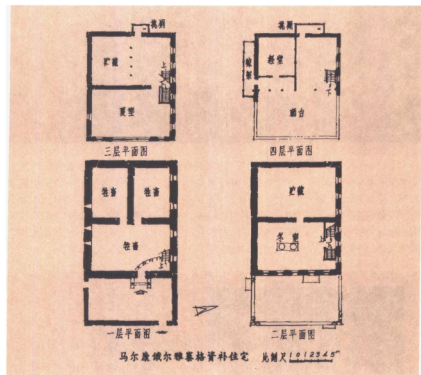
#### 夏室与冬室

任何生物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许多动物为了适应夏日的炎热与冬天的寒冷通常都

有多处住所。川西滇西北的高原地带冬夏两季气温相差大,对于藏、羌、彝诸族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影响。除了游牧时期的帐篷外,邛笼建筑后来的发展中有夏室与冬室的设置,尤其是夏室出现。

如上节所述,主室就是主要的冬季用房,而夏室多在冬室的上面一层,一方面加强冬室的隔冷保温效果,另一方面还可获取较好的通风效果。夏室的开窗洞口较冬室为大,通常占整个房间面宽(图 5-4-2),并且窗户由木材制成,鲜明地对比于粗犷的石材。因此,夏室的出现不仅仅是功能上的需求,同时带来了视觉上与美学上的效果。

图 5-4-2 夏室与冬室  
(引自叶启荣《四川藏族住宅》)



如何在现代建筑设计中引入相对应于不同气候条件下的建筑形态的处理方式,邛笼建筑夏室与冬室分而置之的方式给了我们一定的启示。这方面的例子并不少,上文提到的印度建筑师查尔斯·柯里亚设计的帕理克住宅就是其中典型的案例。

#### 采光·通风与墙体洞口

邛笼建筑除了因恶劣环境所需的封闭形态外,尚需适度的开放,解决一定的采光通风问题。厚实墙体上外小内大的窗洞口,主室顶部的小洞口都是我们常见的处理方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处理手法就是高侧窗的应用。以居住在岷江上游的羌族建筑为例,在垂直的围护墙体与水平的屋面交接处,通常都有约 25—30 厘米左右高、50—60 厘米宽的洞口,间以黄刺或油竹竿。高侧窗不仅可以取得很好的通风效果,而且通过高侧窗的光线可以最大限度地投射到房屋的深处。这对于封闭形态的邛笼建筑极为重要,也是它获取日照的最佳方式之一。(图 5-4-3)



图 5-4-3 环龙建筑  
中的高侧窗

高侧窗不仅仅被应用在一般的民居上。宗教建筑更是通过高高的洞口将光线的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从而展现出了宗教浓厚而神秘的氛围。以拉萨哲蚌寺为例。拉萨哲蚌寺的喇嘛经堂中,由于庞大的面积而导致了进深重重,柱子林立,室内光线昏暗。然而由于向阳一面开有高侧窗,阳光通过小小的洞口倾泻了进来。不甚清晰的墨青色的背景,从天到地缠满神秘的暗红色的林林立柱,弥漫的粉尘以及暖暖的阳光共同烘托出了浓浓的宗教气氛(图 5-4-4)——在这里,“黑暗”是主题,而亮白的光束衬托了黑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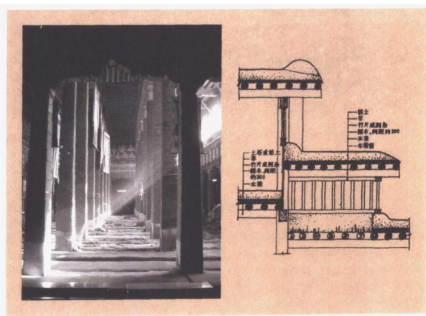


图 5-4-4 哲蚌寺中  
的高侧窗

### 风向·罩房与风墙

风大而且寒冷是高原山地气候的一大特征。因此邛笼建筑的选址通常坐落在向阳背风的场所。主要的窗户均为朝南向,东西方向较少开窗,而北向绝无洞口。邛笼的顶层有罩房和晒坝。罩房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遮挡寒风对于晒坝的影响,因此它的具体方向根据当地的主导风向而定。目前看来以一字形、L形和凹字形为多。罩房抵风的墙上有一两米左右的洞口,根据需要时(如晒谷时)可以将其打开,立即可获得强烈的通风效果。若不知情者,从里看以为是门,从外看以为该建筑尚未完工。(图5-4-5)

在邛笼建筑中,最大限度隔离居住微环境与外部恶劣的气候环境是营建的关键,尤其是阻隔寒风渗透进入居室。但是因为顶层有着与主室层不同的使用要求,是生产所在住屋中的延续,因而它们的主人很好地利用了环境的特征,通过罩房与风墙的处理将不利因素转化为自己所需要的有利条件。这些处理看似简单,但却是藏、彝诸族在长期与自然气候环境的调适过程中总结出来的有效手段。



图 5-4-5 风墙与罩房

### 昼夜温差与墙体构造

从藏民族的服装就可以了解他们居住环境昼夜温差大的气候特征。氍氍族系居住的高原地区白天日照强烈,日照时间长,因此气温高,气候较为炎热,但同时风力较大。当太阳隐退时,尤其是入夜后则气温急速降低,温差可达 $20^{\circ}\text{C}$ — $35^{\circ}\text{C}$ 。因此藏民族的这种束腰服饰,热时可脱下悬于腰间,冷时则披上抵挡风寒,是独具特色的民族服饰。这种巨大的昼夜温差对于建筑的墙体是严峻的考验。为了减少恶劣气候对于墙体的影响,当地的人们创造出了许多技术方式,其中一种就是当地人称为“万年蒿”的草。万年蒿经过脱水,油质浸泡等一系列加工处理后,再压制成标准尺寸的砌块。用它们砌筑在最外层作为围护墙体,内层用石块砌筑,粘土嵌缝,这一层墙体才是承重墙。这在布达拉宫上可以看到大量的应用。(图5-4-6)万年蒿具有“减少墙体自重,增加墙体的保温隔热性能;用动植物油浸泡炼制后的“万年蒿”有憎水性,即有防水性,蜀汉时期孟获的兵士用护身的藤甲作渡水的浮具,藤甲是用油蜡浸泡炼制的藤条编织成盔甲,既可护身又可作渡水浮具(不过惧怕火攻),万年蒿与藤甲在处理工艺上有相似之处。万年蒿被压制后,密实地砌筑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既防水又具保温性的建材,保温性源于其毛细管式的空气间层,防水性使之不因雨水侵蚀后导热系数加大而失去。同时也解决冰雪相变引起墙体侵蚀和开裂的问题;雨水残留在墙体中是不可避免,拉萨地区的昼夜温差极大,晚间气温常常低于 $0^{\circ}\text{C}$ ,这样残留在墙体中的水分就会结冰(液态变固态),液态水相变为冰体后体积会膨胀,长期下来必将引起墙体开裂。万年蒿草砌块空隙率大,具有弹性,即便是有残留水分结冰,也不会出现以上的不良现象。

冬季积雪在檐口和护墙的压顶上,正午的太阳热辐射可以将其融化变成液态水,雪

水向下流淌会侵蚀墙体。用万年蒿草砌块,同样避免了残留水结冰膨胀后引起的墙体开裂。第二天午间时,阳光直射使残留在万年蒿草中的冰融化,砌筑时让万年蒿草向下有倾斜度,以利于水沿草秆的空腔和彼此之间的缝隙流出来。如此昼夜反复的冰雪相变对南面外墙的影响很大,在千百年的历史实践中,发展了适宜的材料技术,以及相应的构造技术,来解决这一问题。<sup>[34]</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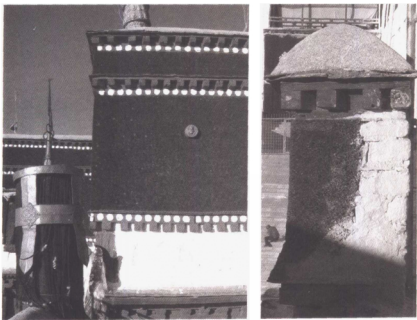


图 5-4-6 万年蒿砌筑的墙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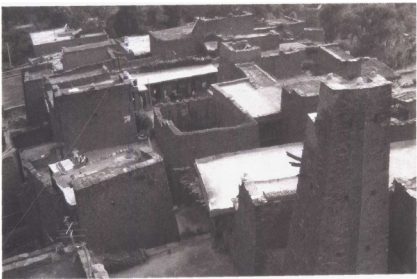


图 5-4-7 密集的建筑布局



### 密集的建筑群组与狭隘的街道空间尺度

除了建筑单体上的处理外,通过建筑组群的布置关系也可以看出建筑是如何调适于气候的。羌族与彝族的房屋布局紧密相连<sup>[3]</sup>,建筑与建筑间仅留出可供通行的走道。紧凑的布置减少了寒冷气候的不良影响,降低了风沙的侵害。弯曲的、狭隘的街道空间一方面阻滞风在巷道中的顺畅通行,另一方面在炎热的白天提供了宜人的阴影。(图5-4-7)这种布局在炎热的阿拉伯地区也较常见。

再者,密集的建筑群体布局有利于在不平的山地中创造出适宜人活动的平台。以彝族的土掌房为例。彝族土掌房通常平行等高线布局,顺坡而下。户与户之间的距离很小,多在一米左右,密密集集的屋顶之间搭有木架与木板联系,在二三层的标高上创造了一个立体的步行通道。

## 二、轻盈干栏

### 炎热多雨与通透轻盈

干栏建筑是南方地区主要的建筑类型。南方地区气候炎热,降雨频繁,湿度大,山地多,而且山地地区的昼夜温差虽不及川西滇西北地区严寒的高原气候那样高达三四十度,但也有一二十度。这些客观的因素左右着干栏建筑的形态,是干栏建筑通透轻盈的深层原因。

#### 架空

和邛笮建筑的干燥气候环境不同,干栏建筑所处的地区气候以湿热为主,建筑中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降低主要使用空间的湿度和温度。其中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加强房屋中的“通风”。从建筑物理的角度,加强通风需要两个条件:一是保证流通渠道的通畅,一是加大流通渠道两端空间区域的风压差,引导通风。因此,干栏建筑的最主要特征——“架空”符合第一个条件,它不仅将住屋隔离了潮湿的土地,而且比起地面建筑,大大减少了对空气流动的阻碍。干燥寒冷地区需要解决防寒防风,而湿热地区通过空气流动,降低了空气中的湿度,并通过加大人体皮肤表面的热气蒸发,从而降低了室内的温度。此外,南方多虫蛇,“架空”也减少了虫蛇对人的危害。再者,“架空”还带来建筑对于山地自然环境的适应性,我们将在下一节将重点讨论。



图5-4-8 中智地区的缓坡屋面

### 降雨量与屋顶坡度

多雨的气候决定了干栏建筑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形态各异的坡屋顶。屋面的坡度根据各地的降雨量而变化,约从15度到45度不等。在云南中部地区,降雨量约在500毫米到700毫米左右,围护墙体虽然还是具有强烈的干栏建筑特征,但是建筑的屋面开始从平屋顶向坡屋面过渡,屋顶材料多为“闪片”,屋面平且缓。(图5-4-8)大约以云南中部为界,再往南走,传统的住屋基本上都是坡屋面,或局部带有坡屋面,且屋面坡度随纬度降低而递增。到了滇西南地区的傣族住屋,屋顶坡度则多达45度甚至更大——体现了传统建筑顺应气候,“因地制宜”的原则。

### 阁楼

影响传统干栏建筑室内温度的有几个因素:1.环境气温 2.接受的辐射热,其中以太阳的辐射热为主 3.人体散发的热能 4.其他(如火塘的热能等)。这几个因素中,除了人们因厨事、照明、取暖等需求的火塘热能外,太阳的辐射热是主要的热源。因此降低太阳的辐射热就成为降低室内温度的主要手段。

阁楼事实上是我们上文提到的“空气间层”的一种。阁楼处于主要使用房间的顶部,作为杂物储藏间或住人。太阳的辐射热先及屋顶,后至阁楼,再及功能用房,经过这一过程,已经大大地减少了。主要使用房间下有架空层利于空气的流通,上有阁楼减低热辐射的影响,从而获得较好的室内微环境。

### 空间的剖面与烟囱效应

炎热地带的干栏建筑,比如傣族竹楼,就经常很巧妙地利用“烟囱效应”获得所需的室内通风效果。所谓的“烟囱效应”是指利用风压的变化获得拔风的一种方式,在空间剖面上表现为上小下大的模式。傣族竹楼通常因为地区的降雨量大,屋顶坡度相应也就陡,造成了室内空间居住活动的楼板面积与屋顶顶部的横断面面积差大,降雨量越大、坡度越陡,形成的空间高差越大,楼面与顶部的面积差也就越大(在相同楼面面积情况下),从而产生的空气流通也就越强烈。(图5-4-9)因此非常有效地引导了自然空气的流动,获得了所需的室内微环境。

“烟囱效应”被广泛地应用在建筑物的通风上。除了上文提到的查尔斯·阿里亚的“管式住宅”外,著名的美国太阳城建筑师保罗·索拉里就将“烟囱效应”作为建设太阳城的主要原则之一。

### 敞廊与檐廊

如果说阁楼是垂直方向的“空气间层”,那么敞廊与檐廊在干栏建筑中就是水平方向的“空气间层”。敞廊与檐廊通常设置在主体建筑向阳的一面,起到的作用与阁楼相同。但由于是在水平的层面上,它覆盖的空间是进入主要功能用房的前奏,也有人称之为“过渡空间”、“灰空间”等。敞廊与檐廊下的场所比起室内房间有着较好的通风和视阈,因此对于生活在南方湿热地区的人们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它有着类似干栏



图 5-4-9 烟囱通风效应

建筑顶层罩房与坝子的功能,是主要房间功能的延续,是进行日常活动的主要场所之一。  
(图 5-4-10)



图 5-4-10 檐廊与樟廊(图片来自季富政《巴蜀城镇与民居》)

#### 挑檐与格槛窗

挑檐与格槛窗是干栏建筑的细部形态,干栏建筑的坡屋顶解决了主要空间的避雨问题,而屋顶延伸的长度、方式,如深挑檐、外挑檐、腰檐以及重檐等则考虑到了墙体避雨、庇荫的问题。(图 5-4-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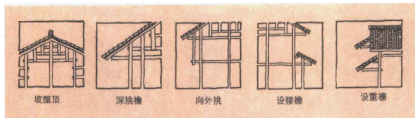


图 5-4-11 避雨、庇荫的做法(图片来自季长杰主编《桂北民间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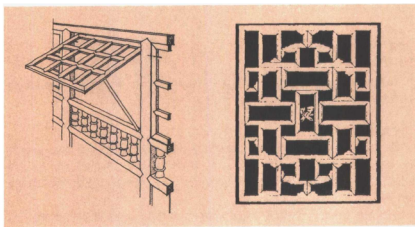


图 5-4-12 格槛窗(图片来自季长杰主编《桂北民间建筑》)

格栅窗是干栏建筑的构配件中最具装饰气息的部分。可能是因为可把握的尺度和所处位置的关系,干栏建筑的窗户形态似乎最受人们重视,由此融入了各式各样的装饰图案。所谓的格栅窗是一种笼统的提法,它的主要特征就是由镂空的木格栅相嵌而成,可阻挡视线又可通风,是干栏建筑在处理洞口时的普遍做法。有的地区还有双层窗的做法,外层格栅窗,里层木板窗,根据气候与日照随意调节。天气炎热时,木板窗完全打开,格栅窗可做上悬窗(同支摘窗),外支时获得较大面积的通风洞口并起到一定的遮阳作用;天气寒冷时,则全部关闭。(图5-4-12)

哈桑·法赛在对埃及传统建筑的“建筑材料、建筑表面肌理材料颜色”进行重新评估时,曾经对传统的木板窗进行仔细分析,并比较了百叶窗、遮阳构架以及木板窗三者的特点。

山地地形及共生的生态特点

地形	升高的			中间的	下降的			
	丘、丘顶	垭口	山脊	坡(台)地	谷地	盘地	冲地	河漫地
风态	改变风向	大风区	改向、加速	顺坡风、涡风、背风	谷地风		顺沟风	水陆风
温度	偏高、易降	中等、易降	中等、背风坡高热	谷地逆温	中等	低	低	低
湿度	湿度小 易干旱	小	小、干旱	中等	大	中等	大	最大
日照	时间长	阴影早 时间长	时间长	向阳坡多 背阳坡少	阴影早 差异大	差异大	时间短 阴影早	
雨量				迎风雨多 背风雨少				
积雪	少	少	少	迎风少、 背风多	多	较多	最多	多
地面水	多向 径流小	径流小	多向 径流小	径流大、 冲刷严重	汇水 易淤积	最易淤积	受侵蚀	洪涝、 洪泛
土壤	易流失	易流失	易流失	较易流失				
动物 生境	差	差	差	一般	好	好	好	好
植被 多样性	单一	单一	单一	较多样	多样	多样		多样

(资料来源:黄耀志《山地城市生态特点及自然生态规划方法探析》,黄光宇主编《山地城镇规划建设与生态环境》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9页。)

### “立”的形态

从地貌形态特征上来分析,自然山地常以丘、岗、墩、山脊、山坡、冲沟、谷地、阶地、河漫地等基本地貌形态或组合的地貌形态存在,这些地形基本单元伴生着相对独立的自然生态特点和小气候特征,影响着山地城市的结构形态和发展模式,其基本形式和特征如表所示。

多山的地形决定了干栏建筑与大地接触方式的独特性。如何在复杂的山地地形上营

建房屋,是一个首要解决的问题。而干栏建筑的“架空”形态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它的立足点不在于改造,而是因借,无论是岗、谷、脊、坎、坡、壁等都是因势利导,化不利为有利,顺其自然,产生了许多与各种复杂的地形相适应的构筑形态”。

山地建筑针对不同地形形态,表现出诸如台、挑、吊、坡、拖、梭、靠、跨、架、爬、贴、跌、转、让、错、分、连等多种建构方式。山地建筑充分借鉴这些山地民居建造方式。巧用地形,争取空间结合自身特点也形成了不少有效合理的建构方式,表现出多种多样的建筑形态。

### 筑台

所谓的筑台指的是对天然地基适当平整形成台地,以布置建筑物,一般将建筑物平行或斜交等高线布置,适于坡度平缓地段。这是山地建筑最常见的手法之一,在坡度较平缓,地段较开阔的环境中,稍加填、挖形成台地,然后在平整的台地上布置建筑,这种方法较为简便,由筑台而产生的建筑形态较接近平地建筑形态,但在山地环境中,利用不同高程分筑台形成群体建筑环境,形成参差变化,高低错落的空间形态。

### 勒基

所谓勒基,就是通过加强勒脚的方式形成稳定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进行建筑,这种方式针对局部高低变化多,地面崎岖不平的环境,勒脚采用碎石、条石等自然的山地材料,勒脚深入土中或直接嵌固于基础上,建筑粗犷质朴、沉稳厚重与自然环境易协调,是一种非常简便而有效的处理手法。

### 悬挑

所谓的悬挑指的是建筑底层基地狭小,利用挑楼、挑廊、挑台、挑梯等来争取扩大空间的处理手法。常用于地形复杂、坡度较陡地区。建筑物利用木梁或石质的悬臂来形成出挑以争取空间,悬挑形式具有“占天不占地”的特征,因此它可以凭较少的接地面获得更多的使用面积,为了扩大出挑距离,悬挑可与吊脚形式相互配合使用。悬挑方式利于减少建筑与基地接触面积。

### 错层

所谓的错层指的是同一楼层作成不同标高的处理手法。根据地形变化情况及建筑布局,可以左右错或前后错,错半层或错1/4层等。地段较陡的环境中,为了避免太多的土方填挖,常常在建筑内部采用不同的基面,形成错层,错层的多少决定于山体的倾斜度,而建筑底面往往与地形表面尽量吻合,即形成所谓“地平无不平”的建筑形态。有时建筑还依山就势,在进深方向形成两个不等高的楼面,相互错半层,从而与地形相应地结合。

### 掉层

所谓的掉层指的是建筑物随地形层层下掉,将建筑物基底作成阶梯状。建筑物纵轴可垂直或平行于等高线布置,构成不同的处理形式及分层出入口。当地形高差悬殊,同建筑内部“错层”或局部跌落达到一层或一层以上时,就形成掉层,采用掉层的手法可避免大规模改造地形,同时还结合不同层面的使用空间,满足不同的活动的使用。同时也可使建筑结合不同标高的道路组织不同方向的人口。

### 下跌

所谓的下跌指的是建筑物纵轴垂直或斜交于等高线布置时,以房屋开间或单元为单位,沿垂直方向段段跌落,顺坡势形成阶梯状布置的一种处理手法。建筑顺坡势逐层或隔层沿水平方向作一定距离的错动或重叠,形成阶梯形的布置方式,其适应坡度可达50%以上,错动的水平距离往往以1—2个开间为宜,跌落高差及间距可随地形不同进行调整。

### 附崖

建筑物临陡坡贴岩修建的方法,可有上爬、通连、下跑等处理形式。山地因劈山开路,

两侧建筑通常一侧为“半边街”另一侧为附岩建筑。建筑物临近陡岩修建,当岩体内凹时,建筑物还时常伸入岩体,与岩壁浑然一体,有时为了争取空间,建筑物也顺墙体上爬。

**错叠:**建筑纵轴垂直或斜交于等高线布置时,逐层或间层沿水平方向作一定距离的错动或重叠,顺坡势形成阶梯状布置的一种处理手法。由于出入口位置随地势而变化,从而构成上爬、下跑、中分、层层进等种种形态。

**架空、吊脚:**架空,建筑物底层局部或全部透空,用立柱支撑上部空间的处理方法。凡临水、水上、跨洞、跨街等情况均可采用架空处理。吊脚,建筑物底部(地面层以下)为适应地形,采取局部凌空,用支柱支撑上部空间的处理方法,有临江“吊脚楼”,陡坎路侧的“半边街”等形式。

综上所述,干栏建筑形式美的产生源于对气候的反应,并通过结构的逻辑、细部的构造与材料的真实等方面体现出来。这是一种真实的美,也是一种理性的美。

### 三、文化合院

#### ·温暖湿润与明朗内秀

西南地区的合院建筑多处于平坝地区,其中以成都平原的面积最为大。通常说来,坝子地区的气温比周围的山地地区高,气候较为恒定,不如山区“东边日出西边雨”那样变化频繁。应该说,坝子地区温暖湿润的气候同样可以采用干栏建筑或是穹窿建筑,为什么最终是合院建筑占了主要的位置?

这里体现了文化的变迁。在成都出土的商代十二桥建筑遗址及相关资料明确表明,成都地区原来存在着大量的“干栏式建筑”。而最迟到汉代该地区的建筑已大致成为“合院建筑”了。(见第二章)因为气候的温暖湿润,成都平原地区理应允许多种建筑形态共存,而最终何种建筑形态能占主流,这要看该种建筑形式能否符合当地文化主流的发展。合院建筑的文化根基源于中原文化,所以其空间布局、形式形态等是与该种文化长期调适的物质体现。随着中原文化在西南以成都平原为主的地区扎根、发展,合院建筑亦随之繁荣而遍布各个平坝河谷地区。

合院建筑的建筑性格明朗内秀,建筑装饰丰富而不繁杂,在西南的三类不同的建筑中,更显现出一种“文化”之美。这是文化的发展与所处的地域空间等诸多因素使然。

#### “院”与空间等级

无论是干栏建筑还是穹窿建筑,日常生活中大部分行为都是在集中式的房屋中进行,虽然从早期形态到今日的发展,在空间的使用上略有根据功能不同作稍稍划分,但总的来看,由于缺乏足够的空间使用等级分级,使得建筑似乎还处于较为原始的状态。这与使用群体的文化发展紧密相关。相比而言,合院建筑由于“院”的使用,从空间上产生了若干个不同使用功能、不同私密程度、不同使用等级的场所。这便是合院建筑“文化之美”体现的一点。

#### 墙·边界·礼仪

合院的产生需要边界的界定,因此“墙”便是合院建筑不可或缺的一个语汇。“墙”不仅界定了“家”与外界环境,“墙”还界定了家庭内的各种关系。可以说,合院建筑的形成与发展是礼仪与家族制度的反映。这种体会可以在曹雪芹对《红楼梦》大观园的描述中获得深刻的验证。

#### “廊”与情感交流

作合院的一个横剖面就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着三种不同类型的空间形态。其一就是

向天空开放的“院子”，其二是生活功能需求的“房屋”，还有便是介于二者之间的“廊”。廊从纵深方向来说具有联系的功能，是连接各个房屋间必需的通道；从横向来看，则是连接外部空间与室内空间的一个纽带，在空间性质上具有二重性，因此人们也通常称这类空间为“灰空间”。当把横向的尺度稍稍加大，走廊便成了“敞廊”，而敞廊则是人们休息、交流、观景的绝好场所。敞廊在北方的四合院中并不多见，这多半是因为北方寒冷的气候使得人们不愿意在外部空间中多加滞留，而在冬日有太阳的日子，人们又更愿意在院子中享受温暖的阳光。在西南地区则不然，尤其是在云南的大理、丽江等地的平坝地区，由于气候温和，人们多喜欢在敞廊下休息，或下棋或赏花，或运动或静思；很多生活功能都在敞廊下进行。可以说，敞廊是西南地区合院建筑的一大特色。（图 5-4-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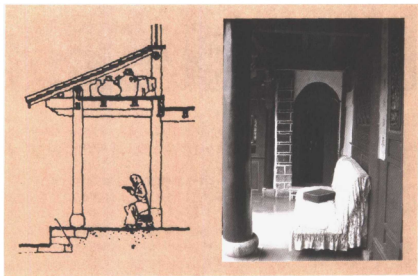


图 5-4-13 合院敞廊

### “绿”与微气候

植物是改善微环境很好的手段。在丽江、建水等地区的合院民居中，花草树木往往是院子中主体。这与民族特性有点关联，纳西族人民喜欢干净、喜欢花草，这一方面在众多资料中可以得知，另一方面在实际感受中也可以得到验证。纳西庭院中遍布各种花草，包括月季等色彩鲜艳的花朵使得庭院生机盎然，此时，人、敞廊、合院、绿化、天空共同形成了一个协调的、诗意的空间。（图 5-4-14）

我们再来研究一下三峡库区的院落形态与气候的关系。

如何考虑遮阳、隔热、通风、换气的方式，对夏天室内热环境进行改进，成了首要的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三峡库区的院落建筑往往采取如下的技术措施来达到目的：

- ① 总体布局考虑与环境的关系，在通风良好、靠近岩壁、水体、乔木的较阴凉的地段建造。
- ② 天井小，减少日晒，也利于抽风、拔风功能。建筑出檐深远，有的还在天井上加盖，形成抱厅，从而进一步减少日晒。
- ③ 建筑层高较高，外墙不到顶，屋檐不封檐；屋顶砌上明造，构造层次简单，构件截面薄小；后期出现的院落有的设“猫耳洞”或气窗，以利通风、换气。院落中充分利用挑廊，遮



图 5-4-14 纳西民居  
中的绿化

阳、避雨、阻止通风,有的院落还设有阁楼,利用阁楼进行隔热,也是一种方式。

④外墙采用青砖斗砌,制造出空气间层;或者用厚重的土墙,增大外墙的蓄热系数,从而达到提高室内热稳定性的办法,使室内冬暖夏凉。室内使用木板壁或竹编夹泥墙,透气性能好,改善室内换气的效果。

⑤房屋连接紧密,进深大,采光面积小,牺牲光环境来换取取凉的室内热环境。

⑥在天井中泼水,种植花草,以吸收热辐射。或在院落中掘井,利用地下的冷空气来改善微气候。

三峡库区夏天日照强烈,而冬天日照为全国最少的地区之一,况且,夏天的日照对健康的作用不能完全肯定。因此,以牺牲局部采光条件来换取夏天的舒适气候,是可行的。对于因此产生光环境质量下降的问题,则可通过扩大内部开窗面积或在屋顶加亮瓦等方式予以解决。

三峡库区空气湿度大,冬天日照又少,防潮也是个问题。特别是当雨后空气湿度大,而室外气温有所回升,室外较暖的湿润空气碰到较冷的室内地面和墙脚时,因其露点温度高于地面和墙脚的表面温度,湿润空气中的水蒸气就凝结成水滴,附于地面和墙脚的表面,如果地面和墙脚材料吸水性差,就容易达到饱和的吸湿状态,地面和墙脚就显得很湿,造成泛潮。传统院落对建筑材料的恰当选用,以及对材料之间的恰当组合很大程度上缓和了这一问题。青砖、土、木材、青石、石灰砂浆的抹灰,三合土这些材料的表面贯通的微孔多,因此,吸湿性大,对水蒸气有良好的呼吸作用而使表面保持干燥。民间制作的竹编夹泥墙,内部竹篾间隙较大,而填的泥土、刷的石灰对水蒸气又具有良好的贯通作用,从而使整个墙体被称为“可呼吸的墙”。此外,由于地下的湿气容易被木构架吸收而导致木材发霉,甚至引起材料力学性能下降,因此院落的石基、柱础一般都砌筑较高,以增加防潮的效果。

对于防火和降噪等方面,院落建筑也有自己的解决方式。院落建筑的主体部分使用木材极多,容易失火,院落内部的井和贮水池可以用作消防之用。街巷中一般也设有水池,以防失火。有的院落与院落之间,院落的堂屋与厢房之间用高大的防火墙防火,同时也可以隔绝噪音,保持院内安静的声环境。<sup>[36]</sup>



## 第五节 过去到现在:西南地域技术现代化思考

西南地域有着多样的气候与地貌、多元的文化、多样的民族:从滇南的热带风光到川西北的地冻天寒;从三峡库区的荆楚遗风、巴渝风情到成都平原的蜀都文明、广汉三星光芒直至喜马拉雅山下的浓烈而强劲的藏风;从深山中五彩斑斓的苗族系到高原上披裘骑马的氐羌一族以及滨水稻作兼狩猎的桶裙百越,西南的文化像深蓝色星空中满布的闪烁星星,神秘而又迷人。

西南跨越了寒带、温带、热带三个气候带,因而兼有这三种气候特征下的建筑类型,而且这三种建筑类型对应于不同气候、地理条件下产生的文化类型,即川西滇西北的高原山地建筑文化——邛笼建筑文化;以成都平原为代表的温带建筑文化——合院建筑文化;以及包括了云贵大部分地区(尤其是滇南为代表)的热带山地建筑文化——干栏建筑文化。这是传统建筑长期与自然环境协调产生的结果,也由此衍生出相应的技术模式。我们在上一节已有论及。这说明了西南地区的传统技术模式从来不是僵化的、单一的模式。

对于西南地区的建筑技术模式,笔者认为理应提倡以“中间技术”为主的多元化技术模式。这其中强调的有两个方面:“中间技术”和“多元化技术”。中间技术来自三个方面,而对于传统技术的改造是其最直接的来源。上文提到的三位国外建筑师就是很好的例子。在这里笔者不想引证诸如皮阿诺或杨经文的设计思想来解释“中间技术”,固然“中间技术”的另一个来源就是对先进技术的改造。——在西南的广大地区,对于传统的地域技术改造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容易受到人们的理解和接受,从而也更容易推广而获得较为现实的意义。下文将简要介绍重庆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三位教师对于“地域技术”的研究来表明笔者对于西南地区应如何提倡、应用“中间技术”的观点。

### 一、微观层面:传统技术的评估和认识

在李兴发先生的论文中<sup>[7]</sup>,他通过对两种“一颗印”建筑的物理环境比较,包括日照、节流、隔声以及利用太阳能可能性的研究,发现传统的“一颗印”的各项指标均大致满足所需的生活需求,而新建的砖混平顶“一颗印”,则有诸多方面的不足,有待进一步的改进。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改进传统“一颗印”的一些措施。笔者深以为,虽然李文中之做法有待进一步的改进,但这种做法是目前传统建筑研究中急需的工作,不仅要拍照测绘,留住其中的文化信息<sup>[8]</sup>,更需要从务实的角度,研究传统建筑的物理环境、外部空间尺度等一些技术性问题,才能够客观地对于传统技术进行现代的评估和认识,才能够对于现代出现的问题产生有益的借鉴作用。下面简摘其中部分,以说明问题。

日照分析:……分析得知,冬季三间二耳“一颗印”实例堂屋有0.5—2h日照,夏季游春约有1h日照;虽有1h左右照射较深的日照,但日照面积不够有待改进。若砖混半颗印也设堂屋则其日照情况大体与三间二耳“一颗印”相似,也不够理想。尽管如此,相当于起居室的走廊(游春)与堂屋还是住户冬季家庭生活较好的活动空间。若三间二耳“一颗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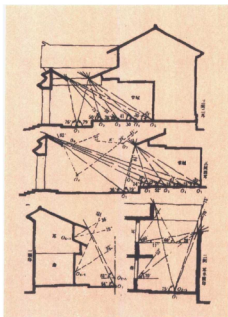


图 5-5-1 日照分析

朝向为正负零度时,冬季只有游春约有 3h 日照;春秋季节在廊沿处有 3.5h 日照;夏季只在天井正中约有 4h 日照。因此称该走廊为“游春”并不过分。(图 5-5-1,2)

若将三间二耳改成三间四耳的话,冬季堂屋有 0.8—3h 日照,春秋季节走廊处 1.5—3h 日照,夏季廊沿处有 0—2h 日照。对照一下,三间四耳日照上优于三间二耳但占地较多。不管哪种形式,夏季天井日照时间长,天井处物体表面温度及其表面上部气温较周围环境气温高,形成 0.2m/s 左右的上升气流带动热压通风换气。

节流分析:正房二楼一般作为居住或贮藏空间,若用实例三间二耳“一颗印”及现时转混“半颗印”进行对照分析(表),分析结果(表)表明,传统“一颗印”建筑确实适应气候,冬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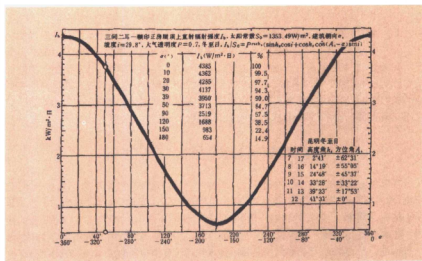


图 5-5-2 日照与建筑朝向关系

夏凉,在昆明市及市郊二区(海拔 1900m 左右)完全按原状构造手法建造也能保证冬暖夏凉,比市区海拔更高的地区可再加 12cm 土楼面及灰板条天棚。现时砖混“半颗印”由于围护结构保温性能不足,有待进一步改进才能达到传统水平的保温性能,这点值得建筑界重视。

隔声问题:若取郊区住宅为 NR30 曲线来控制室内声环境,而噪声源为四冲程摩托车距土墙 3.75 米时,需要的隔声量 D 小于土墙的空气隔声曲线。看来 49cm 厚的土墙具有

优良的空气隔声能力,所以创造出“一颗印”安静的环境。然而一砖墙之隔声曲线低于D曲线,说明传统“一颗印”优于一砖半“一颗印”建筑。由于传统“一颗印”外墙高建筑间之通道窄,所以外墙之屏障作用强,正常语言谈话时屏障效应还能创造出NR30~NR50之声环境,所以“一颗印”户内环境是较安静的。

利用太阳能的可能性:……“一颗印”朝向a最好是正南与 $\pm 40^\circ$ 之间,这对冬季集热有利,其他朝向的屋面不宜利用。实例的朝向为 $50^\circ$ ,只能收集到正南朝向的84.7%的太阳能,这对集热器而言效益上差了点。若能选用廉价黑色氯丁橡胶集热器加热生活用水或采暖用水,则屋面荷载很轻。此种集热器直接裸露在空气中,所以集热温度较低,只要将冷水提高到最高气温值左右即可,不冻手就好,否则热效低。淋浴热水宜使用集热温度高的集热器,4~5口之家有1~2平方米集热器目前已够用。

现时砖混“半颗印”一般楼梯通向平屋顶,楼梯间屋顶上可设闷晒式集热器及饮用水箱。若围绕楼梯间设置集热器便可利用楼梯间空间设热水箱,集热器坡度可在 $25^\circ$ ~ $41^\circ$ 范围内选用。砖混“半颗印”女儿墙可设种植槽,种植矮化果树,屋面上设栽培层(土、炉渣、蛭石、锯末、稻壳、膨胀珍珠岩等几种混合物),其上种植瓜果花卉蔬菜,变成有经济效益的倒铺屋面。……这种利用方式虽然效率低,但直接或间接利用了一些太阳能而且还提高了保温效果,比起不利用好得多。若设置屋顶简易塑料大棚式温室效果更佳。

待改善的问题:传统农村“一颗印”无卫生间有待改进;底层正房设畜厩通风不好,采光成问题,清扫喂牲畜也不便,应设可通风的采光窗扇及后便门以便牲畜出入及清扫卫生。人畜离粪便应先提取有用的能源再作肥料或饲料,以达到物尽其用改善环境的目的,所以它基内畜厩下应留有建沼气池的位置并且池子与卫生间相连。生成之沼渣沼水作大田肥料或供种植屋顶上使用,改善其室内热环境和卫生环境。大门不一定正中开设,所以大门内侧可不设屋檐免得底层日照受遮挡。农村文明与否与上下水设施及用水量有关,在有地下水的地方可设手泵提取无污染地下水送入屋顶水箱中,因此卫生间排泄物应充分注意,防止污染地下水。正房次间采光不足可增设亮瓦或开窗。传统“一颗印”木料用得多,三间二耳需耗40立方米圆木,因人口膨胀,住宅须大建,全用传统土木结构“一颗印”对森林资源是很大的威胁,今后应该用钢筋混凝土结构代替。传统“一颗印”之楼梯是“无”休息平台的,当地住户虽无意见,但从现代建筑讲仍须改进。

## 二、中观层面:场所研究与建筑设计

在《山地住宅建筑》一书中,唐璞先生用了相当的篇幅研究山地住宅建筑的通风、方位、日照、间距等问题<sup>[39]</sup>。针对山地的特殊问题,唐璞先生提出了自然通风在炎热山区的重要性。通过对山地风气候的分析,归纳了由温差及压力差形成的局部风流(山阴风、山谷风、顺坡风、水陆风、林源风以及越山风、山埂风等),并对于利用风速、风向综合考虑住宅朝向、住宅通风间距与住宅面宽、进深、高度以及风入射角度等关系作了深入的研究。针对山地各种复杂的地形,文中对于山地中群体布置形式与通风效果进行了详细的归类,并提出相应的布局方式。(图5-5-3)综合日照、通风、防晒避热以及经济性等方面的分析,对于北纬 $30^\circ$ 附近炎热地带(如重庆),当长直形单元式住宅群体行列式布置时,对于住宅方位的选择<sup>[40]</sup>文中提出了如图5-5-4的建议。另外,对于重庆地区坡度在33%以下的不同坡向不同住宅方位,文中提出了一个比较表格(表5-1),从表中可以看出各种不同坡向的坡地中以南向坡为最有利,东南、西南向坡次之,东向、东北及西北向坡次之,西向坡及北向坡最差。

不同坡向住宅朝向比较表

坡向	住宅方位	日照	通风	避热	结合地形 经济性	综 合
南向坡	正南或南偏东、偏西 15° 范围内	满足冬至中午前后 2 小时日照, D/H 在 1.26 以下	与主导风(或次主导风)成 30°~90° 角	可避免东西晒	接近平行等高线造价最低	日照—满意, 节约用地—良好 通风—满意, 结合地形经济性—良好 避热—良好
北向坡	南偏东 30°	满足冬至上午 2 小时日照, 间距略大	与主导风成 45° 角	略有东西晒	斜交等高线, 陡坡造价最低, 缓坡略高	日照—良好, 节约用地—较差 通风—满意, 结合地形经济性—良好 避热—较差
东南向坡	正南或南偏东 20°	满足冬至中午前后 2 小时日照, D/H 值小	与主导风(或次主导风)成 45°~90° 角	可避免东西晒	斜交等高线, 陡坡造价最低, 缓坡略高	日照—满意, 节约用地—良好 通风—满意, 结合地形经济性—满意 避热—良好
西南向坡	正南或南偏西 15°	满足冬至中午前后 2 小时日照	与主导风或次主导风成 30°~90° 角	可避免东西晒	斜交等高线, 陡坡造价最低, 缓坡略高	日照—满意, 节约用地—良好 通风—满意, 结合地形经济性—满意 避热—良好
西北向坡	正南或南偏东 20°	满足冬至下午 2 小时日照, 间距略大	与主导风或次主导风成 45°~90° 角	可避免东西晒	斜交等高线, 陡坡造价最低, 缓坡略高	日照—满意, 节约用地—较差 通风—满意, 结合地形经济性—满意 避热—良好
东北向坡	正南或南偏西 15°	满足冬至上午 2 小时日照, 间距略大	与主导风或次主导风成 30°~90° 角	可避免东西晒	斜交等高线, 陡坡造价最低, 缓坡略高	日照—满意, 节约用地—较差 通风—满意, 结合地形经济性—满意 避热—良好
东向坡	南偏东 30°	满足冬至中午前后 2 小时日照, 间距最小	与主导风或次主导风成 45°~90° 角	主要居室略有东晒	斜交等高线, 陡坡造价最低, 缓坡略高	日照—良好, 节约用地—良好 通风—满意, 结合地形经济性—满意 避热—较差
西向坡	南偏东 30°	满足冬至下午 2 小时日照, 间距略大	与主导风或次主导风成 45°~90° 角	主要居室略有东晒	斜交等高线, 陡坡造价最低, 缓坡略高	日照—良好, 节约用地—较差 通风—满意, 结合地形经济性—满意 避热—较差
说明	1. 住宅群体按平行行列式布置考虑 2. 地面坡度按 33% 以下坡度 3. 住宅型式为单元式住宅, 主要居室布置一边 4. 其他条件见图 5. 本表适用于重庆地区					



a. 平行行列式与交错行列式通风效果比较



b. 斜列式布置的通风效果



c. 利用风压以提高通风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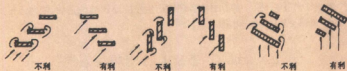
d. 利用点式住宅以减少挡风提高后房通风效果



e. 利用地形兜风提高通风效果



f. 利用弱风及绕山风以提高通风效果



g. 利用不同风向决定布置形式及高低及宽的配置以提高通风效果

图 5-5-3 建筑布局与通风效果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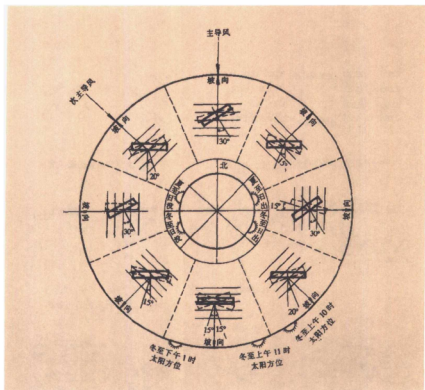


图 5-5-4 不同朝向住宅最佳方位选择分析

唐璞先生的研究事实上就是针对山地的特殊地形,分析建筑如何利用自然的空气流动、太阳照射、山地坡度等,在何种情况下可以获得较好的使用效果。这是一种朴素、实用的技术方式,或者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山地地区的“地域技术”。“地域技术”的直接来源还是基于对“传统技术”的研究。当新的社会环境产生新的建筑类型之后,依然还是可以通过“地域技术”来解决新出现的问题。

### 三、宏观层面:生态技术与“开发生态学”

“可持续发展”是近年来国际、国内较为流行的一个口号。由于各行各业都在谈“可持续发展”,但同时对其似乎无明确的认识,尤其是针对本行业的一种回应,因此总体感觉社会对于“可持续发展”有一种滥用之势。

黄天其先生在其文章《开发生态学与山地城镇的可持续发展》<sup>[41]</sup>中提出,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中落后地区需要在三方面解决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问题:

1. 努力研究和提供实用的生态技术系统;
2. 推进和深化开发理论研究,以建立起一个与当地情况符合的真正有效的生态式开发理论和方法体系;
3. 强化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知识,从法制和伦理上规范开发行为。

基于系统论和生态学知识的背景,黄天其提出了“开发生态学”的这一学科概念框

架。“开发生态学”即是近年来针对城市开发行为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提出的一个新的概念。它将开发行为和生态学结合起来,使开发的过程成为自觉的可监控和优化的过程,并指出“一套先进的山地城市开发生态技术系统,将能在取得经济的效益的同时,保证最小的生态负影响”,提出生态补偿的规划设计原则,针对现有的山地城市建设技术,评价出其“生态化”的程度。开发生态学强调山地城市建设对“绿色技术”的运用,这就要求我们掌握山地城市生态系统的组成要素,找到了它们之间能量和物质流的联系规律,把它们当做一个整体进行设计,从而减少甚至消除废物,增强山地城市环境的健康性。而对于一些无法摆脱的“废物”,则应利用能量和营养流的原则将生物圈某一部分的废物作为另一部分的资源,比如回收有机产品以恢复土地肥力和生产能力,回收废水以保持地下水位和水洁净度、以及发展森林生产和农业;建造用于汇集城市污水的池塘作为一种人造湿地,成为新的水鸟栖息地;收集雨水以改善河流水质并维持土壤稳定等等。

山地城市建设技术“生态化”程度一览表

序号	技术项	生态化程度值	说 明
1	控孔桩基	0.9	对地基干扰面小,引起水土流失可能性小
2	底层架空(现代“吊脚楼”)	0.9	对地面通风、采光、市民活动、绿化影响小
3	普通砖、混凝土墙面	0~0.3	高能耗材料、热工性能差,但空心砖有所改善
4	轻质复合板材	0.4~0.6	热工性能大大提高,减少了能耗
5	玻璃幕墙、屋面	0~0.9	如果不分场合滥用则是高能耗、高造价,而适当和应用则可取得良好效益
6	生态墙	0.7~0.9	绿色墙面以植被覆盖、节能
7	种植屋面	0.7~0.9	相当程度的耕地还原、节能
8	覆土建筑	0.6~0.9	包括窑洞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整体的生态化
9	现有排污系统	1~0.4	只将污水排走,污染水域
10	沼气池	0.9	净化污水,产生新能源
11	石板材或混凝土挡土墙 防噪声墙	0.2~0.3	只起到稳定边坡的作用,“灰色”表面
12	生态式挡土墙、防噪声墙	0.9	
13	混凝土停车场	0	“灰色”表面
14	生态式停车场	0.4~0.9	绿色表面,将“灰色”比例大大减少

(资料来源:黄天其,《开发生态学与山地城镇的可持续发展》,黄光宇主编《'97山地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7~28页。)

同时,研究与实践,黄天其还提出了几个值得注意的理论:

1.山地的全域生态角色:必须认识某一山地作为一定地域整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的作用,如水土保持、森林资源、物种基因库、气候条件、旅游资源等作用。其开发对整个流域可能发生的正负效应。在开发的强度、项目类型方面必须作有依据和有成效的控制。

2.生态补偿的社会原则:某一开发活动对其他地域或个体造成的损失必须予以充分的补偿。还要求对损益作科学的计算。补偿必须得到法律保证。在我国,以邻为壑式的盲

目和野蛮开发实在触目惊心。强化关心生态责任的法律刻不容缓。

3.生态补偿的开发方式与生态技术系统:在我国,生态技术也开始得到重视和投入,但在山地城镇开发中从生态学考虑建立一套较完整的系统还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检索现有的山城城镇建设技术,可以评价其“生态化”的程度。

通过微观、中观、宏观的三种技术方式的列举研究(1.在传统技术评估和认识的基础上,直接将所获得的经验、数据、处理方式等应用于现代住屋的设计和建设中——这是微观层面的技术手法,也是最基础的研究。2.通过建设场地的分析,获得“趋利避害”的处理手法——这是中观层面的技术手法。3.结合生态学与系统论的观点,通过对城市建设技术的生态化评价,从经济学与生态学的角度对城市生态系统的组成要素进行整合设计,以期获得最小的生态负影响——宏观层面的技术手法),肯定了对传统地域技术的改造、升华在面对新的建筑问题,在现代化的建筑类型中依然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

#### 四、关于能源:太阳能、风能利用与地区建筑的发展

中国的西部与东部很大的不同就是自然资源丰富,人文历史信息的保留还比较完整。西北地区是中国的干燥地区,降雨量少,风沙大,因为过度放牧等原因,牧场退化严重,沙漠化程度加重,客观上更导致了环境的退化。但从能源利用的角度,西北地区则有着很好的利用自然风能的潜力。风能是少数几种无污染的能源之一。目前的风能利用大多只限制在大型的风力发电,而对于如何在建筑设计中有效地将这一空气动力与人们所需的微环境联系起来,值得深入探讨。<sup>[42]</sup>

中国的西南地区,尤其以川西滇西北地区为主,有着丰富的太阳能、风能的能源蕴藏。该地区是中国日照最充沛的地区之一,横断山区、攀西地区的年太阳总辐射量均大于6000百万焦耳/米<sup>2</sup>年,年日照时数2200—2400小时,其中中间所在迪庆地区的年日照时数超过2600小时。以拉萨为中心的藏南山区,其年太阳总辐射量大于7000百万焦耳/米<sup>2</sup>年,年日照时数2800—3000小时,年太阳日数平均大于300天。藏东南的年太阳总辐射550—650kJ/cm<sup>2</sup>,名列第一,横断山区与大凉山地区的大地形格局为西北斜向东南的大坡面,地势高,空气清新稀薄,大气透明度高,区内日照充足,辐射强烈,该区年日照时数平均大于2200小时,其中攀枝花、盐源两地的年日照时数达2500小时。全城内大部分地方的年总辐射量在544kJ/cm<sup>2</sup>以上,大大高于同纬度的其他地区,其中攀枝花、丽江的年总辐射量均在600kJ/cm<sup>2</sup>以上,中间、大理、西昌等地的年总辐射量在550kJ/cm<sup>2</sup>左右。总体上,川西滇西北地区太阳年辐射总量高于我国北方和西北大部分地区,更比四川盆地、长江沿岸的宜昌、武汉、上海等地高得多,属我国太阳能资源最富集的地区。据测算攀枝花地区太阳辐射最强时,1米见方面积上获得的太阳能要比一台一千瓦的电炉在同时间里产生的热量还要多得多。<sup>[40]</sup>

在笔者看来,在建筑设计中引入自然的能源(太阳能与风能为主)理应是未来建筑设计的一个主流,尤其理应是川西滇西北地区建筑发展的主要趋势。上文已经多次揭示建筑的形态、构造与等自然地理环境之间的密切关系,而在高原地区集镇化过程中,应该加强对自然环境诸多因素的研究,利用其有利因素,从中提取与该地区相符的建筑语汇。而对于太阳能的利用就是一条很好的突破口。

尽管如此,要真正将太阳能应用于建筑设计中却并非易事。利用太阳能有多种方式,最直接的方式是利用太阳能发电、利用太阳灶烧水等。这种方式在川西滇西北的广大地区多有发现,从川西的乡城到更西边的拉萨、南边的昆明已经成为普遍的现象,甚至在拉



萨的喇嘛庙喇嘛也是用太阳能烧水(图 5-5-5)。其中太阳灶非常适合牧民的生活:体积不大,可以随时拆卸安装,简单实用少花钱,因而受到牧民的欢迎。另外,就是利用“大棚”的温室效应种植蔬菜。这也获得了有效而广泛的推广。由于这项技术的应用,在许多地区,包括拉萨,吃蔬菜已经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了。

从国外的资料上看,对于太阳能在建筑设计中的利用,很大的程度也是利用太阳能集热板等设备,获得生活热水,或通过蓄电池储存



图 5-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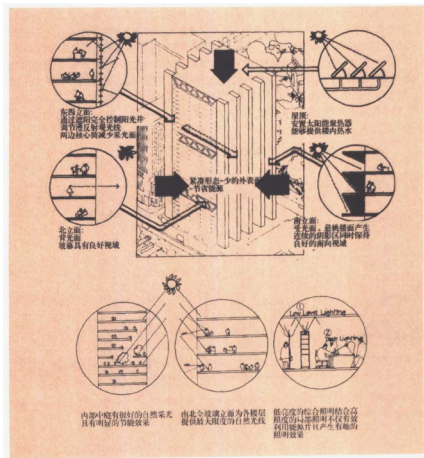


图 5-5-6 香港汇丰银行不同朝向的表面处理及对于光线的利用

能量,维持电器运转等。这是利用“设备”将太阳能转化为人所能利用的能源,也是较为直接的方式。从更广的范围来看,则是在合理有效地安排建筑的朝向、平面布局、内部空间处理等的前提下,在于对建筑材料、构造形式等的研究和推敲之中<sup>[41]</sup>。从根本上讲,这些处理手法并没有脱离传统的设计理念。在这里列举诺曼·福斯特设计的香港汇丰银行为例。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高技派作品,但是从建筑师的设计概念图中,可以看到福斯特对于光线非常理性、传统的理解和应用。向来具有先锋意识的英国建筑师诺曼·福斯特的许多作品表达了他对于光线运用的深思熟虑。在香港汇丰银行的设计中,对于照明计划的思考充分体现设计者的能源观。在室内外空间交接处,诺曼·福斯特针对不同朝向采用了不同的处理手段来调节室内光线:东西立面上,通过遮阳完全控制光线渗透并调节漫反射光的强度;南立面(受光面)利用悬挑楼面产生了连续阴影区同时保证了良好的南向视域;北立面(背光面)则使用了大面积的玻璃,允许柔和光线的弥漫四散。(图5-5-6)同样,在他设计的法国卡地亚艺术馆处理上,采用了类似方法。他走得远的地方在于使用了一些较为先进的材料,以及智能化的设备来调控建筑细部构件与所需的太阳光线、通风等之间的关系。

囿于西南地区的落后经济以及相应的技术、材料等条件,比较现实的做法就是在原有的建筑模式上针对现实的生活需求进行适度的调整,其中不仅仅具有技术的延续意义,更具有文化上的意义。如川西滇西北的邛笼建筑有着许多杰出的措施回应于恶劣的极端的气候,在新的邛笼建筑中完全可以直接拿来利用。而对于高原集镇上的建筑,除了设备上的应用更要强调的是顺从环境,走技术理性的道路,这是一条最基础的、最根本的道路,也是最快的捷径。其可能的发展在于基于原有的平面布局,通过诸如走廊、遮阳、檐廊、挑台等附加构件减少高原太阳的强烈辐射对于实际使用的影响,或通过设备形式与建筑构件的集成而产生新的建筑形式——这些就是产生新建筑的基本语汇。在类似气候条件下而文化较为发达的阿拉伯地区已经为我们描绘了可能的前景。

攀枝花太阳能指标

项 目	月 份												备 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水平面太阳总辐射月总量 (卡/厘米 <sup>2</sup> )	10755.4	12113.5	14999.9	15179.4	15179.8	13531.9	13311.4	14231.7	11748.4	10530.4	8649.4	9686.4	年总量 150457.6
日照百分率 (%)	77	79	77	70	61	48	46	54	49	56	62	74	年平均 62
平均气温(℃)	12.2	15.8	20.2	23.6	26.5	25.8	25.4	24.7	23.2	20.1	15.3	11.8	年平均 20.4
日照时数 ≥6小时天数	27	25.4	27.9	26.3	23.3	16.3	18.1	19.4	16.2	17.3	20.3	25.4	年总量 263
日照时数(天)	253.9	249.8	285.7	268.3	255.3	197.6	194.2	219.0	181.5	197.9	202.5	239.3	年总量 2745.2

资料来源:蒲泽权著《攀枝花地区太阳能利用现状及发展概况》攀枝花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院刊  
(内部资料) 1987.1

## 第六节 小结

在一个全球各个地区互动日趋紧密的社会中,所有的对于未来的尝试都应抱有“全球思考,地方行动”的理念。——所谓“全球思考,地方行动”指的是“实现基层取向与全球视野结合的思想,包括生活方式、绿色社区、技术手段、文化多样性、对个体行为意义的强调等”。<sup>[1]</sup>既要有开放的、学习的意识,在实际的研究和实践中又要抱有审慎的态度,“拿来”是应当有所选择的。这是笔者的态度,也是本章试图表达的内容。

“在中国尚不具备许多高科技手段的现状下,在中国建筑师还不太掌握相关科技手段的前提下,不妨从最熟悉的道路起步,这就是地域性建筑。我们曾经指出过,中国地域性建筑成就很大,它是中国几代建筑师共同努力的结果;其问题也比较集中,它更多表现为形式本位;但它前景广阔,可持续发展的建筑有可能从这里起步。特别是中国的西部地区,当地的特殊自然条件和环境,曾经与人民的智慧相结合,创造出抵御不良自然条件、形成宜人生活环境的建筑。这一点,地方上的建筑师有条件成为引路人,使得他们的地域性建筑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引路建筑。”<sup>[2]</sup>

邹德农先生在《现代中国建筑史》中这段平和而深刻的言语同时也道出了笔者的想法。

---

[1] 参见邹德农:《现代中国建筑史》,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版。

[2] 伍敬:《地域·生态·建筑》,重庆建筑大学硕士论文,1993年版。

[3] 吴良镛:《世纪之交展望建筑学的未来》,建筑学报 1999年第8期,第8页。

[4] 肯尼斯·弗兰普顿 原山等译:《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5] 蔡云楠:《现代山地城市美学研究——体系、观念、方法》,重庆建筑大学博士论文,2000年。

[6] 吴良镛:《世纪之交展望建筑学的未来》,建筑学报 1999年第8期,第6页。

[7] 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8] 郎庆治:《绿色乌托邦——生态主义的社会哲学》,泰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页。

[9] 参照郎庆治:《绿色乌托邦——生态主义的社会哲学》,泰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142页。

[10] E.F.舒马赫:《小的就是美好的》,虞鸿钧,邓关林译,刘静华校,商务出版社,1984年版,第36页。

[11] E.F.舒马赫:《小的就是美好的》,虞鸿钧,邓关林译,刘静华校,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5页。

[12] E.F.舒马赫:《小的就是美好的》,虞鸿钧,邓关林译,刘静华校,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21页。

[13] 参见郎庆治:《绿色乌托邦——生态主义的社会哲学》,泰山出版社,1998年版。

[14] 郎庆治:《绿色乌托邦——生态主义的社会哲学》,泰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169页。

[15] 何强、井文涌、王翔亭:《环境学导论》,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74页。

[16] 建筑作为居住的容器本身需要消耗能源来维持人基本的生理需求,是能源的消费者,尤其是以电能为主的人造能源,另一方面产生的垃圾等废物也很难消解,难以形成一个生态循环圈。因此在建筑设计中不可能使用完全意义上的“生态技术”。严格意义上应称之为“准生态技术”。

[17] 宋晔皓:《结合自然 整体设计》,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54-55页。

[18] Catherine Slessor: (Eco-Tech-Sustainable Architecture and High Technology), p130.

[19] 所谓的适用技术(也称适宜技术)指的是适宜于当地生产生活的一种技术方式。它根据不同的地区可以采用不同技术,先进地区所使用的技术含量比落后地区使用的技术含量要来得高。它并不限定使用何种技术方式,但是以“少费多用”为基本目标。目前适用技术通常被用在指发展中国家应当理智选择适合自己技术方式,不应该盲目追求先进国家舶来的技术方式。

[20] 所谓的传统技术指的是在过去的历史时间内,人们长期与自然调适过程中总结出来的技术方式。不同地区、不同的自然地理空间相应有着不同的传统技术。传统技术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方式,其中还蕴藏着丰富的建筑文化信息。传统技术由于相对落后,通常结合现代的技术进行适度的改造,形成所谓的“中间技术”,也称之为“传统技术现代化”。目前在中国,由于文化建设的滞后,传统技术不太受人们的关注,但随着建筑文化研究的深入,这种状况将逐渐改变。

[21] 尤其是在中小城镇中。中小城镇本身具有进行小规模生产,集权分散化的特点,符合舒马赫提出的“小的就是美”的特征,而且尚保留有相当的传统经济模式、技术方式以及传统的工匠等。如果不加以引导,让中小城镇盲目追随大城市的发展模式,很容易造成地域经济的极大依附性,文化的边缘性以及地域特色的丧失。而在中国,大城市的命运往往在于中小城镇和广大农村的发展。

[22] 林楠:《在神秘的面纱背后——埃及建筑师哈桑·法赛评析》,《世界建筑》1992年第6期,第67-68页。

[23] 所谓的捕风窗就是开口迎向主导风向,高出屋面的导风烟囱。它利用高处气流速度快,气流温度低的特点将流动的空气引入建筑中,满足了室内的通风需求。

[24] 如美国建筑师 Rod Hackney 提倡的社区运动、亚历山大·克里斯托夫提出的社区建设的模式语言以及拉尔夫·厄斯金的拜克赖小区的公众参与等。

[25] 戴路 邹德依:印度与西方现代建筑的对话,《世界建筑》1999年第6期,第39页。

[26] [27] 肯尼斯·弗兰普顿 饶小军译:查尔斯·柯里亚作品评述,《世界建筑导报》1995年第1期,第9页。

[28] 关于这个区域,还有许多相应的称呼,如“灰空间”、“奥空间”、“过渡空间”等,都有类似的含义。

[29] William J. Curtis: Modern architecture since 1900, London, Phaidon Press Limited, 1996, P591. 作者翻译。

[30] 厄斯金的这个论断为西南地区干热与干冷地区建筑形式的相似性提供了佐证。川西、滇西北地区气候严寒,降雨量少,而滇中一些地区则是干热气候;还有由于气候的立体分布,山脉的顶部是干冷气候,而河谷地则是干热气候,然而这两种气候状态下的建筑形式却多有相似,如藏羌之碉楼与彝之土掌房。厄斯金还认为,通常在传统建筑中,两者的表现是不同的,原因在于缺乏交流及两种极端气候间种族迁徙的可能性极小。但这种现象在中国西南的川西、滇西北地区却大量的存在,这是因为西南复杂的山地地理产生了气候的多样性。

[31] 林楠:《在神秘的面纱背后——埃及建筑师哈桑·法赛评析》,《世界建筑》1992年第6期,第70页。

[32] 以上气候资料主要来自:叶启荣:《四川藏族住宅》,第6页。

[33] 这里所指的“空气间层”事实上有点类似查尔斯·柯里亚提出的“中间区域”,但有点不同。“中间区域”指的是建筑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一个区域;而“空气间层”有更广泛的内容,外圈的部分都可向内部分的“空气间层”。

[34] 毛织:《地域性与本土精神》,重庆建筑大学博士论文,2000年。

[35] 由于生产方式的差异,藏族的住屋较少形成聚落的形态,少的往往单栋修建,多的也仅为三、五栋。这是游牧在藏族的的生产方式中占主导的原因所致。

[36] 赵伟:《三峡库区院落空间研究》,重庆建筑大学硕士论文,2000年。

[37] 详见李兴发:《一颗印的环境》,《中国传统民居与文化》第二辑,第176-186页。

[38] 目前对于民居的研究已经有很大的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实地调查测绘到后来的研究“风水”对于村落布局的影响;研究宗法制度与村落、祠堂的关系以及从民俗文化环境的角度来研究传统民居等等。研究的视野已经从单纯的建筑学形体研究扩展到包括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地理以及环境研究等方面,研究的人员也不仅仅在建筑学领域,如北京大学人类学者王铭铭的《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利》等。但是这方面的研究从总的来看还是凤毛麟角,尤其是从技术的角度,以“量化”的形式对于传统建筑的研究是少之又少。

[39] 唐璞:《山地住宅建筑》,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0-106页。

[40] 选择标准按:满足冬至日照2小时;住宅方位与热轴大于70°夹角;风向投射角度以45°为佳。中缓坡地以平行等高线布置为佳,陡坡以斜交等高线布置为佳以及住宅间距比少于平地为佳等。

[41] 黄天其:《开发生态学与山地城镇的可持续发展》,黄光宇主编《'97山地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页。

[42] 有研究在荒漠地区引入通风塔、地下通道,是一种被动式的利用方式。见黄薇:《建筑形态·自然条件·建筑文化》,《建筑师》第56期,第9-20页。

[43] 数据资料参见:《渡口的太阳能资源》渡口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刊,内部资料,1986年第2期,第2页。

[44] 参见 Thomas Herzog: *Solar Energy in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New York, Prestel, 1996。

[45] 郁庆治:《绿色乌托邦——生态主义的社会哲学》,泰山出版社,1998年版。

[46] 邹德依:《现代中国建筑史》,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618-619页。

## 结 语

西南地域建筑文化与其地域文化一样错综复杂,其间有着太多的内容需要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张光直先生曾经指出,“西南的民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中国古代的多样性的民族情况,西南民族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中国民族史,同时西南民族文化的细节也常反映着中国古代文化的细节”——因此,进一步梳理西南复杂的山地地理空间中的各种文化亚型及其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弄清楚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发展脉络。

正如郭湖生先生所言:“对中国建筑的研究总体而言虽粗具规模,但浅尝辄止,不求甚解,乃至以讹传讹的情况尚多。许多问题至今若明若暗,似是而非。”越深入研究西南地域建筑文化,就越发觉相关问题研究的薄弱和不甚明确。一个区域文化的研究除了本身范围内的诸多现象外,离不开周边区域文化研究成果的支持。西南地区更是如此。西南有着多样而广泛的文化周边临界,西南地域建筑文化的形成格局与这些周边文化影响不无关系。但是长期以来,我们更习惯于将眼光固定在某一特定的东西上,尤其是其表面现象,而不善于用动态的,联系的思维来审视事物背后的历史成因、形成机理等等。

另一方面,横向上则有必要拓宽与相关学科研究的联系,将“建筑”研究真正纳入“文化”研究的范畴,真正将其作为反映其所处时代生活面貌的一面镜子。换句话说,有必要将建筑与风俗习惯、衣表相貌、器皿器物、以及墓葬礼仪等等各个方面联系起来,因为建筑每一个过程的演变无不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共同影响的结果。

## 附录:合院建筑外部空间设计初探

(笔者按:长期以来,笔者对于“合院建筑是如何进行外部空间尺度和空间序列安排的”这一课题非常感兴趣。笔者深以为,中国古代传统合院建筑中存在着一整套完整的“数理美学”关系,而这种数理关系与中国古代哲学紧密相连,是中国古代传统合院建筑体系的精华所在。可以说,中国古代社会中,事无巨细,任何局部都包含着整体的性质,任何细部都反映着整体的影响。也就是说,从城市尺度到建筑群体到外部空间设计到建筑单体的营建而至家具、玩物,其中肯定存在着某种联系。可惜这种隐藏的关联长期以来没能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但是也有些学者作了不少的研究,如傅熹年、王其亨等等。正是基于他们研究的基础之上,才有这篇短文的产生。

由于西安化觉巷清真寺简化了“一门一堂”的做法,仅在空间序列的最后布置了礼拜大厅,相对而言较为简单。作为合院建筑外部空间研究的开始,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案例,因此案例的选择不限于西南地区。)

### 合院建筑外部空间设计初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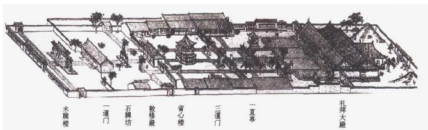
——以西安化觉巷清真寺为例

我先后到过西安多次。除了品尝羊肉串外,闲逛化觉巷清真寺是必做之事。黄昏之时在袅袅烟气和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品尝羊肉串,有一种置身城市的感觉;而闲逛化觉巷清真寺,则能得到一种美的享受,一种心灵的沉寂,假如在这个城市的脚步不太匆匆的话。

化觉巷清真寺始建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历经多次修葺,而今依然散发其灿烂的魅力。西安是十三朝古都,历史的沉淀使这个城市厚重而有内涵。然而经济大潮中的城市开发层叠了许多历史记忆,黯淡了这个城市的光辉。余留下来的历史名胜却多因缺乏人的活动而寂寥。当建筑脱离人独立存在时,它本身仅是“历史的标本”,散失了其原有意义。化觉巷清真寺则不然。它不仅是这个城市的历史记忆体,它还是一个活的标本。它目睹了这个城市的刀光剑影、风风雨雨;同时它也经受了风风雨雨的冲刷。而今,它依然是回民们礼拜活动场所。

因为它的重重历史,当踱步其中,尤其在短短的时间里从喧嚣的车水马龙中、从现代化的钟鼓楼广场中突而转入长长窄窄的回民巷里,又从窄窄长长的回民巷折入其中时,常有一种时空错位的感觉。在这里,听不到车辆的啸叫声,也没有斑斓的霓虹广告;在这里,听得到是静静的脚步声,有的是素雅干净的叠叠院落;在这里,细细密密的砖雕,展翅欲飞的屋角,宋时书法大家米芾遒劲有力的“道法参天地”以及冲天峻峻的枝干,都让人沉浸在美的享受中,沉浸在对过去文明的心仪中。

化觉巷清真寺因其本身宗教的特点,和中国其他传统建筑存在不少区别。特有的邦克楼、水房等建筑是清真寺功能要求;因礼拜必须面向“麦加”,所以清真寺必须坐西朝



图一 群体布置



图二

1. 碑廊登州;
2. 木牌坊;
3. 石牌坊;
4. 二进门看省心楼

东,与传统寺庙坐北朝南的布局方式相去甚远。同时可能是由于伊斯兰教的圣物——黑石的缘故,寺中置有大量各类异石。另外,寺内使用了数量众多的精致砖雕壁照,多为各种植物装饰,这也是其他传统建筑所没有的。再者,伊斯兰教反对偶像崇拜,清真寺建筑的功能就是为教民提供一个礼拜场所,最重要的殿堂即为礼拜堂。相对地,佛教建筑往往遵循“迦蓝七堂”的布局,一门一堂,堂中供奉各种神像。因此,化觉巷清真寺中明显地弱化了“一门一堂”的布局方式,将“堂”转化为“门”的样式,突出了礼拜堂的重要性。然而,一进展进的院子,要使其丰富而不单调,有品位而不匠气,实属不易。(见图二、图三)

化觉巷清真寺整体建筑群面宽 47.56 米,进深 245.68 米;沿着纵深方向布置了进深不一的五进院落(见图一)。根据明嘉靖年所立《敕赐清真寺碑图》的现存史料分析,化觉巷清真寺的发展是一个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过程。如此复杂的建筑加建过程居然保持相当一致的整体性和连续性,这不由令人诧异。古代的司空、工匠是如何延续这种一致性的呢?

整体性和连续性的产生理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即建筑物之间的相互呼应,从屋顶形式、材料、色彩到细部、装饰等方面的协调;另一方面则是院落空间与建筑物之间关系协调,包括人的感知领域控制,空间动态变化控制等。“中国的建筑艺术大致可分两类,一方面在建筑‘实体’营造上,包括结构、构造和各种装饰;另一方面则在借助建筑实体创造一系列景象组织和安排,有序地将意念传达给使用者、欣赏者”。(李允禾《华夏意匠》,1985 年版。





图三  
1.省心楼；  
2.一真亭；  
3.三门门；  
4.从一真亭看礼  
拜大殿

第153页。)简言之,即“形”与“神”的创作。“形”为工具,而“神”的创造就是中国古代艺术所追求的“境界”;用可视实体来感染人的精神境界,牵动人的情感,让观赏者的情绪随创作者起伏跌宕。——返观各类艺术,从虚无缥缈的山水画到酣畅淋漓的狂草书法,从抒情达意的诗词文字到最具实用功能的建筑与园林无不体现出这种审美观:有“意境美”则为上品,反之则为下。

故而,对于“形”的位置选择、尺度控制以及之间的相互关系推敲远比单纯“形”的塑造更为重要;反过来说,则是创作者通过对“无形”的高度理解,调动“有形”的实体来创造高度感染力的艺术形式。建筑艺术中,则体现为对空间尺度、人的感知领域以及二者间关系的高度理解和把握。

简单的提法是这是一种动态设计,是有关空间·建筑的“高·深·广·远”的设计。可是落实到实际的有形形态中,在化觉巷清真寺中,古代的工匠们又是如何着手进行的呢?

#### 1. 主体建筑明间尺度(a)是单体建筑设计的一个基本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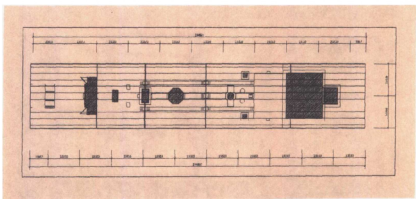
“传统建筑中,单体设计通常是以明间面宽作为其基本单位,……进深由面宽所引申,立面和空间也来自面宽。从面宽引出檐柱高,再引出檐桁高,再根据举架法或举折法决定脊桁高,从而得出整座屋高。”——通过几何作图发现礼拜大殿的明间面宽a约为4667mm,是一个关键性的数字,一个同其他建筑与空间有着紧密联系的尺度。

礼拜大殿面宽7个a,是所有建筑中宽度最大的。一真亭只有3倍的大殿明间面宽;

三道门整体宽度同样也是 3 个  $a$ , 然而除中间门洞是  $1a$  外, 其余两个为  $0.5a$ ; 省心楼、敕修殿、石牌坊、一道门、木牌楼则分别为  $2a/2a/1.5a/6a/3a$ 。

$H=a/2=4667/2=2333.5\text{mm}$  是单体建筑高度的基数。木牌楼高度是其此基数 4 倍、石牌坊为 3 倍、敕修殿也是 3 倍、省心楼为 5 倍高、三道门则为 2.5 倍, 一真亭是此基数得 4.5 倍, 礼拜大殿作为整体建筑群的终结与院落空间的结束, 高度也是所有单体建筑中最为宏伟的, 足有六倍高。

也就是说, 通过大殿明间面宽  $a$  的确定, 其他建筑单体与院落尺寸也就有了相对的尺度依据, 证实了传统建筑的设计思维是从主体建筑等级——用材大小——明间面宽——单体面宽、深度与高度——院落尺度——组团围构的这么一个互动过程。(见图四)



图四

然而  $a$  作为外部空间设计的尺度明显偏小, 如整体建筑群面宽  $w$  为 10 倍  $a$  的宽度, 而进深是  $105 \cdot a/2=105h$  的宽度, 倍数过大, 不便计算, 看来应该存在另外一个基本数, 它应该比  $a$  大, 同时有着倍数关系, 适合于作为外部空间设计的衡量尺度。也就是说, 可能存在于以下这样一种关系:

家具  $\leftarrow$  单体建筑用材  $a' = a/n \leftarrow a$  (建筑基数)  $\rightarrow d = n \cdot a$  (空间基数)  $\rightarrow$  外部空间尺度  $D = n \cdot d \rightarrow$  天·地·宇宙

通过一个基本数将建筑与天地联系在了一起, 而这也就是中国人简单而深邃的传统“数理”哲学。

## 2. 五倍明间( $d=5a$ )是外部空间设计的基本模数

王其亨先生对传统建筑的外部空间设计做过深入研究, 发现中国古代外部空间设计模数“百尺为形, 千尺为势”的规定。传统建筑研究一直停滞于建筑实体形态、结构构造的考研上, 而对建筑与空间关系的研究则显苍白。“百尺为形, 千尺为势”的这一空间模数对研究传统空间布局是非常重要的依据。

“百尺”依中国古尺, 折算成公制约为今天的 23—35 米。这个尺度是人眼能够清楚辨认事物和耳朵清晰获取外部声音的距离。耳朵和眼睛捕获的信息超过了人接受信息总量的 90%, 也就是说, 在 23—35 米的距离内, 人能够全面了解和掌握周围发生状况, 是人所能确切感知的领域, 所以是符合人心理的空间尺度。那么, 化觉巷清真寺中是如何运用“百尺为形, 千尺为势”的规定的呢?

通过研究分析,发现五倍明间( $d=5a=2333.5\text{mm}$ )是外部空间设计的基本模数。以中轴线和最西端墙为基线, $d$ 为基本模数绘制经纬网格,重叠于总平面图上,惊异发现其间的吻合处:中轴线上的木牌坊、石牌坊、敕修殿、省心楼、三道门均位于网格的交叉点上,而建筑群的面宽基本为中轴线对称的两个网格距离;在最具感染力的第四进院落中,从礼拜大殿的正脊到一真亭为两个23米的尺度。整体建筑群中,最远的视距是在一真亭至礼拜大殿的屋檐,而这一尺度被严格地控制在35米的距离之内。另外,建筑群进深245.68米在“千尺”范围内,正是愉悦的步行距离。——这种吻合充分证实和反映了古代匠师深刻认识和把握了有关行为和视觉心理的规律,也体现了其高超技艺。(见图四)

日本建筑师芦原义信在其著作《外部空间设计》提出行程为20—25米的外部空间模数,也是基于对这一空间尺度的深刻认识。“关于外部空间,每20—25米,或是有重复的节奏感,或是有质材变化,或是地面高差有变化,那么即使在大空间中也可以打破其单调,有时会一下子生动起来”——化觉巷清真寺中除第四进院,(然也在“百尺”的规矩之中)其他院基本控制在两个23米的尺度里,第三进院中,纵横恰为两个23米的网格。而每进院的围合都有一突出标志物来分隔空间与活跃空间氛围(一进院为木牌坊,二进院为石牌坊,三进院为省心楼,四进院则为一真亭),使空间的尺度限定在“百尺”之中。从图一可清晰地看见这些标志物同样被巧妙地置放在23米的网格规矩中,起到界定场所的重要作用。再者,院与院间的过渡则是通过地坪标高变化而获得。

对于平面尺度的规矩是整体思维中的一环,是整体设计不可或缺的一步。但是建筑是三维的空间艺术,中国传统建筑更需有动态观感的变化,仅有平面尺度的控制很难获得空间变化的起、承、转、合而至高潮,达到空间韵律的节奏变化。化觉巷清真寺中,每一进院子的深度与宽度、主体建筑物与构筑物的面宽与高度不一,古代的匠师们又是如何控制这一空间的动态变化呢?

### 3. 视点、视距、视角的控制是外部空间设计中的重点

视点的选择、视距与视角的控制是外部空间设计中的重要内容,是研究空间动态变化的重要依据。传统建筑中,不论是严正的宫式建筑还是灵性的园林空间,使用者所获得的场所变化、景观感受多在创作者的安排之中。创作者运用构形要素来控制使用者的最佳视点、视距与视角,精心组织空间序列。然而使用者所获得的场所、景观的感受却非一成不变。创作者善于将自然景致纳入其中,山光云色、四时变化皆入其内。宋时苏轼在《赤壁赋》中写道:“惟有望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是故,许多传统建筑多能激发人的情感联想,让人“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而此乃建筑之上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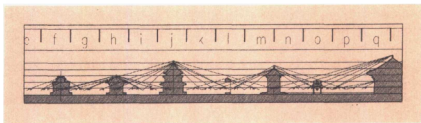
根据现代外部空间设计理论,建筑物与视点的距离(视距 $D$ )与建筑高度( $H$ )的数理关系同人的感受范围存在内在联系。当 $D/H=2$ 时,即仰角为27度时,可以完整看到建筑;当 $D/H=3$ 时,即仰角为18度时,则可完整看到建筑群等等。另外,从平面视角来说,中心视场往外30度则是视觉清楚区域,是观看物件总体的有利视角。——水平视角涉及到建筑的宽度与视距,垂直视角涉及到建筑的高度与视距;也就是说,建筑实体形态处理与布置左右着视距、视角等,左右着人的空间感受。那么,化觉巷清真寺又是如何处理这些关系呢?

在平面尺度限定范围下,最远视距被控制在35米内,即人能够清晰辨认事物的最远距离。视距限定的情况下,视点的选择成为设计要点。“凡与过白的景框构成直接关联的空间序列上的行进起始点、转折点或交汇点……也包括室外建筑轴线交汇点,道路、流水、桥座、月台、庭院、广场、踏跺以至墙垣等等的边界点,起止点、转折点、交汇点等,都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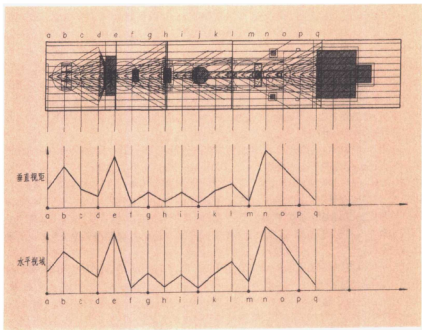
以构成过白观赏点。”——从王其亨先生对“过白”的分析中可以解读，凡从一景致转换到另一景致时，或从一种心理感受延续或转换到另一心理感受时，这些转换点往往就是最佳视点。依照现代外部空间设计理论及视点选择的认识反证化觉巷清真寺的视线设计，所获得的结果让人感慨古代匠匠们的鬼斧神工，赞叹古人的明察秋毫。

在几十个控制点上，从垂直与水平方向作几何研究。水平视阈上，分别在控制点上作出  $30^\circ$  与  $60^\circ$  角，得出的结果是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的视阈变换是一个深思熟虑的过程：沿行进路线的每一个建筑实体，在控制点获得完整观赏视阈的视角均控制在  $60^\circ$ ，符合人眼的视觉泛域；而  $30^\circ$  控制角的观赏域，又将建筑中心部位的重点观赏区域控制在内。每一个建筑都可以在视线走廊上获得由远及近，由整体到局部、由群体到单体的充分感受。对各种观赏角度的精心设置，使建筑群体在人的步行过程中体验步移景异的变化，以单纯的建筑组合创造出有着丰富变幻的空间。垂直方向上将控制点（取人视点到 1600mm）与相邻建筑高点连线，每一控制点所获得的视角另人惊讶地均有着  $D/H=1.2, 3$ ，即  $45^\circ, 27^\circ, 18^\circ$  的数理关系。（见图五）在暗藏的空间秩序控制下，建筑群体在严整对称的组合中构成了丰富的院落群，创造了多重的视觉感受而又不会显得零乱无序。

图五



图六



将每一控制点的垂直视距大小与水平视阔广窄联系起来,就是对人的空间尺度感知的研究。分别把主要控制点所获得的垂直视距与水平视阔( $30^\circ$ )绘成图表(见图六),可以明显发现二者变化的一致性。随行程的推进,人眼在各个控制点通过视阔的开阖感受空间的变换,而这心理感受的张弛,与图表中视距与视域的尺度变化同步。

#### 4. “理、气、数”与传统建筑设计

传统建筑设计与古代中国人对自然界的基本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宋代理学家朱熹在他的“理气”学说中对“理”和“气”的本质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气”是构成宇宙间一切天体的物质能量,“气”在“理”的规律下运行;而整个大自然的运行则是由“数”来支配。“数”的含义极广,早在古希腊时期,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学者就发现音符的声调是依着弦长的简单比数而定,于是判定这个简单比数也符合于各个天体和地球之间的距离。事实上,他们相信这些天体不停地发出音符,不过只有极少数天赋特殊听觉的人才能听得到。在中国的数字学中,也有毕达哥拉斯学派式的理论,古代中国哲学家也运用数字来解释大自然的规律及生命界的现象。朱熹说“有是理,便是气;有是气,便是数。”用以说明“数”与“理”、“气”的密切关系。而在远古流传的《河图》、《洛书》中亦清楚表示数字之间的自然联系。因此,中国的传统建筑与远古时期的人们对宇宙、自然的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传统建筑的数理关系与人们认识中的天地宇宙的数理关系一脉相承。在此,从宇宙天体到建筑群组合与单体建构,从建筑构配件乃至细部装饰与内部家具,无一不遵循这一数理结构,构成了统一的、理想的数理模数系统。

对化觉巷清真寺建筑群的数理分析只是在这一方面的一种探索,本文在此只对其外部空间的尺度进行了研究,尚需进一步的探讨和广泛、科学的印证。古建筑中蕴涵的哲学意义博大精深,对传统建筑空间数理模数、尺度控制的探寻将是一个辛苦、漫长而又有趣的过程。



## 主要参考文献

- 1.刘敦桢,西南古建筑调查概况,刘敦桢文集,《三》,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 2.童恩正,南方文明,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
- 3.童恩正,古代的巴蜀,试谈古代四川与东南亚文明的关系,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
- 4.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上海,三联书店
- 5.刘敦桢著,三其明增补,中国居住建筑简史——城市、住宅、园林,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0

- 6.郭湖生,我们为什么研究东方建筑,载于杨昌鸣著《东南亚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建筑文化探析》,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

- 7.吴良镛,江南建筑文化与地区建筑学,吴良镛城市研究论文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 8.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南方文明,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
- 9.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9
- 10.宋蜀华,中国民族学理论探索与实践,北京,中央民族出版社,1999
- 11.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 12.黄才贵,亚太干栏文化比较研究,建筑与文化论集,第4卷,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 13.奚国金,张家坝,西部生态,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
- 14.王文御,陈琳,中国传统民居构筑形态的自然区划,建筑学报 1994(7)
- 15.高曾伟,中国民俗地理,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
- 16.徐新建,西南研究论,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5
- 17.高亦兰,建筑形态与文化研究,建筑师(56),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 18.段渝,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
- 19.申旭,刘维著,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跨境民族,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8
- 20.邓少琴,巴蜀史稿,重庆地方史资料组
- 21.徐治,王清华,段鼎周,南方陆上丝绸之路,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7
- 22.宋治民,蜀文化与巴文化,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 23.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上海,三联出版社
- 24.袁庭栋,巴蜀文化志,中华文化通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 25.常青,建筑志,中华文化通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 26.吴必虎,景观志,中华文化通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 27.尤中,云南民族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
- 28.罗二虎,秦汉时期的中国西南,天地出版社,2000
- 29.佐佐木高明,照叶树林文化之路,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 30.凌纯声,中国与东南亚之傣族,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3),1952
- 31.史波,神鬼之祭——西南少数民族传统宗教文化研究,云南,云南教育出版社,1995
- 32.谭继和,论古“江藤”流域聚居文化渊源及其历史发展,四川岷江上游历史文化研究,四川大学

出版社,1996

33.何耀华,古代美人与藏区土著居民的融合,中国西南历史民族学论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

34.何耀华,试论古代羌人的地理分布,中国西南历史民族学论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

35.杨庭硕,罗康隆,西南与中原,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

36.廖伯琴,滕毅的理性之光,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

37.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65

38.方国瑜,方国瑜文集,第一辑,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4

39.张增祺,云南建筑史,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1999

40.姜彬,稻作文化与江南民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41.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7

42.陆翔,王其明,北京四合院,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

43.蒋高宸,云南民族住屋文化,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

44.李允禾,华夏意匠,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5

45.杨昌鸣,东南亚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建筑文化探析,东方建筑研究,下册,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

46.童恩正,四川西北地区石棺葬族属试探—附谈有关古代氏族的几个问题,古代的巴蜀,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

47.童恩正,蜀国境内的各种民族,古代的巴蜀,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

48.叶启桑,四川藏族住宅,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

49.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50.斯心直,西南民族建筑研究,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

51.梁庭望,壮族风俗志,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

52.黄天琪,邹振扬,山地城镇空间结构演变的生态学控制,山地城镇规划建设与环境生态,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

5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巴南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巴南文史资料第一三辑

54.四川省文史馆,成都城坊古迹考,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55.韦东超,王瑞莲,中国民族流变史,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56.张步天,中国历史文化地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

57.罗哲文,黄彬,漫谈塔的来源及演变,文史知识,中华书局

58.黄河涛,禅与中国艺术精神的嬗变,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59.郭瑾,巴蜀摩崖佛寺研究,重庆大学硕士论文,2001

60.黎方银,大足石窟艺术,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61.李泽厚,美的历程,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62.邹德侬,现代中国建筑史,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63.伍敬,地域·生态·建筑,重庆建筑大学硕士论文,1993

64.吴良镛,世纪之交展望建筑学的未来,建筑学报 1999(8)

65.肯尼斯·弗兰普顿,原山等译,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66.蔡云梯,现代山地城市美学研究——体系、观念、方法,重庆建筑大学博士论文,2000

67.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68.邱庆治,绿色乌托邦——生态主义的社会哲学,济南,泰山出版社,1998

69.E.F. 舒马赫,小的就是美好的,虞鸣钧,邓关林译,刘静华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 70.何强,井文通,王淑亭,环境学导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 71.宋晔皓,结合自然——整体设计,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72.林楠,在神秘的面纱背后——埃及建筑师哈桑·法赛评析,世界建筑,1992(6)
- 73.肯斯·弗莱普顿,饶小军译:查尔斯·柯里亚作品评述,世界建筑导报,1995(1)
- 74.戴路,邹德依,印度与西方现代建筑的对话,世界建筑,1999(6)
- 75.William J.R.Curtis, Modern architecture since 1900, London, Phaidon Press Limited, 1996
- 76.毛羽,地域性与本土精神西南高海拔山区城市化与地区建筑学研究,重庆建筑大学博士论文,2000
- 77.黄耀志,山地城市生态特点及自然生态规划方法探析,黄光宇主编,山地城镇规划建设与生态环境,科学出版社,1994
- 78.赵伟,三峡库区院落空间研究,重庆建筑大学硕士论文,2000
- 79.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
- 80.唐璞,山地住宅建筑,北京,科学出版社,1995
- 81.黄天琪,开发生态学与社会城镇的可持续发展,黄光宇主编,‘97让地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7
- 82.黄薇,建筑形态·自然条件·建筑文化,建筑师(56)
- 83.Thomas Herzog, Solar Energy in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New York, Prestel, 1996
- 84.李富政,巴蜀城镇与民居,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
- 85.李富政,中国羌族建筑,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
- 86.李长杰主编,桂北民间建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
- 87.杨大禹,云南少数民族民居——形式与文化研究,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7
- 88.云南省设计院,云南民居,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
- 89.重庆市博物馆,巴渝文化(1-4),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 90.晏昌贵编著,中国古代地域文明纵横谈,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 91.李子贤主编,多元文化与民族文学——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 92.周月亮,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
- 93.向楚主编,巴县志述注,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 94.高介华主编,建筑与文化论集(3),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
- 95.蓝勇,古代交通生态研究与实地考察,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 96.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西南文化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
- 97.孙晓芬编著,四川的客家人与客家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 98.郭东风,彝族建筑文化探源,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
- 99.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 100.侯绍庄,史继忠,翁家烈著,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 101.杨福泉,郑晓云著,火塘文化录,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
- 102.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绿色建筑研究中心编著,绿色建筑,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
- 103.黄光宇主编,山地城镇规划建设与环境生态(全国首届山地城镇规划与建设学术讲座会文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
- 104.方铁,方慧,中国西南边疆开发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 105.杨庭硕,罗康隆,西南与中原,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5
- 106.张诗亚,祭礼与讲礼——西南民族宗教教育比较研究,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5



- 107. 赵万民, 三峡工程与人居环境建设,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9
- 108. 陆元鼎主编, 中国传统民居与文化(1),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1
- 109. 陆元鼎主编, 中国传统民居与文化(2),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2
- 110. 黄浩主编, 中国传统民居与文化(4),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6
- 111. 李先德主编, 中国传统民居与文化(5),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7
- 112. 高亮华, 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 113. 林惠祥, 中国民族史,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98
- 114. 王鹤之, 云南历史文化新探,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3